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Neil Harding
Leninism

列宁主义

[英] 尼尔·哈丁 著 张传平 译

本书是第一部重新全面解读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著作，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理论成果。该书对于列宁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列宁主义的内容以及其作为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思想体系所具有的优点与缺点的原因等诸多问题，向传统的学术判断发起了多方面的挑战。

“一部学识渊博、令人振奋、通俗易懂、使人印象极其深刻的作品，我相信它将成为学生的经典著作，在课堂内外的世界都会引发许多争论。”

——理查德·萨克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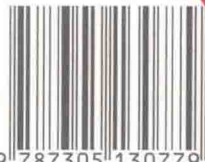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Neil Harding
Leninism

上架建议：哲学

ISBN 978-7-305-1307



9 787305 130779 >

定价：48.00 元



南京大学出版社官方微信 njupress
南京大学出版社官方网站 www.njupco.com
南京大学出版社官方微博 weibo.com / njupco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列宁主义

[英] 尼尔·哈丁 著 张传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宁主义 / (英) 哈丁著; 张传平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8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 Leninism

ISBN 978-7-305-13077-9

I. ①列… II. ①哈… ②张… III. ①列宁主义—研究 IV. ①A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2088 号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Leninism by Neil Harding.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17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列宁主义

著 者 [英]尼尔·哈丁

译 者 张传平

责任编辑 李乾坤 张 静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5 字数 350 千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3077-9

定 价 4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Neil Harding

Leninism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献给

亚历山大·麦克劳德(Alexander Macleod)

加雷恩·维德翁(Gareth Videon)

马库斯·丹尼尔(Marcus Daniel)

本杰明·劳埃德(Benjamin Lloyd)

昆廷·托马斯(Quentin Thomas)

五位最好的朋友

致 谢

在实际操作中,我要感谢菲莉丝·罗伯茨(Phyllis Roberts),她以崇高的敬业精神悉心处理我的原始手稿(即手写稿)。而在思想上,我还要感谢已故的老师、同事和朋友约翰·科尔温·里斯(John Collwyn Rees),他教会我如何阅读文本并且在多年以前曾提议合作写一本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

尼尔·哈丁

目 录

- 1 / 致 谢
- 1 / 导 言
- 15 / 第一章 列宁主义之前的列宁
- 41 / 第二章 1905 年革命
- 57 / 第三章 社会民主党的瓦解和列宁主义的产生
- 89 / 第四章 俄国革命
- 127 / 第五章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
- 157 / 第六章 政治与国家
- 189 / 第七章 政党, 阶级和意识
- 219 / 第八章 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
- 243 / 第九章 确定性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
- 271 / 第十章 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 295 / 第十一章 结 论
- 313 / 附录 1 1870—1924 年的重大事件和列宁主要著作年表
- 335 / 附录 2 《列宁全集》导读
- 357 / 附录 3 按主题排列的列宁主要著作
- 359 / 索 引
- 369 / 延伸阅读
- 375 / 译后记

导 言

1917年10月,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the Bolshevik Party)成功地发动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改变了二十世纪的政治进程。人们通常承认,没有列宁,没有列宁思想在俄国社会重要的战略部门中的贯彻,首先是俄国政治,然后是世界政治的这种极端分化,是不会出现的。直到那时,在俄国的社会主义团体的斗争之外,以及在欧洲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无关紧要的团体之外,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实际上并不为人所知。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俄国的成功,列宁主义就会毫无疑问地汇集到那些令人难以相信的社会主义宏大剧本之中去,在这个剧本中,其主要人物早已无可奈何地湮没无闻。大约六个月前,对于很多人(甚至在政治立场上接近于列宁)来说,列宁的命运也不过如此。列宁的思想即使对于俄国和欧洲极端的左派社会主义者来说也是一种极端,其财政和组织资源也无足轻重。他几乎不能展示一个天生的领导者所具有的雄辩威力和传统的超凡魅力。这个健壮矮小、沉默寡言穿着破旧大衣,在孤独的流放期间,在瑞士公共图书馆度过了战争的岁月的人,几乎不被看作是适合在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领导一场革命,更谈不上会威胁到已经确立的世界秩序的基础。

随着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列宁主义突然登上国际舞

台,从那时起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和俄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列宁主义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为全面的替代物。自始至终,列宁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之上,即整个历史时代,生活方式和文明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失去其存在的历史权利。它的时代已经结束。它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把死亡带给世界。这种文明和时代正在佛兰德斯(Flanders)的腥风血雨中垂死挣扎。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早已失去了竞争性和进步性,它已变为垄断的和军事化的,对内进行压迫,对外进行专制。因此,由列宁发动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不是一场旨在扫除专制制度和封建地主残余的反对俄国沙皇的革命。它不能被看作是一场追赶欧洲的狭隘的余兴表演,而应当被看作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开创一个新时代的革命;应当被看作旨在最终消灭剥削、不平等和战争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它向资产阶级世界的价值、制度和实践宣战。当它谈到战争时,它意味着战争——革命和内战是为了创建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和价值体系而改造人的唯一方法。列宁主义是一种具有战斗精神的分离主义的思想体系,它确立了我们这个世纪国际政治中显著特征,即意识形态的两极世界(the bipolar world)中的一极。

列宁主义也是执政的共产主义的理论,这种共产主义的政策和行动总是参考经典文本、组织的实践和战略的指令来证明其正当性。它许诺要创造一个完全崭新的物质财富、权力和地位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不仅将消灭人对人的剥削,而且逐渐消灭社会的统治和依附关系。它将终结匮乏,从而终结政治的进程。

这本书把批判性研究作为一种世界观、作为对现代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实的一种理解方式。因此,我的主要目的是对列宁主义为其追随者所提供的意象图(mental map)加以说明,通过这种意象图,其追随者进行自我调整,达到识别朋友,并激发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反对已被察觉的敌人。现代意识形态的任务首先是对支持者进行定位,并引

导他们去改变或保护现存秩序。为了完成这种任务,意识形态必须向它的支持者提供一种看似可信的说明,他们是谁,他们目前的地位是如何造就的,通过什么具体的战略可以改变或捍卫他们的未来。

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列宁主义产生所必备条件是,它必须把自己的独特性及其魅力的基础与其他所有竞争对手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它不仅要把自己与广泛支持现存财富和权力分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区别开来,而且还要把自己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并揭示他们同样都陷入到错误之中。与所有的意识形态一样,列宁主义在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必须通过哲学的、社会学的、经济的和历史的分析,揭示所有竞争性的意识形态的错误。

具有深厚历史和普遍传播、基础广泛的意识形态,总体上很少关心其理论基础的内部或不同要素之间的相容性和一致性。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等这些意识形态上的折衷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起源的多样性,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感觉到这具有吸引广大选民的功能。它们组建一种(通常是捉摸不定的)多样性联盟。相反,列宁主义则宣称其哲学的、社会学的、经济的和历史的分析的每一个要素和论述的每一个方面都紧密相连。它能够确保理论本身具有内在一致性(正如列宁所提出“是一整块钢铁制成的”),因为列宁主义只是一个人 在 1914 年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提出来的,大部分重要观点实际上是在 1914 年至 1917 年提出的。本书的部分观点是,列宁主义的的确确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内在一致性,但是这种内在一致性是它被固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为代价获得的,这个时间范围内的异常轮廓线投射出一幅预定的世界图景。

随之而清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解释自身,解释自己的历史以及和其他竞争性意识形态关系的方式都充满着大量实践后果上的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通常对机构的组建方法、团体、阶级和个人关系的处理、公共生活事务的引导都具有决定性影响。意识形态需要付诸政治

实践——它们不是漫无目的地在世界上行走,为了令人信服,它需要认真细致的观察研究和批判。在现代世界中,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像列宁主义那样如此强调变革的意图。因此,列宁主义的责任也相应重大。它首先渴望用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来激进地重建人类的所有关系: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法的、美学的和个人的关系。

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共产主义者实施他们的变革计划提供了机会,也给他们带来了适应急剧变化的环境的艰难任务。抽象的理论体系现在不得不转化为政策指令、具体的计划和执政当局的立法和行政命令。因此,我们关注的部分内容就是要说明和批判作为一种可操作性的意识形态和作为一种权力结构的列宁主义的实际含意。

很显然,对读者来说,我已经提出了一整套的论点,这些论点本身在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研究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将向读者证明这些观点,例如,1917年,列宁主义向它的追随者提供了一种综合的世界观——关于他们是谁、他们的现状又是如何造成的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说明,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我也坚持认为,列宁主义作为这类意识形态中显著的一种,在1914年至1917年基本上形成了,而在这之前并不存在。革命的意识形态当然也要向其支持者说明,他们如何从一个受鄙视的现在到达理想的未来——他们制定变革的策略。我赞成说这在列宁主义那里也做了详尽的阐述。尤其是我已经提出,列宁在主要观念上所具有的这种或多或少的完整性或一致性确实宣示了列宁的行动,成为吸引俄国民众(和世界人民)的基础,对苏维埃政权的制度和实践产生决定性影响。几乎在本书的每一章中,我都坚持认为,与大多数的评论所提供的理解相比,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即使是修正的或更新的)更加真实可信。我认为列宁主义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高度理论化的产物(在此,我强调我不是在称赞它)。列宁主义的显著优点和显著缺点都完全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

至此,本书的总体解释思路就清晰了,但是,此时此刻,如果把对列

宁和列宁主义所作的不同或对立的一些主要解释概括一下,可能会对读者具有指导作用。

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思路(我们称之为“基本立场”)认为,列宁的天赋在于他有能力把握具体形势的发展趋势。作为一名政治革命的实践者,他是举世无双的;然而作为一名理论家,由于他的立场变化前后不一,非正统的和反复无常,因而无足轻重。这些“基本立场”是如何通过一代代著名学者在其著作中的重复而被条理化和神圣化,这个历史过程也有人加以探讨。^① 这些“基本立场”还有很多不同说法和补充观点,但我们认为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早期论述具有代表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宁在理论方面是不严肃的;他的天才表现在他具有在具体形势下处理政治现实的本能。他制定并实施自己的策略,既不管别人的理论立场也不管他自己过去的理论立场;然后用马克思主义文本加以证明。”^②

学术如其人。当列宁被描绘成老练的追求权力的机会主义者时,列宁主义就被看作是一个组织化的密码——由集权的、富有纪律的政党所掌管的一套组织规则和动员机制。西方评论总体上认为列宁主义是第一个把握了群众动员新途径的潜力的现代意识形态。由职业鼓动家和宣传者所熟练控制的现代传媒,常常会制造和激化公众舆论。从国内的少数民族到没有土地的农民,极不相同的群体的怨恨情绪都被由党所控制的前沿组织所利用和诱导。对列宁主义的这种认识完全与作为共产主义政体和意识形态的流行理解模式极权主义相呼应,这一点也不奇怪。控制机器又一次被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教条化的党和国家借助现代科技发动控制机器来禁锢人们的思想,动员、引导和规范

^① N. Harding, 'Lenin and his Critics: Some Problems of Interpretation', *Europe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xvii (1976).

^② E. Wilson, *To the Finland Station* (London, 1940) p. 390.

- 6 公民活动。列宁主义在这里被看作是早熟的极权主义，列宁早期对于党的组织的论述（写于1902年）也因此成为很多评论家探求列宁主义起源的地方。

一种持类似的或赞同的观点认为，虽然列宁主义关于政党组织和革命动员的思想与当代欧洲的政治实践完全不一致，但它却正是落后的俄国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人们曾经认真地梳理出诸如扎伊奇涅夫斯基(Zaichnevsky)、涅恰也夫(Nechaev)和特卡乔夫(Tkachev)^①这样一些“先驱者”，认为他们为列宁提供了如何改造社会的方案。他们认为，历史进程能够通过具有献身精神的、训练有素的、无情的少数人的有意识地干预而被改变，如有必要，可以通过恐怖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在一些评论家的心目中，这种观点可以从马克思自己于欧洲革命风起云涌的1848—1851年充满激情的著作中找到部分根据。正是这种“唯意志主义者”的马克思，即一个对欧洲反民主的倒退孤注一掷地加以批判的马克思——一个一心要在落后的德国发动革命的马克思——是列宁主义所津津乐道的。而更加成熟的和决定论的马克思，即强调新的生产力逐渐产生新的阶级关系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历史阶段；随着资本主义走向完全成熟，它的矛盾和不稳定也渐渐暴露出来；人们通常认为，这个马克思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没有多少影响。^②从这个角度来说，列宁主义是一种落后的政治学，它只是采用了马克思主义一些词句，但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因此，我们经常引用东方列宁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划分，并据此把马克思思想的起源、理论和方法论等内容都被视为浑然一体的西方传统

^① 例如，考虑一下A. L. 威克斯(A. L. Weeks)不合时宜的刺耳书名：《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彼得·特卡乔夫的政治政治传记》(*The First Bolshevik—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eter Tkachev*) (New York, 1968)。

^② 这是对波特莱姆 D. 沃尔夫(Bertram D. Wolfe)一般观点的总结。

思想之网的一部分。^①

本书探讨了关于列宁主义本质的各种广为流行的说法。它揭示了列宁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它的确使作为阶级战争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生。然而不应该设想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紧密就会有好的口碑,相反,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列宁主义再现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教条而狭隘的主题。总而言之,只有把人格化的(hypostasized)和净化的(sanitized)马克思与神化的(mythic)列宁对照起来,才能看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显著差别。

也许我应该在此指出这种显而易见(但常常被忽视)的事实,列宁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与我们当代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主题所关注的是人的异化和异化克服的可能性,这些著作那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大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意识形态,毕竟是公开发表的言论)。马克思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这些早期著作,并且拒绝其追随者要公开发表这些著作的要求。我在别处已经指出马克思小心谨慎是很有道理的。他承认(正如后来的列宁主义者承认的那样),他们对包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内的看法与马克思成熟的意识形态对于敌对阶级的战争分析极其不同,这种成熟的意识形态仅仅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全面的(即使是简洁的)表述^②。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既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只是在19世纪20年代由梁赞诺夫(Riazanov)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Gesamtausgabe*)中第一次公开发表,随后于1956年在俄国发表,那么指责列宁没有吸收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就是明显地不合时宜。总之,很清楚的一点就是马克思自己从来没有打算使它们成为其公开的易于理解的学说的一部分。

^① 例如,R. N. 贝尔基(R. N. Berki)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的起源》(*The Genesis of Marxism*) (London, 1968)第2页中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具有潜在的一致性,通过把马克思的思想看作是实现了在欧洲传统中确定的出发点和重要观点的“综合”,这种一致性就很容易被发现。

^② N. Harding, 'The Early Marx and the Decomposition of Marxism', *Studies in Marxism*, 1, 94.

下述评价认为，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广义意识形态，它源自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作的一种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它的动员号召力源自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衰退所作的看似合理的（却是极其僵化的）分析。它的真正思想来自于一种哲学体系的迷人确定性，这种哲学体系声称其方法和结论在一切方面都优越于所有的资产阶级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明中，列宁主义的历史分析增添了一个最后的阵痛阶段——垄断的或金融的资本主义阶段。这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顶点，在这里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都达到紧张的顶点，并同时包含从全球范围内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切必要条件。至此，应该清楚的是，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高度理论化的意识形态，它自称是各种观念的一个总的解释体系——一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物都概莫能外，至少在原则上都可以根据其思想结构加以说明。它满足于自己的自足自立——它不依赖资产阶级科学。

列宁主义的巨大吸引力在于它不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进行了全面批判，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替代方案。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在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中感受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受到剥夺、异化、剥削和边缘化，对于这些人来说，列宁主义为他们的苦难提供说明，鼓励并组织他们起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列宁主义向对受剥削的工人许诺要消灭雇佣劳动；向贫穷的农民许诺要消灭地主所有制；对殖民地被压迫的民族来说，列宁主义在共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会伸出援助之手；对于有良知的慈善家和知识分子来说，列宁主义许诺它是消除社会不公的捷径；对于希望世界更加美好的梦想家来说，列宁主义发誓要消灭战争和国家间的对抗状态。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诺言和行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致人们指责执政的列宁主义所带来的实际上与它所许诺的东西正好相反。但是据以判断并发现列宁主义不足的正是其主张。它最终要被抛弃，不仅是因为它不能实现它自己所传播的理想，而且是因为它都不再宣称自己正在逐步实现这些理想。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列宁主义,就其起源和内容来说,最好是被理解为是对世界大战的一种反应。在列宁看来,已经导致这种流血冲突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文明最终不可避免地要丧失其存在的权利。所有支持本国参战的这些人,以及那些无论是持保留或警告态度的人,也同样会失去被视为是进步人士的资格,更不用说被视为是社会主义者。这些就是列宁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即刻作出的武断结论。它们是最基本的主张,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批判,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日益临近和不可避免之信念的列宁主义,在1914—1917年间在这些主张的基础上很快形成。正是战争促使列宁来分析民族对立和军国主义发展的经济根源。他在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这本书中给出了这种结论,这些结论成为列宁主义其后不变的世界观。列宁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已经变成垄断和寄生的资本主义。它只有通过对其殖民地的残酷剥削才能生存。考虑到有限的世界疆域和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展剥削范围的无限欲望,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来冲突。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变成了军国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对外侵略扩张和对内进行镇压。最为重要的是,军国主义和战争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内在本质——它们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系统功能。列宁对资产阶级国家和政治的分析同样也是以非常的战时状态为前提的。对公民权利进行压制;对工人权利采取严厉的法律限制;资本主义国家侵入到经济和社会的管理;面对国外威胁而采取审查制度和强行一致——所有这些都列列宁主义视为是当代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和普遍的特征。说也奇怪,正是对帝国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威胁的分析,促使列宁在1917年迫切要求毁灭民族国家,这是因为,民族国家已经最终表明它本身与争取世界和平或自由的目标极不相同。

战争的经历使列宁对资产阶级政治学进行了激烈批判。战争证明和加强了列宁对代表制或议会制民主政治所抱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成见。如果这样一种政治体系会导致野蛮、同胞间的相互屠杀,那么这种

代表制民主政治就糟糕透了。这种民主政治因此也宣告了自己的破产。列宁此时转向无懈可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议会制或代表制民主政治是建立在一种根本上是错误的观念的基础上。这种错误观念就是由全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们坚持不懈加以培育的信念，即完善普遍接受的宪法构架来和平地协商现代社会中不同团体的对立主张，这既是可能的，又是令人向往的。在“资产阶级”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令人欣慰和系统维持的托词之上的，即如果有善意和合适的机构，公共利益可以进行调解和协商，这就是欧洲所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左、右和中间派所宣扬的一体化和调和的政治学。每一个派都声称代表全体人民的实际利益，每一派都断言自己超越了集团、阶级和地域差异。

列宁主义一开始就大喊大叫加以蔑视的正是“公共利益”或“民族共同体”这个观念。它的第一句话就让追求这种幻想的人无法容忍。他们不是有权势的战争贩子的有意识的帮凶，就是无知的受骗者。列宁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根本教导首先被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悄然忘记，然后是完全地背叛。他们忘记了马克思方法论，即在相互敌对的阶级的划分中，经济利益居于基础地位。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不拥有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人之间，是不可能持久的和平。相反，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最后的和垂死的阶段，这种对立的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就会变得更加明显。在列宁主义看来，它们彼此的要求是不可调解的。资本主义不可能自愿放弃对工人的剥削，工人阶级不也会放弃结束剥削的战斗。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利益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它是哪个阶级将在社会中将拥有财富、地位和权力的根本对抗，设想这种对抗可以通过在议会大厦里彬彬有礼的、绅士般的争论可以进行调和是荒谬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在列宁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和历史经验同时表明，这种涉及在社会中各阶级财富和权力分配的决定性问题，只有通过暴力才能解决。在垂死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部死亡的战争时期，马克思以前的门徒不仅忘

记了这些基本的思想,而且断然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资产阶级主人视为一体,因而是十分可鄙的。在帝国主义国家及其拥有者处于极其危险的时期,欧洲的“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却投降了。他们不是尽其职责来实践他们自由地向社会主义国际许下的诺言,竭尽全力去阻止战争的爆发,如果战争爆发,他们就利用战争带来的混乱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相反,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们事实上都站在他们“本国”政府一边。他们都充当了保护资本主义的利润和殖民地野心而使工人相互残杀的鼓吹手。列宁立即宣布第二国际或社会主义国际的旧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和破产了。它的领导者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叛徒。他的结论是直率而武断的:必须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净化马克思主义,清除背叛者,创立新的革命国际。

11

当列宁主义被有意识地系统阐述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之时,这也是分化的战争时期,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区别并对立于全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派别,而且区别并对立于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派别:1914年是作为一种综合化意识形态的列宁主义的诞生之年。

列宁有生以来第一次深信,他有着不二的责任来重申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革命,并且在当代世界革命的经济和政治的条件下重新阐述世界革命。他着手思考的主题第一次不是以俄国为参照中心,而是在全欧洲甚至是全世界都具有意义。直到这时,列宁还从来没有试图论述一下国际政治经济、欧洲社会主义史或者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以及如何建构或实现一个代替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或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的确如此,直到这时,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或其实现的必要条件,列宁实际上没有写下什么。以后他写的也很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三年内,列宁最主要的方面定义了经济的、历史的和政治的世界观,这些世界观后来成为列宁主义的特色。因此,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就其不是漫长历史过程中广泛传播的众多思想家的综合物来说,列宁主义是独一无二的。相反,它是在极其紧凑的一段时间内的一个人思想的产物。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原因,列宁

主义变得清晰和连贯,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列宁主义又显得视野狭隘和凝固僵化。

- 12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列宁主义的风格是直截了当的对抗。它试图使两极对立而不是去调和它。它的目标正是要攻击欧洲政治共同的话语。它是一种不相融合的和分离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不仅以与欧洲政治的前提和基本原理决裂而感到骄傲,而且以自己不断挑战政治世界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而自豪。受压迫和剥削的殖民地和(占人口绝大多数)“落后的”地区并不注定是世界的边缘——它们不是“发达的”国家的政治客体,而是它们自己的政治主体。它们在现代历史进程中起着主导的、真正至关重要的作用。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以及全球反帝国主义斗争逐步走向社会主义斗争所具有的相应的意义,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列宁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成功之处和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对当代政治表演舞台的重新界定。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列宁主义为他们遭受外国资本和皇权的羞辱提供了历史说明,对受剥削的工人和农民来说,列宁主义为他们的剥削提供了理论说明。对它们两派来说,列宁主义给他们自信,他们为了尊严和独立的斗争是更大范围内全球人类进步斗争的一部分。这可以说是列宁主义吸引力最具潜力和最持久的源泉,这种吸引力在多种情况下仍然具有影响力,只要它所反映的压迫条件仍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其吸引力就会一直存在。

- 至此,我们忽略了列宁主义模式中哲学的重要性,然而读者会发现,与绝大多数著作对这个主题的论述不同,本书专门留出整整一章来论述列宁主义的哲学。以下是简要说明。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很多意识形态在哲学上不是不可知论者就是折衷主义者。同一个意识形态,为了维护其战略或策略命令,从借自于一个哲学学派中的前提轻易地转换到借自于另一个哲学学派中的前提,并没有明显地感到难堪。列宁主义是唯一一个坚持为其追随者强制设定的哲学立场——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政治意识形态。它声称,这种哲学是唯一与被压迫和被
- 13

剥削阶级的进步和变革要求相适应的哲学。之所以如此,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这种哲学一贯地主张自然界和社会的所有现象都是可知的,它们在其进化和发展过程中都遵循可知的法则。第二,这种哲学能认识到每一个现象的本质,认识到它们在不断变化过程中与其他现象的内在的相互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被称为是唯一能够理解事物的这种复杂的相互依赖和永恒变化的哲学。

在这个问题上,读者也许会倾向于认为,追求如此高度抽象的概念,与现实政治的杂乱事务相去甚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毫不相关。然而,如果我们要试图解释作为列宁主义及其追随者特征的那种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超常自信和确定性,我们就真的有必要努力理解我这里所说的“确定性的哲学”(philosophy of certainty)。至少其领导者傲慢的自信(以及谦卑的追随者的自愿顺从)就来自这种坚定的信念,即唯独列宁主义荣幸地获得了比任何敌对思想体系都更加科学、更加严格和更加精确的知识和方法。他们相信,没有什么现在或过去是列宁主义的理论所不能包容和解释的。这是最核心的防御堡垒,能够抵御任何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者的哲学或意识形态上的进攻,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在其思想自身的结构内,它能够很好地解释他们批判的“真正”根源。这种强制性的哲学基础是企图毁灭资产阶级文明的分裂主义政治运动的黏合剂。它有助于保持其纯洁性和战斗性,为它的活动提供无限空间,并且提供这些行动都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这种令人鼓舞的保证。

列宁重新发现了马克思思想辩证结构中的黑格尔主义根源,这一重新发现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对于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唯一**真正代表这种主张的最终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列宁主义与其他所有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相对抗的基础。这是列宁主义作为现代世界的一种独特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和理论性呈现的时刻。以前列宁从来不敢冒昧地向欧洲社会主义的大师们讲授马克思的方法论,也很少大言不惭地说这些大师们已经深

深地违背和阉割了马克思的方法论。然而从1914年8月起,列宁就开始使之成为其新兴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石。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辩证唯物主义也是这种运动权力结构的重要特色。它声称科学,就其本性来说,就是要对任何问题或者形势给出一个唯一解答,就是要求由单一总路线明确一致地发出的对决策过程的导引(或过去习惯于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对于列宁主义领导人的话语权和合法性来说是重要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哲学被当作是他们的专有领地被小心翼翼地维护着。

导言的目的是概述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要详细阐述的那些主题,使人们了解列宁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所具有的令人注目的复杂性。对于内在复杂性的这种专注,并非出于维护或推荐的目的,而是与上述讨论的那些解释相比较,对列宁主义的吸引力和持久性的来源提供一种更加令人满意和令人信服的说明。这或许也可以揭示列宁主义所经历的更深层次的不幸和悲剧因素,这种不幸和悲剧因素在其无限的许诺和贫乏、通常是粗野的表现之间日益明显的不一致中表露无遗。

第一章 列宁主义之前的列宁

青年列宁——雅各宾派还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西方众多的解释中，有一种关于列宁主义起源的描述过于武断，这种描述歪曲历史事实、忽视列宁大量的早期著作或者轻视其内容。在这些传统的和不严肃的解释中，列宁主义虽不太关注理论^①，但它是独特的，因为它能“现代地”把握宣传所具有的说服力，对动员群众的前线组织具有操纵力。列宁主义的“起源”也因此被指认为是在1902年列宁论述组织问题的著作中，并认为对这本著作影响更多的是俄国本土的密谋传统的影响，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15

^① 埃德蒙·威尔逊在其富有影响力的著作、1941年首次出版的《走向芬兰车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中广泛散布这种观点(尤其参见1960年伦敦版的第390页)。轻视列宁著作中理论的重要性的类似论述也在这样一些富有影响的著作中传播,如:R. N. Carew-Hun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sm* (London, 1950) and J. Plamenatz, *German Marxism and Russian Communism* (London, 1954)。

人们不断重复着这样的一个故事^①：17岁那年，青年的列宁遭受了一次创伤，他从未真正从创伤中恢复——他的哥哥亚历山大(Alexander)因参加暗杀沙皇的阴谋而被绞死。年青的列宁发誓要为哥哥的死报仇，并开始从事其哥哥为之殉难的事业。这被认为是列宁主义产生的心理学基础^②。评论家们都认为不屈不挠的决心和超人的献身精神是列宁及其学说的基础，这就对此作了充分说明。的确，正是在这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不久，刚被喀山大学录取就被开除的列宁，开始经常接触在萨马拉(Samara)的革命小组，并精通了他哥哥为之献身的学说。据说列宁在这里直接从战斗老兵那里掌握了他们的目标、策略和组织原则。根据这种主导性的说明，列宁就带有俄国革命运动的传统印记，并使革命局限于其哥哥死难的那种流血之路。尤其是他开始懂得重视组织的作用，命令和责任的条理清晰的必要性，保密的重要性，以及密谋工作高超水准的重要性。很早他就意识到没有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俄国革命将一事无成。从一开始，新生的列宁主义就清楚地展示

① 几乎所有广泛使用的论述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西方著作都相当重视俄国雅各宾传统的决定性影响。参见，*inter alia*，A. B. Ulam, *Lenin and the Bolsheviks* (London, 1969) p. 108-9, R. N. Carew-Hun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sm*, p. 166; L. B.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1970) p. 4; R. Payne, *The life and Death of Lenin* (London, 1964) p. 30; and S. V. Utechin, 'Introduction' to *What Is To Be Done?* (London, 1963) pp. 28-33. 理查德·派普斯(R. Pipes)的《革命的俄国》(*Revolutionary Russia*) (London, 1968)中试图对青年列宁要感谢俄国雅各宾派的思想传记做最彻底地论述。西恩(R. H. W. Theen)的著作《列宁：革命的发生和发展》(*V. I. Lenin: 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Revolutionary*) (London, 1974)第38-42页几乎复制了派普斯的论述。有关在列宁思想中俄国的雅各宾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主题的最近的变种是由H. 舒克曼(H. Shukman)翻译的迪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Dimitri Volkogonov)的《列宁：生活和遗产》(*Lenin: Life and Legacy*) (London, 1994)。在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1981)第2卷第381-412页和瑟维斯的三卷本《列宁：政治生涯》(London, 1985, 1991 and 1994)中可以找到更缓和和更公正的论述。

② 西恩的著作、内森·莱茨(Nathan Leites)的《布尔什维主义研究》(*A study of Bolshevism*) (Glencoe, Ill., 1953)和沃尔芬斯泰因(E. V. Wolfenstein)的《革命的个人性》(*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具有突出的心理史学的特点。

了自己的独特特征。他专注于组织、动员和操纵的问题。出于这种情结，列宁论述组织问题的主要著作《怎么办》（写于1902年）问世了，并且狂热地要把该书的建议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大会上加以贯彻实施。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不幸地出现了与孟什维克主义相对立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当时和后来都等同于列宁主义。它们成为是同义词，都被认为根植于俄国革命运动狭隘而坚强的传统。人民群众的作用、人民群众追求自由和社会主义的自发运动并没有受到重视，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的地位很大程度上被训练有素的、有献身精神的职业革命家精英所取代。

列宁的雅各宾主义的证据通常会完善和加强这种关于列宁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起源及其与人们所提出的那种“正统马克思主义”日益远离的说法。在这些说法中，雅各宾主义本身经常就是含糊不清的。然而一般说来，人们大概有些共识，即在俄国的语境中，雅各宾主义等于这种主张：一群自认为是精英的人，凭借其知识、奉献和无私精神，比普通群众更能够准确地掌握他们自己的需要。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会预先知道群众的真正（但当时并没有被认识到）愿望，并在运动中坚决地代表人民。因此，革命的前途并不依赖于大多数人的愿望。雅各宾派认为，考虑到国家对教育、教会和军队的控制，在革命之前就希望革命意识广泛传播只是幻想。获得人民支持的途径在于事先掌握国家权力：不是通过大众走向国家权力，而是通过国家权力走向大众——这就是雅各宾主义的政治总路线。在这个意义上，雅各宾主义具有共同信仰者规模小但组织严密的含义，他们要加快历史的步伐，拒绝接受诸如工业发展水平、阶级结构、文化和意识等对政治策略的限制。它通常被看作是唯意志论的同义词——具有献身精神的精英的意志能够战胜此类“客观的”制约。在其俄国的含义中，它一般与那些社会主义者（例如巴枯宁〔Bakunin〕、涅恰耶夫、扎伊奇涅夫斯基和特卡乔夫）相联系，与马克思的意见完全相反，他们认为既然农民和城市工人还没有被资产阶级文化所腐蚀，俄国工业和社会的落后状况就是一个

积极的有利条件^①。因此,组织起来的革命者中少数活跃分子有责任引导俄国直接地和立即地进入社会主义,而不必等待所谓的“物质前提”的成熟。既然在萨马拉和喀山的讨论圈子中,列宁作为一名年轻人,崇拜这种传统余下的老兵,那么这种说法就持续不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民意党人(Narodovoltsy),是曾经强大的民意党(Narodnaya Volya)组织的传奇的幸存者,这个组织纪律严明,密谋技术娴熟。他们试图通过其英勇的榜样力量来唤起大众的行动。他们自封为革命的先锋队,其精锐部队在1881年3月1日成功地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列宁哥哥曾是暗杀小组的一个主要领导人,这个暗杀小组选择6年后的同一天试图暗杀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最后失败,当时他们都自觉地认同雅各宾派公开的民意主义的传统。

一种类似(或意志主义者)的论证迫不及待地断言:证据就在列宁第一次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在1894年《什么是人民之友》中,据称列宁否认俄国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性并极力主张进行共产主义革命^②。根据评论家们的共识,列宁在1905年接受托洛茨基永久或不断革命理论,从而回到了这种雅各宾的意志主义上来。1917年10月,他通过策划一场武装政变(*coup d'état*),最终使他早年与雅各宾主义的联系密切到顶点,这场武装政变宣布在最落后的欧洲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解释框架中,列宁主义的灵魂就是雅各宾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很清楚,我们不能回避列宁主义的历史起源问题,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是因为对其内容的解释和这些内容是何时以及怎

^① 弗朗哥·文图里(Franco Venturi)的《革命的根源》(*Roots of Revolution*) (London, 1964)是对19世纪俄国革命运动中多样化趋势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研究。也可参见:A.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Oxford, 1969), and R. Wortman, *The Crisis of Russian Populism* (Cambridge, 1967)。

^② 派普斯和西恩尤其强力坚持这些主张。

样出现的解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本章随后提出另外一种观点，我认为列宁主义的起源与俄国和欧洲马克思主义传统有着紧密联系^①，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富有特色的意识形态在1914年之前并不存在。就把俄国政治经济环境的落后性强加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之中这个特征来说，列宁更多的是要感到歉意而不是骄傲。他几乎只专注于俄国的事情，从来没有想到要来指导具有无比先进的、有教养的和有组织的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相反地，直到那时，列宁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小学生和学徒。当然这不是说，1914年之前所写的、理论化的和实践的东西对后来的列宁主义没有任何影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将是荒谬的。然而，大多数评论家都全神贯注于组织问题，几乎忽视了列宁详尽透彻地论述当代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著作，这些著作花费了列宁的毕生精力，可以说是列宁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的争论中，正是这些关切使刚到24岁的列宁成为了圣彼得堡最著名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主要发言人。

列宁最初对政治革命感兴趣，然后参与其中，是在其哥哥死去的第二年。亚历山大被处死的创伤完全会对列宁整个革命事业产生深深的心理学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够评估这一影响，不仅是因为这种个人悲剧的影响本质上就难以衡量，而且因为列宁自己对这件事出奇地保持沉默。在其随后事业的整个进程中，在其所有的大量著作和信件中，仅仅只有一处简短地提到他哥哥的死。这或许是伤痛太深而无法言说，并且我们仅能推测这件事对列宁影响的方式。然而，从他在这一时期所阅读的材料、所接触的人和所表达的见解中，我们的确知道从十八岁开始，年青的列宁根本就不是一个典型的或正统的俄国雅各宾党人。当然，列宁参加了经常由声名狼藉的俄国雅各宾党人出入的圈子，但是这

^① N.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 1, London, 1977; vol. 2, London, 1981).

个圈子在意识形态路线上从来不是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其他的圈子可供想要成为革命者的人参加。他们中间有温和的民粹主义者,这些人相信只要通过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耐心地关注农民的文化和愿望就能够确保社会主义的未来。他们中也有干劲十足的雅各宾派,这些人认为等待向社会主义的这种变革是一种怯懦表现并会适得其反。他们声称,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由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构成的有凝聚力的组织,他们发动政变,夺取国家权力并利用这个权力使俄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

理论问题——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革命家中间,关于组织和策略问题的争论更多地充满着关于俄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能性道路的争论。这就是所谓的“俄国资本主义命运”的争论^①。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前,俄国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无疑是痛苦的)资本主义阶段?正如马克思的学说似乎所暗示的那样,俄国必须重蹈西欧发展的历史道路?“例外论者”(the ‘exceptionalists’)或俄国民粹主义者通常认为,俄国不是也不应该是西方实践的奴隶。俄国的发展规律不是必然要与西方的发展规律相同。他们特别提到了唯一在俄国保存下来的土地占有和分配的古老形式,即土地的所有权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国家。正是当地的农村公社(俄语是 *mir* 或 *obshchina*)把土地分配给每一个家庭,并定期对土地重新进行分配使得土地分配大体上与家庭的规模相匹配。在民粹主义者看来,农村公社代表着对社会正义的本能赞同,代表着俄国民众的社会主义天性。它能够而且应该用来作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的确,农村公社多次成

^① 这是俄国民粹主义最有条理的一个文本的标题,质疑的正是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可能性:V. V. (V. P. Vorontsov), *Sudby Kapitalizma v rossii* (St Petersburg, 1882)。

为俄国伟大历史命运的信号——为世界其他地区走社会主义道路指明方向。因此他们认为,正是公社拯救了俄国人民,避免了欧洲其他地区小农家庭的可怕命运——由于圈地和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的推进,他们的土地被剥夺,他们被迫成为大城市中贫困、受剥削和雇佣劳动者。他们认为,在俄国重复这些灾难不仅在道德上是不能容忍的,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幸福。

在民粹主义者看来,俄国资本主义不可能走向繁荣,究其原因它还有很多先天不足。俄国没有由良好的铁路、公路、运河或海上交通紧密联系起来人口聚集的中心。人口稀少,散居各地且缺乏便利的交通。原材料也同样分散在各地,很难利用。不仅远离俄国市场,更重要的是也远离外国市场。建设良好的交通网络把原材料和生产中心连接起来,以及把它们与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连接起来,这些建设费用对于俄国生产的工业商品来说都是一大笔额外的费用,从而使它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劳动力成本也有同样的情形。众所周知,俄国的气候是严寒的和不宜居住的,与西欧比较温暖的国家相比,俄国工人仅仅为了保持作为劳动力的存在的健康状况就需要花费更多的衣服、住房、燃料和食品。反过来,这将使他们生产的产品增加一个额外的费用。总之,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在道义上不受欢迎,造成社会分裂,在俄国的实践中行不通。资本主义的当下存在更多要归功于为确立重要经济领域的战略地位而进行的政府资助,而不是出于国内市场的自然要求。他们的结论是,俄国的资本主义是温室植物,一旦维持它的人工条件被废除,它注定是要死亡的。真正的俄国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俄国自己的组织机构、实践和成见的基础上。它将是高度分散的(自由公社的联合体),如果明确不敌视的话,也许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它将建立在农民和工匠的公有制生活和社会同质化的基础上。

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后期俄国革命者圈子中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到何种程度?它还在发展

吗？它已经渗透到农村还是局限于城镇？从更加专业的层面上说，这是关于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再生产自己，或简单地说，能否保证其继续存在的争论。这里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资本主义是否假定了一个已经存在的供其生产商品销售的广阔市场？或者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它创造了这样一个市场？这些问题是 18 至 24 岁的列宁参加的革命者圈子中激烈争论的问题。列宁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对马克思的强烈兴趣。他在 18 岁那年就已经阅读了《资本论》第一卷，从那以后就对马克思的所有著作怀有极高的兴趣。我们看到，从 20 多岁起，列宁作为一名对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进行持续的、见识广博的批判家在当地很有些名气，包括对雅各宾主义的批判。他已经开始着手一个庞大计划——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彻底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关系的程度，尤其是在农村的程度，这个计划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直到世纪交替才完成。在 1893 年，当列宁决定离开萨马拉到圣彼得堡时，他已经完成了对俄国社会主义者（或民粹派）的经济和社会观点的深入而详尽的批判。这项工作的第一部分在第二年出版，正是作为秘密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争论的第一次公开回应。^①

列宁早期在理论上的主要兴趣是要完成对俄国经济和社会分析，这项工作于 1892 至 1893 年在萨马拉就开始了。1899 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的出版，标志着这项巨大任务的完成^②。这是他无与伦比的、最为重要的早期著作，也可以说是他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创造性贡献最大的一本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他开始系统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作出说明，并试图把具体的地区和行业与这种发展阶段相对应^③。他赞同普列汉

^① V. I. Lenin, "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 and How They Fight the Social-Democrats", CW, 1, 133 - 332.

^②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重要的《列宁全集》第 3 卷的全部内容。在列宁的通俗著作或学术著作中很少关注这篇至关重要的文本即七年不断研究的总结。

^③ 《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598 - 599 页对俄国资本主义渐进的进步作用作了简短概括。

诺夫(George Plekhanov)的观点,认为 1861 年农奴解放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根据解放法案(Act of Emancipation)的条款,通常由农民公社所持有的土地所有权已经正式属于农奴自己。农奴要向其当地的地主履行劳动服务的法律义务被废除了,但是,作为补偿,每个公社必须向国家交纳一种所谓的“赎回金”(redemption monies)。这意味着每个公社必须向每户农民征收现金税。农民突然间必须要适应商品经济的很多问题。因此,他们的生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存。他们以相对适度的规模被卷入到农业产品、手工艺产品的市场交换——为了卖出商品,他们不能再为自己而生产或进行物物交换。现在,他们必须获得现金来满足公社对赎回金的需求。为了获得现金,他们不是被迫交换他们的产品,就是被迫出卖他们的劳动力。

必然会有很多农民交不起他们应向公社支付的赎回金。他们受制于较富裕的农民,这些较富裕的农民变成放债人或高利贷者,他们以高额的利息而不是以贫穷农民未来收成作担保进行放贷。由于掌握了日益遥远市场的知识,拥有保证运输、渡过收获季节和售卖季节之间间隔的资源,农民高利贷者迅速地成为中间人或商人。他们以收购的名义购买农民的小量剩余物,并把它们集中起来投放在买卖市场。他们自然要索取他们的利润,小农越是具有依赖性,商人们越是能提高自己的利润,其客户的依赖性和债务也随之越来越大。

22

当一部分农民快速地变成这种情形时,他们土地的预期产出很可能不足以弥补不断增长的债务,这时,他们被迫用他们拥有的唯一剩下的有价值的东西——他们自己的劳动力来抵押。现在商人们从现金的借出者变成了劳动力的雇主。他们建立工厂和车间来生产木材、农业产品、羊毛和矿石等等。这就是被称为“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二阶段。商业资本变成生产资本,虽然它仍然是建立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但具有了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从这时开始,购买节省劳动力的装置、机器和建立大规模机械化工业车间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步骤。现在生产资

本则完全转变为工业资本。

某些一般特征日益显示出来，它贯穿于这个复杂而多样的过程，这些过程在国内不同行业 and 不同地区的进程极不平衡。市场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差不多使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而只是使少数人富裕起来。迄今为止大多数独立的农民和工匠在自己的土地和车间里生产的东西，现在则不得不到市场上购买。就资本主义而言，只要他们不得不在市场上购买的东西的总价值在不断上升，那么作为个人他们能够消费的东西比他们以前享用的要少这一事实就并不重要。列宁得出结论说，市场的发展不只是使大众遭受贫困，实际上更是以此为前提的。

23 在这本对俄国社会进行理论分析的著作中，列宁试图证明农民越来越被分化为没有土地的、被迫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农村无产阶级和在不同阶段都不断增强其资本的农村资产阶级。在列宁的政治策略中，农村无产阶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团体。除非城市工人设法获得农村无产阶级的支持，否则民主革命将前景黯淡。然而，既然作为雇佣劳动者他们拥有共同的客观利益，既然他们都共同仇恨资本主义剥削，可以预见劳动联盟就能够建立起来。在这个联盟中，城市产业工人尽管在数量上较少，但却成为领导核心。他们一起被吸引到巨大的车间，他们的信息联系被很好地建立起来，他们是流动的，他们能够相互借鉴彼此的经验并开始总结他们的要求。他们早就从某个具体地主或高利贷者的人身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摆脱了村里长老或教会的权威，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并开始意识到他们集中起来的潜在力量。他们最终集中在最具有战略性的至关重要的乡镇和城市，尤其是两大首都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城市无产阶级是“俄国整个劳动和被剥削人民的唯一和天然的代表”(Lenin, 1960—70, vol. 1, p. 299)。他们在俄国大量分散的雇佣工人中独一无二，他们具有成为真正的阶级存在的潜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的雇佣工人中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全国性组织的这种潜能。

沟通工人的桥梁——政治通过经济来实现

当列宁 1893 年 8 月底到达圣彼得堡时,首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正式的组织,与产业工人的联系几乎没有。主要的团体(列宁立即加入的)建立在科技协会的基础上,它以学生和知识分子圈子中偶尔讨论理论问题的形式出现,它的成员数量很小,资源很少,与俄国其他马克思主义团体的联系极其有限。1893 年冬天,圣彼得堡小组第一次齐心协力建立与工人阶级联系的桥梁。他们承认只要社会民主党仅仅局限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内,那么它就会孤立无援和徒劳无益。此时他们采取的策略是,把研究的圈子和马克思主义讨论小组从工艺学校中走出来并深入到工人中去。列宁被分配到城市中重要的涅夫斯基门(Nevsky Gate)地区,他开始组织工人小组,意在全面地引导他们学习马克思论述经济、历史和政治的全部著作。其目标在于培养最活跃和最有智慧的工人,使他们能够懂得俄国社会各阶级和集团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形势之间的联系。然后,那些工人鼓动家会按照计划建立起自己的圈子,培训新的会员,这些新的会员会依次做相似的工作,如此这般在范围上不断扩大,直到整个工人阶级都是有意识的和有组织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培育社会主义意识的连锁信(chain-letter)战略。

24

在实践中,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倡导者遇到了工人们形形色色的并且通常是令人困惑的回应,甚至在受过很好教育和积极的工人那里也是如此。有些人(像列宁的学生巴布什金〔Babushkin〕)是热心的追随者,通过搜集工人苦难的详细资料以及与圣彼得堡的主要工厂建立起联系来直接帮助他们的老师。其他人则带有一些怨气,“学生们”可能像过去一样,突然出来承诺支持工人,当斗争爆发后他们就消失了(或当放假时,他们都回家了)。还有一些人把这个圈子看成是获得知识和文化的一种途径,这些知识和文化可以使他们避免工人阶级的残酷生

活和不安全感。正因为如此,当 1894 年末在涅夫斯基街区庞大的谢米亚尼科夫(Semyannikov)工厂发生罢工和骚乱时,很多列宁的学生几乎是招摇过市地站在一旁,就像是无知大众的最初反应一样,远离他们看到的一切。到了 1895 年初,列宁已经意识到工人学习圈子所扮演的暧昧角色。他们面临着培养某种工人精英的考验,这些工人精英对其工友的混乱状态和好斗行为表现出公然的蔑视。

到了 1895 年春天,在马克思主义核心小组内还有相当多的讨论,是否要转变到一个全新的策略上来,解决大多数工人直接而强烈地感受得到的经济上的痛苦。列宁赞同这个新策略并和马尔托夫(Iulii Martov)(马尔托夫在 1903 年后,成为反对列宁的孟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结成受欢迎的联盟。马尔托夫刚刚到达圣彼得堡,他曾经是俄国西部边陲比较成熟的犹太工人运动中活跃的组织和鼓动者。马尔托夫随身带一本他帮助写作的纲领,名称是《论鼓动》(*On Agitation*),它的基本意思是,工人们不是通过书本学习和理论上的训练,而是通过反思战斗的经验而走向社会主义,这些战斗是他们为了改善自己悲惨的经济条件而不得不战的。争取更好条件,提高报酬和安全,从很多工业机构所特有的残忍待遇和任意罚款中解放出来,这些斗争将使工人们懂得团结和预先组织的重要性。经济斗争将使罢工资金的设立和管理成为必要。在一个工厂内部各车间之间以及与当地其他工厂之间的协调必须得到保证。苦难必须被清楚地表达出来,无论在哪里出现,都要印刷并散发出去。必须任命得到工人充分信任的发言人。所有这些将提供一个训练舞台,在这里,大多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工人积极分子将迅速学会如何组织和动员他们的同伴(当然,要通过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

根据这个新的策略,政治将通过经济来实现。工人们不可能不明白法律和国家的力量是被用来保护所有者利益和利润的。工人们从他们直接的经验中就懂得只有通过他们积极行动和组织,只有通过不断

拓宽和深化这种斗争,他们的条件才能获得持续的改善。^① 追求直接要求的劳工行动,无论规模是如何的小和具有地方局限性,都会产生一个简单的组织结构。起初,工人们由于缺乏厂内团结,或受到管理层的胁迫,或经由破坏罢工者的渗入而受挫。然后,工人们认识到更精心的准备和组织的必要性。罢工基金将会建立起来,基金本身就需要款项的收集和基金的监管,与其他工厂的协调的必要性就显而易见了。所以代表会议就必须召开。很快地工人们意识到单个工厂和车间的罢工,由于雇主贸易联合会保证在罢工事件中给予多方面的支持而很容易被击败(或安全渡过)。后来,工人们被迫组织更广泛的罢工,包括整个城市或贸易的全部分支机构。反过来,这就需要以更加深入的精心组织为基础。

最后,从共同的罢工经历中,工人们认识到无论是贸易,专业或所属地区,工人的条件在任何地方都基本上相同。工时长、报酬低、没有权利是共同点。在这点上,他们主动响应被概括起来的要求,使所有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的要求。这种要求是由欧洲工人在他们五一示威中提出的,要求对劳动时间的法律限制。这些示威的新闻以及著名“国际”(第二国际或社会主义国际,1889年建立)协作力量开始以传单或由社会民主党出版并由工人团体复印的小册子的形式广泛传播。在列宁看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或许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代工人运动已经开始采取断然行动来与政府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

26

“任何阶级斗争都是一个政治斗争”,这当然一直是俄国民民主党的一个口号;马克思也说过这句话,普列汉诺夫曾经把这句话作为其开创性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Soc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Struggle*)

^① 这些是“*Ob Agitatsii*”(论鼓动)纲领性声明的主题。由A.克雷默(A. Kremen)和马尔托夫撰写,1896年在日内瓦(Geneva)第一次公开出版,但早在1895年就已经被圣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当作纲领来采用。《论鼓动》由本书作者翻译并收录在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1879—1906年的重要文献》(*Marxism in Russia, Key Documents 1879—1906*) (London, 1983)中第192—205页。此后是作为哈丁1983年的著作来引用。

的格言而加以引用——这本著作第一次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的社会条件^①。然而,经常会是这种情形,越是著名的简洁词句,其意思越是含糊不清。对列宁来说,1895—1896年的事件极其鲜明地揭示了这个基本格言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真理。《论鼓动》的理论思路促使列宁对阶级的发展阶段、意识和组织进行反思。列宁断言,它们的发展是工人阶级活动的广度和深度的展现。在活动还是小规模(局限于个别车间和工厂),追求的是暂时和有限的利益(归还假期或暂停罚款)的地方,产生的组织将是临时的和易逝的。工人应具有的意识水平和在斗争中生产的意识水平也都是朴素的。在这个进程的另一端,每天8小时工作制,或最小周期工资支付的要求,由于具有普遍性,不是具体的雇工们或雇主联合会就能处理的,它们应当是由政府批准和实施的。没有法规的保障和执行,没有一个普遍的全国性的对违规者进行制裁的系统,这种全国性的阶级需求是不能实现的。由此看来,普遍性的要求、代表所有雇佣工人的要求完全是阶级的需求,在本质上是直接针对政府的政治要求。

27 从这种分析中可以引申出一种更加关键的推断,这个推断是:在对这种普遍性的阶级要求的追求中,鼓动、罢工和示威等等活动要想有成功的希望,就必须在全国性的基础上加以实施。一句话,活动的规模要
和目标相适应。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协调和指挥斗争的组织结构同样地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扩展。这种组织必须激发出工人们的这种普遍性要求的意识并加以清晰地表达,而且要以权威的方式代表他们面对政府。在这点上,工人阶级的地区性组织和行业组织必须被政治性的工人政党所超越。在组织领域也是这样,因此当工人的要求、活动和意识扩大到国家的层面时,对工作的组织和指导也需要一种全新的组织结构——工人政党的形成就势在必行。

列宁此时所详细阐述的是对工人的阶级活动、意识和组织从个别

^① In G. V. Plekhanov,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London, 1961) vol. 1.

到一般、从地方到全面发展的一个阶段性说明。这是一个直接与资本主义自然史相当的演进过程，他在对前述过程的说明中引入了很多过去用来描述后者的艺术和图像的术语。小车间(*kustarnichestvo*)过时的方法，连同受到限制的市场或活动领域以及粗陋的分工，是与车间罢工委员会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相比之下，现代工厂精密复杂的科技和复杂的分工就需要一个全国性和世界性的市场或活动领域，这就是列宁过去不断重复地用来描述政党的明喻。贯穿于其中的是从个别上升一般，从特殊上升到普遍的这种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目的论。

在列宁来说，1895年底、1896年6月和1897年1月，发生在圣彼得堡(和其他工业区)的纺织业和钢铁工业的大罢工，似乎在实践层面上为列宁所描绘的进程作了精彩的辩护，这个进程预先在《论鼓动》纲领中提到^①。罢工的确变得更加广泛，不仅表现在罢工的地域传播上，而且表现在他们提出的要求上以及他们匆忙建立起的组织上。1895年底以个别纺纱工和织布工团体提出比较小的经济要求为开端，到1896年年中和1897年春，罢工工人要求制定俄国历史上第一部每天十小时工作制的法案，迫使政府在工人的要求面前让步。按照列宁的估计，斗争的广度和深度确实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了工人的意识。政治的确是通过经济表现出来，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仍然没有任何全国性的政党清晰地表达俄国所有雇佣工人的利益。没有一个永久的遍及全国的政治组织，工人就不能上升到真正的阶级存在——他们就缺乏进行政治斗争的方法和专门知识，正如我们所见，这些方法和专门知识与所谓的真正的阶级斗争是共存的。

28

^① 有关圣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罢工中作用的种种对立解释，可参见 A. K. Wildman, *The Making of a Workers' Revolution* (Chicago, 1967) and R. Pipes,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Saint Petersburg Labor Movement, 1885—1895* (Cambridge, Mass., 1963)。

建立新型政党——《怎么办？》

自相矛盾的是，正是这些年罢工运动的成功阻碍了全国性政党的发展。在1895年11月罢工开始的一个月里，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联合会的整个领导成员都被逮捕，随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列宁的流放期直到1900年1月才结束。与此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于1898年在明斯克（Minsk）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①。由于大会结束不久，几乎所代表都被逮捕，所以这次大会在各方面都是一个错误的开始。领导层又一次被削弱并被驱散到西伯利亚流放。与工业界工人阶级的联系只是零星的并且也不协调。现在显而易见的危险是1896和1897年大罢工所产生的势头由于缺乏指导和领导而消散了。当工人尤其是圣彼得堡的工人变得激进时，当他们在自己的宣言中号召激进的民主变革和实现政治自由时^②，正是在这一刻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早在1897年，列宁就得出结论，如果社会民主党还有一点领导反对独裁政权的民主斗争愿望，他们就迫切需要加强其组织结构。这几年工人运动的成功已经让政府警醒，政府已经通过加强监视、布置更多内奸来加以应对，展示其任意围捕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好战分子的能力。它把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运动作为目标，其理由是它们是挑战其权威的唯一有效力量。为了迎接双重的挑战即面对日益复杂并具有压迫性的政府和开创与领导一场团结所有民主力量的运动，在危险和非法条件下进行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除了熟练掌握秘密组织的技能之外，别无选择。“不加强和发展革命的纪律、组织和秘密活动，就不

^① 1983年哈丁的著作第223-225页载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LD）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② Wildman, p. 83.

可能同政府进行斗争。而秘密活动首先就要求各个小组和个人实行专业分工,把统一联系工作交给……为数很少的核心分子。”^①1898年大规模的逮捕完全证实了列宁的判断,即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涣散和非专业化,除非迅速地加以改变,否则他们自己设定的宏大目标就会继续受到嘲弄。创建一个有凝聚力的全国性政党,不仅能够领导工人而且能够领导俄国社会所有为民主而战的反对派组织,就需要专家、劳动分工(和由此产生的一个权威的协调中心)在密谋技术上的训练。所有这些思想在1897年就详细阐述过,直到1917年2月推翻沙皇统治时,列宁仍然坚持这些思想。当然,这些思想在1902年他著名的小册子《怎么办?》中作了进一步明确的阐述。

到《怎么办?》发表时,在“老”的领导者看来(列宁和马尔托夫此时已经和普列汉诺夫以及阿克雪里罗得〔Akselrod〕结成联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分裂在组织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都更加明显。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俄国国内“老练的”领导者在1895和1898年都被大规模逮捕。取而代之的是“青年的”领导者,他们的确不太激进,不太精通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尚不成熟,也不明智;它自然地会招致政府的全力镇压。

总的说来,新的领导者公然轻视与独裁政府的政治斗争。他们问道,工人阶级为什么要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让资产阶级为民主革命而战吧,我们的战斗是向雇主们争取较好的劳动条件。”——在列宁看来,这就表明与《工人思想报》(*Rabochaya Mysl*)和纲领声明《信条》^②相联系的修正主义的所谓“年青领袖”目光短浅。在列宁看来,放弃真正的社会民主政治,其结果是极其有害的。由于缺乏政治方向,工人运动就屈从于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并使工人运动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丧失自主性的危险。留下的那些仍然牢固坚持政治斗争

30

^① CW, 2, 349.

^② 库斯柯娃(Kuskova)的《信条》的译文和《工人思想报》第7期的“独立增刊”奥米昭著的社论都可以在哈丁1983年的著作第242-253页中找到。

的中心地位以及工人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那部分工人却没有任何有凝聚力的组织,更糟糕的是,试图进行业余的协调活动都会导致逮捕和驱逐。问题已经发展这种地步,工人们正在对社会主义者失去信心,他们对于从事革命事业犹豫不决,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是如此的草率。“工人们说,知识分子太粗心大意,常常遭到破坏。”^①在工人推翻独裁政府的政治斗争有了更加专业的指导和协调以前,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是没有希望的。

在1900—1903年期间,列宁坚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不是阶级辜负政党,相反,是政党辜负阶级。它已经消失在吵吵嚷嚷的分裂大众之中,它们中没有具有财力、意愿、理论训练和组织技能来重建一个领导核心,从而能够协调和指导全俄工人的斗争。列宁着重指出,在俄国社会民主的危机是“领导者……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②。他谴责的不是群众的自发性,而是“领导者们”引导和指导这种自发性在组织上和理论上的缺点。一个正确组建的党的组织并非是减少自发性运动的规模和范围,而是给运动以信心,鼓励参加者的士气。“最广大的群众积极参加”,列宁说:“不但不会因为‘十来个’职业革命家把这方面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而减弱下去,反而会因此而十倍地加强起来。”^③

我们应当清楚,列宁、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在1900—1903年期间所从事的是公开的权力斗争。他们试图在他们的领导下重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其意识形态路线也由他们指导下的一份全国性报纸来发出指令。为了证明老兵和“正统”领导者个人的、意识形态的和组织上的权威超越了“青年派”和修正主义者,就不得不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此就需要精心加以准备。这就是列宁的狂热活动的背景,就是列宁在1900年流放生涯结束后到1903年的布鲁塞尔、

31

① CW, 5, 443.

② CW, 5, 446. 领导者的这种落后是列宁著作中的一贯主题。

③ CW, 5, 465.

后来在伦敦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一期间所有著作的背景。首先,他奔走于全国各地,建立起自己的联系和合作网络。其次,他到国外与普列汉诺夫派保持联系,出版一份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杂志。由列宁主编的第一期《火星报》(*Iskra*)在1900年12月出版。

列宁指出,正是这种在非法条件下来创办与发行一份全国性报纸,就需要创立一个有凝聚力、有纪律性和有效率的组织。在各个地方都需要有代理人,来报道各种事件和创建一个秘密网络向当地车间和工厂的工人进行分发。它们是党与支持群众的联系人,他们与各个地区党的代理人进行联系,然后,由他们对报纸的编辑委员会负责。编辑委员会本身由公认对理论非常精通的运动老兵组成,因此他们能够从特殊中概括出一般,能够预测下一个阶段的斗争。因此,在列宁看来,一份全国性报纸的创办本身就必须发展党的组织(至少是一个这种组织的骨干),使之具有清晰而明确的劳动功能划分和垂直的问责模式。

只有在组织内直接起作用 and 持续起作用的那些人,才能被认为是党的成员。然而,在组织内部,职位的层次和职责的范围不同。在地方一级的代理人,或许专门从事报纸的发送或当地报道的制作,他们的担子不重,还可以正常地找工作。他们在保密工作和地下组织工作方面依然需要一些技术上和技巧上的培训;否则,他们会很快危及在网络内的其他人,并使他们下属的工人小组遭到当局不必要的骚扰。因此,对于信任党的代理人的工人来说,也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密谋技能的培训以减少遭受报复的危险。在组织的更高级别上,代理人不得不在国内大范围地从一个安全的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很显然,对他们个人来说,正常地找工作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在双重意义上必须是职业的,他们依靠党来生活,同时要全面训练并精通秘密活动的各种技能。在俄国的条件下,这些人必须是熟练的、专职的“专家”。

32

“新型政党”出于安全考虑不可能是公开的和民主的。如果它采用西欧政党的实践模式,它将很快被沙皇的密探渗透并粉碎。列宁认为,必然要以职业化的和秘密的方式组织起来,组织的基础就是党的报纸。

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①

我们应当非常清楚,《怎么办?》显而易见是作为《火星报》编辑委员会政治路线的一个总结而写作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党的重建工作中,他们也是试图把《怎么办?》中的主张确立为党的核心思想。这些主张打算用来作为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共同宣言,并且也广泛地运用了。在列宁的所有著作中,这本著作遭到曲解最为严重,它所引发的不当评论比列宁实际上所写的东西还要多。的确,这本著作通常被视为雅客宾式的意识形态的列宁主义的主要文本。人们普遍断言,这里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起源和真正精神。因此,当发现迄今为止小册子最主要的部分是对赤裸裸地重申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老套的(但最近已经被忘记的)正统观念,这种正统观念可以回溯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普列汉诺夫的公式,并且是直接加以引用,这实在是令人惊讶。作为经验丰富领导者的代表,列宁开始严厉斥责形形色色并且通常模糊不清的派别,这些派别对反独裁政治斗争的中心地位争论不休,既拒绝工人政党应该对斗争进行领导的思想,也坚持认为还没有成熟到要开展这项斗争。毫无疑问,像所有为确保自己的领导地位而进行权力斗争的雄辩家一样,列宁和他的同事们在对证据的使用方面也是精挑细选,也倾向于夸大他们的对手的不足。《怎么办?》明确无疑是这种唇枪舌剑的重要组成部分。

列宁和马克思论社会主义意识

在与这些派别进行论战的过程中,列宁在一段著名的段落中断言,让他们自由发展的话,工人阶级不能够真正产生社会主义意识或不能

^① CW, 5, 502.

够清楚地表达他们自己一贯的意识形态。“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von Aussen Hineingetregenes*)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東西，而不是一种从这种斗争中自发地(*urwüchsig*)产生出来的東西。”^①这些话引起了强烈而持续的争论，这里是否表明列宁对无产阶级缺乏信心而诉诸意志主义的政治学。在意志主义政治学中，一批受过训练的党员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桀骜不驯的历史进程。

我们应记得这些主张只是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才提出来的，当时提出这些主张的人曾经遭到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严厉斥责，也在党的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当《怎么办？》第一次公开出版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中以及《火星报》的编辑中，没有一个人对《怎么办？》提出任何实质性的保留意见。的确，这本冗长小册子中的所有主要主题都曾经在列宁为这本杂志精心写作的头版文章中论述过，这些文章在党内主要理论家中也没有引发相反评论。在为《火星报》第一次发行而写的头版文章中，根据惯例，这篇文章应该考虑整个《火星报》编委会的宣传主张，但列宁坚持认为，“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②正如列宁后来在《怎么办？》中所解释的那样，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拥有巨大的意识形态优势——它的意识形态更久远、更普遍，它更加发达，“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③

正如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所承认的那样，列宁“仅仅是在老生常谈，既然工人们不能写作《资本论》或《反杜林论》，或者甚至是《怎么办？》，那么很清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激进知识分子的产物。”^④更重要的一点是，评论家们几乎总是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上面引述的这段过激言词是直接而清楚地引自欧洲社会主义的“教父”卡尔·考茨

① CW, 5, 384.

② CW, 4, 368.

③ CW, 5, 386.

④ Kolakowski, p. 389.

基(Karl Kautsky)的。的确,考茨基说得甚至更加直接,他宣称,“科学的工具”“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①普列汉诺夫也经常表达类似的观点。^②

34 我们很可能会为这些自以为是和傲慢自大的理论态度而感到悲叹,但我们把这些理论态度专门归因于列宁那就错了。它们是当代欧洲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可能也是马克思自己的政治学所固有的东西。首先,马克思自己就坚持与任何朴素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家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他就曾经批驳过魏特林(Weitling)和蒲鲁东(Proudhon)之流的天真和折衷主义。马克思多次宣称,他的第一国际总务委员会秘书处领导工作,只不过是“与试图在国际内部坚持己见,反对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派别和业余实验持续地作斗争。”^③在这封信的后面,马克思声明,除非工人阶级“受过持久鼓动的熏陶……对联合力量如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的打击,”否则,工人阶级在统治阶级手中“将是一个玩偶”^④。如果我们坚信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无论如何,都可以通过工人阶级本身而自发地产生,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马克思一生的工作,他为建构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做了非凡的努力。英国工人阶级的整个历史足以(向马克思和后来的列宁)证明,没有社会民主党在理论的和组织上的帮助,自发的工人运动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政治所操纵。让我们记住,这也适用于世界上规模最大、最集中和成熟的,最具有组织和最自由的工人阶级。正如马克思所察觉到的那样,英国之谜在于它不仅具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贵族和一个资产阶级的中产阶级,而且还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这表明,工人阶级不能够自然地 and 自发地创立社会主义

① 列宁引用的,CW, 5, 383。

② 有关普列汉诺夫论述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两者关系的简短总结,参见 Harding, 1971, pp. 49-52。

③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D. Torr (ed.) (London, 1936) p. 316.

④ *Ibid.*, p. 319.

和独立的政党。

在组织和阐明无产阶级的苦难并领导他们进行政治斗争方面，赋予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以独特的作用，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傲慢的核心，完全不是一种列宁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和以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得不声称，马克思比任何一名无产者或无产者团体都更深刻地意识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目标。马克思在早期就清楚地指出，在有关无产阶级运动目标的估价上，只考虑工人自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究竟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行动已经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①

35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同样清楚地指出，这是“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②很显然，这些人是共产党的领导者，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最终的一般结果。”^③唯独这些个人摆脱了马克思本人的决定论知识社会学的一般原则的束缚，根据这个一般原则，“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④共产党的领导者不仅要设法摆脱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制约，他们甚至要设法比其社会存在就是无产阶级的那些人更能表达真实的无产阶级意识。的确，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无产阶级似乎（正如

① K. Marx and F. Engels, *The Holy Family* (Moscow, 1956) p. 53.

② *MESE*, 1, 43.

③ *Ibid.*, p. 46.

④ *Ibid.*, p. 363.

它在英国)永远沉迷于错误的意识之中并成为有产阶级政治谋划的“玩偶”。

列宁告诫他的追随者说:

回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者向阶级的转变不仅要与它们联合的不断壮大相一致,而且要与它们政治意识的成长相一致。要牢记诸如英国这些国家的教训,在英国,尽管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无产阶级仍然是处于分裂状态,它的当选代表是由资产阶级提出,它的阶级意识被资本的意识形态所侵蚀,它的力量因工人贵族背弃广大工人群众而遭到削弱。^①

用“民主的”和“亲工人的”马克思来戏剧性地衬托精英主义的、操纵人的列宁,这一奇怪策略几乎成为西方评论者论述列宁主义的惯用手法。这一策略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在对那些相信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的自然和自发的结果的人进行公开指责方面,目前尚不能确定列宁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行动和精神。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我们谴责列宁,那么我们也必须责难卡尔·考基茨没有理解或阐明马克思主义——这不是极端的自大,就是十足的愚蠢。

列宁《怎么办?》最初的目的(如完全从文本的比例来看)是要表明政治观点而不是组织观点。其政治信息是:按照其所有的权威文本、纲领和领导者来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对反对沙皇的民主革命的先锋队,已经把领导工人作为自己的任务。它所设想的领导权在1900—1901年出现了,当时工人和学生自发攻击独裁政府的行为显著增加。因此,运动的重心从大规模的地方性的经济斗争转移到一般跨阶级的、全俄政治改革的斗争。因此,这将不得不与所有那些渗透到运动中的人和否认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分析正当性的人进行较量(正如《怎么办?》

^① CW, 5, 443.

的主要文本所做的那样)。对列宁来说,接受所阐明的这场运动的政治目标,就等于接受其集中化、秘密化和专业化的组织要求:“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①

仅仅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才断断续续地有人试图谴责列宁《怎么办?》一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主张。我们应当记得,党在此时再一次充斥着激烈的政治争论和激烈的个人对抗。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坚持认为有必要把《火星报》的编委会由6人减到3人(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从而伤害到被流放的老兵(查苏利奇〔Zasulich〕、波特列索夫〔Deich〕、阿克雪里罗得),这些人对报纸的编辑工作没有什么贡献,只是荣誉性地增加了人数。这些老兵赢得了马尔托夫的支持,并站在马尔托夫的立场上对党员进行“温和的”和“松散的”解释,反对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对党员的“严格的”和“狭隘的”解释。在对党的条例第一条款的激烈争论中,再次出现了政治性伤害和个人伤害,这些伤害似乎与涉及的实质性问题不成比例。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都坚持认为,一个在非法条件下进行斗争的革命的政党,必须是一个忠诚的积极分子的党,这些积极分子“既要37在物质上支持党,又以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马尔托夫则提出,党的成员应当扩展到任何“在一个党组织的指导下,经常和党进行合作的个人”。据说,就是这个关于建立一个狭隘的党或广泛的党的争论,在1903年把俄国社会民主党最终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实际上,这两个对抗性主张之间的差别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因为在三年之内,1906年由孟什维克主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合大会接受了列宁党章第一款的表述。这里所体现的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似乎已经被列宁昔日的批判家们所忘记。

自相矛盾的是,这次列宁自己已经转而接受使党的工作方式和程

^① CW, 5, 480.

序更加富有弹性、公开和民主的观念上来，他在 1906 年第一次把这称之为“民主集中制”。显然，这是对俄国政治形势巨大变化的一个回应，沙皇权力被近乎全国性的罢工有效地削弱，列宁已经被迫向召开的民选代表大会做出让步。

第二章 1905 年革命

沙皇和杜马

1905 年 1 月 22 日，一位牧师——乔治·加蓬(George Gapon)神父——带领一大批和平请愿者来到圣彼得堡沙皇的冬宫(Winter Palace)前面的广场上，恳求沙皇改善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他们的抱怨五花八门，但他们的请愿行动反映了产业工人日益自信的要求，这些产业工人最近通过大规模罢工已经使首都处于瘫痪状态：

38

陛下！我们工人，我们的孩子和妻子，我们那年迈的无依无靠的父母，我们来到陛下你这里寻求正义和保护。我们处于极度的贫穷之中，我们受到压迫，被残酷的劳动压垮；我们受到侮辱，我们不被当人，我们被当成奴隶一样对待……我们正在遭受专制君主制度和专横统治的扼杀，令人窒息。陛下，我们已精疲力竭！我们已忍无可忍；对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宁愿死亡也比继续遭受难以忍受的折磨要好的糟糕时刻。^①

^① L. Trotsky, 1905 (Harmondsworth, 1971) p. 89.

的确，他们在那个不幸的星期日遇害，由于遭到卫队的扫射，导致100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暴行震惊了整个世界并且在俄国激起一场罢工浪潮，到10月中旬，已发展成全国范围内的罢工。所有的铁路都停业，产业工人、职业联盟和传统行业的大罢工都要求民主和宪法。与此同时，首先在圣彼得堡然后在其他主要工业中心，工人们成立了由所有主要工厂的代表所组成的苏维埃（或者委员会），来协调大罢工，迫切要求在广泛、平等、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立刻召开立宪会议。10月30日，沙皇政府做出让步并发布了一个声明，许诺召开代表大会，许诺言论、思想、集会、结社的自由，在俄国实行民主统治。此后不久，沙皇答应特赦那些自从一月以来持续超示威和罢工中被逮捕的人们。

39

右翼的温和主义者（当时自称为十月党人〔Octobrists〕以表明他们接受沙皇声明）为他们的最终所获欢呼雀跃，而沙皇一直将这些要求视为“痴心妄想”而拒绝加以考虑。自由主义者结成了立宪民主党（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或者 Kadet Party），他们通常致力于利用提议中的杜马来扩大民主和政府职责。由于被数月来的罢工和贫困折磨得疲惫不堪，工人们听从苏维埃的号召重返工作岗位。这样，革命运动的热情熄灭了。沙皇能够重组自己的力量并开始反击那曾经使他蒙羞的力量。在最高当局明显的纵容下，一场反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开始了，在一月份圣彼得堡号召工人大罢工，设置路障并进行激烈的巷战之后，当局一心转向要消灭革命者。用当场处死和大规模驱逐流放来恐吓和威胁反对党。

到1905年底，沙皇的力量再次控制整个国家，他施政一贯奉行的路线是限制和减少其“十月宣言”对沙皇独裁权力所造成的影响。宣言所许诺的一种广泛的公民权得到普遍认同。然而，当选举法公布时，大地主和城市有产者却不恰当地获得了益处。在宣言中许诺的集会自由，现在被骑警所控制（并大量地被取消），警察将有权判定集会行动是否与公共秩序相一致。新闻自由同样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如此宽泛和模糊不清，以至于可以用来禁止几乎是最温和的批评。

当第一届杜马在1906年5月召集会议时,尽管受到了当局的操纵和威胁,但它确实是一个决心进行激进改革和变法的机构。它强烈主张1905年的所有要求——普遍的、直接的和平等的选举权,政府行政机构不是对沙皇而是对选举出的杜马负责,广泛的土地改革将要把王室的土地和大庄园的土地转让给农民。两个月来,沙皇一方面(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允许杜马继续辩论,一方面在为反击做准备。七月份,杜马草率地遭到解散,愤怒的杜马代表号召对政府进行消极抵抗和不合作运动没有获得响应。随着精力充沛而且才智过人的斯托雷平(Stolypin)担任第一部长,政府开始实施一项长期战略以平息农民(尤其是那些比较勤奋和有雄心的人)的不满;赋予农民有权选择离开他们的公社,有权把他们当时耕种的所有土地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在西伯利亚(Siberia),无主土地得到分配,国有和王室土地也过户到农民银行(the Peasants' Bank)。通过这种方式,是希望农民缺乏土地的状况得到解决,并为忠心、富裕和独立农民的政权奠定群众基础。政府把自己的未来押在这个设想之上,即得到满足的富裕农民应是有效应对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激进动荡的一个防护带。这个赌博很大程度上来说取得了成功,因为1906—1914年出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实际工资增加,并且由此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稳定。

40

然而,政府对农民在经济上的痛苦所作的安抚性回应与对精心准备反击民主党人和革命者的主张相辅相成。警察对立宪民主党的威胁加速了第二届杜马选举的到来。受到怀疑的革命者遭到了围捕,被军事法庭草率地处以死刑或者流放。当选举开始时,当局成功采取的一切措施很显然是要分化政治意见,其结果是无论极左派还是从极右派都以牺牲温和主义者(立宪民主党)来从中获益。沙皇再一次面对一个不受约束和控制的杜马。经常受到农民的劳动(*Trudoviki*〔或 *labour*〕)协会大力支持的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和社会民主党人〔*Social Democrats*〕),组成一个规模最大,最具有凝聚力和最好战的组织,它们更关注具有煽动性的大众诉

求而不是那些具体的立法建议。

41 在不到三个半月的政治混乱之后，沙皇解散了杜马(1907年6月16日)，并于当天单方面公布了一部新的选举法，以至于选票更加决定性地有利于大地主。沙皇关于民主和宪政的短暂实验显然已经结束了。他突然改变选举法，公然违反他自己颁布的基本法。他草率地解散两届杜马，显现出他对民主进程及结果的蔑视。无论如何要，他甚至连这种意愿都坚定地拒绝考虑，即政府的财政或是他的政府内阁都应该受到当选议会的监督，不论其代表的基础是如何狭隘。毫不含糊地拒绝了君主政体现代化和建立一个稳定的立宪政体这个选项的正是沙皇本人(受到了更加偏执和喜怒无常的皇后的鼓动)。沙皇在1906年和1907年的所作所为似乎证明了革命者的分析：公民自由和民主的这种最广泛愿望——1905年所高声诉求的——只有通过革命行动才能实现。他们令人信服地指出，沙皇不可能被民意，民众示威或民主选举的结果所推翻，唯有暴力才能够推翻他。毫无疑问的是，沙皇的所作所为使温和立宪民主党人士气低落，并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的计划失去信誉。

赞成不断革命？

正是在这些动荡的岁月里——不合时宜地被认为是1917年革命的伟大预演——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者团体之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分歧。在1905年上半年，孟什维克(Mensheviks)在其建议的激进方面首屈一指。在对工人及其苏维埃的影响上孟什维克要比布尔什维克要大一些，他们要求工人进行政治性大罢工，期望这些罢工使推翻沙皇的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孟什维克甚至在他们的刊物上留出版面给帕尔乌斯(Parvus)和托洛茨基发表思想观点，他们鼓吹不断提高工人和政党的要求，直到包括建立工人政府，公开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他们问

道：为什么应该是工人被要求牺牲一切而资产阶级却获得一切利益？他们令人信服地指出，正是不断发展的俄国所有主要工业地区的工人总罢工促使社会所有其他部门迫切要求激进变革。在经济上遭受最大损失的正是工人及其家庭，他们因领导最终迫使沙皇屈服的非法的群众游行示威不仅使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为什么工人们还要遵守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个自我否定的规定即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民主统治的漫长阶段？他们声称，俄国革命的原动力是这样的：革命形势本身所产生的加速发展的激进主义把党的正统理论上的制约放在一边。他们争辩说，对党来说，领导其军队在“艰苦战斗但不能取胜”^①的口号下进行战斗，不仅是心理上的难以置信而且是战略上的幼稚。

42

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所提出的观点是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旧有正统思想的根本背叛，俄国社会民主党具体阐明了两个阶段的革命过程。第一个阶段是要清除独裁统治并摧毁其赖以存在的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反过来会极大地促进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其结果是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天然的支持者）的显著壮大。随着资本的自我增强，工业的技术基础也得到改造，并由此带来生产力的增长，从而为走向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的（或者“客观的”）基础。没有资本集约化和高度工业化的产业基础的优先发展，“从俄国的能力和要求来看”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不可能的。总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实现俄国工业的现代化，在全俄推行资本主义关系并造就一个占多数的工人阶级。孟什维克认为，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提上议事日程。由此断定后沙皇时代俄国的领导者只能是资产阶级。

对列宁来说，他在这两个极端极之间处于一个复杂不安的位置。

^① 仅仅在稍后的1929年，当时他已在流亡，托洛茨基就编辑了一本连贯论述不断革命理论的著作。参见L. Trotsky,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 and Prospects* (London, 1962)。

他既不赞成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目标的工人政府，也不赞成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独裁统治的革命。列宁宣称，任何超越由俄国工业不发达状况所造成的种种限制的草率行为，“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①，所带来的只不过是荒唐和反动的结果。因此，他坚决反对帕尔乌斯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路线。他坚决认为，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俄国革命不能也不应毫不停留地进行下去。但列宁依然赞同他们的这个观点，即在俄国特定的条件下，民主革命只能在由产业工人(或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成功。然而，与不断革命论者不同的是，列宁认为只要工人阶级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工人阶级无疑是革命力量中最具有积极性，最具有政治觉悟和被极好地组织起来的革命力量，但是他们的人数相对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少数较大的中心城市。除非革命运动(在工人的领导下)对农民进行动员，否则他们将在战略上容易受到俄国落后地区广大农民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城市产业工人正成为“所有劳动和被剥削人民”的先锋队和代言人的这个思想，从1894年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著作开始就是列宁经济和社会分析的一个主要结论。的确，这始终是列宁著作中的一个战略主题，在1917年这个思想再次浮现，并且从1921年3月到1924年列宁去世这一时期重新加以坚持——没有农民的支持，任何重要的革命进展都不能确保。

联合资产阶级还是联合农民阶级？

形成这种战略的社会和经济前提远不像一些评论家通常所宣称的那样是非正统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列宁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不断地把农民(封建的)阶级分裂为现代两大阶级即农村无产

^① CW, 9, 29.

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随着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将无情地产生(作为其自身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比以往更多的没有土地的雇佣工人。总之,贫困农民到处都在转化为农村无产阶级,它们遭受到资本剥削甚至比城市工人所遭受到的要更加残酷。

在列宁看来,在1905年反对沙皇的斗争中,土地问题比宪政建设或在明确规范公民权利上的争吵更加具有重要意义^①。土地问题是所有其他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问题。农民想要所有的土地。他们的杜马代表——劳动社——一直坚持认为农民们有权得到土地及其产品。他们要求所有教会、国家和地主贵族的土地都上交并加以分配。在列宁看来,实现这个革命目标最简单的策略就是宣布所有土地国有化并让农民决定土地的实际分配。因此,土地国有化成为列宁1905年纲领中的核心政纲。它的贯彻实施同时是在加速农业的资本主义积累并消除作为沙皇统治社会和政治前提的地主贵族。

44

在这里,国有化是作为民主革命纲领的一部分,而列宁坚持认为民主革命不应该追求社会主义目标,这似乎是自相矛盾。事实上,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土地的国有化是所谓的“最低纲领”即那些经济和政治要求的一部分,它们的贯彻实施与保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相一致。就土地国有化来说,他们可以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找到依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土地私有制如何成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障碍之一。土地的购买占据了大量农业资本,这些资本可以通过融资购买先进设备、改良牲畜,或是改进生产工艺和销售而获得更多利润。因此,鼓吹土地国有化与第一阶段的民主革命(或反封建)并非不相一致。相反,土地国有化是“资本主义的措施”^②,它通过把“地租转让给国家”^③来加速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此,从策略上来说,促使民主革命取得最后成功的唯一稳定联盟

① CW, 10, 353.

② CW, 10, 181.

③ CW, 10, 183.

是工人和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的联盟。俄国资产阶级(正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向其成员所宣告的那样)是软弱和胆怯的^①。它在血缘、文化和社会关系方面与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会感受到对神圣财产权的任何侵犯给其自身的利益所带来威胁,农民对所有土地的激进要求显然侵犯了神圣的财产权。因此,按照列宁的预测,资产阶级将会完全专注于立法和宪政改革以增强他们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然而,他们太过虚弱难以承受农民和工人都在不断高涨的战斗性,因此,一旦专制统治受到革命浪潮的严重削弱,他们会与专制政府妥协以获取自己最大利益。这样,资产阶级就背弃了全部他们曾经轻易许下诺言:人道、平等选举权和激进的土地改革。列宁坚称,阶级是按照他们对其基本经济利益的理性衡量而行动,而不是按照意识形态的华丽言词和书面条文而行动。当革命威胁到他们的经济稳定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促使他们与其他的财产所有者以及现存政权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列宁提醒其追随者,这就是马克思对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进行分析所得出的全部结论——当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背叛民主而向反动派投降。列宁认为,很难想象人数更少,更易受影响,政治上更不发展的俄国资产阶级将会或能够采取不同的行动。

在1905—1906年革命期间,列宁对阶级力量和政治联盟的分析是独断的和教条的——它过于理论化并令人费解。因此,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对事件进程没有丝毫影响就不足为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资产阶级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可靠的同盟军,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在不要让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方面有着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的整个阶级地位迫使它在人民和沙皇之间挑拨离间,从中得利^②。因此,在列宁看来,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应该放在揭露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两面

① 参见上一章注释14。

② *CW*, 9, 180-1.

性,促使他们在革命的早期阶段就与独裁政府和大地主结成联盟。否则他们会摆出革命领导者的样子赢得民众的信任,每当背叛时刻来临时,只会使人民置于毫无防备,毫无领导的境地。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应该促进民主革命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并与贫农结成联盟。

为了确保与农民的结盟同时迫使资产阶级自由派公开自己的意图,党必须积极游说所有土地国有化。首先,列宁坚持认为逼迫沙皇做出让步毫无任何价值。这不是一个通过给专制国家披上一件虚假的宪政外衣来促使其改革自身的问题。相反,它是一个如何推翻沙皇政府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厦问题。只有实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达到革命的顶点。在这种生硬口号下,列宁号召其追随者起来斗争。

列宁坚称,革命不是谈判,不是低声下气、毕恭毕敬的请愿;革命是要求,革命是战斗。他提醒党,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正好是处于国家和阶级的生活中批判的武器被武器的批判所代替的时刻。革命的爆发就是因为谈判已经到了极限,也就是当社会团体之间的基本对抗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打仗就是要有打仗的样子(*A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正在俄国蔓延的内战——得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支部的支持(至少到1905年晚期)——不是业余爱好者和懦弱之徒的事情。它需要专业知识和胆量,其领导者必须要精通各种军事策略(因此列宁用1905年最初几个月的时间来消化克劳斯威茨〔von Clausewitz〕和恩格斯的军事战略)。需要对积极分子在使用武器,设置路障和城市游击战战术方面进行培训。他认为,像孟什维克这样的领导者——号召人们参加武装起义的同时拒绝提供必要的武器、训练和军事技能——是完全不负责的。

直到1905年12月最后几个星期和1906年最初几个月,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最初分歧才转化为对工人阶级革命和作用的评价上根本不同。在整个圣彼得堡苏维埃在12月16号被逮捕以后,由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莫斯科苏维埃发出了进行总

罢工和工人起来反抗当局的号召。然而，正是布尔什维克为随之而来的起义提供了领导和最多的战斗小分队。街头战斗持续了两个星期，只到1905年最后几天才被政府军镇压下去。正是在这场诉诸武力的尝试失败之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革命剧变期间展示出来的表面团结迅速瓦解了。

普列汉诺夫从一开始就谴责莫斯科起义是一次盲目的冒险，其后果将是失去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的支持，并把他们赶到反动阵营。普列汉诺夫流亡期间的老友阿克雪里罗得以温和的语气劝告党要与激进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合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途径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我敢说与我们一直以来所运用的无用方式相比，甚至连议会制度的最恶劣的漫画都具有巨大优越性。”^①数月之内，大多数孟什维克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们的新共识是那种英勇的、军事的革命时期结束了。任何进一步的政治性群众罢工或者暴力活动都会适得其反——都将迫使资产阶级“退缩”。鉴于工人阶级已经精疲力竭并且他们的苏维埃已被镇压，除了自由的立宪民主党人之外，再没有别的力量能够领导民主斗争并作为执政党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与此同时，把杜马作为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因此，党目前除了充当为相对长远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打下群众基础的左派反对党之外，没有其他作用，直到最后组成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政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按照孟什维克的构想，既然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有节制，既然他们的秘密组织已经遭当局破坏，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应该集中现存力量最大限度的利用合法手段“在仍然被政府所容忍的工会、合作组织、工人的教育机构和俱乐部……中”^②重建他们的力量。根据费奥多尔·达恩(Fyodr Dan)所说：

^① A. Ascher, *The Menshevik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1976) p. 62.

^② *Ibid.*, p. 22.

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斗争方法来维持、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合法地位，从法院到出版、国会、自治机关和杜马政府，以及基础广泛的用来指导工人群众的鼓动机构。^①

所有这些都让列宁深恶痛绝，在第一次退却时，孟什维克就表现出他们的软弱性和无原则的轻视党的政治总战略的最基本原则。无产阶级应该领导（或者按照普列汉诺夫早期构想来说是掌握“领导权”）民主革命的这个原则是这些不断重复着的坚定主张即俄国资产阶级人数不多和政治不成熟的一种必然结论。这个原则在阐明俄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文本中被奉为神圣，并且正是对这些原则的辩护（反对修正主义者和经济主义者）促使《火星报》创立。现在孟什维克“悄悄地放弃了曾经珍视的原则。托洛茨基把‘领导权’看作‘伪善’，普列汉诺夫则视之为‘荒谬可笑’”^②。在一年之内，他们就从卖弄不断革命转而投入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怀抱，主张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反对专制独裁斗争。突然地，孟什维克（由普列汉诺夫领导的）热衷于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有决心、有力量、政治上稳定和成熟，从而公开推翻了他们先前所做的分析。从那时起，列宁坚持把他们称为“取消主义者”（liquidationist），列宁坚持认为，他们不仅一心想取消俄国社会主工党的理论基础，而且一心想取消党的秘密政治组织。

48

就列宁来说，他坚定地坚持着这个陈旧正统理论的这些原则。马克思笔下的历史纪录与他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分析相一致——资产阶级终将背叛。他们在客观上对推翻沙皇政府没有兴趣。他们既没有政治意愿也没有组织基础来建立一支真正的反对力量。随后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列宁的预言。诚然，第一届国家杜马（这个期待已久的自由梦想的体现）的强制解散，遭到了立宪民主党人代表的谴责，他们号召群众抵

^① A. Ascher, *The Menshevik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1976), p. 74.

^② L.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1963) p. 82.

制。但是他们的影响微不足道。考虑到信仰沙皇巨大声势和俄国第一次民主试验所寄予的深切希望,他们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的反响小得可怜。这暴露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软弱无力,正如莫斯科起义的失败冷却了孟什维克的热情一样,这次经历也惩罚了立宪民主党人。在迫不得已时,他们就有点气势汹汹,然后屈服。因此随之而来是沙皇对1905年十月许诺的一次次食言,一次次地缩小选举权并搁置公民权,一次次地解散杜马以及逮捕或流放杜马代表,面对一次次的挑衅,立宪民主党人号召人民忍耐和克制。

49 一般认为,列宁在1905—1906年,通过拉拢农民而伺机抛弃马克思主义,通过反对资产阶级有领导作用而表现出自己的雅各宾派倾向,通过自己对军事问题的兴趣,暴露了他的布朗基主义的(Blanquist)倾向,这些判断是陈腐而轻率的。相反,列宁毫不偏离地坚持着一条连贯的战略路线。他具有不可动摇的、教条主义的信念:他早年对俄国所作的经济和社会分析的正确性将会在实际政治斗争的探索中被揭示出来。他相信,所有阶级的长处和短处,抱负和忠诚都将会在公开的政治争论中尤其是群众运动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1905—1907年的革命事件只不过表明列宁是一名坚定的教条主义政治家,迄今为止,他更多地倾向于按照预想的场景来安排事件和演员,而不是根据每次政治场景的巨大变换来更改故事内容。当然,不应当认为以任何方式指出其理论上的一贯性都意味着赞成或同情。相反,这本书隐含的批判性立场是,那些更少一些无情、更多一些折衷,最重要的更多一些宽容的政治家能够更好地为我们服务。总之,如果列宁曾经是一个伺机见风使舵的人,或者像众多评论家所指认的那样对主义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对世界(以及他创立的意识形态)将会产生更加良性的影响。

到了1907年12月,列宁又一次遭到放逐,随后在欧洲游荡几乎长达9年半时间,直到1917年4月最终返回俄国。从1908年到1912年这些年极其暗淡。在那之后,俄国国内的工人运动显著地复活。俄国国内的党组织早已被摧毁,数百名革命者被逮捕入狱或者被流放。并

且资金一直是一个难题,最糟糕是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少数派内部,他的政治和理论权威受到了波格丹诺夫(Bogdanov)和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的严重挑战。他们在政治上坚持极左路线,要求从被削弱的国家杜马召回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列宁不得不同时与孟什维克的温和派(取消派)及布尔什维克中的多数派(召回派或 Otzovists)作斗争。在哲学领域,列宁觉得必须与他所认识到的波格丹诺夫陷入其中的折中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战斗。列宁不得不还击,着手写作一部长篇(并且有点浮夸)大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在第9章中将会深入讨论)。这是一个分裂的时期,在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党布拉格会议(the Prague Conference of the RSDLP)上布尔什维克正式从孟什维克中分离出来时,分裂达到了顶点。无论对于俄国国内还是国外流亡运动来说,这都是一个政治上解体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列宁的政治思想只是停滞不前。

结 论

我一直认为,在1914年以前的著作中,列宁一贯是一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评论家们所宣称发现的离经叛道,经常是断章取义或是忽视马克思本人著作中的模棱两可(和危害)。这些年来,列宁认为自己只不过是马克思和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名忠实信徒。他并没有试图从俄国的经验中得出一般结论,也没有声称他在理论上和组织上的任何见解具有普遍意义。他只是没有意识到他正在提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当代世界的一幅崭新思想蓝图。他几乎不对国际形势发表评论,除非国际形势已经对俄国国内政治产生了影响。毫无疑问,他有资格被认为是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唯一最杰出领导人,但这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列宁本人也时常承认俄国革命运动只不过是西欧尤其是德国主要革命表演的一个插曲。他

曾经论述的那些主题——两个阶段的革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封建制度下的资本主义发展、贫穷农民的政治地位、在非法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原则——所有这些都只是对俄国并且或许是对阶级斗争落后的其他外围地区的共鸣。因此，列宁在这一时期决不声称自己的任何著作在俄国之外具有适用性，这就不足为奇。

直到1914年，列宁还是在各方面都处于欧洲社会主义边缘、不可救药的分裂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的一派鲜为人知的领导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的著作实际上也不为人所知，它们几乎全是狭隘的，发行量小而且未经翻译，要不然就是它们所关注的问题（例如哲学和辩证法）在很大程度上被群众性政党的实际领导人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在此之前，列宁可能具有某种相关东西对于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有贡献，这种想法不仅列宁从来不曾有过，而且也会使整个欧洲感到惊奇并加以嘲笑。如果列宁的欧洲社会主义同伴们觉得他奇怪的话，这倒不是因为他的雅各宾派或俄国背景，通常让他们感到窘困的，是列宁极其严肃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纯洁性。

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还要花时间处理其他事情。他们必须参加他们的议会工作，培育他们的选民，与商会组织保持联络，筹集资金，向党的出版机关投稿，参加当地或地区会议和代表大会等等。他们没有时间，一般说来也没有兴趣深入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或者领会当代资本主义的统计学或经济学的分析。在国内全国性机构——有着多样化的团体和期望——多年的工作经历，使他们懂得妥协和调和的必要性。直到1917年10月，列宁实际上还没有任何这种经历。列宁在这段时期一直是一位没有众多支持者响应的理论家和作家，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群众民主运动的经验。列宁对政治对抗和阶级战争的承诺直截了当地违抗带有压倒性的温和的这种调和政治学——它是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典型特征。列宁被认为是某种不合时宜的人。

列宁俄国背景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使他停留在一种原教旨主义，这种原教旨主义被认为是没有任何希望地与当代现实脱节。宪政制度，

人民的选举权,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快速发展,教育、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在西欧创造了通过民主方式和平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因此,社会主义者必须调整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以适应这些新情况,而他们成功的标准则是看似不断增长的社会党选票。所有这一切都与列宁擦身而过。直到 1917 年,他对欧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都没有真正的影响。他是一种过时的教条主义者的代言人。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书本化的和学究气的,这恰恰是因为他的马克思主义来自于对经典文本的深入研究,它把人们拉回到欧洲社会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早已遗忘的时代和主题上来。

第三章 社会民主党的瓦解和列宁主义的产生

1914年8月4日，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庄严的国会会议上投票支持他们的政府进行战争，并发誓在已经爆发的战争期间支持他们的政府。整个欧洲弥漫着一种一切都将不再是从前的可怕征兆，但是对列宁来说，八四事件是完全颠覆了他的世界的一场政治巨变。正是由于这种创伤，列宁主义——作为全球革命的一种综合意识形态——迅速地产生了。在三年之内，列宁就已经描绘一种全球经济分析、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的轮廓，并把它们织入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激进意识形态之中。明确提出列宁主义不仅仅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全部现存意识形态的替代物，而且是作为一个新世界和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并将全部现存意识形态一扫而空。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列宁主义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竞争对手思想纲领的谴责要比对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谴责更加严厉。这种敏感性暴露了列宁主义起源方面的众多内容，因为列宁主义的产生正是出于昔日战友背叛的深远影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开始受到谴责的东西扩展为一种全面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当前形势和未来任务同样全面的替代性说明。列宁主义，从其产生到最终灭亡，都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灵魂的争论，主要用来反对社会主义传统内部对手（列宁称他们为叛徒）。因此，为了把列宁主义定位为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必须相

当详细地探究国际社会民主党中被认为是极其有害的倾向。

国际与战争

53 最初,列宁对投票赞成战争的新闻极其无动于衷,他宁愿相信这是资产阶级新闻界混淆视听的宣传,试图用来动摇和分化欧洲的工人阶级。即使做最糟糕的设定,列宁也完全没有想到他成人后始终尊敬的领袖们犯下如此大错。他们一举消灭了社会主义国际(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在列宁看来,是唯一真正忠于工人阶级的机构。更糟糕的是,他们早已用社会民主党道义和组织力量来支持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政府。他们的背叛原本不应该更加彻底,他们的声明和行动之间的差距原本不应该更大。他们也不应该逃避到争论中去,这种争论是他们面对一种极其无法预料的形势不得不立即做出的回应。相反,第二国际的整个历史显示,他们对于战争和军国主义问题几乎是过于关心。无论是在各国党之间还是在国际大会上,争论都一直持续不断,直到在1907年斯图加特大会才最终解决。在列宁看来,在这次大会上,国际及其所有各党最终达成共识,因此,也赞同关于战争的义务和战略。很多方面都取决于对斯图加特决议(the Stuttgart Resolution)的解释,我们最好还是咬文嚼字地看看这篇冗长声明中的最后两段:

如果存在着战争爆发的危险,有关国家的工人和议会代表有责任在国际当局的援助之下,通过协调行动竭尽全力来阻止战争。他们将用最为恰当的各种方法,并依据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总的政治形势做出必要的改变。

然而如果战争爆发,他们有责任迅速终止战争,并利用战争所带来的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来唤醒民众并加速推翻

资本主义的统治。^①

由德国温和的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起草并提出的最初决议,不包含最后这句;它在“迅速终止战争”这句就结束了。修改过的决议中的过激言辞是由来自俄国党的马尔托夫和列宁以及来自波兰党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起草的。列宁对1914年八四事件的激烈反应,至少部分地源自于一种个人背叛的感觉,国际的战略——他曾帮助制定过这个关键问题——竟如此无理地遭到忽视。如果他更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话,他或许会承认自己寄托于国际尤其是其领导党团——德国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SPD)——的巨大信心一直是一种自欺欺人,他悍然不顾大量相矛盾的证据,这些证据他完全清楚,但更愿意加以忽视。

列宁非常清楚地知道,斯图加特决议是国际对待战争的政策基础(1912年在巴塞尔[Basle]再次得到确认),斯图加特决议本身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妥协方案,它反映了各个不同国家党之间和作为整体的国际内部各种对立力量的复杂性和不可调和性。倍倍尔与德国工会联盟领导层有着紧密的联盟关系,列宁知道他已经使用了程序上的所有策略以及各种各样和各不相同的方案,顶住来自他自己的左派和来自法国与英国的所有压力,使国际对待战争问题的立场变得激进。尤其是他一直坚持(德国工会甚至更加强硬)他不会令德国社会民主党参与各种可能危及“党的正常生活”的具体反战活动。法国、英国、波兰、比利时、和俄国都做了慷慨激昂地表态赞成在军队和预备役军人中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如果战争爆发就号召政治总罢工以使经济瘫痪,这一切倒是很好,但是他们的豪言壮语是空洞的和不负责任的。他们知道他们的政党不会运用权力来实施这些极端措施,然而他们试图把它强加

^① C. E.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New York, 1955, p. 83), J. P. 内特尔(J. P. Nettl)的《罗莎·卢森堡》(London, 1969)第269—270页载有斯图加特决议的完整译文。

于一个政党身上。倍倍尔就早已指出,为“词句上的社会主义”所陶醉,存在着太多的危险。

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低和最高纲领

无疑,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国际的典范。它已经不断壮大,成为欧洲最大的和组织无比完善的政党。尽管帝国政府用尽一切手段来对付它——诽谤和骚扰,以及推行反社会党人法,这部法律甚至使社会主义的宣传也是成为一种犯罪。尽管——或者可能是由于——其报纸被查封和领导人被关押,德国社会民主党持续不断地扩大其支持度。在1878年推行反社会党人法的初期,党有数十万的支持者(1881年选举获得312 000张选票)。到1890年,当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党在国会选举(the Reichstag elections)中赢得全国20%的选票,获得1 427 000张选票^①。到1903年,它获得的票数上升到总数的三分之一,有300多万张。到了1912年,得票增加到425万张。在战争爆发之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拥有超过100万党员和超过3 500名全职官员^②。这是推动国际前进的强大引擎,是给其他许多人——尤其是给俄国人和东欧人以鼓舞的原动力。在这令人印象深刻、似乎势不可挡的发展背后,有一个日益复杂和集中的行政机构和一个由全国的、地区的和地方的报纸构成的综合性网络。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控制着19家日报和42家周刊;到1914年已有90家日报。

175万附属的工会会员远不止是构成了党的产业工人基础——它还用合作社的制度和价值替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工会和党为其成员制定了广泛的社会保障方案。作为对他们每周贡献的回报,工人们确信自己能对抗疾病、懦弱和解雇。有了生育津贴和殡葬计划,这使党有理由吹嘘能照顾其成员一生(或者,正如有人

^① R. N. Hunt,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18—1933* (Chicago, 1964) p. 9. 也可参见对战争前夕社会民主党形势所作的有用总结,载于E. Bevan,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During the War* (London, 1918) ch. 1.

^② Hunt,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p. 21.

打趣地说,从生到死)。社会民主党的俱乐部和各类协会蓬勃发展,满足了工人娱乐性的、体育和文化的需要。几十年来,社会民主党艰苦地创造了一个“国中之国”。它的积极分子向往一种自给自足和自治的世界,在那里,工人们不仅通过领会其价值,而且获得信心,管理他们自己事务所必需的实际的管理技能,从而使他们适应未来的社会主义。其格言是好战的分离主义的口号:*diesen System keinen Mann keinen groschen*——“没有人在这个制度下一无所所有。”考虑到官方的蔑视和法律干扰,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绝妙的思想,然而它也给自身带来了制约和局限。

实际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受困于一种成功的矛盾辩证法。其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和政治说教把成功归于推翻现存制度的革命,而其选举战略和组织联合的巨大成功则意味着耐心而和平的发展。这就与维护社会和平有着巨大的利害关系。随着其吸引力日益广泛和财力的增强,德国社会民主党因此变得更加谨慎。首先,它渴望不给政府(仍然不是向当选的国会负责而是直接向国王或皇帝负责)任何借口动用国家权力来镇压党和工人运动。它的政党基金(到1914年其资产超过2亿马克)、报刊、附属的工会和社会保障基金都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取得进展的关键指标,这些都不允许在不切实际的起义中被浪费掉。直到绝大多数人都赞同社会主义——当(设想)资本主义同时显示出不能容纳自己的更新和发展——只有那时伟大转变的时刻才会最终到来。

56

最低和最高纲领

在相当长的准备期内,党的干部及其追随者都同时受到了“组织、宣传、学习(*organisieren, propagandieren, studieren*)”口号的引导。同样,从战略上讲,党的目标将不得被限定在温和主张上,这些主张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界限。党的准备期首先是这样一个时期,在这

个时期内:(a) 大多数人还都不是社会主义的自觉拥护者;(b) 资本主义还没有穷尽其扩展和创新的空间。因而,由此得出结论完全推进社会主义主张,即主张威胁私有财产和个人占有的真正基础是不成熟和不负责的。在这个时期,应该迫切要求劳动力出卖的更好条件(最小的支付周期、假期和疾病津贴,未成年人保护等等),但这不能促进整个劳动力买卖制度的终结。这一点使我们看到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极其重要的差别(为第二国际〔或社会主义国际〕大多数成员的政党所坚持)。

57 最低纲领的要求就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条件还不成熟的准备时期的要求。扩大民主、公民和政治权利是这一时期所有社会主义纲领的显著特征。整个十九世纪后半期,只有社会主义政党要求投票权的普遍化,也就是说无论男女。他们要求比例代表制、广泛采取公投、选民有权撤销它们的代表和直接选举所有政府官员。用人民民兵取代常备军是最低纲领中最激进的民主改革。在经济领域,最低纲领迫切要求改善年轻工人和妇女的劳动条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推广和八小时工作制的实施使所有工人都享有更高的尊严和安全。迫切要求通过累进所得税来保证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国家投资最能够最大化。最激进的经济要求是土地应该国有化并用来出租。人们认为这些措施中没有一项威胁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自身的空间,但是它们仍然为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工人运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相反,最高纲领体现了党的成熟社会主义愿望,要把“土地、矿山、自然资源、机器和交通运输”转变为社会或国家所有^①。这就要求由工人阶级获得政治权力,实行过渡性的“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市场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将逐步消失,劳动力也随之不再进行买卖。最后,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一个机构将失去其功能并消亡。这当

^① Schorske, p. 5.

然是在走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①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党纲的理论前言诉诸于相同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来为激进的立场辩护。这些正统理论始终坚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能确保工人生活条件任何持久的或富有意义的改善。不断增强的危机——由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和生产与消费的脱节所诱发的——将侵蚀繁荣时期获得的暂时收益。不安全感、失业和不断加重的剥削反过来又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火上加油。

58

正是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Erfurt Programme of the SPD)(由卡尔·考茨基起草的)把党在最低和最高、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目前和未来之间的目标的划分奉为神圣。在那时,这似乎是对党的战略问题的一种简洁和富有吸引力的表达。但是很快就清楚,这只能成功地重新界定革命和改良主义策略的基本差别。在追求最低纲领时,党的诚信竟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假如理论上坚持认为,并且为历史经验所证明,不可能从资本主义那里争得工人命运的任何富有意义和持久的改善,那么为这种改善进行活动并把它置于选举宣传的中心地位,难道不是一种伪善吗?党在这里是在从事一项唤起它知道不能实现的这些期盼的愤世嫉俗活动吗?正如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党的立场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逻辑是,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是党要反对工作和生活条件的一切改善^②。原则上它赞同这个公式:越好越糟而不是越好。归根到底它得出的结论是,党和工人运动在实现最低纲领的目标上越成功,革命的必要性就越会减少。

人们广泛认为,耐心推进选举和组织联合的战略得到了伟大的恩

^① MESW, 1, 33-65. 尤其参见第53-54页的十点方案。

^② E. Bernstein, *Evolutionary Socialism* (London, 1900) p. xii. 这是伯恩斯坦文集的译文,最初以 *Die Vorraussetzung des Socialismus* 的标题于1899年在德国出版。

格斯本人的真正赞同。在他的最后遗嘱^①中,马克思主义的这位共同创始人承认旧式的起义——巷战和设置路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交通设施的发展(尤其是铁路),乡村农业的发展,尤其是为职业军队所利用的火药的发展无限制地增加了国家和军队的权力并使起义者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交战那样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②在恩格斯看来,投票箱作为社会主义发展最有效的方法早已使子弹黯然失色,在这方面,德国工人开辟了一条供人们学习的新路:“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为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③他们的200万选民(在1895年)“构成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政府的胁迫和剥夺都不能阻止其稳定发展。唯一威胁到其未来的美好前景的是它会引起政府的愤怒,所从事的不断升级的小冲突导致“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正如1871年在巴黎发生的那样,其结果是工人运动被延迟好多年。因此,党的主要任务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要把它好好地保持到决战的那一天。”^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得出结论说:“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⑤甚至更具讽刺意味的(至少对列宁来说)是恩格斯指定为其著作的整理者的这个人,第一次出版恩格斯“遗嘱”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主要的背叛者爱德华·伯恩斯坦。

① 恩格斯所谓的“遗嘱”写于1895年3月并作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发表(MESW, 1, 118-38)。

② MESW, 1, 130.

③ MESW, 1, 129.

④ MESW, 1, 135.

⑤ MESW, 1, 136.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

到了世纪之交,伯恩施坦对作为当代阶级斗争和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全面的和毁灭性的批判,丑化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体制。他所表达的修正主义遭到了来自他自己政党和其他政党的断然拒绝和严厉谴责,但并没有销声匿迹。相反,修正主义作为一种国际现象而享有盛名,这恰恰是因为它似乎更加符合当代世界的现实和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当下实践。

有必要理解伯恩施坦的一般观点,其原因在于——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是欧洲社会主义一切堕落的表达。在列宁看来,修正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具体和本质的东西:它拒绝一切激进资产阶级不能接受的东西。它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平淡无奇的信条,它鼓吹融合而不是阶级斗争,鼓吹通过现存制度的渐进的改变而不是由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动革命。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裂主义的一种重新阐释。它是向一切没有激情的胆怯者开战的宣言书。谈到变节和背信,它的言词之激烈非常类似于宗教原教旨主义,它懂得选举王国和地狱之间没有任何层次和中介。那些不赞同我们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从这种事物的二元论观点(Manichae-an scheme of things)来看,人们感到伯恩施坦就是潜伏在列宁的路德(Lenin's Luther)身边的从不信教的人。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有理论家中最受尊敬的考茨基看来,伯恩施坦的《进化的社会主义》(*Evolutionary Socialism*)一书是“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文献中所撰写的第一部引起轰动的著作”^①。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它直面党的神话和日常的豪言壮语。证明党一切工作都正确的基本原理是：它正在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好党自身和德国工人的准备。因此，参加竞选就表现为革命准备工作的一种有效晴雨表——是公众支持推翻资本主义的一种标尺，不过是避免不成熟起义的一个有效方法。同样，按照陈旧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看法，参加议会并不是被用来作为改造现存权力结构的一种方法，而是作为革命宣传合法的受保护的工具体。正如倍倍尔已经指出的那样，社会民主党人在国会中不是要试图完成说服国会中的阶级对手这种不可能的任务，而是“向外界宣传的窗口”。

对伯恩斯坦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豪言壮语式的革命主义既不负责任又虚伪。说它不负责任是因为它从未正视过当前实际。党的政策是基于一切都将为革命所改变的立场之上，从没有根据具体而困难的细节来加以探讨。革命已经变成一种神奇祈祷——“有一则儿童故事说，善良仙女能消除一切个人问题和社会弊端，她知道疯狂的力量能够使具有政治天赋的人物从其他博学之人中脱颖而出。”^②说它虚伪是因为党甚至都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认真思考过德国将会发生什么样的革命。更不用说采取一些措施，为与当局进行武装斗争进行干部准备。伯恩斯坦得出结论说，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是时候超越其幼稚信仰并正视自马克思以来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复杂世界了。

革命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种断言——伯恩斯坦称之为“灾难理论”(theory of catastrophe)——源自于大量的命题，在伯恩斯坦看来，这些命题在哲学上成问题或者在经验上可以驳倒：

^① Schorske, p. 19. 考茨基对伯恩斯坦分析的最初反应是相当温和的。甚至发现这些分析“极具吸引力”(J. P. Nettl, *Rosa Luxemburg*, London, 1969, p. 95)并且最终批判说“是姗姗来迟和犹豫不决的”。参见 P. Good, *Karl Kautsk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London, 1983) pp. 15-31.

^② Bernstein, p. 102.

(i)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理性分析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发展根源于对立面的斗争。因此,马克思自己的方法预先决定了他的结论。在伯恩斯坦看来,“马克思整个不朽的著作”,“旨在成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同时也旨在起草之前就宣称证明了一种理论。”^①现在是终止这种伪科学的辩证法的时候了,代之以真正人道主义的道德——“康德并不伪善”。

(ii) 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发现,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产生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危机,这将逐步导致经济的全面崩溃。实际上,在伯恩斯坦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建立了调节补偿机制来使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保持平衡。

(iii) 马克思的社会分析同样是有缺陷的或是过时的。在伯恩斯坦看来,伴随着贫穷在人民大众中发展,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人手中的现象从来没有出现过。中产阶级没有正在消失,工人阶级也没有日益贫穷。无论是在两大阶级之间还是在各阶级内部,现代经济都创造出一个持续的复杂的等级序列。总之,社会没有出现两大日益敌对的阵营,一方是大资本家阵营,另一方是大量共同贫穷的工人:“与较早时期相比,社会分层远没有被简单化,无论是在收入还是在商业活动上,它都已经变得等级化和差异化。”^②

伯恩斯坦也提出了更多技术层面的诘难,涉及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经济学分析中最为神圣的东西,伯恩斯坦抱怨说,它是“拒绝承认在某一点之外服务的关键”^③)和资本主义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这个重要发现:在伯恩斯坦看来,二者都不是建立在批判考察或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赖以建立的整套观点体系都被证明是错

① Bernstein, p. 209.

② Ibid., p. 49.

③ Ibid., p. 39.

误的。

与伯恩斯坦对灾难战略的前提和结论的毁灭性批判相呼应,他积极建议重新定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他认为,运动必须“毫无保留地置于民主理论的基础上”^①。这句话除了其他方面的意思外,还包括绝不能在工具性意义上把民主看作是便于扩大革命宣传的一个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他声称,民主和议会制政府的原则就是两种可选政纲之间的理性辩论。它是或者应当是一个过程,以某种方式了解或关心行为的可能性结果。因而它极大地优越于非理性的暴力革命活动:“在立法中,在安定的时期理智支配着情感,在革命的时期情感支配着理智……立法工作是一种系统的力量,革命是一种要素的力量。”^②重要的是,精心的立法是达到社会主义所渴望的那种社会类型的唯一可靠途径。

伯恩斯坦坚持认为,一个和谐、高效的社会、其中每一个人的尊严都确保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和宽容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绝不会通过内战的方式来实现。长期的、充满仇恨的内战(因为这是革命性词语的真正含义)将使一代人变得残酷无情,留下痛苦的记忆,并将产生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生灵涂炭。当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物质和道德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忽视时,这些条件与实现社会主义还极不相适应,还要加以提升。

伯恩斯坦得出结论说,现代社会主义必须把自己置于一个复杂的、高度分化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这个复杂的、高度分化的社会现实反映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复杂和分化。如果社会主义得以成功的实现,那么,它不仅必须受到蓝领工人的欢迎,而且必须受到极其重要的技术专家、科学专家和管理专家们的欢迎。这些人(在这个时期,他们几乎全都是男性)是工程师、检查员、化学家、精密工具制造者、工头、书记员和

① Bernstein, p. 145.

② Ibid., p. 218.

工厂经理；这些人正处于开创与电力和内燃机联系在一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他们对于繁荣现代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甚至远比对于维护资本主义更加重要。他们是理性和科学之人，反感模糊不清的空想或是号召革命行动。他们日益成为有资产的人，他们掌握稀缺技能要求高工资和稳定的工作。他们得到的要比失去的要多得多。他们这些人对革命的号召充耳不闻。伯恩斯坦坚持认为，没有他们，仅仅是那些没有技能的工人大众就不具备掌管现代经济的知识和培训。他坚持认为，现在到了停止通过幻想，通过他们显然没有掌握的，并且闲暇时间、教育和稳定的缺乏妨碍他们获得的技能和知识来赋予“无产阶级”的不负责策略的时候了^①。

63

伯恩斯坦的书是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文献中经常讨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这个争端的少数著作之一。浪漫主义者（像帕尔乌斯这样的）把整个经济置于社会控制之下，以至于在“半年内，政府的权力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将属于历史”的这些幻想言词，或者是朱尔斯·盖德（Jules Guesde）有关经济转型在“一个月，不，也许几个星期”^②就能够完成的断言，都是乌托邦式的傲慢自大和无知的表现。只有通过耐心的渐进的发展，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及有技能和受过教育的同盟军，才能培养出社会化经济生活所要求的“富有判断力、实际知识的管理人才”^③。很显然，这个结论深受英国费边主义者（the English Fabians）的影响。尽管遭到众多诽谤，但是费边主义者过去曾经是唯一详细研究过把具体工业和公共事业置于国家或市政控制下在管理上和财政上的复杂性的社会主义派别。

然而，伯恩斯坦的结论有意直接针对激进阶级战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所有论据都反对它们。阶级不再趋向两极分化，工人阶级不再变得越来越贫穷和单一化，中产阶级也没有正在消失。资本主义也

① Bernstein, p. 221.

② Ibid., notes to pp. 101-2.

③ Ibid., p. 100.

没有穷尽其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的空间,相反,它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端。经济和社会日益变得复杂和多样化,广泛地包容具有不同的能力、技能、生活方式和愿望的不同团体。社会主义应该驾驭和培养这种多样性而不是强迫要求单一文化。首先,产业的社会化将是一个渐进的、理性的和和平的进程,它是由议会立法所发起并控制。商品交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继续着,国家和传统的政治也将继续。对于国家来说,立即保证一种普遍的“劳动权”是愚蠢的,对一切劳动进行指导则是更加有害的。

64 总之,将不再有一个单一的赎买法案,不再有过去的一切错误都借以得到纠正的大赦日,机构转型,人重塑为新人。社会主义必须研究现存世界的具体现实。因此,它不得不挖掘其所有这些机构(国家、工会、协会、市政当局)的最大潜力以便为一切人提供有尊严的安全生活^①。正如赞成机构一样,也要赞成它的实践和价值。在伯恩斯坦的论述中,社会主义不是用来破坏,而是用来实现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的潜力发挥到极限:“实际上,没有一种真正自由的思想不属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要素。”^②他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组织自由主义”^③以及通过最终结束经济强制来深化和扩大个人的自由目标。民主必须毫不含糊地成为“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本质”^④,没有什么比这种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更加真实的了。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基本主题是,社会主义只能作为普通的、活跃的公民的一种理论和实践才能成功。它必须是融合主义者(integrationist)而不是分离主义者。它是建立于已经存在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于一个模糊不清的、未知的未来基础上。它是理性的、和平的和进化的,而不是原始的、暴力的和突变的。简言之,它是内在之人(an insid-

① Bernstein, p. 163.

② Ibid., p. 151.

③ Ibid., p. 154.

④ Ibid., p. 160.

er)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外在之人(an outsider)的意识形态。伯恩斯坦对于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战略和目标提出了全面批判。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对自己学说的不断批判和修正才能发展和更新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意:“学生的职责在于行动而不在于不断重复其导师的话语。”^①

由于拒绝了辩证法,并怀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预测未来的能力,伯恩斯坦由此得出结论说,赋予当前斗争以意义的社会主义目标不可能是单一的。像罗莎·卢森堡那些人一样,认为此时此刻进行的改革斗争仅仅就其促进了未来革命的到来来说才具有意义^②,伯恩斯坦认为,这些人仍然被“辩证法的烟火”和历史是由内在目的推动的天真信念所蒙蔽。在他看来,革命家都是这种目的论者,相信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完全根据革命意识的增长来评价其发展。问题的另一面是他们对普通工人的日常生活需要高傲地加以贬低,并对工人们自己建立起来的保护自己利益的工会也采取傲慢的态度。根据伯恩斯坦的说明,现在正是党致力于工人阶级直接的、最近的需要的时候了。现在到了仅仅是在阶级同意加入到革命家的历史目的论的情况下才考虑其重要性这种傲慢的算计游戏的时候了。伯恩斯坦反对这些专注于目标和结果的一切空想,反复肯定一种人道的怀疑主义:“完全不能相信目的论,我不相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但是我强烈相信社会主义运动,相信前进中的工人阶级……”^③，“对我来说,通常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④“如果它精神饱满地追求最近的目标,那么它是否提出自己的最终理想

65

① Bernstein, p. 26.

② 罗莎·卢森堡 1899 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伯恩斯坦的进行回击并且以《社会改良还是革命》(Social Reform or Revolution)小册子加以出版。英译文载于 M. A. Waters, *Rosa Luxemburg Speaks* (New York, 1970)。

③ Bernstein,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 xxii.

④ Ibid., p. 202.

目标就是次要的。”^①虽然伯恩斯坦著作中的逻辑前后连贯,但我们还是不能避免这种结果:由于用这种明快的警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受到了无谓的挑衅。

对像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社会主义最终目标思想的蔑视正是所有马克思主义叛逆者的判断标记。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人们清楚地阐明了列宁主义重新把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坚持认为没有一个实质性的目标——具体说明作为一套独特的价值和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不可避免地会变得微不足道和资产阶级化。在后面的几章中,我们将看到列宁主义是自觉地同所有那些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开战,这些理论家和实践家们试图把社会主义解释成向自由民主或资本主义其他方面进行妥协的一种意识形态。在列宁看来,在所有这类妥协者(accommodationist)中,伯恩斯坦是完美的典范。一旦从其整体结构中丢弃或“改良”了任何一个要素,马克思主义就如何遭到败坏和阉割,他的修正主义就是一个例证。

66 伯恩斯坦所说的,没有什么东西是英国费边主义者在较早前没有说过的(伯恩斯坦从1888年到1901年滞留英国期间与他们有密切的联系)。这种影响是全面的,以至于考茨基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悲哀地指出,“你已决意成为一名英国人,……结果成了一位模仿英国腔的人。”^②然而,伯恩斯坦的观点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注定会引起公众的骚动。伯恩斯坦是恩格斯作品的遗嘱执行人,他使正统派感到难堪。他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理论机关报《新时代》(*Neue Zeit*)编委会成员。伯恩斯坦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也会引起反感。他的批判是全面的、对抗性的,甚至不得不说是居高临下的。虽然左派(尤其是帕尔乌斯、盖德和罗莎·卢森堡)的粗陋而空想的方案被无情地揭露,但是至少没有抓住核心,因为他的批判缺乏严密性,并且没有彻底想清楚革命

^① Bernstein,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 222.

^② 转引自 P. Gay,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Eduard Bernstein's Challenge to Marx* (New York, 1962) p. 80.

神话的空难性影响。在这场运动中他太过突出、他的批判太带有根本性、尤其是太公开,不可能遭到他的对手的忽视。

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列宁就在非常成功的报刊《工人思想报》上严厉谴责了第一次在俄国出现的修正主义。1899年,这份杂志的第7期出版了一份“独立的副刊”,上面包含有伯恩斯坦的一篇文章和编辑们生动的赞美之词^①。列宁断定,这些思想“只是伯恩斯坦‘最时髦作品’的复制”^②,在各种意义上,它都代表着“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种倒退倾向”^③。从那以后,列宁几乎没有写文章公开地反对伯恩斯坦或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而把这项任务留给了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尽管他继续抨击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极其微弱的经济主义或修正主义)。1899年社会德国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the 1899 SPD Hanover Congress)坚决地肯定《爱尔福特纲领》以来的正确路线,并且拒绝“任何试图改变或模糊……党对现存国家和社会秩序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对态度”^④,列宁从中得到安慰。列宁更加振奋地指出,在这次大会上,伯恩斯坦本人“尽管有错误,尽管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试图公然倒退,但仍然有足够的智慧和充分的意识不去试图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他表明接受倍倍尔的决议,这个决议庄严地向世界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将坚持它以前的纲领和策略。”^⑤

在伯恩斯坦的著作出版之后的几年里,不断有人对其妥协的策略和渐进的、和平的改革进行正式谴责。第二国际的重要人物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罗莎·卢森堡都重炮齐发对其予以猛烈批判,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the Dresden Congress of the SPD)甚至

① 这份“独立增刊”社论的摘要译文载于哈丁1983年的著作第242-250页。列宁与俄国本土的“修正主义者”争论的有关论述可以在哈丁1977年的著作第145-151中找到。

② CW, 4, 275.

③ 这篇长文的标题是列宁在这时写下的,CW, 4, pp. 255-85.

④ Schorske, p. 23.

⑤ CW, 4, 277.

比以前代表大会更加强烈地抵制“修正主义者用一种对现存秩序的调和和政策来战胜我们的敌人从而取替一种武力征服的政策的努力。”^①一切都似乎是有条不紊，修正主义被打垮，革命的正统理论被重新确认。列宁（在1900年就已经）称之为“前马克思主义者（the ex-Marxist），或更确切地说是‘前社会主义者’（the ‘ex-socialist’）”^②的那个人真正地安分守己了。

大罢工——消耗或革命？

67 尽管在形式上他的观点遭到了谴责，但是伯恩斯坦的影响远没有消失。这位“前马克思主义者”和“前社会主义者”不仅没有被驱逐出党，而且继续与党的领导层保持着亲密联系。权力不断增长的工会更加同情他的观点而不是更加激进和正统的考茨基的观点。在德国南部和工业大都市外围的大部分地区，伯恩斯坦的总体战略是向热衷于获得工匠、学校老师、职员和农民选票的党的机关兜售自己的观点。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他更加温和立场的显著优势就显示出来了。受到俄国经验和罗莎·卢森堡华丽言词的鼓舞，左派敦促把采取政治大罢工作为党可以利用的最有效武器来迫使政府让步。在1905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the Jena Congress of the SPD）上，左派赢得了暂时的胜利。倍倍尔措词谨慎的决议承认政治大罢工可以作为一种防御性策略，用来保护受到威胁的权利和机构。然而，反击已经开始。唯恐他们在工人事务中失去特权的工会，鄙视那些对工会组织的实际一无所知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毫不妥协地拒绝政治大罢工的想法。他们向党的最高层发出挑战，在第二年的曼海姆代表大会（the Mann-

① Schorske, p. 24.

② CW, 4, 353.

heim Congress)上,工会成功地抵制了(由考茨基领导的)把他们纳入到党的总路线的企图。他们要求与党处于平等地位并取得成功。他们进一步坚持,在一切有关工人活动的事务中(包括大罢工的讨论),工会和党必须达成一个相互认可的策略。非常清楚的是,温和的工会领导阶层不仅战胜左派,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权力结构,并且使党认识到在将来它必须约束其狂热的革命者。

在第二国际中,情况大体相同。德国党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激烈辩护,只有他们对任何可能导致采取一些具体行动来改变现状的反对程度能与之媲美。因此,伯恩施坦及其学说在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the 1904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 Amsterdam)上的一项提案中受到了强烈谴责,这项提案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如出一辙。另一方面,从1889年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巴黎)到1912年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巴塞尔),德国党强烈地抵制了由法国和英国提出的赞同第二国际所有政党把总罢工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目标的最有效工具的一切企图。在早期的代表大会上,五月一日同时停止工作的想法被广泛地珍视为工人国际团结的一个实例。在每天工作八小时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的世界工人,的确是国际创立的最初灵感。从一开始,德国党就既反对国际应当为所有支部发布强制性策略这种一般性提议,同时也反对大罢工本身更加具体的理由。

在拒绝接受总罢工的作用方面,德国人坚守经典学说的立场。马克思恩格斯都断言政治斗争优先于经济斗争。在他们看来,工会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组织,其目标有限,在推翻资本主义并确立全新的社会秩序方面裹足不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认为,早在一个成功的总罢工严格前提条件具备之前,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和政治优势将使工会变得多余。

无论如何,总罢工是与在工人运动内部马克思主义者的顽强敌人——工团主义者(the syndicalists)相联系的一个口号或政策。因此,

承认总罢工的作用就是安慰主张社会主义的斗争领域应该完全放在社会工业和生产力基础之内的那些人。就工团主义者来说,他们激烈地抵制传统的政治、政党和议会活动——他们认为这种传统方式会导致工人阶级丧失激进的政治立场,导致对僵化的和沉闷的官僚政治的保护以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统治。相反,在一系列不断升级、在总罢工中达到顶点的群众罢工中,工人们将受到自我的军事训练,他们将从每一次失败中汲取教训并一次次取得成功。工团主义者非常严肃地看待阶级战争并认为它的唯一的纯粹的表现形式是工人和雇主、逐渐地和国家之间的直接工业对抗中^①。这些观点在法国有巨大的吸引力(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1914年的法国,工团主义者在工人运动占有优势地位),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也非常强势。

69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总罢工的政策是与早期的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按照他们的观点,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总罢工是胡说八道。它是自发性农民起义的一种工业化翻版,蔑视支持暴力反抗的富有纪律的常设组织。它与无政府主义是一丘之貉,并威胁要把运动交到像埃米尔·佐拉(Emile Zola)在《萌芽》(*Germinale*)中所描写的莱温(Levin)这样不负责任的下层社会的煽动者手中。这种策略不仅使工人士气消沉,其无法控制的暴行也将不可避免地加强那些想动用一切国家力量来对抗工人运动威胁的人的力量。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欧洲是一派无政府主义暴行的景象。爆炸、暗杀和工业破坏促进了政府间的行动,德国社会民主党似乎有理由认为,这种行动的范围很可能更加广泛。

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罢工的最终判断留给了纯洁无瑕的考茨基^②。

^① 工团主义最突出的理论家是特立独行的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他的著作《反思暴力》(*Reflection on Violence*) (London, 1961)是对工团主义革命实践所作的最精致的辩护。进一步参见:J. R. 詹宁斯(J. R. Jennings)的精彩研究《乔治·索雷尔》(London, 1985)。

^② K. Kautsky, *Der Politische Massenstreik, Neue Zeit, 1910. Karl Kautsk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 and trans. P. Goode (London, 1983) pp. 53-73. 中有摘录。

考茨基认为,这是与资本主义最终崩溃阶段相适应的策略,是与无产阶级被完全组织起来并具有阶级意识那个时期相适应的策略。现在不是那个时期。目前,反动分子仍牢牢掌握政权,在这种形势下,适合进行一种消耗的战略而不是一种暴力推翻的战略。考茨基援引被称之为拖延者(Cunctator)的昆塔斯·马克西姆斯·费边(Quintus Maximus Fabius)的经典权威及其战略智慧,他的战略智慧是拒绝与其强大的敌人进行战斗,直到他消磨掉敌人的士气并相应地提高自己军队的效力和战斗准备。(自相矛盾的是,正是这个小心翼翼的战略受到了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的欢迎,他们把这位延迟者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并自称是费边主义者。)在考茨基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就接受消耗战略并加以充分发展”。^① 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证明暴力推翻战略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并且恩格斯本人的政治遗嘱强化了这种信息。越是接近于向现存体制发动正面进攻的时刻,遵守纪律、为这种天赐良机而保存实力就越是重要:

正是因为我们坚信我们正面临着伟大而严重的斗争,并且接近于必须从消耗战略走向暴力推翻战略这一特定时刻,我们就更有必要不让自己被不成熟行动中的急躁和在公开冲突中的最后一搏而冲昏头脑。^②

70

具有革命热情的“法国”模式与具有组织约束的“德国”模式之间越来越常见的一种对抗,成为第二国际后来有关把总罢工作为对抗国际战争威胁手段争论的特征。法国在反对军国主义的鼓吹者古斯塔夫·爱尔威(Gustav Hervé)的领导下,从事荷兰人多梅拉·纽文胡斯(Domela Nieuwenhuis)较早前曾经呼吁的伟大事业。早在1891年,纽文胡斯就提出了这个简明主张:“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回应战争要求

^① K. Kautsky, *Der Politische Massenstreik*, *Neue Zeit*, 1910. Karl Kautsk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 and trans. P. Goode (London, 1983) p. 60.

^② *Ibid.*, p. 72.

的将是呼吁人民宣布进行总罢工。”^①爱尔威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同样简明而直接的呼吁：“反对战争的总罢工……不管哪个政府是侵略者，我们都拒绝为它流一滴血……我们只为建立集体主义秩序这一种事业而战斗。”^②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短视的、迷惑人心的信息的反应，在国际中自始至终都基本上保持一致。在理论层面上，总罢工人们浪漫的唯意志论遭遇到历史决定论的重要规律的反对：资本主义，按其本性来说是分裂的和竞争性的，对稀有资源的大肆追求会给个体，后来是整个国家带来无休止的冲突。只有结束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剥削，并建立一个充满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国内和国际合作体制，才有可能结束战争。大众霸权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就是消灭常备军并代之以人民军队或民兵。与职业的军官不同，普通民众对同他们邻国或遥远国家进行对外战争没有兴趣。他们会把自己限于纯粹的防御性行动——保卫他们的领土和家园的完整，人们一般认为，这种防御性的战争是正义的，并且理应受到支持。

71 从更加实际的层面上说，可以把这看作是对总罢工者令人信服的驳斥：他们立场的矛盾是，工人运动最具有组织性并且无产阶级最具有阶级意识的那些国家，凭借他们总罢工的这种成功，把自己置于他们更加落后和野蛮的邻国的掠夺中。不难发现，隐藏在这种逻辑背后的，是长期存在的德国对俄国的畏惧。为了政治正确，提出这种观点任务已经落到了“德国理论”在俄国的代言人身上了。普列汉诺夫宣称，总罢工将“使西欧成为俄国哥萨克骑兵的猎物”。^③（实际上当战争在1914年爆发时，普列汉诺夫成为一名狂热的爱国者，宣称只是年龄和疾病使

① 转引自 B. D. Wolfe, *Marxism, 100 Years in the Life of a Doctrine* (London, 1967) p. 276.

② Ibid., p. 280.

③ Ibid., p. 277.

他不能加入军队，从而失去用刺刀刺杀昔日德国同志的快乐。^①

当时德国人拒绝爱尔威这种“词句的社会主义”，而对埃尔韦本人来说，他极大地轻视他们不能把理论转化为实践。“你们只是一架精致的售货机，你们没有革命的观念，你们能够非常深地穿透思想的迷雾，但是面对政府，你们畏缩不前……害怕入狱。”^②他的同胞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早些时候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作了同样的嘲讽，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矛盾状况是，选举的成就越大，工会的组织就越广泛，党就越变得中庸和软弱无力：“支持你们优秀的考茨基同志临终前提供给你们僵化理论公式，你们就已经向本国无产阶级，向国际无产阶级隐瞒了你们的无能。”^③

回顾这场争论，最值得惊奇的是，列宁坚持站在其德国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一边，反对“爱尔威本人对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是荒谬可笑的”^④。他热烈地赞同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对“法国半无政府主义者爱尔威之流的愚蠢的反军国主义的狂热”^⑤的批判。列宁附和考茨基，把爱尔威在战争中进行总罢工和起义的计划当作“英勇的愚蠢”^⑥而加以摒弃。

列宁反对极端反军国主义者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缺乏鉴别力和区别对待。他们的态度是完全反对一切战争并且号召所有国家的工人进行罢工和起义。这也许是对的，列宁解释说，因为“无产者没有祖国，……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爱尔威和爱尔威派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生活在什么样的祖国都无所谓，生活在君主制的德国、共和制的法国或

① S. H. Barron, Plekhanov, The 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 (London, 1963) p. 324.

② Wolfe, p. 282.

③ 转引自 M. Harrington, *Socialism* (New York, 1972) p. 75.

④ CW, 13, 91.

⑤ CW, 13, 92.

⑥ CW, 15, 196.

专制的土耳其都一样。”^①列宁本人会为这段话感到追悔莫及。它使大门半开着,1914年8月,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党人都通过这扇门纷纷陷入不光彩的行列之中。

72 普遍反对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相反一派观点同样也传播开来,但却自相矛盾地认为爱国,甚至温和的爱国主义都与成为一名社会党人完全不相容。法国的社会党人的确拥有骄傲的革命传统。到十九世纪末,他们甚至准备与激进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并肩战斗,以保卫民主共和国,反对不断出现的牧师和民族主义者破坏民主共和国的企图。他们为保卫受迫害的犹太族指挥官德雷富斯(Dreyfus)而战斗,甚至准备容忍他们的成员之一——米勒兰(Millerand)——进入资产阶级政府。甚至连考茨基也准备承认,在特殊情况下并且获得了党的支持,社会党人可以积极支持,或者甚至进入资产阶级政府。例如就德国来说,所有左派和激进力量的广泛联合是对反动俄国入侵的一种最恰当反应。这只是重申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即德国工人对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并不是漠不关心。^②

第二国际的历史是一种紧张状态持续存在和意见不一的历史。这些紧张状态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表达。首先,以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为一方,以革命主义为另一方,存在着这两方的统一体。它本身并没有它看起来的那样轮廓清晰,因为,更深入一点考察的话,它涵盖的立场非常广泛,从不断革命论的鼓吹者为一个极端到小心翼翼调和的英国费边主义者另一个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也存在着众多的不同立场,从超议会的政治大罢工的鼓吹者(罗莎·卢森堡是忠实的代表),到那些主张把合法和非法手段结合起来的人(例如列宁),再到那些(像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对不受党的直接控制的和没有在法律和宪法狭隘范围内进行的任何形式的行动持怀疑态度的人。就国际社会主义中的

① CW, 15, 194.

② G. Steenson, *Not One Man! Not One Penny!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863—1914* (Pittsburg, 1984) p. 134.

这些基本问题来说,列宁根本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持一种相对温和和中间偏左的立场,同他的导师卡尔·考茨基的立场没有什么差别。

民族问题和社会党人的爱国主义

关于民族问题和反对军国主义的相关问题,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类似的情形。激进的左派(例如纽文胡斯和爱尔威)蔑视任何对于他们忠于自己民族或国家的要求。然而,绝大多数社会党人觉得,温和的爱国主义是与国际主义完全一致的。的确,人们普遍意识到社会主义如果要发展为一种强大的运动,它必须具有民族的色彩。德国社会主义的语言风格、方式和思想氛围非常明显地不同于与法国社会主义的,正如它不同于英国的社会主义一样。让·饶勒斯经常声明法国社会主义与法国的革命传统相一致,而德国领袖贝尔则宣称任何缺乏爱国主义的个人或运动都是一种“怪物”^①。在这里距离认为社会党人有兴趣与其所有同胞一道保卫国家领土只有一步之遥了。因此,保卫国家的战争被认为是正义的战争。恩格斯自己曾经明确地表示:“如果俄国侵略德国,那么我们就同德国当局一样深表关切并将进行抵抗。”^②在这里,恩格斯准确地预见了这种基调,告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代表们在1914年8月4日做出无条件支持战争的重要声明:

73

如果沾染了俄国人民优秀儿女的鲜血的俄国专制主义取得胜利,那么,对于我国人民及其和平发展来说,如果不是全部那也是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危险之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阻止这种危险,保卫我们的文明和我们自己国家的独立。在这里我们将履行我们始终强调的声明:危难时刻我们不会对祖

① Wolfe, p. 271.

② Ibid., loc. cit.

国舍弃不顾。^①

当然，人们忽视了的重大问题是，“专制的”俄国是与人民民主的法国通过条约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认为德国有理由对法国或其伙伴进行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吗？在德国国会关于战争授权的争论中，即使已经揭露说德国军队已经开进比利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还是决定坚持其预先准备的方案。

74 一场战争何时是进攻性的或何时是防御性的问题，显然被这种情形进一步加重了，在国际局势严重紧张时期——社会党人，同其他所有派别一样，必须立即做出决定的时期——正是在这段时期所有的王牌都集中在政府的手中。他们能够为了证明报复的正当性而发动挑衅，他们能够扣发军事事件的重要信息，他们能够封锁或误导媒体，他们能够并且的确准备了严厉的措施来对付任何反对国家动员的行为。法国和德国社会党的领导人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政府已经精心地准备了一份全面攻击计划来反对他们，如果在战争期间出现任何协调一致的党的反对活动的话。那些将要被逮捕的全国性、地区性和地方性官员的名单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有必要，党和工会的基金将被没收。整个工人运动都将遭到军事围剿。因此，投票反对战争授权将招致国家对党破坏。1914年党的领袖们“在忠于原则和忠于作为无产阶级团结的制度体现的党之间而左右为难，要明白公开反对党的这种决定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懂得党对这些人来说几乎就是生活本身。党已经给了他们那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道德上的满足感，这些是他们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所不能找到的东西”。^②

结果，对每一个正在争夺的政府来说，它都很容易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并用祖国（或 *la patrie*）已危在旦夕的战斗号召来煽动爱国情绪。孤立无助的社会民主党尽管试图抵制流行的沙文主义的强大浪潮，但

^① Bevan,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p. 21.

^② Schorske, p. 300.

最终还是被迫承认，他们继续反动战争准备会使他们脱离其群众基础，甚至脱离他们自己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朔尔斯克(Schorske)简明地总结了1914年8月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形势：“对严厉法办的畏惧或许足以决定投票支持战争。但是就决定投票支持战争的因素来说，需要考虑其他两个相当真实的因素：害怕败在俄国人手里以及害怕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尤其是前者。”^①正如当时一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代表所指出的那样：“党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投票反对，这将引起前线的人们的强烈愤慨和后方人民对社会民主党的反对风暴，社会党组织将被民众的憎恨彻底扫除。”^②

总之，人们普遍地深信，在国际战争的暴行日益临近、悲剧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应当保护一种提倡和解、对话和真正和平的理性声音。回顾过去，很容易看到这些观点对于社会党人代表来说是多么吸引人，这些代表在1914年8月4日必须决定是否投票赞成政府进行战争。一直具有组织纪律性的德国党全体一致投了赞成票，法国也如出一辙。只有俄国和塞尔维亚的社会党拒绝对战争投赞成票，尽管英国在野的社会党在很多方面都要更加坚实、更加广泛。欧洲两大社会主义堡垒，工人国际法国支部(the SFIO [Section Franc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ere])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突然发现自己深深地卷入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战争努力之中。在法国，反对军国主义的倡导者古斯塔夫·爱尔威一夜之间就变成狂热的爱国者，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茹尔·盖得(Jules Guesde)加入了战争内阁，在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合作确保最严格的工人纪律并赞成国内和平(或 Burgfrieden)的政策，“赋予政府‘决定一切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问题的独裁权力’”^③。第二国际寿终正寝，不仅国际承诺被遗忘，而且国际的很多领导人事实上都如释重负地欢呼：至少，他们已经从冰冷以对回到了温暖拥抱他们的民族

75

① Schorske, p. 288.

② Bevan,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p. 15.

③ Schorske, p. 292.

共同体。

列宁对战争爆发的反应

在引起灾难的 1914 年夏季,列宁是一位孤立的和完全边缘化的人。他住在奥地利加利西亚(Austrian Galicia)的诺维塔尔格(Novy Targ),战争爆发没有几天,列宁就因为被怀疑是俄国间谍而被当地警察逮捕。自相矛盾的是,仅仅是著名的奥地利社会党人(全部支持他们国家的战争努力)的干预,列宁就相当迅速地获得保释。他们向奥地利政府保证,列宁远不是一个间谍,列宁绝对敌视俄国政府,列宁在牢房外比在牢房里的作用更大。列宁同妻子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及岳母一道乘火车去瑞士,8月23日到达伯尔尼。通常,两位女性把动荡的革命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并尽可能舒适些。克鲁普斯卡娅整理书籍和论文,处理信件,当列宁正在工作时,不让革命同志打扰。她的母亲负责购物、做饭和清洁工作。时局越是动荡、越是觉得自己与所谓的世界现实意见不一,列宁越是珍视其日常生活的井井有条和家庭生活的平稳运转。此时,列宁已经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于战争性质以及社会民主党在这种完全改变了环境中的革命战略的种种看法。在他到达伯尔尼的第二天,他在紧急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会议上提出了他的结论。他的文章毫不妥协地主张激进变革,完全与普遍的沙文主义爱国情绪相脱节,以至于甚至连他自己的战友都怀疑他对现实的把握。然而,这是个简洁而独断的阐述,自始至终完全充满敌意。它们是列宁主义的第一次声明,这种列宁主义是国际革命中所有竞争性意识形态的替代物,——尤其是第二国际社会主义的替代物,按照列宁的分析,第二国际已经声名狼藉并且已经死亡。

76

他声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的行为是“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并且被法国和比利时社会党的领袖们所效仿。这种全面的背叛

“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① 第二国际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增长,阶级合作,以及不加批判地接受通过议会和立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它破产的预兆。必须“毫不例外地”开展一场反对“所有这些国家”领导人的无情斗争,他们都误入爱国主义的歧途,因此应该创立一个全新的、真正革命的国际。^②

既然战争是划分世界市场和“掠夺其他国家”的“一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王朝战争”^③,工人阶级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利益——他们只是为资产阶级的利润而同胞相残。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从事:

在各方面,包括在军队内、在战场上,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宣传必须把枪口对准各国反动的资产阶级和政党,而不是对准自己的弟兄——其他国家的雇佣奴隶。^④

就俄国来说,“沙皇君主政府和它的军队战败……为害最小”^⑤,坚持革命的失败主义对一个真正的社会党人来说是严峻的考验。

作为整个战略之基础的思想是,工人群众仍然保持着革命觉悟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敌视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⑥这种思想悍然不顾现有的全部事实。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前的三年时间内,列宁几乎完全是毫无结果地在向这些想象的支持者发表演讲。在1915和1916年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会议(the Zimmerwald and Kienthal Congress)上,他试图满怀热情地使分散的反战革命团体协调一致并变得激进,但是他的努力收效甚微。在欧洲左派极端主义派别中,列宁因其观点的极端性而被孤立。只是1917年俄国革命改变了列宁的处境。

① CW, 21, 16.

② CW, 21, 18.

③ CW, 21, 15.

④ CW, 21, 18.

⑤ CW, 21, loc. cit.

⑥ CW, 21, loc. cit.

列宁从无关紧要的边缘位置突然地陷入到俄国和欧洲政治的中心位置。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列宁已经创立了一种意识形态全面替代了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列宁对战争的反应(他的全面的意识形态就是出于这种反应),远不是一种机会主义,而是教条主义地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坚持国际工人的阶级斗争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唯一能够采取的正确道路。如果这意味着违背了舆论的潮流,宣布驱逐几乎所有在任的欧洲社会主义领导人,甚至使自己的党员感到难堪,那也无所谓。列宁主义是作为一个喧闹的弃儿来到世界,在充满敌意的人群中叫嚣着挑战一切。

然而,列宁他很快认识到,要使他的批判具有效力,他必须超越对其敌人的这种软弱无力的指责,并对他们的背叛行为做出一种合理解释,这种背叛行为是根植于当时已经改变了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他开始批判性地重新评价第二国际的整个历史。

甚至还有一项更为基本的工作需要去做。这项任务就是正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背叛,是源自于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根本误解(或狡猾的否定),列宁本能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正是伯恩斯坦立场的可疑之处,至少他已经公开地攻击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无稽之谈。列宁开始认为,第二国际其他一些领导人就更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一直都更加虚伪。他们没有公开对抗马克思的方法,他们仅仅忽视了辩证思维的复杂界限。修正主义以其阴险的方法,不断侵蚀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灵魂,此时列宁认为,这一灵魂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辩证法结构之中。因此,在最初几个月的喧嚣战争中,列宁当务之急是在黑格尔辩证法中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起源。他确信,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列宁对于战争的反应表明,他首先是以一种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学究气的态度来看待世界。在空前的混乱之中,列宁把自己关在伯尔尼图书馆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他正在为自己全新的意识形态立场确立方法

论基础，这种全新的意识形态立场的深刻含义将在第九章加以探讨。

他也意识到，他必须对当前战争的性质和原因做出同样合理的经济分析。由此产生了这种信念，即战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文明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这是期待已久的在全球范围内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信号。简言之，这是全新意识形态的本质要素。显而易见，正是战争使列宁走向列宁主义。

第四章 俄国革命

到 1916 年末,对沙皇政府及其在战争中表现的不满已经影响到俄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拉斯普廷(Rasputin)的丑行、沙皇皇后的政治干预、沙皇尼古拉斯(Tsar Nicholas)的软弱以及他对有效率且称职的部长们明显的厌恶,甚至在宫廷内部和高级贵族中间都引起了极度失望,不再抱有幻想。随着前线形势的恶化,尼古拉斯作为统治者的地位日益动摇。与此同时,在 1916 年末 1917 年初,主要城镇的食物和燃料供应处于危机状态。领取面包的队伍越来越大,人们的不满日益严重并发展成动乱。尼古拉斯还是与从前一样用镇压来回应。在 2 月中旬,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工人代表被逮捕,但这次彼得格勒(Petrograd)的工人们没有被吓倒。在普梯洛夫(Putilov)工人大规模骚乱导致全厂整整 30 000 名工人在 3 月 8 日被关在外面。第二天,大约 200 000 工人罢工,到 3 月 10 日,罢工已经发展为瘫痪首都工业生产的总罢工。结果是沙皇镇压骚乱的命令不可能被执行,并且在两天多的时间内,几乎彼得格勒所有的驻军都转而站在工人一边,1917 年 2 月 12 日,罗曼诺夫王朝(the Romanov dynasty)的命运已被牢牢掌控。工人们再现 1905 年情形,建立他们的苏维埃和一个工人代表的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他们又增设了士兵代表苏维埃。

在这场推翻沙皇的不流血的革命中,走在前面的是彼得格勒的产

80 业工人。他们以惊人的速度,甚至没有遭到任何有力的反抗,就终结了300多年的专制政权。他们掌握了首都的实权,但他们不愿意运用这个权力。真正像他们信奉社会主义自我否定的法则那样,他们请求杜马的中产阶级的领导人把茶杯从他们的嘴边端走。仅仅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徘徊之后,杜马临时委员会采用了“临时政府”的名称,但自始至终其权力更多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际的。

沙皇命令解散杜马,但在进行抵抗的特殊时期,杜马取消了沙皇的谕旨,并投票建立一个临时委员会,赋予其充分权威。临时委员会并没有立即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反政府组织,而宁愿在君主制与混乱群众的激进主义威胁之间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它本能地以英国立宪君主制为榜样维护国家的王室领导的稳固性。只因米哈伊尔大公爵(Grand Duke Mikhail)拒绝接受尼古拉斯放弃的君权,从而迫使犹豫不决的杜马委员会走向中心舞台。临时政府由自由立宪民主党控制,由李沃夫公爵(Prince Lvov)担任总理,古契柯夫(Guchkov)担任战争部长、由米留可夫(Miliukov)处理外交事务,克伦斯基(Kerensky)是内阁中唯一的社会党成员。

尽管苏维埃的领导人(最重要和最著名的有孟什维克主义者齐赫泽[Chkeidze]与策列铁里[Tseretelli]、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Chernov])拒绝掌权,但是为了“革命民主”与“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坚决主张他们有权对政府的活动进行限制。他们尤其迫切要求成立军团委员会和士兵苏维埃,促使军队民主化并把士兵从其长官的监督中解放出来。此外,他们还坚称“已经参加革命运动的军队不应该被解除武装或从彼得格勒撤离”;他们应为“保护革命的胜利果实”而永久存在。^①因此,至关重要的彼得格勒驻军完全忠于苏维埃而不是忠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这就不足为奇。从一开始,政府就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局

^① S. P. Melgunov; *The Bolshevik Seizure of Power* (Santa Barbara, Calif., 1972) p. xv.

限性。

在1917年4月列宁返回俄国之前,社会党人有一个广泛的共识,俄国革命不应该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界限。3月15日沙皇的退位以及同一天宣布临时政府已经建立,对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似乎是俄国资产阶级政治统治还将或长或短地存在下来的信号。新政府保证实行民主及召开立宪会议,立宪会议最终制定俄国未来权威的宪法。它承诺建立一个能够赢得广泛同情的民族团结的政府,激发起曾被沙皇政府拙劣组织的战争努力。在经过许多世纪的专制统治之后,俄国终于自由了。俄国可以重新恢复其骄傲,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与欧洲其他民主大国英国和法国一道反对德国帝国政府扩张主义的野心。

81

在这种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俄国社会党人都赞成防御战争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当前的任务是恢复秩序,抑制工人不时的过分要求,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军队以粉碎德国的军国主义,从而奠定欧洲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基础——当然在这之后,俄国社会主义的前景或许会根本改变。甚至布尔什维克人也广泛支持这个总路线。在斯大林(Stalin)与加米涅夫(Kamenev)领导下,党报《真理报》(Pravda)不断警告反革命危险,同时也对临时政府表示谨慎的支持。对于战争,它仍然墨守成规地认为,只要德国的侵略在继续,俄国就必须“以牙还牙”^①。最重要的是,所有重要的苏维埃组织的领导人都明白,考虑到战争期间国内严重的危机,唯有政府能够确保广泛的团结,这样的政府必须建立在杜马中多数派中产阶级的基础上。

^① H. Shukman, *Len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1966) p. 177

列宁的四月提纲

1919年4月,列宁乘坐德国当局准许运行的著名的“闷罐火车”返回俄国。列宁原以为他在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the Finland Station)下车会遭到拘捕,但出乎意料的是,苏维埃派出一大批迎接人员来欢迎他。齐赫泽为列宁做了一个简短的欢迎致辞,勉励列宁维护社会党人力量的团结,采取温和的和负责任的路线。在齐赫泽致辞期间,列宁坐立不安,茫然地打量着车站富丽堂皇的帝王接待室。苏克汉诺夫(Sukhanov)是这些事件最敏锐的见证人,他对这个场合中的不和谐现象深感震惊。他说,正在发生的一切——穿着灰色服装的政要、凯旋拱门、旗帜、鲜花和穿着制服的乐团和仪仗队——都似乎与列宁没有任何关系。列宁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与这些人,他们的感情和意见以及伴随他们的一切都毫无关联。

列宁没有理睬齐赫泽,转而走向站台上的群众并向他们致敬,称他们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国际内战的俄国先锋。这种毁灭世界的掠夺战争很快就会改变。德国正在动荡不安,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开始摇摇欲坠,但是必须保持这种势头。开创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工人的巨大荣耀,现在他们有责任把这场革命继续下去。列宁充耳不闻齐赫泽对于社会党人要团结与温和的呼吁。列宁甚至没有对他的欢迎词做出任何回应。列宁“同样也完全没有回应这些见证和参与者人人都认同的俄国革命的‘情势’”。^①

于是,列宁穿过哑然失声的欢迎会场来到外面的广场,广场被众多要求列宁发表讲话的人群所包围。起初,他试图站在汽车发动机罩上,后来他被抬到广场上的一个装甲车上——一盏安装好的探照灯烘托着

^① N. N. Sukhanov,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London, 1955) p. 273.

列宁和这个场景。他再一次直率而明确地说——这场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战争，工人阶级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任何利益，欧洲人民必须调转枪口反对他们的剥削者，走俄国工人的道路，俄国工人已经为一个新的时代——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铺平了道路。在通往布尔什维克权力中心每一个十字路口，列宁都会重复这种观点。最终，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列宁向其布尔什维克同事们详尽阐述了他的观点，后来，他把这些观点浓缩进一个含义模糊的十点纲领：《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他的著名的《四月提纲》^①。这是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公开出现的重要时刻。

列宁作了综合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纲领，一直到十月革命他都矢志不渝地坚持这些综合分析和具体纲领。面对公众情绪、面对其他政党令人反感的领导人、甚至是面对几乎是其全部同志的敌视和极度不信任，他都毫不妥协。列宁在自己的党内几乎没有得到一位著名领导人的支持，《真理报》（列宁已经被任命为编委会成员）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步骤与党分开，从列宁的《四月提纲》开始，编委会作为一个整体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其读者，《四月提纲》只是作为列宁同志的个人观点而公开发表的。《真理报》始终认为列宁的综合分析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源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并且指望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②

83

无论是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没有一个著名的领导人能够理解列宁所独有的激进观点，更谈不上深有同感了，这也许不足为奇。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们并没有参与列宁的思想发展，或者，即使参与其中，他们也不懂得其政治实践的内涵。读者也许会处于一个类似的情形，因为展现列宁观点的理论框架在本书中还没有被充分地概述出来（见第5章）。然而，正是直接而明确的基于这种理论分析，列宁一返回俄

① CW, 24, 21 - 26.

② Sukhanov, p. 289.

国就提出了他的纲领。

帝国主义与战争

当然，每一个用头脑思考的人都知道，列宁是激烈反对战争的，然而，大多数苏维埃的领导人也是如此，他们自豪地宣称他们是齐美尔瓦尔德宣言(the Zimmerwald manifesto)的拥护者。这个宣言要求在不合并、不赔款、所有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议和。在列宁看来，这种观点是感情用事和前后矛盾。它完全没有理解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因而也提不出任何方法来解决其对立。

为了把握列宁论证的逻辑，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扼要地概述一下本书后面将要阐述的内容。对列宁来说，帝国主义完全意味着：垄断和技术退化；军国主义和破坏性的生产方式；对内和对外压迫；牺牲个人和团体自由的一种庞大而寄生的国家的发展；最后，通过把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使其矛盾普遍化。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形式和腐朽形式，它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作为一个历史时代，最终在其已经煽动起来的世界大战中，宣告了自己的破产。在这个分析中，列宁已经

84

得出了对于1917年革命战略来说是基础性的观点：

(i) 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消灭战争：“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和饥饿，就免不了有千千万万人的死亡。”^①历史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纪元。

(ii) 只有推翻与资本主义内在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形式才能推翻资本主义。“不推翻资本的权力，不把国家政权转到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中，就不能跳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争得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②创立深受欢迎的机构——苏维埃——的任务降临到俄国人身上，只有通过苏维埃才能实现这种超越。

① CW, 24, 37.

② CW, 24, 67.

(iii) 资本主义本身在其国家垄断的形式中创立了新的组织机构——托拉斯、卡特尔和大银行，通过它们经济的社会化管理得以进行并实现民主化。

从第一论点可以得出，一切要求用“体面的”或和平谈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的那些人（这是大多数苏维埃领导人的观点）与相信通过盟军的胜利能够确保和平时代的那些人（这是临时政府的观点）犯了同样的错误。必须拒绝这两种观点，因为这两种观点都不理解战争、军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国家是如何内在地联系着的。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承认，“说明资本与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反复证明，要缔结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①这是教育和宣传的一项中心任务。用现实的语言来说，这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必须公开喊出谴责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自始至终都在狂热地支持同盟国的战争目标，并且以受到民众的狂热支持为荣，因而可以更加有效地来追求这些目标——的口号：“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完全是谎话。”^②温和社会主义者，此时主导苏维埃的国际主义孟什维克的立场也同样受到了全面的谴责：“决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③

第二个论点直接导致“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必要性，……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④；“我写的、宣读的和反复说明的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⑤本来，列宁就明白苏维埃是符合“我们关于‘公社’国家的要求，即由巴黎公社提供了原型的那种国

85

① CW, 24, 22.

② CW, 24, loc. cit.

③ CW, 24, 21.

④ CW, 24, 23.

⑤ CW, 24, 25.

家”^①。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摘录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公社制度的论述：

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②

毫无疑问，列宁“公社国家”的思想是其整个纲领中最令人惊讶的激进特征。其理论背后隐含着这种信念，即那些崇拜专制和军事化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民族国家最终会失去其历史作用。

列宁的第三个论点在《四月提纲》还没有详细地展开，但它无疑隐含着“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③的要求。根据列宁早年对垄断与金融资本的分析，作为资本积累与流通的神经中枢的银行的作用变得极为重要。在列宁看来，银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股票交易所，成为作出与投资分配和行业调整相关的基本决策的场所。因此，大银行提供了一套现成的机制来指导经济的生产和分配网络，并对此负责。这是由垄断资本主义本身所创立的典型的组织结构，通过它可以极大地推动经济的社会主义化。在其他经济措施方面，列宁坚持的仅仅是“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④。这只不过是简要地重申了列宁 1905 年的土地纲领。土地的所有权仍然是民主革命中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强大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已经相当彻底地改变了农民的土地占有制，但是农民仍然嫉妒地主贵族、教堂和国家所持有的土地。

孟什维克的批评

回顾式地再现列宁在 1914—1917 年期间的思想发展以及导致他

① CW, 24, 24.

② CW, 24, 23.

③ CW, 24, 23.

④ CW, 24, loc. cit.

得出极端结论的逻辑是一回事，而正确认识列宁对其同时代人的影响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的布尔维克同事们的第一反应是一种惊愕、怀疑、不安。在孟什维克派（在到达彼得格勒的第二天，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合”大会上宣读了他的提纲）中间，感到的则是愤怒并谴责“列宁在民众中挑起了内战的旗帜”^①。波格丹诺夫谴责这是“疯子的胡言乱语”^②。——强烈爱国的普列汉诺夫赞成这个评价。斯切克洛夫（Steklov）是一位“联合派”成员和苏维埃的一位著名领导人，他充满着更多的期待（但他更有优越感）：

列宁的演讲……通篇都只是些抽象的阐述，这表明他已经远离俄国革命，当他熟悉了俄国国内事务之后，他本人就会抛弃自己的这些阐述。^③

温和的社会党人消除了临时政府部长们的疑虑，他们认为列宁“疯狂的想法”使他陷入孤立：“完全是一位置身于运动之外的迷途之人。”作为最初接受列宁思想的最值得信赖的见证人，苏克汉诺夫“大体上赞同对列宁思想的这种评价，并且说就列宁当时的态度而言，没有人能接受得了。所以当时根本不会对我们的对话者米留可夫构成威胁”。他也确信：“当列宁脱离其国外的学术氛围之后……他将会……抛弃无政府主义的胡言乱语。”^④根据克鲁普斯卡娅一个朋友的回忆录，甚至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也得出结论说：“恐怕看起来列宁似乎是发疯了。”^⑤

我们应该清楚，当列宁第一次概述他关于俄国二次革命的纲领时，没有一个著名的社会党领导人赞同他的任何实质性观点。在国家权力应该归属于谁的关键问题上（列宁反复强调国家权力问题是一切革命

① Sukhanov, p. 287.

② R. R. Abramovitch, *The Soviet Revolution* (London, 1962) p. 31.

③ Sukhanov, p. 287.

④ Sukhanov, p. 288.

⑤ Abramovitch, p. 30.

的首要问题),他们几乎一致认为,作为沙皇杜马的继承者、由资产阶级控制的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合适的宪政形式。他们宣称,唯有这种宪政形式,才能使资产阶级接受革命并协调跨阶级的民主努力。正如在列宁返回俄国之前不到两个星期,孟什维克和苏维埃的一位最主要领导人在向彼得格勒苏维埃发表讲话时所说:

你们明白正在发生的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它是社会革命的一个阶段……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你们把这个权力交给资产阶级,但与此同时你们要保卫重新获得的自由……只要这种权力可以巩固革命,只要它是在推翻和打破旧的秩序,临时政府就必须掌握全部行政权力。^①

根据这一共识,就无产阶级或其社会党而言,任何革命冒险主义都会疏远中产阶级和行业工会,分化民主力量,并为反革命政变开辟道路。无论如何,工人阶级人数太少,政治上和组织上太不成熟,而不能独自掌握权力。在本质上,这完全是重申了1905年末和1906年孟什维克的观点。

列宁的“提纲”提出之后,孟什维克的《工人报》(*Rabochaya Gazeta*)立即得出结论说,忽视“生产力状况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们的思想状况等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就是为反动服务,列宁的确是反动的。因此,反对列宁的斗争就是与反动作斗争^②。自那以后,大多数孟什维克通过他们的新闻机构和他们苏维埃的党的发言人,谴责“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是一个反革命的挑衅(直到8月末,科尔尼洛夫将军[General Kornilov]试图发动政变后,孟什维克左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才承认苏维埃自己有必要拥有权力)。

^① Tseretelli, 转引自 Ascher, p. 93。

^② Ascher, p. 24. 在孟什维克间,只有马尔托夫暂时准备支持苏维埃夺取政权的号召(参见 Ascher, pp. 101-2)。

不成熟的俄国革命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孟什维克加以批判的主要借口是，马克思所阐明的（并且被西方社会主义者普遍接受）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在俄国还不成熟。根据这种解释，马克思已经为其追随者设定了清楚而严格的条件，因而他们能够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时刻何时来临。这些条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独立的历史逻辑。

历史上不同的生产方式（例如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方式不同。它们是建立在技术工艺的性质广泛不同的基础上，因此具有广泛不同的劳动分工方式，以及分配社会地位、权力、财富的不同方式。虽说如此，每一种生产方式在其法律和宪法实践、其薪酬体系和地位以及商品生产和分配的事务管理之间，都必然会形成一种严密的内在一致性。每种生产方式都有其内在矛盾，但是，每一种生产方式——一旦确立并占据主导地位——在其进步的潜能完全失去以前，都注定要发挥其历史作用。谈到进步的潜能，马克思通常是指增加人类劳动生产率的能力。当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最终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并且受到一种新的、更有效率、更复杂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系统的威胁，只有这时才会发出这种生产方式寿终正寝的信号。此时，它自身的内在矛盾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些矛盾将变得不可调和。同时发生的危机不仅动摇了商品的生产 and 交换系统，而且动摇了社会借以进行统治和自我表达的整个综合系统。

关于革命时机成熟的这种决定论说明的经典名著是马克思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为这种过渡设定了清晰的条件：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

现的。^①

这些就是被称之为必须要满足的“客观条件”，很显然，孟什维克就是站立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坚决反对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推进俄国革命的任何建议。他们强烈争辩说，完全没有理由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接近于耗尽其进一步发展的潜能。俄国国内先进的机器工业的狭小地区被那些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与原始积累的早期阶段不和谐地并存着的广大落后地区全方位地包围着。孟什维克通常在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的分析中坚定地坚持俄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他们没有意识到或者不相信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关注的是全球经济，俄国只是其中一部分，并且坚持依据国际水平来评价革命成熟的条件。这是 1917 年俄国马克思主义主要的理论分水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产生了政治战略与策略的根本分歧。赞成还是反对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涉及先前是否接受国际金融资本主义分析这个问题。

在孟什维克看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要义不容辞地加以接受的另一个条件是工人阶级自身发展的程度。除非无产阶级在国家中形成多数并且意识到其历史使命是实现社会主义，否则，谈论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前景仍然是不负责任的。革命同样还必须具备“主观条件”，它涉及工人阶级的数量大小、成熟、组织上的凝聚力以及革命意识。孟什维克认为，这些标准中的任何一条（也许，最后一条除外），1917 年俄国工人阶级都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从数量上看，接近 1.2 亿的总人口中大概有 300 万工人，很显然，工人阶级在俄国人口中只占一小部分。工人阶级的成熟程度和组织凝聚力不仅受到了针对工人阶级政党的专制禁令的严重抑制，甚至还受到了针对工会保护组织的专制禁令的严重抑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理由认为俄国工人阶级已接近满足马克思

^① Ascher, p. 24. 在孟什维克间，只有马尔托夫暂时准备支持苏维埃夺取政权的号召（参见 Ascher, pp. 101 - 2），loc. cit.

关于“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①的具体要求。

对于孟什维克与温和的俄国社会党人来说,事情非常清楚——俄国并不满足向社会主义前进所必需的客观条件或主观条件。他们把那些不负责任地鼓动工人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人看作是蛊惑民心的政客或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煽动没有面包的工人、希望和平的士兵以及没有土地的农民的不满,但是“面包、和平、土地”的口号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毫无关联。他们逐步地认识到,战争的严酷激化了俄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在部分无产阶级中间产生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冲动。但是这不能作为那种仅仅是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界限的不成熟的和灾难性尝试的依据。相反,社会党人应该致力于阻止工人们天真的乌托邦主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习惯于这种前景,成为可预见未来的负责的反对派。

反对列宁的不只是他自己政党的领导人,孟什维克、社会党的革命者、苏维埃的领导人、工人群众,尤其是士兵也反对列宁。列宁谴责防御战争,草率拒绝没有合并和赔偿的和平不仅带有很多背叛俄国的味道,也带有背叛二月革命所赢得的自由的意味。持续不断地宣称列宁是德国的一名代理人,受到德国财政的资助,并且被德国火车巧妙地运送回来以破坏俄国战争努力,这更强化了列宁背叛的形象。总之,没有什么比经常重复的这种看法更加远离真理,即正如《四月提纲》中提出的纲领一样,列宁的革命纲领是人为精心设计的机会主义观点,是用来迎合俄国民众的主流情绪。情况正好相反,持有他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很少。

四月份在自己的党内还是少数派的列宁是如何在九月份就变成俄国各主要苏维埃中的多数派,可以相当简单地加以说明。党自身的抵制迅速地瓦解。五月中下旬,列宁在彼得格勒以及全国性的会议不停

^① MESW, 1, 44.

91 地做演讲、散发小册子和报告，不知疲倦地重复与展开他的“提纲”。就像当代一些敏锐的评论家已经观察到的那样，列宁再一次表明他可以独立于党之外而进行思考与行动，但反过来却不能成立。到四月底，只有极少数持怀疑态度的杰出之人（加米涅夫、李可夫〔Rykov〕与米柳亭）拒绝妥协。从思想和心理上说，党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列宁的造物——没有列宁党或许还能够存在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反对列宁，党就是无法生存的。

此后，党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作为整体的人民身上，或者更确切说是转移到首都的产业资本工人身上，列宁坚持认为，他们在正在开展的革命运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就像 1905 年的彼得格勒顺理成章地成为俄国注视的中心^①。正如在 1905 年，证明自己是更加广泛的进步阶级的正是整个国家中最有组织、最有文化和最成熟的首都先进的产业工人。列宁的论述以及他的整个政治策略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系列的预测或预言的基础上（他的全部革命理论确实如此）：

(i) 其他政治党派不可能解决战争的中心问题和基本问题。正如他们接受具有局限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样，由于立宪民主党人坚持为最终的胜利而战，孟什维克及苏维埃革命家的声誉将会不断受到损害。

(ii) 同样地，立宪民主党人在其中拥有实际发言权的任何联合都不能解决土地问题。他们为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战，阻止农民占有全部土地的努力，结果是他们认为土地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相适应而积极地加以干预和镇压。

(iii) 民族问题上也有很多相同的情形——因为害怕与立宪民主党人产生对抗，如果不是在口头上的话，“小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派和社会党的革命家也被迫在实际中保持压

^① CW, 24, 543.

迫的俄罗斯帝国的完整性。他们被迫得出结论说,当战争危机威胁到国家的生存时,就不宜进行俄国边界和宪法的重新谈判。

(IV)坚持现有的财产关系神圣不可侵犯也不可能解决不断升级的、已经给军队和城市居民带来了真正匮乏的经济危机。只有通过国家对银行的控制和主要工业部门的国家托拉斯化才能对国家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只有通过工人对工业的控制才能遏制腐败和暴利,而贸易和交换的恢复则需要承担越来越大作用的合作社。

92

根据列宁的分析——或者确切地说,根据他在1917年4月详细阐述的预测,俄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工业、农业、财政以及政治崩溃和大灾难的威胁的客观形势,不能通过把革命严格限定在现存财产关系的范围内而得以避免。因此,试图保持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是徒劳无益的。

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介于二者之间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列宁不厌其烦和强力驳斥有关他迫切要求在俄国实施社会主义的断言。例如,土地国有化是列宁1917年土地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如同在1905年一样——它不仅符合农民经营者一定的利益,而且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相一致,与马克思本人所坚持的观点相一致,即土地国有化的措施是促进而不是妨碍农村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发展。列宁认为,要求建立单一国家银行和在主要经济部门中建立一批国有托拉斯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措施,这同样适用于普遍的劳动服务。正如列宁不断地重申,工人对工业进行监督(control)的计划,只是意味着监督而不是所有。“监督”用书本上的含义来说是防止暴利和国家的掠夺。“公社国家”的计划,

同样是民主最彻底的扩展,也是人民能够把俄国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唯一途径。

因此,俄国革命的直接目标不是社会主义,“谁也没有说要做‘社会主义的实验’”^①……“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只要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决不能提出‘实施’社会主义的目的”^②……“我们不能主张‘实施’社会主义——这是非常荒谬的。我们应当宣传社会主义。”^③

列宁头脑中的政权,在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构成上是一个独特而混合的形态,这种形态虽然没有理论上的预见,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实践上已经为其做好了准备。在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主义本身是一个中间形态。帝国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积聚、劳动社会化和垄断过程最高点,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征兆。帝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④。托拉斯和大银行是帝国主义的发动机,它创造出一种机制能够极大地促进整个经济的社会化。战争本身以及日益需要对整个经济和劳动力的动员,不断扩展和加速交战国的这些进程。在垄断时期,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开始矫正那种作为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典型特征的无政府无计划性:“恩格斯指出:‘哪里有托拉斯,哪里就没有无计划性,而有资本主义’。现在指出这一点尤其恰当,因为现存我们看到的是军事国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⑤列宁对此是毫不怀疑:

① CW, 24, 32. 直到并且甚至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一再坚持认为,就俄罗斯来说,最有希望的就是进行激进的民主革命,为走向社会主义作准备。关于这一点可进一步参见本书作者的‘Lenin, Socialism and the State in 1917’ in E. and J. Frankel and B. Knei-Paz (eds), *Revolution in Russia: Reassessments of 1917* (Cambridge, 1992) pp. 287 - 303.

② CW, 24, 73. (cf pp. 193, 217).

③ CW, 24, 242.

④ CW, 24, 44.

⑤ CW, 24, 306 cf. p. 240.

“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由于战争而更加成熟，并且继续在异常迅速地成熟。……资本的积聚和国际化正在大大地加强。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由于情势所迫，许多国家实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其中有些国家进而采取普遍劳动义务制。^①

列宁提出的“党纲的理论、政治及其他一些部分的修改草案”——写于四月底——非常清楚地表明，列宁高度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进行详细阐述；简言之，要具体说明必胜的“客观条件”，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策略和应追求目标的界限。这就是列宁对党的整个纲领中最基本问题所作的最权威论述，他从中得出结论说：

因此，客观情况把下列任务提上了当代的日程：从各个方面直接训练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以实现构成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各项经济的措施和政治措施。^②

94

很清楚，列宁在这里是一般地谈论作为一种全球现象的资本主义，并且他毫不怀疑，鉴于资本主义内在的国际化特征，这也是把握它的唯一方法。他宣称：“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彼此联系得很紧密的时候，……只谈一国的情况是荒谬的。”在战争中，“这种联系大大地增强了，全人类卷入了一团血污之中，要想单独脱身是不可能的。”^③毫无疑问，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已提到了议事日程。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俄国，问题并不是要剥夺资本家并把他们的资产上交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确切义务并不是改变财产关系，而是坚持对银行、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国家监督。这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正如列宁在“全俄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解释的那样：它将是“某种中间

① CW, 24, 305 cf. p. 309.

② CW, 24, 459 - 60.

③ CW, 24, 238.

的、某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①苏维埃领导下的普遍劳动义务制，同样“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②确切地说，对银行的监督也是如此^③。然而，所有这些措施仍然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实现这些措施将确保“俄国一只脚踏进社会主义”^④。因此，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的未来过渡是有保证的。

然而，列宁设想俄国是一个奇怪的混合政体，在其生产方面上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很多特点，期待建立分配机制把合作运动扩展至全体民众，同时把二者都置于苏维埃的全面监督之下。根据群众经由苏维埃、民兵、工人监督机构以及负责特殊职能或地方事务的专门公社对公共事务进行决策与执行的参与程度来衡量整个机构的民主化。鉴于他预见到革命所产生政体具有复杂性、混合性，列宁及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们经常对社会主义是否要立刻提上日程的问题感到困惑不解，就不足为奇了。（公社式的管理机构不具有通常所说的国家机关资格问题也存在着同样的困扰。）

95 尽管在俄国立即“实施”社会主义的革命问题上，列宁有所限制和保留，但他完全自信地认为，苏维埃成功掌权以及它所代表人民权力的宣告，连同把资本主义置于人民监督之下的一揽子经济措施方案，不可能不对发达的西方产生刺激性影响。他确信尤其是德国和法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边缘，他们带头革命，欧洲其他国家将迅速地跟进。列宁认为，一个“沉浸在血泊中”^⑤的世界，经济上的毁灭、饥荒的袭击以及即将来临的所有文明世界的崩溃，最终使人们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拯救世界。“现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论断……世界大战必然导致革命，已经在各地得到证实。”^⑥战争本身正强力造就革命

① CW, 25, 19.

② CW, 25, 364.

③ CW, 24, 53, cf. p. 194.

④ CW, 24, 307.

⑤ CW, 24, 504.

⑥ CW, 24, 227.

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

开辟世界革命的历史责任落到俄国头上。俄国的无产阶级尽管人数相对较少,但是它通过苏维埃制度在一个阶级的基础上被严密地组织起来。在欧洲,唯有他们享受着彻底的集会与出版的自由。重要的是,他们武装了起来,并有革命军人的加入。“给予你的有多少,对你的期待就有多高。”在列宁看来,开辟人类历史新时代——最终把人类从垂死的资本主义、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毁灭中解放出来的时代——的任务就落到了俄国工人和士兵身上。随着开创社会革命时代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属于他们的开创“新阶段”的荣誉和责任具有了客观必要性。尽管他们本身不可能明确地成为是社会主义奠基人,但是点燃消灭资本主义的火炬是他们的职责。“开始革命的巨大光荣落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头上。”^①

阶级和政治分化

如同1905年的分析一样,列宁在1917年也相信,事态的发展将会证明其预言的正确性。革命的经验、政治上空前广泛的群众参与,将会公开揭示俄国社会真正的阶级对立——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那些试图保持中立的党团——温和主义者、调和主义者以及社会和谐的空想家——将被一扫而空。就在其《四月提纲》公开发表两天之后,列宁在《真理报》上写道:

我们要团结起来进行无产阶级本阶级的工作,无产者和**贫苦**农民就会愈来愈多地转到我们方面来。因为**实际生活**将时时打破“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这些更“地道的”小资产者等等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资产阶级主张资产

^① CW, 24, loc. cit.

阶级的单一政权。觉悟的工人主张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苏维埃的单一政权，主张用**启发**无产阶级意识、使它**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办法而不是用冒险行动来取得单一政权。……这就是决定我们任务的实际的**阶级**的力量对比。^①

策略很清楚——揭露目前苏维埃小资产阶级“社会党”的领导人和温和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的动摇性和半心半意；揭露他们之所以不能采取决定性的措施来结束战争，是因为他们与自由立宪民主党是一丘之貉——自由立宪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它反而屈从于国外帝国主义的利益；揭露温和社会党人自我否定的法令是如何把革命目标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之内，它必定反对民主革命的任何深化，或反对任何真正对资本主义过剩和暴利的限制措施。最重要的是，列宁把自己的未来及其党的未来押在他的这种信念之上，即认为广大工人，士兵和农民会逐步信任他们自己的苏维埃而不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及其地区或者城市的杜马。

97 从1917年4月到10月的数月里，阶级基础、革命的目标和条件这些争议概念都经历着时间的考验，并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上下飞舞。国内和国外的事件、政治危机、经济混乱和战事的起伏都会被相反立场的人善加利用。俄国被铺天盖地的各种新闻报纸所淹没。到处泛滥的杂志、新闻、传单、声明、海报以及小册子，详细解剖和分析着事件的每一次最新变化，力图使它们与某种态势，某种发展进程相一致。各种会议、研讨会和在街道、兵营、工厂以及苏维埃区的群众示威也可以说是没完没了。并不只是一些主要城市（正如社会历史学家已经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而是整个俄国都因政治争论而难以平静；并且越是不平静，布尔什维克就越具有优势地位。每月发生的事件以及流行的评价似乎都日益证实列宁的预测。

在战争与和平这个关键问题上，每月都有更加深入的证据来证明

^① CW, 24, 40-1.

布尔什维克的论点,即临时政府决心使战争获得胜利。列宁返回俄国不久,就发生米留可夫照会(the Miliukov Note)的丑闻,在这个照会中,外交部长(最著名的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人)请求战斗到底并且履行对同盟国的责任。很明显,苏维埃要求在没有兼并或赔偿的公正和平基础结束战争的立场遭到政府无理的忽视。大规模的街头示威第一次表明列宁的“打倒战争”口号,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正在获得支持。^① 开始席卷全国(和军队)的反战情绪处处都受到政府的强烈抵制,甚至在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Kerensky)在五月成为战争部长后仍是如此。

六月中旬,政府决定在加利西亚(Galicia)发动一场巨大攻势,续三个星期表示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到了七月第一个星期结束时,俄国军队却在混乱中退却。此时在政府中处于突出地位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不可避免地遭受耻辱。只有布尔什维克叫喊着要立即结束战争,指责所有其他政党对于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及其国外主子软弱和屈从。实际上,布尔什维克的和平政策(如果确实是如此的话)是什么并不完全清楚,当然他们不是执政党,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其政策的模糊符合他们的利益。列宁不断声称布尔什维克不会和德国单独媾和,部分原因可能是想戳穿他是德国代理人的谣言。列宁所许诺的是一种并不明确的民主和平,如果它被拒绝,就威胁通过武装起来的俄国人民发动革命战争。虽然列宁相信俄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会引起德国革命,但是德国革命的前景则很少被提出来加以讨论。不论布尔什维克对于战争的看法是如何含糊不清,不论作为其政策基石的国际局势是何等的不可预测,但是在民众的心里,布尔什维克作为唯一激进反战的政党日益赢得信任,这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

98

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有一种类似的说法。其他党派一向低估了民众对作为人民革命体现的苏维埃的忠诚度。在这几个月,苏维埃毫无

^① Melgunov, p. xviii.

疑问是大众动员及民主化的工具,数百万人通过苏维埃第一次感到不仅有了自己的声音,而且有了改变事物的能力。我们应当再次明白,这远非一场仅被局限在首都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地区的运动。相反,苏维埃以及类似机构(在俄国不同的地方叫法不同)雨后春笋般增长,几乎迅速地渗透到每一个村庄以及军队的每一个哨所。的确,有事实表明,在农村的很多地方和小城镇苏维埃运动最为强劲。俄国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苏维埃,意味着是对沙皇政权复杂行政机构的清算,临时政府试图通过这个行政机构来控制国家。在很多地方,当地的杜马,州议会、警察及土地所有者被取代,被投入监狱或者被驱逐。实际上,临时政府把自己的权威凌驾于当地或农村苏维埃的一切企图都遭到激烈反抗,这些反抗通常都取得了胜利。

在某种程度上,农村自治的这种强烈主张根源于世世代代对城镇和任何形式的政府干涉的不信任——尤其是当政府试图对粮食贸易实行国家垄断时(因为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都做过)。更重要的一点是,许多苏维埃以及农村公社(在1917年大量复兴)担心,他们对地主休耕地、森林、牧场以及整个财产的事实占有会因政府行动而发生改变。政治原则与当地的和个人的利益在这里极其巧合地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与“一切土地交给农民”的口号紧密联系起来。当所有其他党派徒劳无益地加以反对时,再一次只有布尔什维克把这些口号作为自己的口号。

七月事变(*the July Days*)和科尔尼洛夫叛乱(*Kornilov Revolt*)

99 当然,在1917年10月革命之前数月的动荡中,布尔什维克的命运也是起伏不定的。党的影响力的持续增长受到抵制,7月初,几乎变成一场起义的群众示威使党的影响力出现暂时下降。武装的士兵与海员在一场混乱的暴动中加入到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行列。这场暴动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组织的,随即被取消,没能及时地阻止参加者的聚集,然后又同意进行以检验力量。彼得格勒的苏维埃领导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仅拒绝掌管示威者所要求的、他们从临时政府手里

夺取的权力,而且他们明确表示他们会用武力镇压起义者以保护自己,当这一切都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这种一半是暴动的示威失败了。在日益激进的工人与士兵中,反对当时苏维埃领导层的憎恨情绪在增长——当权力被拱手送给他们的领导人时,如果有必要反对那些坚持送给他们权力的人,他们的领导人就有权诉诸武力,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七月事变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苏维埃与政府联合协调一致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签发了逮捕高层领导的命令,因此这些领导人不得不逃离这个城市。《真理报》编辑部和办公场所遭到破坏,官方似乎授权在大众传媒上广泛声称列宁确实是一个德国间谍。

现在看起来,七月事变的挫折并没有像评论家们一直都倾向于认为的那样严重。它确实使得列宁在七月底八月初收回“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使列宁得出结论说,政府的镇压和政治对策使得党在当前通过和平的方式赢得大多数成为不可能。因此列宁总结说,在这种情况下,武装起义是革命前进的唯一方式。

加速提升布尔什维克党威望和组织力量的,正是八月底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它超越任何单一事件。同样地,叛乱的耻辱性失败也表明右翼反革命力量已经变得何等薄弱。这定会提出有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基本依据问题,以及由于担心温和派会倒向反革命阵营,他们一致拒绝采取激进的立法或经济措施问题。8月25日,刚刚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的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布公告,在这个公告中,他自作主张代表所有爱国的力量,恢复军队和政治生活中的秩序与纪律。他计划向彼得格勒的哥萨克萨维奇区(the Cossack Savage Division)中心进军,来镇压苏维埃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并把国家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中解放出来。在这个事件中,完全没有可能导致战斗。来自彼得格勒的社会主义鼓动家、工人和士兵渗透到科尔尼洛夫军队内部,不是战胜他们就是削弱其决心,铁路工人破坏其军队调动和电报联系。反正很明显,这次未遂政变缺乏很好准备和协调。然而,在真正

危险的时刻，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废除了那些反布尔什维克的措施，布尔什维克党则以立即动员其影响下的工人与红军作为回报。利昂·托洛茨基被任命为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威来武装工人特遣部队——大约分发了 40 000 支步枪。正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布尔什维克最有效的支持下，实际上成为反对科尔尼洛夫力量的动员者与组织者。

布尔什维克是科尔尼洛夫事件的受益者。人人都知道临时政府软弱无力。更糟糕的是，广泛谣传（并非没有根据的）科尔尼洛夫的行动如果没有获得许可，也至少是告知了任命他的总理克伦斯基。另一面，该事件表明，苏维埃中央是革命果实的唯一真正保护者和唯一能够鼓舞、动员群众的机构。正如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工人之路》（*Rabochii Put*）所说：“在科尔尼洛夫期间，权力已经重新回到苏维埃了。”^①温和社会党人的整个革命策略不仅遭到昔日支持者的质疑，这些支持者正在抛弃它们，而且也遭到领导集团内部著名领导人的质疑。马尔托夫和丹（Dan）领导“国际主义”孟什维克走上了日益敌视临时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场。他们已经认识到两个政权并存并不能为革命的利益服务，苏维埃应该准备接管政权。社会革命党人中间也发生了类似的分裂。其左翼在土地、战争和苏维埃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都是对布尔什维克纲领的有限支持。

列宁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作准备

101 到九月初，很显然临时政府的气数已尽。布尔什维克已经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的苏维埃中成为多数派。在至关重要的、深受国民敬重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托洛茨基已经取代温和孟什维克齐泽赫成为主席。列宁现在毫不犹豫地打算夺取与独掌权力——在这时，他的纲领性声明《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用清晰的话语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

^① Melgunov, p. 4.

此时,无论如何,临时政府所拥有的那些有限权力正迅速地消逝。许多省级城镇和一些省纷纷效仿喀琅施塔得(Kronstadt)、察里津(Tsaritsyn)、巴库(Baku)、第比利斯(Tiflis)和萨拉托夫(Sartov),宣布他们的苏维埃是唯一受到信赖的国家政权。土地加速向地方选举出来的苏维埃或者委员会的转让,军队也正在加速瓦解。

九月中旬,克伦斯基在莫斯科召开了由地区的、职能部门的、苏维埃的和政治团体的领导人参加的国务会议,政府的无能及混乱在这次会议上显露无遗。这次会议是该政权最后一次试图抵消苏维埃日益增强的威望和不满,从而两次确认政权的合法性,并阻止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布尔什维克党的刊物也正在公开讨论掌握政权的问题。不幸的是,这次会议并没有减轻而是加剧了政府的问题。政府没有在任何一个大问题上明显地处于多数派,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危机程度都被极其公开而直率地揭露出来,从而使情况变得更糟。所谓的预备议会(Pre-Parliament)也遭到相同的命运,该机构由政府建立的,作为一种立宪国民代表大会的先期机构,最终在十一月份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9月25日,在克伦斯基领导下组成了最后一个联合临时政府,由四名孟什维克、四名立宪民主党、三名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六名无党派的部长(包括四个知名的百万富翁在内)组成。

这时,列宁正在试图使自己政党的中央委员会相信,事已定局,军队被动员起来了,重要战略位置已被控制,政权已被掌握,时机终于来临。他的指示和劝诫一天一天地变得更加紧迫和专横。到九月底,列宁向已经中央委员会提出辞职以此抗议其不作为^①。在他看来,再也没有理由拖延了。无论是即将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还是为期更远的立宪国民大会都无法减轻人们的紧迫问题。^② 即德国的进攻迫在眉睫不能等待,如果把红色的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交给德国能够

① CW, 26, 84.

② CW, 26, 135-6.

阻挠革命发展的话,政府也会毫不犹豫:“克伦斯基同英法资本家策划了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从而扼杀俄国革命。”^①

列宁再三地回到他的1905年的论点:革命期间不能停滞不前。坐等事件的转机,被动地寄希望于敌人的错误和挑衅将会成为前进的阶梯(假装是“保卫革命”)是一场灾难。列宁认为,这是庸俗之辈和小资产阶级的路线,是那些既不懂马克思也不懂历史的人的路线。他坚持认为,当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到了决定性的时刻,总是要大胆地赢得胜利。马克思是对此是毫不含糊的,列宁提醒他的追随者,牢记马克思的话才是成功的保证。

“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上、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被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比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Danton)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②

列宁认为,流产的七月起义所不具备的那些条件现在已经成熟了:首都与其他各地的工人和士兵的大多数都支持布尔什维克。那时不曾

^① CW, 26, 145.

^② CW, 26, 132. 引文来自马克思的《德国革命和反革命》。

有“全国范围内的高潮”，现在有了；那时革命的政治敌人与革命的阶级敌人已经联合起来，现在他们正犹豫不决，处于混乱状态。^①在这个时期，党已经沉溺于克伦斯基在绝望中所施用的催眠剂。不顾列宁的建议，他们参加了（虽然是短暂地）民主会议的“可耻的清淡馆”^②。演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当前要做的事情是把军营和工厂中的革命武装力量有目的地组织起来。列宁强调，“历史使军事问题在目前变成了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③因此，要建立一个由绝对可靠的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作为起义的司令部。它能够收集参加革命的所有军队、水兵和赤卫队分队的准确资料，并对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革命热情进行评估。必须详细说明彼得格勒的所有战略要点，制定精确夺取计划和加强措施——电话电报局、铁路车站和连接彼得格勒中心区和工人街区的桥梁。

列宁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坚定中央委员会的决心，并尽力消除他们所提出的种种疑虑。他强调，在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能够管理经济与国家。^④资本主义本身给他们留下了全国性簿记和监督的机构。可以立即加以利用，并且可以一下子运转起来。^⑤和从前一样，农民阶级需要引导，并且他们肯定会服从无产阶级的政府。士兵是布尔什维克的坚定追随者，不会反对一个和平的政府。国际的形势也朝着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迅速发展，仅仅需要俄国来点燃整个欧洲的火焰。列宁得出结论说：

“危机成熟了。俄国革命的全部前途已处在决定关头。

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荣誉正在受到考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

① CW, 26, 23.

② CW, 26, 48.

③ CW, 26, 69.

④ CW, 26, 111 - 15.

⑤ CW, 26, 106, cf. p. 130.

际工人革命的整个前途都在此一举。……危机成熟了。”^①

布尔什维克党的犹豫不决

104 在列宁看来,革命道路上唯一真正的障碍是党自身的犹豫不决和畏惧。可以确定的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至少对于列宁举行武装起义的号召感到震惊,就如同他们曾经对于列宁的《四月提纲》感到震惊一样。但与四月的事件相比,列宁花了更多的时间来赢得他们的支持,为了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甚至不得不采取一些更加极端的措施。季诺维也夫(Zinoviev)和加米涅夫二位是列宁最著名的资深追随者,他们打破常规,严重地违反纪律,在非党报纸专栏中公开指责拟议中的夺取政权的命令。批评者并不只是他们;相反,在十月革命的前夕,甚至连负责军事准备工作的那些人对胜利前景都明显感到悲观。极力的劝说、热烈的来信和海报、清除“叛徒”的要求、坚持有关革命的准备和时间的决议,所有这些都来自列宁。至于中央委员会,则竭尽全能,想尽一切方法来拖延。它几乎每天都会招来新的抗议,它也无法回应列宁日益疯狂的有关做出决定和设定日期的要求。它甚至下决心破坏列宁通讯并且不允许列宁返回彼得格勒。^②中央委员会有关工人情绪和忠于自己的军队战斗力的报告也极其含糊不清,列宁几乎不得不再次长时间孤军奋战,使他们相信时机已经成熟。正如托洛茨基所讲述的那样,最初,“虽然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动机不同,但是都拒绝了这个提议。”^③如同四月事件那样,列宁不得不再次运用他所有的权威和说服力来改变党的立场,列宁再一次证明,中央委员会对他的信任远远超过了他对中央委员会的信任。在这两次关键的时刻,列宁都不得不同党的领导层的顽固抵制进行斗争。

没有列宁,1917年就一定不会发生第二次“十月”革命或者“布尔

① CW, 26, 82.

② L.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3 vols, London, 1967) p. 128.

③ Ibid., p. 129.

什维克”革命。正如托洛茨基在其《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中所承认的那样,这是个人意志胜利的完善展现。单枪匹马地让其同事们冒险夺取权力的正是列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绝无虚言;自四月以来,列宁就不知疲倦地传播这种思想,预见到革命具有可能性,并帮助公众形成这种观念,从这个更大的意义说也是如此。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实施社会主义的前景,在四月似乎还是遥不可及的可笑之事,到了十月初,已经成为俄国上下各种政治力量争论着的问题。怎么强调公众情绪这种自然的重大变化也不过分——因为在历史上,如此极端地要废除军队、警察和官僚机构的激进计划第一次赢得了数百万人的支持。

105

10月10日,列宁最终被允许向中央委员会发表讲话,尽管预测在军事援助上前景黯淡,但大多数人还是被迫接受列宁立场。六天之后,中央委员会召开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试图对支持布尔什维克起义的力量进行一种更加全面而详细的评估。但会议报告还是含糊不清和犹豫不决。甚至在彼得格勒的钢铁工人(长期被认为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中的先锋队”,是布尔什维克影响的据点)中间,施略普尼柯夫(Shlyapnikov)不得不报告说:“布尔什维克的起义是不受欢迎的,这种传言甚至产生恐慌。”^①季诺维也夫在其形势总结的关键之处也认为:“我们还没有为武装起义做好技术上的准备。我们甚至还没有一个中心。我们将会在半醉半醒中失败。”^②重要的通讯管道——邮政、电报和铁路——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力量的中心。卫戍部队是靠不住的,他们只会坚定地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和平提议,但他们显然不愿意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成功而战斗。重要的是,季诺维也夫似乎很清楚,六月以来公众情绪已经显著平静下来。但是列宁坚持认为党只有前进,它必须行动,否则党就会失信于群众。无产阶级起义,农民追随;反

^①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Minute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SDLP* (London, 1974) p. 99. 此后简化为:RSDLP, *October Minutes*.

^② *Ibid.*, pp. 103-4.

对派士气低落，微不足道；胜利在望，国际革命即将到来。

10月16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最终同意党“为武装起义做好全面而透彻的准备”。^①但是，决议仍然把“进攻的最佳时机以及最好方法”这个重要问题搁置起来。结果中央委员会决定在10月24至25晚上发动起义夺取政权，列宁即时的战略预测大部分被证明是正确的。工人们确实响应列宁的号召——热情的程度超出了布尔什维克党主要成员的想象。红卫兵分队成为各地的先锋，它们在大工厂中以一种完全不协调的方式雨后春笋般产生，其推动作用以及可靠程度都超过了大多数军分队。在彼得格勒，革命完成的轻松程度简直是难以置信。

106 这次武装起义实际上没有遇到抵抗。几乎没有人会准备誓死保卫一个如此长时间支吾搪塞的政权，它甚至已经失去了原有支持者的同情。其总理在冬宫被逮捕。克伦斯基仓皇逃离首都，到10月25日早晨，首都的战略要点以及通讯中心都被布尔什维克牢牢控制。当晚，推迟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在彼得格勒召开。布尔什维克虽然以“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为掩护使自己合法化，但是很清楚（并且是列宁所表达的意图的一部分）它是提前篡夺了权力。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它的意志“已经由彼得格勒工人与士兵的起义预先决定”。^②苏维埃依然是布尔什维克占大多数，它开始着手批准列宁有关土地法令、和平以及苏维埃政权宣言的草案。

解释问题和方法问题

很显然，1917年4月至10月这个时期在列宁主义的发展中至关重要。如果那时列宁主义没有取得成功，那么它很可能不过是二十世纪历史上的一个大大的脚注。然而，对其成功进行说明是极其困难

^①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Minute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SDLP* (London, 1974), p. 108.

^② Anweiler. p. 192.

的——我们回到几种相互矛盾的解释方式上来，在这些解释方式中，最为相互矛盾的立场似乎都自认为有证据支持着他们。当然，问题在于有多少证据可以提供，又有多少证据可以被谨慎地忽略。

对一些人来说，在这至关重要几个月内中，列宁的思想与行动充分证明他的确是一名雅各宾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他是严格地依照等级制的、秘密的和集中的原则来确立动员群众和暴动的手段。在敌人最软弱的时候，他给予决定性的打击并最大化地增强自己的力量。当他取得国家政权时，他会系统地运用国家政权来巩固自己的基础并消灭敌人。不可否认这个思路引人注目地简单明了，但是，我们应当对与这一思路不相容的大量证据作出判断。例如，我们如何理解列宁坚持不懈并反复强调说，革命的整个目标不是巩固和扩大民族国家的权力，而是把它赋予苏维埃和公社？我们如何理解他同样坚持不懈地认为革命的目标是废除常备军、警察和官僚机构，并把他们的特权赋予武装的人民？当然可以反驳说，这些仅仅是掩盖其真实意图的蛊惑人心的表现。但是很清楚是，《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是这一时期列宁最主要的著作，也是列宁全部著作中最具有“无政府主义的”著作，而该书并不是写给广大听众的，也没有打算立即发表（十月革命期间本书还没有完成，直到1918年才公开发表）。

107

如果说列宁此时不完全是一个布朗基主义者（尽管与马克思一样，他的学说的确吸收了布朗基主义因素），那么他也不完全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权力追逐者。根据这种解释，列宁抓住了人民不善于表达他们的不满来为他们代言，把他们放大并联合成一种推翻俄国合法政府的嘈杂抗议。这种解释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对于那些他认为或许会成为其强烈权力欲望的工具的任何团体，他都加以奉承并鼓舞其志气——而不计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后果。我们只要看一下他的《四月提纲》及其在党内和整个国家遭受到的抗议，就意识到这种观点是多么骗人。在回国之前，列宁就已经阐明了他的教条，显得与主流观点相脱节，极其不受欢迎。正如苏汉诺夫准确地指出，他是来自外部的声音。在这一

点上,他提出的口号没有一个具有重要意义——“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打倒临时政府”、“一切土地归农民”、“民族自由”、“打倒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的国际国内战争”。这些口号本身仅仅是两年多来一直在酝酿的深刻理论分析的一种速记式的简洁表达。

108 在本章和随后几章中所提出的解释是:列宁主义的优势、弱点和危险来自于它试图傲慢地迫使现实符合理论。总的来说,其主旨和指导性文本是马克思本人极具独创性和极其危险的主张:“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①这里,理论不是简单地思考显而易见的东西,而是进行预测和设计;此外,理论把自身作为关键要素添加到改造现实的整个实践生活中去。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正是通过理论推理才能在“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②的现存条件下宣布战争。列宁对所有这些现状表现出同样的愤慨,它产生了彻头彻尾残忍和破坏性的世界大战、产生了导致野蛮的文明。对马克思来说,“德国在政治上思考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德国是这些国家理论上的良心。”^③对列宁来说,在二十世纪,俄国注定要突破毫无生气的理论王国进入到实践领域,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他毫不怀疑他的整个生活经历是他唯一能够成为这种转变的推动力。武器的批判最终要取代批判的武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与自己军队的动员、训练和部署有关的枯燥无味、迄今为止都被忽略的事情都被赋予特殊的、甚至是决定性的重要性。必须把革命当作一门艺术——否则,革命会被那些喋喋不休之辈和浅薄之人当作一种无聊的文字游戏。

这一时期,列宁的追随者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确定性:列宁毫无疑问地知道他要走向哪里和革命将要走向哪里。正如1905年革命的情况

① K. Marx,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Introduction' in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London, 1975) vol. 3, p. 183.

② Ibid., p. 177.

③ Ibid., p. 181.

一样,他首先对各个阶级和政党所渴望的,或准备认可的政治经济政策的界限进行理论预测。然后,革命的策略要求(如同在1905年所做的那样)尽可能迅速而生动形象地把这些不同的政策界限揭露出来。革命政治学必须揭露的正是区别、对立(或者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矛盾)。理论的任务是记载阶级分化的产生并加以明确表达,在此它必须被转变为分化社会的政策和口号。

列宁毫无疑问具有这种能力,即把革命过程时刻与其首要的阶级分析和总体战略联系起来,而这些首要的阶级分析和总体战略又是与时代性质更深刻的理论论述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能力给列宁的门徒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托洛茨基这样评价说:“他几乎是自动地把代数公式转换成实际的算术。”^①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同样确信列宁与其同时代人的区别在于其理论上的清晰,把握整个过程的能力并把它概括为“为日常议程中所有问题确立牢固的指导方针的能力……唯有列宁采取这个步骤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相当现实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来说,列宁是迄今为止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产生的唯一与马克思齐名的理论家。”^②

从列宁回到俄国的那一刻起,在其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列宁就认识到只要温和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寻求保持跨阶级的国家统一——也就是维护自由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良好愿望——那么他们也就无法满足工人、士兵和农民等广大群众的愿望。他们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设置的狭窄界限迫使他们日益沦为资产阶级秩序、资产阶级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保护人的角色。正是他们的僵化和资产阶级革命界限的狭隘理论观念迫使他们沦为局外人——他们终将会在政治上陷入瘫痪。他们不能够使战争迅速结束、不能注意到土地问

109

^① L. Trotsky, *On Lenin: Notes Towards a Biography* (London, 1971) p. 74.

^② G. Lukács, *Lenin, A Study 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London, 1970) p. 13.

题、不能处理暴利与工业混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不得不坚定地反对在该国政府中拥有决定性发言权的工人(或者苏维埃)。列宁预测,所有这些问题在国家生活中将变得越来越突出并要求彻底地加以解决。只要温和社会党人被立宪民主党人所左右,被他们的民主革命所束缚,他们就会被指责为软弱无力。他们理论上的不足迫使他们试图把把革命停留在二月革命的水平上——所有应该完成的任务都已经完成。如果人们要求更多的东西,那他们就犯了错误,就需要指导和限制。正如一位著名的孟什维克主义者后来所说的那样:

看来孟什维克不能把革命的潜能运用于任何实际目的。他们被其马克思主义的严格公式“资产阶级革命在先,无产阶级革命在后”所束缚并且试图限制群众。他们向群众宣扬自我克制的思想,告诫他们在资产阶级已经建立起稳固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前要袖手旁观……孟什维克因为优柔寡断失去作用……他们致命的自我限制的教条导致他们从一个错误走向另一个错误;从仅仅支持临时政府到实际上加入……费奥多尔·达恩(Fedor Dan)1946年承认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革命观念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的。^①

110 列宁的预言在四月份看起来还是那么狂热与过分,而到了九月却被实现了,这似乎有太多的不可思议。军队正在瓦解,不能或将继续战斗,然而俄国比以前更加远离和平解决。彼得格勒与喀琅施塔得在里加(Riga)沦陷之后,完全可怕地处于德国的攻击之下。农村处于动乱之中,对农民的剥夺加速进行,由于通货膨胀和供给严重困难,经济正在崩溃。国家的政治结构混乱。民主会议在嘈杂之声中、在缺乏共识和果断行动的情况下就向预备国会做出让步。而且还失去了对大部分国土的有效控制——各地的苏维埃已经宣布独

^① V. Broido, *Lenin and the Mensheviks* (Aldershot, 1987) p. 14-15.

立。政府失去了主动权与领导权，政府的权力正在削弱。看起来好像是上帝在帮助列宁实现他的纲领，但这里所低估的是列宁把握自己命运的程度。

在制定其未来规划方面，列宁也太过谦虚，而不把自己对于历史发展趋势的贡献写到他的预测之中。他喜欢把自己仅仅视作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力量的工具。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在四月和十月关键性时刻，他个人的干预决定性地影响了革命的进程。说是“决定性地”，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列宁的出现、没有他思想的力量和说服力、没有他强大的个人权威，并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他的钢铁般的信念，那么俄国在1917年就不会出现第二次革命或者社会主义革命。毫无疑问，并不是列宁单独发动了十月革命。当那一刻来临时，革命的成功的确是依靠赤卫队分队领导人^①的主动性与勇敢精神和托洛茨基的天才的组织能力，托洛茨基主要负责协调军队与详细的起义策略。但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在其革命史中仍然得出结论说，这些事件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可以毫不妨碍地被其他人所代替——但列宁是唯一的例外。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列宁也就没有革命。这种承认清楚地认识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强烈而复杂的理论争论，的确很难驳倒。马克思主义者有关生产力水平、觉悟和国际成熟的争论再多，也不能在最后的分析中解决俄国是否能够或不能够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被一个人的“偶然”出现而解决，这个人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即一种文明正在崩溃，另一种文明必然会诞生。

这只是说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一种“革命的科学”，尤其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时期，寻求关于革命行动的“客观”界限的明确指导注定

^① 关于赤卫队在十月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参见 R. A. Wade, *Red Guards and Workers' Militia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tanford, Conn., 1984) and the same author's 'The Red Guards: Spontaneity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E. and J. Frankel and B. Knei Paz, pp. 54-75.

111 是要失败的。正如恩格斯所坦承的那样,正是在这段时期,有关所有权关系和阶级分化发生变化的详实而准确的资料极不可能得到。总之,在经济基础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和革命者对这种变化深度和广度的数据把握之间,必然会存在着相当大的时间滞后。当然,在这期间他们必须行动,不是不得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作是固定的”,就是他们被迫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中加以推断,并从显露的征兆来推测原因。恩格斯继续说道: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难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是,概括叙述眼前的事件所面对的种种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生产错误的根源,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

当马克思着手写本书(《法兰西阶级斗争》)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在1848—1849年的革命期间,要跟踪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是掌握它们的概况,也简直是无能为力的。^①

恩格斯轻视这种存在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核心中的重大方法论缺陷。他轻率声明“在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的这种不可避免的“错误根源”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这是不负责任的逃避。确实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号召人民去做的是在内战中拿他们的生命作赌注,据此,他们被许诺说,他们当下的贫困和无助将会很快消除。许诺范围和持续后果之间是不同的世界,一个涉及书写历史,而另一个则涉及创造历史。

完全可以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他的总体分析中不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及其派生的国家理论进行同样的指责。作为一种思想的结构,它

^① MESW, 1, 119 - 20. 括号中的插入语原文中没有。

们有着在很大程度上被批评家们所忽视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连贯性。但是,列宁不是一个学究式人物。按照列宁自己的衡量标准,评价他不是看他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和连贯性,而是看它们反映当代现实的准确性。显然,列宁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个命运取决于作为其基础的世界经济分析的准确性。资本主义能拯救欧洲正在日益陷入其中的经济混乱和贫困吗?资本主义能成功实现向和平时期的经济转型并实现稳定吗?世界资本主义外围国家的革命成功会对宗主国产生致命的影响吗?最后,宗主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能够向外围国家大量提供专家和资本货物并赞成外围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吗?这里的每一个问题列宁都给了绝对肯定的回答——资本主义不能从战争中恢复,俄国革命将会点燃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反过来将会有助于俄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他知道,他的党及其追随者不可能被“可能”或者“也许”激发出英雄的行动。

112

列宁以一个理论家的确定性来促使其追随者不断前进,因此,他不得不忽略了他最核心的分析中所存在的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这并不意味着在鼓吹和领导十月革命时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这仅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对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作出事先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行动仅仅只能建立在一系列或多或少知识渊博的预测和推理基础上,这些预测和推理来自于对一个暂时遥远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作的或多或少准确的分析。因此,革命行动的理由总是在行动“之后”,而不是在行动“之前”。当且仅当革命行动的预言被证明是准确的时候,才能证明其正当性。确切地说,这才是创造历史和仅仅书写历史之间差别之所在。结果,作为整个俄国革命冒险行动前提的主要预言,实际上没有一个实现。国家被迫处于资源的自我毁灭和低层次的文化水平上。正如列宁甚至都准备承认的那样,在这些条件下,政权必然会退化变质。但是,从来没有被承认过的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开创全面转变冒险行动的巨大责任,当这种全面转变所依赖的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它变成一场灾难。毫无疑

问,人们能够受到观念的激发而产生英勇献身的行动,但是同样,这些相同的观念也能够激发或许在无意中会导致野蛮行径。在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清白的,它往往犯下罪恶的行径。

第五章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

列宁对战争的反应不可能与这种观点符合，这种观点认为列宁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实干家而不是一位思想家，他是一位追求权力的实用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关心理论的限制。事实上，在用尽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谴责战争和所有支持战争的人之后，列宁投身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之中。从那以后，列宁致力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它如何不可避免地导致军国主义和战争作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这个说明写于1916年并在1917年中期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te of Capitalism*)^①(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为题第一次公开出版，它是列宁主义政治学最基本的文本。它概述了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并详细说明了被认为是人类历史的全新的时代——资本主义最终灭亡和社会主义即将到来的时代——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当然，它也为布尔什维克领导的1917年十月革命确立了理论上的正当性。

113

我们应该想到，列宁的所有著作都服务于政治的目的，包括像《帝国主义论》这样明显学术性文本。它们总是具有党派性，它们总是论证一种政治观点，因而它们总是在肯定一条基本路线的同时对其他所有

^① CW, 22, 187 - 304.

114 的路线进行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体系就是分界线,而列宁主义着手绘制的重要分界线就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之间的分界线。列宁对辩证法方法论的坚持在哲学领域设定了分界线(参见第9章),而帝国主义(或者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在经济和社会理论中也起着同样的作用。承认辩证法的规律就必须承认只有通过“渐进性的中断”或“质变”才可能产生根本性的变化。承认帝国主义理论就意味着要把这些抽象概念转化为当下的行为责任。这也与社会民主党人有直接的关系,它剥夺了社会民主党人逃避革命责任的最后托辞和借口。

改良主义者和渐进主义者(gradualist)是微小而和平变革的支持者,拥护者时常认为时机不成熟。他们宣称,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穷尽其进一步发展的所有可能性。因此,作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建议保持谨慎。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见解中,只要一种生产方式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那它仍然是进步的,因而就不应该被推翻。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那样,这是俄国孟什维克在整个1917年的一贯立场。此外,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危机和工人阶级贫困化预言的明显失败,几乎是社会主义改良主义所有学派的根源。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伯恩斯坦坚持认为工人没有变得越来越贫穷,并且社会也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因此,改良主义者认为,革命是一种不合情理和不必要的战略。作为一种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到1914年实际上已经死亡了。正是列宁,几乎独自复兴了一种作为革命性理论和革命性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部事业的基石就是帝国主义理论。

列宁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帝国主义论》中阐明的)是为了揭穿这些自满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改良主义者评估现代经济的谎言。列宁《帝国主义论》(*Imperialism*)最基本和最根本的信息是:资本主义成熟了,它已经烂熟了,正在衰落;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是靠借来的日子活着。一个时代结束了。社会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历史继任者,而

且是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上的每一发展的逻辑继承者；社会主义所有客观前提和主观前提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就已经发展成熟，它的胜利成为一种必然。列宁用一种极具表现力的措辞说道：“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①帝国主义理论是这个结论的注解。它的全部信息是强调革命的紧迫性（或卢卡奇所说的“革命的现实性”）^②。《帝国主义论》首先关注的是对时代的定义。《帝国主义论》的胆识和重要意义在于，它在全球范围内确定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垂死挣扎和没落的时刻，确定了一个新历史时代诞生的时刻。列宁主义明确地为全人类定义了一个时代——现在正处于在社会主义和野蛮之间进行选择的时代。

115

正如马克思在证明革命在经济上的必然性之前得出革命的必要性一样，列宁也是如此。对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并没有发生在列宁关于全球革命已经提上日程的结论之前，这个分析是为证明这个结论服务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正好以同样的方式成为他早年革命结论迟到的“科学的”辩护。对于他们两人来说，经济学是密涅瓦的猫头鹰。

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

作为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论》的首要主张是，伴随着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不再具有进步性。垄断资本主义不但不会去促进、发展和改进技术创新，事实上它反而会阻碍技术创新。当然，这绝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结论，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唯有当生产方式及其孕育的文明通常能够促进人类可利用的生产力的发展和改进，它们自身的合

^① CW, 25, 363.

^② Georg Lukács, *Lenin, A Study 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London, 1970) pp. 11 - 12. 在卢卡奇看来，“列宁一生中并没有作单一实践上的决定，这种决定不是其理论立场的合理的和逻辑的结果。”Ibid., p. 42.

法性才能得到历史地证明。同所有现象一样,各种生产方式内部都包含着对抗的力量或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而且随着它们从成熟走向衰落,这些矛盾就会变得更加明显和无法解决。列宁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上)现在所达到的程度。用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文明来取而代之的时代已经来临。最终的“结局”即将到来,以前的历史时期全部只是这一结局的准备。社会主义作为第一个没有阶级的生产方式,唯一有可能逐步代替垂死的资本主义,因而它是第一个真正世界性的文明。历史最终的(和第一个真正“人”的)时代即将到来。

116 在列宁看来,正统马克思主义已经在资本主义竞争性市场结构中正确地找到资本主义进步的驱动力。在所有企业都在争夺现有市场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就有了内在的动机。由于失败和破产的痛苦,资本家必须不断地改进和优化所使用的机器:“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①资本家最起码必须与其所在贸易地区的平均生产率水平保持一致,并且在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生产商品。在此,我们不得不简要地补充一下马克思经济分析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在列宁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列宁分析的新颖之处及其产生的影响。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意味着商品生产的历史性胜利。商品是为了在市场上出卖而专门生产出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当然,以前的生产方式也生产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但是没有一个生产体系是如此普遍和彻底地依赖于商品生产。与早前所有的生产方式不同,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切都具有自己的市场价格——有用的产品、劳动力、技能和专业、妇女的爱好、艺术和学习——所有的一切都被简化为一种肮脏的金钱关系。资本主义的历史创造性在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专业集团实际上都依赖自己在市场上出售商品、服务或原始劳动力

^① MESW, 1, 37.

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市场就是复杂的交换过程,所有这些庞大的各种各样的商品在其中寻找着买主和卖主,并确定彼此之间的价值关系。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在市场中进行的整个交易必须具有全部商品共有的某种公分母,以便实现等价交换。它们唯一拥有共同性的东西是它们都是劳动力的具体化。因此,进入到任何商品生产之中的劳动力的量是其价值的尺度。这就在马克思的时代里被认为是相当正统的政治经济学的法则,被人们称之为劳动价值论(至少与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一样久远)。总之,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产品是根据所它们包含的劳动力的量而与其他产品进行交换的。

然而,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整个生产领域都紧密依赖的独特商品,这就是劳动力本身。这的确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定义的一部分,正是在商品生产阶段劳动力本身才成为一种商品。简单地说,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存在于雇佣劳动是主要谋生方式的一切地方。由于早期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有时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人们已经与自己的自己生产力(小农场或手工作坊)相分离,他们被迫作为劳动者而出卖自己。他们的生存依赖于他们找到购买自己劳动力的能力。然而,他们拿到市场上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是多少?这与决定其他所有商品的价值的东西是一样的,即其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劳动力生产的成本是劳动时间,是向工人获得衣食住的所花费的平均劳动时间。马克思说,根据劳动价值论,我们应该知道劳动者所得到的仅仅是维持其作为劳力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因此,“劳动力的价格”将由“必要的生活手段的价格”^①所决定。事实上,这就是她/他通常所得到的——她/他生产自身的成本价格。

维持资本主义运转的东西是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总额与其以工资形式所得到的价值总额之间的差额。劳动力是所有商品中唯一独特的

^① Ibid., p. 88.

商品,唯有它生产出的价值多于它所消费的。直到或者除非它是这样,否则在经济上就没有合理的动机来雇佣任何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经济学紧紧抓住这个明显的事实,雇佣某人的全部动机正是这种精确的计算,即被生产出来商品的价值将远远大于被消费(或作为工资支付)商品的价值。这种差额被称为剩余价值。现在,如果劳动力的价值(工资)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当技术提高了生产率时,工人生产出的产品的价值与工资所代表的产品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必然增加。因此,剩余价值将会增加。但是,马克思注意到,这里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即必须支付的技术创新的费用,好像与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相对立。实际上,竞争性的资本主义注定要经历一个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过程,这正好是因为其内在动力迫使它越来越多地投资于机器而不是劳动力。在这种分析中,机器不能创造价值(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机器只能转移自己所物化的“死”劳动力。

118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模式,唯有劳动力才是价值的创造者。它创造的价值大于它消费的价值,技术创新的速度越大,产品的数量与市场的容量之间的差异就越大。然而,这种技术变革的过程必然意味着资本家必须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工厂和机器——或者被称为不变资本(Constant Capital)之中。竞争者总是在加快科技的步伐,而资本家为了生存必须跟上科技的步伐。这里的问题是,根据劳动价值理论,机器不会创造价值,只能转移价值。如果建造一台机器需要200个小时,那么转移到它所创造的产品中去的价值量只是它所包含的、以劳动时间来表示的价值量。但是,如果机器上的支出费用量是以雇佣劳动的支出费用(或者被称为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为代价而不断地增加的话,那么必然存在着一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换句话说,如果劳动力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且劳动力身上的支出费用构成了总体资本支出不断减少的部分,那么结果是剩余价值榨取率(因而利润率)必然表现出下降的趋势。

面对利润率这种无情的下降趋势,资本家必须作出回应。他不能

单方面地把他的产品价格提高到市场一般水平之上,因为那样就会找不到买家,他很快就会破产。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通过增加对工人的剥削来提高剩余价值率。有三种基本的方法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

- 1) 通过延长工作日的长度。
- 2) 通过降低工资率。
- 3) 通过加快劳动过程。

使用这些方法,资本家能够以同样(或更少)的工资支出从劳动力身上榨取更多的价值。然而,这些方法都存在着极限。工作日不可能不断地延长:工人必须有少量的休息时间来补充第二天工作的精力。工资不可能长久地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生存手段(正常水平)之下,而不会削弱劳动者维持自身作为劳力存在的能力。劳动过程的速度也不可能无限地加快——它必然涉及一个复杂的劳动分工,并且只能以一般劳动者能够维持的速度进行。马克思相信,尽管有这些限制,但还有一个必然进程会在这里起作用,它使工人的状况不断地恶化。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不管任何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情感如何,资本家都被迫提高剥削来徒劳地维持利润率。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步”,“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①将会加深而不会减轻。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规律”。

119

在 20 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解释为什么这种贫困化的趋势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在 19 世纪下半期和 20 世纪初,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持续不断的提高,这在整个欧洲都有着强而有力的证据。对某些群体的工人来说,不仅在物质状况上,而且在安全、谈判权利、法律保护、福利和教育供给上,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根据状况恶化而预言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的浪潮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

^① K.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1938) p. 789.

资本输出

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模式的这些问题,列宁的基本回答是认为,资本家通过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策略,设法为他们的生产剥削方式购买了一些额外的时间,但其代价是它的国内和国际矛盾变得更加触目惊心 and 无法容忍。他们所使用的膏药无法治愈深层的疾病,现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力挽狂澜。

在疯狂阻止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努力中,资本家们所采用的第一个策略是进行大规模的出口,首先是产品输出,其次是资本输出。“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①

到了19世纪的末期,资本主义宗主国发现他们拥有大量的资本资源,在国内市场中找不到有利可图的出路,因而被迫开拓海外投资场所:

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②

120 通常,资本是要寻找那些可能会产生最高回报的投资途径,并且意识到,随着国内市场的饱和,在很大程度上要到国外去寻找。在那里,资本资源的稀缺性价值更大,劳动力的物质需求更低并且没有任何保护组织。有大量的可以用来开发的重要原材料(或至少没有竞争者)。铁路、公路和港口的网络需要资金,工厂需要建立,军队需要装备。如果这一切极大地增加了弱小外围国家的民族债务,那么就更好了,因为

^① CW, 22, 240.

^② CW, 22, 242.

它们也为极多的资本提供了有利可图和相对稳定的出路。从残酷的国内竞争市场进入资本稀缺的地区,并且人力和自然资源可以被无情加以剥夺,会产生超出正常的利润盈余。因此,根据列宁的观点,在19世纪末的20年里,一股资本输出洪流正好与英国、法国和比利时领土的巨大扩张相一致。到19世纪末,这些国家基本上成为资本输出国而不是商品输出国。殖民地的剥削和输出资本的巨额回报支撑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它们的相对繁荣几乎完全可以归因于它们作为国际寄生虫的角色。它们已经成为食利国,依靠“剪息票”生存,攫取对外投资的收益^①。列宁对19世纪下半期资本输出和随之而来的寄生性的发展的说明,正如他承认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在1912年出版的研究著作《帝国主义:一项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

列宁论点的独创性部分(成为后来的新殖民主义理论核心的观点)在于剥削不再只是在阶级的意义上加以思考。帝国主义时代生产出民族剥削的现象。世界(已经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了)越来越被分成剥削民族和被剥削民族。有食利国、半殖民地(表面上独立但实际上依赖外资控制的国家)和完全的附属国或殖民地:“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②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已经成为征服的一种国际武器,它的剥削方式已经变成如此普遍,以至于整个世界都坠入其网络之中。因而,从对外投资中榨取“超额利润”的代价是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压迫性在范围上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了。

121

根据列宁的分析,超额利润以多种方式来维持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

- (i) 它们有助于防止马克思早已预言的从利润率下降中产生的螺旋上升的危机——资产阶级文明的“阿基里斯之踵”

^① *CW*, 22, 193, cf. 300.

^② *CW*, 22, 277.

(the Achilles' heel)”。

(ii) 它们至少部分地被用来提高城市经济中某些重要企业工人的物质状况——创造出“工人贵族”。

(iii) 由于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从殖民剥削中获得的利益,这就为培育一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创造出肥沃的土壤,在这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民族利益”似乎能够同金融资本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iv) 通过令人信服的游说,保护这些“民族利益”被说成是伟大国家的重要事件,竞相重整军备、确立海上优势等等。

(v) 扩充军队和海军的支出费用和随之膨胀的国家债务本身进一步成为金融资本获取丰厚超额利润的来源。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上述列表十分清楚的表明,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在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这是三个可以互换的词语)意味着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终结。关于最小守夜人的国家观念,即国家的分内之事应当被限定在维护公共秩序和防卫外来的侵略者之中,看似不再可信了。旧自由主义完全不符合现代帝国主义国家日益增长的干预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具有决定性),它远非完全只关心维护国内法律和防卫外来攻击,它在国家经济中起着主导经济的角色。它通过殖民化来全面扩张经济的势力范围,它通过设立高关税壁垒来保护国内垄断企业免遭外国的竞争。它向全体人民征收高额税收来支付军事和海军费用的巨大增长。

122

战时的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显著地改变了工业生产的财政和关税环境:它成为国家经济中巨大的生产同盟。它不仅为贸易和工业发展创

造了条件,而且也变成了主要的贸易和工业组织。正如布哈林(Bukharin)^①和后来列宁所评说的那样,在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国家的性质根本地改变了:

战争所做了 25 年来没有做到的事情。工业国家化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也得到发展。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②

资本主义国家从市场经济的一个授权代理机构,变为资本资源的所有者、工人的雇主、消费标准的独裁者以及整个经济信用的控制者。它开始充当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周期不可缺少的保证人。如果没有它,资本主义生产周期就无法循环进行。因此,可以推断出资本主义在其衰落的垄断阶段,只能作为国家资本主义而存在。帝国主义国家形态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托拉斯,在这里,国家本身表现为众多托拉斯的一个托拉斯组织。

正如银行运用它们提供或停止信贷和投资资金的权力来操纵制造业一样,它们现在是作为国家的雇主来运用他们的权力来控制 and 支配政府。现在整个集团是完整了。银行或金融资本的人事和政策与国家的人事和政策融合在一起。国家资本主义的托拉斯诞生了,它现在能够操纵国内外政策、必要的支出和需求的满足。作为国家的领导者,银行家能够保障需求,也能够通过向居民征收人头税和消费税保证其回报。他们能够因那些被认为适合于国家控制的过时行业而获得充分的补偿,并且最终通过法律来限制工会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的要求。总

^① 列宁的追随者布哈林在 1914 至 1917 年这段至关重要的岁月里对列宁主义形成的影响通常被低估了。在斯大林把布哈林开除出党并在 1936 年将其处死之后,苏联评论界完全忽略了布哈林的影响。正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的世界经济》(*The World Economy of Imperialism*) (1914 年出版,列宁为之写了前言),第一次使列宁相信资本主义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过时并且已经腐朽。也正是布哈林使列宁得出这个结论: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已经根本地改变了。

^② *CW*, 24, 240.

123 之,他们意识到,尽管最小规模的国家有助于竞争和自由市场,但是直接
在金融资本家控制下的帝国主义国家最适合垄断资本主义。像银行
一样,国家现在由竞争性利益集团的适当调解人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
的指导和控制中心。不维持对国家的控制,垄断资本主义就无法生存。
因此,国家不再消极地反映现存权力和财富的分布,不过它本身却是创
造和再生它们的主要机构。这种全新的政治/经济结构:

使旧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大托
拉斯、辛迪加、卡特尔的资本主义……,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
的国家化的原则,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
联合成一部机器,使千百万人处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
之中。^①

国家不断侵入的证据并不难发现。由重工业、基础设施和交通业
构成了“经济的高地”,现在全都被国有化了。大银行已经处在政府的
控制之下或归政府所有,于是,国家控制了现代经济的全部神经系统,
尤其是至关重要的获得投资基金和信贷的途径。罢工的权利被取消
了,变换工作的权利在许多情况下也剥夺了,配给制建立起来,强制执
行未经协商的工资方案。总之,国家已经获得了控制一切生产和交换
要素的可怕权力。由于国家控制了资源的分配、工资、价格、税收和关
税,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能随意控制社会盈余额,并能保证它所服务的
金融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利益率和生存。这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资
本主义的最后生存之战。资本主义以英雄般的挑战封建国家的独裁和
专制权力为开端,它在其竞争的全盛期不断使社会获得复兴,并因此只
依赖一种最小的国家。但现在,在资本主义的衰败时刻,它自身的社会
力量已经消失了,它已经开始消灭不可靠的和难以驾驭的市民社会,并
且开始完全地和专门地依赖一种急剧扩张的、军事和经济一体化的国

^① CW, 24, 403.

家权力的力量。用布哈林的名言来说,它创造了“新的利维坦,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与之相比似乎只是儿童的玩具”。^①

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两者关系的这种分析绝对是列宁主义最初表达的核心,并且在后来它不断把自身与其他的政治信条区别开来。它最重要结论是,随着资本主义垄断程度的加深,它也日益变得具有腐朽性、寄生性、扩张性和强制性,表明它已成为国家主导的暴力。资本主义越是变得更加腐朽,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就变得越薄弱,其国家权力就变得越具有独裁性和压迫性。因此,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不管给自己穿上什么样的宪政外衣,都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专政。^②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的那样,对资产阶级国家形成的这种高度理论化和本质主义的分析对苏联的政治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列宁对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分析的主要论战点是要揭穿社会民主党的乐观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积累进程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化,因而导致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国家作为社会的组织者和经济的组织者,它的任何发展都是对这种状况的确切证明,即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最终会变得令人无法容忍。他们天真地相信,整个经济会逐渐地与邮局一样转变为为和善的公共目的服务。社会主义将在国家权力和民主影响持续的进步中逐步实现。所有的改良主义者都信奉费边社会主义者在渐进必然性上的种种乐观主义。列宁轻蔑地把他们称为“信用社会主义(the socialism on credit)”者,与所有的机会主义者一样,他们都追求最小阻力的道路。但是在列宁看来,最小阻力的道路通常是接受资产阶级统治的道路。它的拥护者绝不是在建设社

124

① N. Bukharin ‘K teorii imperialisticheskogo gosudarstva’ (‘Toward a theory of the imperialist state’) in *Revoliustsiia Prava, Sbornik pervyi* (Moscow, 1925) p. 30. 更全面地论述布哈林对于列宁分析国家的影响,参见 Harding, 1981 (pp. 94-8 and pp. 102-9); and Harding, ‘Bukharin and the State’, in Kemp-Welch (ed.), *The Ideas of Nikolai Bukharin* (Oxford, 1992), pp. 85-112.

② CW, 28, 462.

会主义,而是成为极端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凶,成为其政治的辩护者和工人运动中的败坏者。他们必然会被指责为是工人运动中的帝国主义“特洛伊木马(the Trojan horse)”,因为正是他们如此成功地使工人阶级相信,他们的代理人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合作事实上是进步的。这类领导人不只是犯了错误这么简单,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并且必然要被揭露为:

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一部分,他们被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所**收买**,已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①

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

125 在列宁的分析中,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现象。它自己有着动荡的早期发展、成熟稳定和最终衰落的自然历史过程。在其成熟期(根据列宁的年表,这个阶段的跨度大约为从1770年到1870年这一百年),资本主义一直是进步的,主要因为它一直具有竞争性。这一时期在其他方面也可以说是进步的。总的来说,列宁勉强承认,这一时期所特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为普通大众的解放提供了种种可能性,这种解放是他们以前从未拥有过的。选举权的逐步扩大与民事和政治权利的扩大相辅相成,这些民事和政治权利虽然有限,却是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在法律保护下组织起来的手段。同样在这个时期,国家也普遍地被限定在自己所标榜的领域之中。当然在列宁看来,宣称自由的国家在阶级斗争处于中立地位虽然毫无意义,但它至少还没有产生庞大的官僚或大量的常备军。

^① CW, 23, 110, cf. 58 and 107.

这一切都将改变。按照列宁的观点,在从 1870 年至 1914 年的 40 多年里,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性质都经历了深刻的退化。这些退化的实质在于竞争性资本主义转变成垄断资本主义,最终转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此,在列宁的看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基本时代中,每一时代都有自己一系列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特征:

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已经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快速崩溃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向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第三个时代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①

126

列宁后来稍微完善了这种分期,并把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或腐朽时期的开端推后到 1900 年。他后来得出结论说,从那时起竞争让位于垄断,生产资本被金融或银行资本所取代,资本的输出超过了商品的输出。列宁通常坚持的历史年代追溯可以系统地表述如下:

第一个时期:1789 年—1870 年

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时期,资本主义不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比它所取代的封建主义更加有效率)是进步的,而且它的相对自由、宽容的政治态度和宪政安排也是进步的。

第二个时期:1870 年—1900 年

主要发达的资本主义开始转向垄断和帝国主义。在国外,整个世

^① CW, 21, 146-7.

界的经济领域都被大国所瓜分；在国内，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发展）并且日益依赖国家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再生产，自由贸易和最小国家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战斗口号。

第三个时期：1900—

衰落和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图通过掠夺殖民地和贿赂上层工人来拼命地维持其存在；对外推行军国主义和压迫，对内实行独裁和排斥异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被搁置或取消，国家变成赤裸裸的独裁统治。

金融资本与银行业

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银行体系中，垄断的发展一开始十分谨慎，随着势头的日益增长，它开始向外发展，吞噬了现代经济的一些最重要的部门。德国经济学家雅德尔斯（Jeidells）是最先注意到银行业内垄断趋势的人之一，他的见解为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所接受并加以发展。^① 因此，在经济学方面，列宁几乎没有开拓新的领域——正如他所坦承的那样。他大量报道了他们的证据：到世纪末，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少数极其强大的银行成功地吞并和占有了大量当地小银行的资产。这样，列宁看到：“分散的资本家合成了一个集体的资本家。”^② 大银行从仅仅是促进交易和支付的中介机构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控制获得信贷和投资基金途径的全能

^① 在其《金融资本》（*Finanz Kapital*）（Vienna, 1910, trans. and published in a Russian edition, Moscow, 1914）中，希法亭把大多数有关银行在垄断资本主义演变中作用的主要观点发展为一种富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合题。

^② CW, 22, 214.

机构。在列宁看来,对银行来说,甚至运用他们控制最大企业的权力,在它们所掌控的行业内创造出它们自身发展出的那种垄断地位,只不过是一步之遥、不可避免。它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干预并控制全部工业领域。在萧条时期,大银行“贱价”收买小型的和效率低下的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①它们鼓励在通向原材料和市场的最佳地点处建立大规模一体化的或“联合的”工厂。它们带给工业正是把自己早已运用的机制以保证其最大的回报——兼并、合并、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它们的目标始终是在它们所控制的贸易和工业部门中消除竞争,至少是缓解竞争的影响。

这样一来,大银行把自己从资本主义企业和制造业的辅助作用转变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历史形式的主要推动者和动力。^②制造业或工业资本的统治地位让位于银行业或金融资本。银行或金融资本建立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它拥有无可争议的地位。在这个进程中,银行或金融资本创造了巨大的、一体化的公司(要么是整体的,要么是以托拉斯和卡特尔形式联合起来的),它们负责在全世界范围内掠夺原材料,并在巨大工厂中提炼和加工那些原材料,这些巨大的工厂已经把劳动的社会化发展到极致。列宁认为,这些工厂通过极其复杂的劳动分工、高度的资本化和巨大的电力消耗把大量的工人聚集在一起,正是**这些**工厂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特征:“几万个最大的企业就是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算不了什么。”^③但是,新的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不仅是开采、运输和制造过程实行一体化控制,销售的过程也是如此。托拉斯和卡特尔建立了综合性的仓储和零售店的分销网络来负责它们的产品销售。这种新型的生产体系的意义在于,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使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在一些国家和一些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无计划竞争的混乱性(马克思主义者称之

128

① CW, 24, 235.

② CW, 24, 210.

③ CW, 24, 196.

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被克服了。至少在理论上,垄断的托拉斯和卡特尔能够根据对市场需要的精明预测来安排原材料的开采、运输、加工和最终产品的销售,并且这一切都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这样,克服深深困扰着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周期性危机的潜力就产生了。然而列宁强调,这仅仅是一种潜力,它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除非是以有限的和被扭曲的方式实现。

在列宁看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销售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和无法解决的结构不平衡,它在私有制的框架内无法被克服。其中之一就是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之间的差距,另一种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相类似的差距。最后是在市场容纳产品的能力和生产出来的商品数量 and 价值的巨大增长之间长期存在的差距。总之,资本家不可能减少它们对劳动力的剥削率,因为这是它们利润的来源。但是,他们以这种方式榨取工人的越多,消费者能够吸收产品的能力就越小。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市场吸收产品的这种能力不足对于生产循环的全部可能性来说都是致命的。当然,正是为了抵消这种消费不足的趋势,资本主义宗主国已着手计划把这些在国内市场无利可图的商品向外输出(随后是超额资本的输出)。然而,这仅仅延缓了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并没有根除它。它反而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性和动荡局面。

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

作为一种对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分析,列宁主义的独特特征在于它对不均衡发展的强调。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希法亭,尤其是布哈林——已经相当多地强调银行和托拉斯有能力使生产计划与输出和消费相匹配。布哈林险些认为,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了。一个由国家监管因而

越来越能够生产出自己稳定和持续条件的“组织化”资本主义处于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在布哈林看来,资产阶级国家的历史独特性在于,它远不是社会经济基础的被动决定的对象,它在宏观层面上已经使自身成为经济的核心参与者。布哈林有些令人震惊的结论(这个结论后来在布尔什维克的国家理论中有着巨大的重要性)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不是相反。^①对列宁来说,尽管这种分析在学术严密性上很聪明,在结论上也十分大胆,但是这种分析太过抽象而且缺少了一点辩证法。垄断或金融资本主义有一种建立自己统治的明显趋势,而且事实上它已经建立,列宁对此毫不怀疑。但是,列宁坚持认为,那个事实不应该掩盖同样无可争议的事实:某些经济(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全球性的)部门远远落后,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初始的阶段上。列宁同样也不怀疑,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上,国家在确保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条件的作用已经成为决定性的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克服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或消除了阶级社会的社会紧张。相反,暂时的缓解只不过是基本结构上的疾病加重。

在列宁的论述中,现代经济在所有国家中都是多层次性的。在确立自己统治的过程中,金融资本并没有因此消灭工业、制造业、商业或土地的资本。同样地,英国和法国决定性的国际影响力及其帝国主义的支配地位永远无法掩盖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对抗性,无法掩盖帝国主义食利国与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为了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之间的对抗性。在列宁看来,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重要的不稳定特征是不同的工业部门和不同国家都处于自身的资本积累过程中。

130

在列宁的分析中,资本积累有四个基本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和随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阶段。从本质

^① 布哈林在其文章《论一种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中首次提出这些观点,并在1912年出版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中进一步详细地加以阐述。

上讲,这是通过对农业生产的“剩余”的强制(财政)剥夺来完成的。在第二个阶段上,重点是依赖于对生产资料生产的投资上,例如铁路、机器工具、工厂和运输的建设。在第三个阶段上,消费商品迅速地充斥市场,而且产生了国内市场无法消化的剩余资本资源。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正是在这时资本输出变得不再是一种偶然的计划,而是成为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资本输出,资本主义制度就无法生存下去。反过来,这导致为保护投资和保证利润的武力干预。整个世界现在变成了主要帝国主义列强为之竞争的掠夺地带。他们被迫扩张自己经济的势力范围,并且这种经济的势力范围大体上是根据自己当时相对的经济力量来确定的。

问题是在世界被瓜分完毕和在全球范围内的界线确定以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继续以不同的速率快速地进行着。相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例如德国、日本和美国)出现了,而且它们也开始遭受大量资本需要寻找出路的痛苦。但是,它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瓜分、被声称拥有并防止他们进入的世界。对它们来说,表达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主张的唯一可行方式是为之进行战斗,因为第一个到来者不会自愿地放弃自己对于全世界经济的势力范围的有效垄断。然而,为争夺世界经济的势力范围及其再划分的战争不可能由托拉斯、卡特尔或银行业来领导,不管它们的力量有多大,而只能由国家来领导。这场巨大斗争的各方只有在自己的全部资源被动员和组织起来的时候,才有胜利的希望。再者,只有政府才有力量和权力充当国家资源的动员者和组织者。在全球战争中扮演这种角色的竞争国家越多,任何其他的竞争国就越惊恐,越会根据外部的威胁来证明其干涉主义的合法性,越有必要保持(或声称)自己的国际地位。国际紧张和冲突加剧的全部过程既是一种越来越好战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种好战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把民族利益等同于贸易利益,并且根据世界其他国家的敌意和掠夺意图来巩固自己并使自己合法化。

帝国主义和世界政治

在列宁主义国际政治的观念中,帝国主义时代存在着一种为争夺经济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残酷的和不断升级的战争。经济势力范围可能意味着被直接吞并为殖民地。在那里,帝国主义国家将拥有掠夺自然资源资源和剥削劳动力的权利。至少这不会给潜在的竞争者提供机会。它将为自己的商品或资本输出创造专门的通道。经济势力范围也可能意味着一种影响力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中,宗主国的政府有效地控制着表面上政治独立的政府的经济生活。这些半殖民地受条约和商业协议的束缚,向宗主国的商品供给和资本资源提供优惠的通道。它的工业基础设施、交通乃至国债都将由外部控制。国家独立的传统条件在帝国主义时代则无足轻重,这些条件强调一种凌驾于地域划分之上的普通法的强制司法观念,强调对国家强制力量的一种垄断。在世界上众多的民族国家中,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在这个意义上获得真正的独立,即他们的国内国外政策不受第三方强加在它们身上的这种经济力量的制约。

在列宁主义者的分析中,帝国主义世界被划分为三个档次。第一个档次是一些强大的国家即金融资本主义宗主国,这些国家的力量最终来自大规模的资本输出。首先成为这种国家的是英国,法国紧随其后。潜伏在暗处、快速发展并威胁它们主权的是经济快速扩展的德国、美国和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只有这些国家才是重要的——其他所有国家只能随着它们的旋律起舞。它们彼此之间的力量是随着它们经济的发展或衰落而变化的。任何国际安排或同盟都不是永久或固定的——这些事情仅仅反映出在特定时期的相对力量,并且当契约各方的相对力量明显改变时,这种安排就会被修正。总之,大国被锁定在争夺权力的残酷竞争之中,这种竞争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的。列宁得

出结论,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时代的自然状况。

国际领域中的第二个档次由表面上独立的国家构成,这些国家都按惯例饰之以所谓自治或主权——立法和行政权、法院、监狱、警察和军队。但在列宁的分析中,这些只不过是皇帝的新妆。它们只能通过其穿戴来掩饰它们自主行动的无力。它们的政府实际上是代理政府,只有在那些对其国外的经济支持者来说没有直接利益的领域中,它们才具有有限的主动性。它们赖以建立的社会结构同样会受到束缚并被限制在它可用的选择权上。本土的资产阶级仅仅充当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它是由外国资本培养起来的,并被训练出来以满足其要求。它不能自主地扎根于当地的文化,它也没有为争取本阶级利益而组织起来或斗争的传统。它是一个软弱和衰败的集团,迄今为止都没有展示过作为一个真正阶级存在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品质——全国性地组织起来和阐明自己利益的能力。总之,它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同样也可以攻击日益膨胀的官僚阶层在政治上的无能,这个阶层的主要职能制定和实施更加严厉而全面的税收体系,以便偿还由外国金融资本包销的国债。正是有了这些半殖民的社会基础,才有了它们的政治立场——社会基础上的依赖性产生了政治上的依赖性。

然而,在列宁看来,必将迎来这样一个时代,甚至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也将觉醒起来,声称反对外国资本的掠夺,从而成为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那时,与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相比它将成为进步的力量。拒绝承认国际金融资本主义受保护的的市场,拒绝承认它对本民族资源和劳动力进行残酷剥削的“绝对权力”,威胁着金融资本利益的任何运动,都必然会威胁到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于是,在宗主国中,利润率的下滑趋势会随着革命的进程而变得越来越明显。因此,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世界范围内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同盟。只要它的目标是促进民族经济的独立性、反对垄断资本的市场、创造自己的投资基金并且坚持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政治力量,它是帝国主义霸权的威胁。因此,对共产主义者来说,有必要在全球战争的第一

阶段中获得民族资产阶级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列宁主义关于世界革命的方案中,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胜利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共同构成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统一阵线。

第三档次是殖民地和甚至表面上独立都不享有的附属国。它们绝不是政治主体;它们是他人权力的客体。不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宪政理论上,这些国家甚至连象征性的独立都没有。可是,那种认为它们是“母国(mother country)”的组成部分并在物质和文化上被提高到与“母国”处于同等地位的观念,同样是一种幻想。在列宁看来,种种标榜的目的(带来文明、尊严和秩序)与实际的作为(流血、极端的剥削和民族的分裂)之间的差异极其醒目,难以长久维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主义无疑就是对一般民主即一切民主的‘否定’,而绝不是对种种民主要求中的一个要求即民族自决的‘否定’。”^①殖民地人民不会长久地忍受他们所遭受的屈辱和压迫。每一次维护劳动者权利或民族权利的运动都会增加宗主国监管和控制“当地人”的成本。当维护殖民地专制统治的成本超出其回报,帝国主义国家将被迫撤退,这一时刻终将会到来。列宁赞成这一点,因为当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武装力量与弱小的民族解放的斗争力量相比较时,民族解放的斗争力量似乎是前景渺茫。但是数量的绝对优势将会占据上风。毫无疑问,对世界力量权衡的长期推理和统计学分析的结果有利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民族。它们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帝国主义国家镇压他们寻求自由的一切图谋都将是徒劳的。

134

因此,在列宁主义的论述中,现代帝国主义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的、无法解决的矛盾的世界。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超国家的托拉斯揭开了资本的国际化的趋势。我们今天称之为跨国公司的那些企业,有兴趣和平地把世界划分为开发资源的种种利益范围并把它们作为剩

^① CW, 23, 43.

余资本投资的区域。这些主题正是卡尔·考茨基在其“超帝国主义”(Super imperialism)理论中所讨论的东西。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愈加承认有必要扩张它们的经济势力范围并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宣布为自己的专属保护国。为了这样做并且拒绝其他竞争者的进入,它们在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动员国家的一切力量。因而,国际性的托拉斯和卡特尔可能会对一种超帝国主义感兴趣,超帝国主义中的各国都赞同对世界进行和平地瓜分或重新瓜分。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是敌对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进行激烈斗争的场所,它们武装到牙齿,冷酷无情地追逐它们各自的利益。这是一场只有武装冲突才能解决的彼此相对抗的无休止战争:

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①

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国家间敌对的利益对抗构成了现代世界的主要矛盾。一个国家在哪里得到的被视为是另一个国家在那里所失去的,世界经济的势力范围在哪里是有限的、已经被瓜分了的,出现了激烈的争吵,哪里就有资本主义进化所固有的不平衡发展,必将出现规模不断扩大的持久战争,维持整个压迫体制的成本就会变得无法承受。

困扰着现代世界的次要的,但也是极其重要的矛盾是以帝国主义国家为一方和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另一方这二者之间敌对的利益对抗。不可能长期镇压把它们从外国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斗争。金融资本主义把它的矛盾普遍化,从而确保了一场全球革命的爆发。在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战争以一种新型的方式变成国际性的战争。它已经变成一切受到其他民族剥削的民族的解放战争:

资本主义本身在逐渐地为被征服者提供解放的手段和方

^① CW, 23, 275-6.

法。于是他们也就提出了欧洲民族曾经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争取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的手段。这种独立运动，使欧洲资本在它那些最有价值的、最有光辉前途的经营地区受到威胁；因此，欧洲资本只有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兵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①

帝国主义的国家（不仅仅是它们内部的个别阶级）相对于它们殖民地而言已经成为主要剥削机构。整个国家的各个集团现在都参与剥削，同时又都受制于剥削。食利国（rentier states）的现象（与个别的食利者阶级截然不同），通过向其他国家榨取贡税而成为寄生性的存在，在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剥削和阶级战争的性质。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将成为列宁主义最有说服力和最成功的因素之一。

现代世界最终的本质矛盾是无产阶级利益与金融资本家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极其简单地讲，这个矛盾表现为一切雇佣劳动者把自己从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国际性斗争。然而，这个本质矛盾在当代世界中被两个相互联系的因素所遮蔽了。第一个因素是这种持续存在的趋势，即把国家当作是代表整个民族的中立组织，因而要求全体国民效忠国家。第二个因素是社会民主或改良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这个思想使工人阶级相信在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条件中具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可能性。当然，这是“工人贵族”的突出的案例，在列宁看来，他们在工人中的特权地位，源自于参与对从殖民剥削中榨取的超额利润的分配。在早期的论述中，列宁主义的重要主旨在于反驳和揭露这些同样能麻痹无产阶级意志的幻想。

除了解释战争之外，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还做了大量工作。自那时以后，它为其追随者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世界观，其基础是这一发现，即资本主义，以及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政治结构和资产阶级价

^① CW, 23, 297.

值,正处于垂死挣扎之中。一种文明,人类历史上的整整一个时代,终于浸没在血泊之中。列宁整个分析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一整个文明,这一全部历史时期已经宣告了自己的破产。它无法被改良或补救——它已经最终走进无情的死胡同,现在不得不被抛在一边以使新的时代得以诞生。因此,资本主义的死亡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对列宁来说,这是当代世界的重要现实。

作为超越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

在辩证的思维中,一切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因此,资本主义在其衰退的最后阶段上,同时创造出新的机构并据此被超越而进入一种新的和更高的文明——社会主义。荒谬的是,资本主义在其绝望的自我拯救的最后努力中被迫创造出一种经济管理体系,在列宁看来,正是这种经济管理体系成了通向社会主义的中转站。战时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把经济的最高指挥层国有化了。大银行已经处在国家的控制之下,于是,国家拥有实际的能力来指导所有信贷和投资在整个经济中的分配。在列宁看来,这是一种卓越的机构,它是现成的并且可以为社会主义者“一劳永逸地”用来建立全国性簿记和会计系统的机构。同样地,托拉斯和卡特尔已经在生产和分配的关键领域建立起有效的垄断,对于把经济置于社会控制之下的工作具有促进作用。金融资本主义原来无法实现的潜能最终在实践中得以实现。正是在延缓其死亡的挣扎中,垂死的资本主义被迫创造出大规模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它们不仅促进了自身向社会控制的转变,而且使得向下一个阶段的转变成为自然的和必要的。至少对于列宁的追随者来说,帝国主义理论表明社会主义不仅作为一种目标值得向往,对于结束战争也有必要,而且社会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各种组织和管理机构的基础上也是立即可行的。的确,正如列宁一再坚持的那样,这是克服战争在欧洲各地所带

来的破坏和使经济崩溃的唯一方式。

帝国主义的辩证法(至少到1917年)也被应用于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越是努力控制社会动荡的激烈矛盾、殖民地的不满和国际战争的毁灭性代价,它也随之被迫更加公开地成为垄断资本家的利润的无情捍卫者。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国家公然进行干预来限制工会的谈判能力、禁止罢工、禁止工人运动以及控制工资和配给,它最终会暴露其国家中立性的伪装。战争的延长以及它所造成的死亡和毁灭最终会消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资产阶级形式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利润和资产阶级殖民掠夺权利的最后堡垒,由于它把世界从疯狂的边缘带入相互的自我毁灭之中,从而宣告自己最终成为冗余,丧失了要求其公民效忠的权利。如果没有国家的组织、意识形态和惩罚性权力,垄断资本主义就无法生存。然而,同样的情况是: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名誉扫地的贪婪的民族国家形式)就是多余的并将不得被全新的管理形式所超越。

我们甚至不能理解列宁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管理方式本质的分析(在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中提出来的),除非我们懂得列宁的这些分析直接是以在他先前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死亡本质及其在战争期间最终名誉扫地的(高度理论化)论述为前提的。列宁对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个口号或策略的热情,直接来源于他早期对国家鲁莽作用的分析,即在其疯狂的最后一站,国家作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权力和利润保护者的鲁莽作用。在1916年晚些时候,列宁开始相信,资本主义和国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两个拴在一起如同是一个东西,战争最终把它们两个带到了衰落和破坏性的终点。如果没有资本主义指挥中心的毁灭,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毁灭。一方的死亡同时是另一方的死亡。国家终将被打碎。列宁的理论分析使他陷入到这种极端的激进主义。由于他是教条主义者,尽管他的结论甚至激怒了他最忠实的追随者,他都没有在自己的结论面前退缩。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的那样,正是列宁按照高度理论化的方案行动的决心,使得随后产生的

列宁主义的(随后的苏联的)整个政治理论与实践不断恶化,也使它的言词表达变得贫乏。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它不仅重新界定了时间,即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划时代变更的年表,而且也从根本上重新界定了这种超越发生于其中的地理空间。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只是被当作是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相关的一种历史议程。(可以说,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其他主要的意识形态具有同样的看法——西欧产生了社会主义并且是它们的天然场所。)列宁主义为意识形态话语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地理政治框架。毫无疑问,这是列宁主义的世界性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金融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是它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全球体系——一种真正世界历史性的生产方式,它使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基本划分普遍化。在其最复杂的层面上,它提出了这样一种分析,一方面是全球经济的根本性联合,另一方面是不同地区、国家和工业的不均衡发展。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是,现代世界中的剥削不仅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阶级榨取另一个阶级的剩余价值,而且要被理解为在新的全球劳动分工的条件下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榨取超额利润。现在,整个民族(尽管大多数人处于边缘化)都参与了对其他国家的剥削。民族独立和经济自主的斗争因而与结束帝国主义剥削的斗争不可分离。列宁主义触及了二十世纪全球政治的根本,并由此直接或间接地对新殖民主义和依附理论做出了普遍深入的当代分析。

列宁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适应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愿望。它为殖民地人民在经济领域中的严重失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并激起殖民地人民对自己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的愤怒情绪。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说明了帝国统治的动机和本质,而且也促使民族独立的斗争走到了全球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前沿。人们现在认为,殖民地争取民族自治权和经济自治权的斗争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斗争既是共存的也是必要的。的确,列宁把社会主义者重新界定为这样一个人,即他致力于解放一切受到自己民族国家压迫的人民,并以此作为他或她自己解放的条件。

列宁对帝国主义分析的一个战略含意是：鉴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体性，只能在国际的（而不是在狭隘的民族）基础上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进行分析。因此，作为一个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会在其全球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上瓦解。这绝不是意味着这种最薄弱的环节会在最发达或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中被发现。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列宁主义的分析使得在最发达或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首先开始世界革命变得不再不可能。在最发达的国家中，一切阶级，他们在不同的地位上都参与了殖民剥削——这就是帝国主义食利国的含义。甚至工人阶级的整个阶层都因为其对殖民剥削的超额利润的可鄙分享而被收买，并且很容易堕落为叛变的工人领袖的牺牲品。工人贵族有力地褻读了阶级意识并控制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在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机器和强权已经得到数代人的改进和加强。

然而，在半殖民地，这些抗衡的因素中没有任何一个占据优势。本国的资产阶级非常软弱：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根据（legitimizing rationale）甚至不能诉诸虚构的民意。对本国工人的剥削十分严酷，既不受到在其他地方盛行的道德束缚的制约，也不受有效工会存在的制约。因此，革命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正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外围，而不是在其防御最完善、矛盾并不尖锐的宗主国心脏地带。顺便提一句，并不像大多数评论家要我们相信的那样，这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背离。虽然马克思本人承认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有着最发达的工业和最广泛和成熟的工人阶级，但他从来不认为开创革命的任务因而就落在英国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怀疑其真正的阶级存在）身上。相反，在1848年马克思认为法国甚至完全处于外围的德国将开创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关于列宁观点与马克思的一致性争论的结果如何，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确为他的追随者们提供了那种在他们来说是合理的和令人信服的解释：向全球的和划时代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伟大进攻为什么在1917年落在俄国人的身上。

帝国主义理论及其派生的政治策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宣言和纲领,明确无误地把列宁主义与各种竞争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区别开来。列宁主义的政治见解很明确——那些企图认为资本主义仍然是进步的,因而革命还没有提到当前的议程上来的那些人,无论是多么的不情愿和具有什么样的情形,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战争大屠杀的辩护士。另一方面,那些赞同列宁帝国主义分析的人不得不把资本主义文明的延续看作是对人类生存最严重的威胁。因而他们也赞同立即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因此,在列宁主义的辩证法逻辑中,可以推断出,那些不准备献身于反帝国主义革命活动的人,那些不准备致力于变帝国主义掠夺战争为社会主义国内战争的革命活动的人,由于它们的自满而成为堕落的帝国主义的帮凶。界限已经确定,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就产生了:要么赞同关于帝国主义的见解,从而赞同立即举行革命以结束资本主义和战争;要么坚持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无限期地推迟革命,并支持本国的战争努力。这些是当代政治斗争辩证法的两极。根据列宁主义辩证的还原论(reductionism),一切所谓的中间立场(“为了一种公正的和平”,“为了一种没有吞并或赔偿的和平”)只不过是防御主义的辩护。客观地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人

141 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工人阶级的堕落分子。这是列宁主义政治学中的新蛮横主义(the new brutality),它明确地体现在列宁这句著名的口号中:“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①

列宁第一次向其支持者们提供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完全截然不同的具体要求,他们将在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中生活和活动。除非那些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否则列宁主义就不可能呈现为一种拥有它自己的当代世界地图的独特意识形态思潮。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主义和当代共产主义的指南针和计时器。

^① CW, 29, 294.

第六章 政治与国家

我们已经看到,列宁在 1904 年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时代正在国内外的矛盾中走向崩溃。开辟向全球社会主义胜利的革命性转变的时代已经被坚定地提上日程。这些结论是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意识形态的显著特征,并且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①这本著作中得到理论上的论证。当时列宁所面对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者应该如何重建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关系?作为第一个真正的人类普遍联合体,社会主义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如果人类要避免沦落到一个野蛮状态,社会主义的国际革命就会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有鉴于此,那么确立那些预示着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那些革命理论的原则、步骤和制度就变得非常的必要,至少要概括地提出这些原则、步骤和制度。而且这项工作还有着直接的实际意义。列宁充分地认识到,为了使群众果断地行动起来,革命者不能满足于揭露现存社会的腐化堕落。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毁灭性批判或许足以削弱现存权力结构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却不足以促使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它。列宁认为,只有让他们相信用更好的制度来取代现存的制度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可能的,他们才有信心推翻现存的权力结构。因此,社会主义

142

^① CW, 22, 185 - 305.

转变的积极因素不仅必须要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而且必须要表现为现实性的东西。

143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决定要强调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潜在的积极方面。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消极方面的论述在第五章中作了研究，他在1914到1916年间的著作中不断地复述这些论述。到1916年年底，由于满足于已经完成了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攻击，列宁的主要关注点实际上发生了变化。此时列宁所关注的是要证明，正如人类以往所有的历史时代一样，在当代社会中可以发现未来社会的萌芽——哪怕是扭曲的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方面表现为一个曾经具有进步性的生产方式的最后的退化形式，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表现为将要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文明的一个全面的准备。

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

根据列宁的观点，垄断资本主义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没落的资本主义越是拼命挣扎着来维持自己，它就越会创造出更多的机构，并借此来激进地改造和取代自己。资本积累的必然进程意味着一个成功的资本家消灭其他几个不成功的资本家。正如其所进行的那样，这就必然意味着这个过程会不断地削弱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相当简单，垄断的发展意味着资本家在数量上的减少。随着垄断资本家们霸权的社会基础的削弱，他们就不得不日益把国家权力用来作为确保社会服从和保护他们利润的直接工具。但是这样做，他们仅仅成功地撕掉了国家权力长期成功伪装的公平和中立的面纱。国家的本质被揭露得越多——一个不断衰亡的统治阶级的专政，它必定越会在人民的心中丧失信用。其合法性将会遭到破坏。垄断资本主义可以暂时通过培育一种虚假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煽动对外战争，把工人的不满引向国外的目标，从

而为一个庞大官僚机构的日益膨胀和军事化国家的掠夺进行辩护。然而,这些仅仅只是暂时的缓解剂,它将加剧而不是治愈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痼疾。人民群众最终会意识到帝国主义战争的物质和财政的花费将会不成比例地分摊到他们的身上——到那时就没有什么能够挽救丧失信用的帝国主义国家了。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列宁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特征的分析中,附和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含义。巨大的综合性工厂的增加意味着劳动的社会化不断增长;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工人集中在越来越少的庞大的工厂里。(在资本主义世界外围存在着突出案例,如俄国,那里的垄断和现代剥削方式的输出所导致的劳动集中的程度比资本主义任何传统的经济方式都要更高。)这些发现会产生两个重要结论:第一,由于少量的大型工厂对整个生产部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这种状态下把整个生产置于社会控制之下比起在无数小型工厂存在的状态下显然要容易得多;第二,工人越集中、他们所在的企业规模越大,就越能创造出有利于革命组织和革命意识发展的条件,这是列宁主义理论的核心。列宁与普梯洛夫大型工厂工人们交往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个一般结论。在这类工厂中,工人之间的交往得到了最大程度发展,与其他工厂之间的联系更容易保持,并且最为重要的是,工人们能够意识到他们联合起来所具有的巨大的潜能。由于这些原因,他们是天然的中心,革命的积极分子能够集中精力在他们中开展活动并扩大自己的影响。

144

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既然资本资源都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并且决定性地集中到少数大银行,因此将它们置于社会控制之下的过程再一次被大大地简化了。在列宁看来,大银行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神经中枢。在它们的支持下,“我们看到,银行渠道的密网扩展得多么迅速,它布满全国,集中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

义经济。”^①他们不仅控制着资本和信用资源在整个社会产业结构中的分配,而且还日益控制着整个工业领域的生产和分配。总之,控制了它们也就控制了当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如列宁引用马克思的话所说,银行在其初期就是一种制度,它拥有“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②革命能够实现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它凭借的正是大银行用来确立其经济霸权的这种机制和过程。托拉斯和卡特尔也可作类似的理解。这些垄断统治的机构本身可以用来作为一种对工业基础进行社会控制的简化机制。资本主义的悖论是,资本主义似乎全能的自我防卫武器很容易被它的对手所夺取,并被用来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

导致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等设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地便利和简化了由工人和农民通过采用真正的民主方式控制剥削者、地主和资本家。^③

在通往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列宁主义突出地强调要通过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既不会废除其先进的科技基础,也不会废除其资源分配或产业调整的制度化方法。改变的只是这些机构和程序的动机与目标,随着目标的转变,生产和分配体系中现存的不合理、不均衡和不公正现象将会被消除。当生产过程的整个目的被重新确立为追求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按比例发展,从而确保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时,创新和平稳发展中的阻碍物将会消失。总之,发达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可以用来现实社会主义的具体目标。的确,它们将会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几乎是唯一)工具:

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

① CW, 22, 213.

② CW, 22, 216.

③ CW, 25, 346.

实现的……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的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那时候量就会转变为质。统一的、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分支机构——这已经是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机构了。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骨骼……这个“国家机构”（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完全是国家机构，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将完全是国家机构），我们下一道命令一下子就能够把它“拿过来”，使它“运转起来”，因为这里的簿记、监督、登记、计算和核算等实际工作都是由职员来进行的。而他们本身大多数处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地位。^①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特别的纲领，以前从来没有人思考过这类纲领，更谈不上把它作为一个革命快要成功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实践纲领。我们应该记得，这些就是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向布尔什维克发出建议的主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10月。）^②列宁的思路是如此远离西方的政治传统，以至于我们需要停下来并重新理顺这些争吵的脉络，这些争吵导致列宁得出明显异端的和非政治性的见解：一个国家银行相当于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十分之九的国家机构。

列宁一直是马克思的勤奋的学生，在1916年底和1917年初更是如此，他专心致志地研究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国家的理论。促使他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他不满意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布哈林，列宁认为

^① CW, 26, 106.

^② CW, 26, 90-136.

他的思想充满危险,但也是由于他意识到必须正视一切革命理论或者实践的核心问题——国家权力。

国家资本主义与公社或苏维埃的取舍

到现在为止,列宁还很少思考国家权力的本质或一个成功的革命如何对待国家权力的问题。直到1916年底,列宁对这些问题的态度还是完全正统的并且了无新意。他只不过是重复马克思主义左派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只不过是资本所有者用来惩罚和压制的工具的观点。作为最后147 一招,国家是“独立的武装团体”,它是唯一有权携带武器、并愿意使用这些武器来在捍卫现存的社会权力、财富和地位的分配方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越是不知不觉地走向资本的集中和垄断,那它的社会基础就会越萎缩,并被迫依靠赤裸裸的国家力量来维持自身的统治和利润。资本主义,特别是处于其最后的衰败阶段,将会暴露其国家中立的虚假性。那时,为了抑制国内日益上涨的不满以及不断增长的脱离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独立要求,帝国主义国家将会无休止地增强武力并扩大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独裁统治。它不得不压制所有迄今为止独立的协会或者把它们吸收到自身中来。它将逐步地把诸如交通、通信、钢铁、军需品和银行等关键的战略性经济领域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或为国家所有。在列宁看来,国有化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国家通过定量配给控制分配,通过严峻的立法来限制工会力量和工人运动,它将限制工资及劳动条件。最后,通过对关税的控制以保护本国产业(和利润率)免受国外竞争的威胁。对于创造和再生产使资本主义本身永存的条件来说,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绝对的核心。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及这一历史阶段的历史独创性(正如布哈林已经指出的那样)就是,国家非但不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反映了经济基础的

要求,反而是作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而出现。政治上层建筑现在是决定经济基础,而不是相反。当资本主义处于最后的死亡时刻,国家是充当资本主义非常可怕的自大、独裁和军国主义的保护人,自以为是地控制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用布哈林的话来说,国家已经变成“新的利维坦”^①——一个威胁着要摧毁个人和集体自治的令人恐怖的武装力量,它的确在追逐利润的血腥战争中摧毁了文明本身。它最终表明国家的发展在历史上导致了野蛮和疯狂——国家将不得不被摧毁。

尽管列宁最初对布哈林的结论感到愤慨(列宁指责它极其危险地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但是到1916年晚期列宁自己开始赞同这些观点。此时,列宁已经从他们逐渐淡忘的记忆中复兴了马克思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著作,并且从中发现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得出同样的见解。^②在马克思看来,路易斯·波拿巴(Louis Bonaparte)急剧膨胀的官僚政治和军事政体已完全具有寄生性和压迫性。它不仅吞噬大量的国家财富,而且窒息了个人和社会的主动性。马克思认为,这象征着国家的历史作用达到最后的、荒谬的顶点。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与社会在无情的斗争中被联结在一起,其中,国家象征着高压和控制,而社会象征着言论自由和自发性。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国家控制和统治社会的意图受到了国家财政或缺乏实现这些目标的技术手段的制约。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国家强行干预社会的可能性显著地增强了。铁路、轮船和电报改变了通讯,使国家机关的核查、注册、监控程序大大地得以改进。先进的军事技术、通讯以及训练赋予了国家军队在对手无寸铁的民众时具有不可逾越的优势。来自于工业化生产过程的增加的产品和有效的全国性税收征收组织能够承受得起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最后,国家有能力渗透到社会

148

^① N. Bukharin, 'K teorii imperialisticheskogo gosudarstva', *Revolutsiia Prava*, *Sbornik pervyi*, no. 25 (Moscow, 1925) p. 30.

^② K.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MESW*, 1, 486 - 545. 也可参见更加恶毒反对集权的1970年出版的该著作北京版的草稿。

生活的各个方面,在1851至1871年路易斯·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国家获得其最后的“完美的”形式:

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①

149 马克思总结说,以前一切革命的错误都是试图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②汲取这个教训用了20年的时间,后来在1871年3月,巴黎公社的革命者们凭着正确无误的本能对国家发起进攻。马克思充满热情地写道,他们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宣告废除常备军、官僚机构和警察机关。国家——作为被政府机关赋予专有司法权的独立机构——被粉碎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③这是一场反对整个国家本身这个“可怕机器”的革命,它的目标是将迄今属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一切权力和特权都归还给武装起来的人们。人们在他们自己的集会里讨论和决定公共政策并加以执行和维持。他们重新获得他们丧失了了的权力——他们自己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控制。

社会最终把自己从国家中解放出来,只有这一点可被视为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主张,巴黎公社将会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它对于财产的所有权或劳动过程的管理没有提出任何深远改变的建议。建议几乎全部集中在改变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对马克思来说,公社意味着授权给社会、普通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决策和实施进行有效的、持续的控制:

① MESW, 1, 332.

② MESW, 1, 333.

③ MESW, 1, 519.

公社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此一举就会把法国的复兴推动起来。^①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The Civil War in France*)一书中所得出的结论对列宁主义以及后来苏联的国家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马克思明确地坚持认为现代国家与自由、正义毫无关联。相反,它是对一个特定阶级实施强迫管理和惩罚的工具,它不能作为真正人类解放的工具。第二,国家的发展是以社会为代价实现的。国家权力的增强必然会削弱个人和社会集团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根据这种分析,社会与国家受困于一种零和博弈。国家仅仅通过削弱社会生活的自治范围就能达到完善的形式(对马克思来说是波拿巴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列宁来说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在列宁看来,国家与社会构成了辩证的两个方面;统一体的双方处于不断地斗争之中。

在1916年晚期到1918年早期这段时间里,列宁在国家问题上成为这些激进的理论化主张的狂热信奉者。1871年,马克思就已经宣布国家是赘余之物,对于热战正酣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来说,马克思的看法再贴切不过了。在保卫国家的借口下,帝国主义国家动员一切人力和物力为其目的服务。他们立即搁置民主和公民权利,并且建立起对劳动、工资、分配和供给的全国性控制。通讯媒体温顺地按照它们的命令行事,工业统统被置于其控制之下,整个社会都受到军事化命令的制约。列宁反思说,在这样的形势下,马克思要求革命者打碎官僚的或军事的国家机器就具有独特的力量。列宁现在赞成布哈林,认为不同时对维护它的寄生的国家政权进行攻击,那么反对腐朽堕落的垄断资本主义的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并且离开了对社会的激进改造,上述两个目标一个都不能完成。

从1917年2月起,列宁开始逐步地把苏维埃看作是社会主动性和

^① MESW, 1, 521.

151 战斗性的真正体现。苏维埃是公社观念的当代载体。苏维埃的建立起初是为了保护工人免遭解雇或者被削减工资,但从2月后的几个月中,他们的关注点和立场明显地扩大了。他们很快成为一个前政府,焦虑不安地与自封的临时政府共存。列宁坚持认为,1917年初春在俄国出现的苏维埃相对于仅仅由工人阶级所组成的巴黎公社是一个进步。苏维埃至少是潜在地表达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苏维埃是高效和务实的机构,如同巴黎公社一样,公共政策会立即被精心地加以贯彻和执行。在这些方面,苏维埃无比优越于那些具有立法、行政、司法特权和权力复杂划分的资产阶级议会的清谈馆(the talking shop)。与传统的国家不同,苏维埃既没有专门的官僚机构,也没有常备军和错综复杂的权力划分。公共事务由选举产生的官员进行管理,他们要对其选民负责,可以随时被撤换,领取工人的平均工资。苏维埃的治安和防御职能是由一个人人参加的全体民兵来履行的。在这里,社会主义是“自下而上的民主,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由全民的普遍武装的民兵来自愿担任公务”^①的广阔民主。简言之,那些妨碍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进行直接管理的所有中介、制度安排和栽培秘诀都将被废除。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意味着通过苏维埃对一切公共事务实行社会的(而不是国家的)控制。根据自称是现代共产主义的国家主义(Statist)理论和实践,1917年4月列宁坚称布尔什维克应该把他们的党改名为“共产主义者”,这是根源于他对巴黎公社的迷恋,而巴黎公社的整个目标是把国家消解于社会之中,这是自相矛盾的。^②

西方的评论家们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1917年列宁恶毒反对国家主义的深远意义,而苏联的分析家们则几乎完全忽视了。双方都心照

① CW, 24, 170.

② 列宁在其“为论证四月提纲写的要点”中,第一次把苏维埃等同于巴黎公社:“我们应当巧妙地、谨慎地、循循善诱地引导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前进,从‘两个政权’前进到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公社,1871年试验过的公社”,CW, 24, 32-3。

不宣地认为,这种热血沸腾的乌托邦与随后发生在苏联的事情几乎没有关系。这使我们相信这些态度不会产生持续性影响。在列宁主义问题上,与如此众多的其他判断一样,这些判断严重地低估了由列宁固执的教条而导致的对苏联实践的消极影响。关于列宁这一时期的思想对后来苏联历史产生影响的这种“犯罪经历(criminal career)”,A·J·波朗(A·J·Polan)作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明。^①列宁轻率地把国家仅仅看作是压迫机器而不予理睬变成了某种信条,以至于在随后共产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中,政治学的重要问题一直被排除在讨论的范围之外。国家是当代世界邪恶的守护神——对内、对外的剥削、分裂和军国主义的组织者,这种简单的观点导致所有关于改善国家公共机构和程序、保证官员尽到责任、将国家行为与政策接受司法审查的讨论都成为是多余的。在现代共产主义随后的历史中,对于如指导选举的具体程序、媒体的使用、当选代表的豁免权等等如此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也同样闭口不谈。任何讨论个人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意义同样遭到禁止,它们不仅不能够被公开地用来反对行政当局,而且也不能得到独立法官或宪法法庭的进一步明确和保护。列宁以及随后的列宁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一贯反应是,这些问题与剥削和压迫时代声名狼藉的政治有关联,这个时代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仅仅懂得,国家是各种竞争性利益的中立的仲裁者,它是法律平等、公民权利和法规的保证人,这完全都是资产阶级国家虚假的自我辩护。对于马克思和随后的列宁来说,任务之一是要揭露出这些主张的缺陷,并证明这些主张受到更多称赞的只是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践中;这是列宁主义否认国家成为解放代理人或者个人和社会自由的保证人的全部可能性的另外一种惯用手法。对于列宁主义者来说,国家(和政治)缺乏自主性和持久性。二者都反映了一个阶级分化社会的矛盾。它们注定要随着人对人剥削制度的死亡而消失。因此,可以断定列宁主义者执政的重要目标是经济

152

^① A·J·Polan,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London, 1984).

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消灭剥削就是消灭阶级以及对于政治和国家的需要。

因此,列宁的乌托邦理想和反国家主义的思想不是毫不相关,也不是转瞬即逝的幻想。当然,正处于建立过程中的苏维埃国家公然与这个纲领发生矛盾。一个比历史上任何国家政权更具强制性和更加渴望全面控制和塑造其全体公民的国家政权正处在建设过程中。然而,传统的政治语言,以及政治制度和程序据以进行讨论和争论的概念体系,都已经受到列宁的诋毁和拒绝。西方传统政治的词汇和语法突然地被废除,并且没有提出任何东西来取而代之。列宁成功地使一种传统的政治理论失去意义,使自中世纪(the Middle Age)以来对于教会与国家、社会与国家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实践上再协商的动荡历史失去意义。对列宁来说,从马西利乌斯(Marsilius)到霍布斯和洛克,以及从卢梭到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密尔(Mill),都是无聊的无稽之谈,与真正人类社会没有任何共鸣的谎言。在苏联整个历史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政治话语的贫乏对其民众产生了严重的实际后果,最终也对其自身的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实际后果。列宁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责任是清楚的,也是不可推卸的。

153 我们已经看到,在1917年列宁相信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机构是经济机构而不是政治机构。单一的国家银行相当于完成这项工作所需要的十分之九的组织机构。这一断言背后有着一系列的假设,它们对那些后来被当作苏联的国家理论的东西有着深远的意义。首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其政治的上层建筑。在这种观点看来,政治只不过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而国家只不过是保护统治阶级剥削特权的工具。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实际内容在于:打算将当前绝大多数人受极少数人(强制的和国家主义的)的统治转变为一切人相互合作和自愿参与以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生产体系和公平的报酬分配。使得这个计划看似可行的假设是:

(a) 对资源(资本和劳动)进行有计划的和合理的分配以

达到最佳结果,是可以通过科学方式达到的,因而它不应该成为严肃讨论和政治争论的话题。

(b) 在社会内部决定报酬分配的原则,同样地是按照基于个人和集体对社会生产的贡献的实际(也就是可以计量的)结果来进行分配。

正如列宁始终坚持的那样,在公共政策的这些关键问题上,广泛的公共争论本来就不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作用。数据和统计的汇编、对计划实施的耐心监控、核算和会计的适当措施、模范或实践的优秀典型的广泛宣传,所有这些都是单调乏味的、没有争议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社会主义目标得以实现。在列宁的一生中,无论是在野还是执政,他都决不主张决定经济优先的那些原则应该由全体人民广泛讨论,或重大次序的调整应该根据广泛的民主决定而加以裁定。列宁树立了一个榜样,所有共产主义政权都加以效仿。这些问题都不在政治范围之内——它们都不在公众考虑的范围之内。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党的领袖和挑选出来的作为顾问的专家通过行政领导的方式加以解决,他们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政治就这样被剥夺了其核心的关注点。

到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列宁对政治的轻视已经变得日益明显。毫无疑问,关注经济问题义不容辞,共产主义者应该集中精力解决经济问题也是自然的。然而,经济问题的解决方式和共产主义者为垄断国家权力所提出的衡量标准,甚至更进一步缩小了政治的范围。

154

此时,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这些危机使得城镇和农村的商品交换事实上已经处于停顿状态。工业产量下跌到不足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一,农民拒绝上交粮食,交通运输处于混乱状态,到处都发生饥荒。列宁认为,一切都要服从于重建工业和恢复城镇与农村之间的交换这个中心任务。到这时,列宁得出结论,无产阶级几乎消失了。在内战期间,无产阶级为了保卫革命而被大量杀害,而在糟糕的 1918 到 1921 年期间,无产阶级几乎消失在农村之中。留下来的工人受到疾病、严寒和饥饿的摧残。不难理解,此时无产阶级的意志消沉并迷失了

方向。无产阶级已经显著地丧失了阶级特性。在这三年半时间里，“它所遭到的灾难、贫困、饥饿和经济状况的恶化，也是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从来没有遭到过的。因此，这个阶级在经历了这个超乎寻常的紧张生活之后，自然也就显得特别疲惫，特别困乏了。”^①列宁被迫承认，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国家政权缺乏一个牢固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已经丧失了阶级特性，就是说，它已经失去本阶级的生活常态，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了。”^②农民不是对苏维埃政权充满怨恨，就是与苏维埃政权公开发生冲突。正是当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显著消失，在严重的经济混乱和危机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被理论化了。其主题构成了苏联国家神话的基础，并完全与苏联国家的结构相呼应，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

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是当代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成为独裁和专政的：

155 要么是地主资本家专政（即铁的政权），要么是工人阶级的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中间道路。^③

根据列宁的分析，当代最重要的现实是进步的社会主义力量与退步的资本主义力量之间不停地战争。当双方都精疲力竭，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打败另一方时，双方之间也会存在着不稳定的休战期（1920年列宁认为，当时的状况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时期仅仅是在更

① CW, 32, 274.

② CW, 33, 66.

③ CW, 29, 559.

大范围内重新进行战争之前的间歇。那时苏维埃政权的形势是,通过巨大的努力和奉献,它经受住了资本主义最初的攻击、领土的丧失和一场由外部势力资助的内战,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农村遭受蹂躏,城镇的人口大量减少,工业和运输业成为一片废墟,人们正在遭受饥饿和贫穷。俄国革命没有导致预期的欧洲革命,从而加剧了它的痛苦。俄国遭受围攻和资源减少的局面在不远的将来不可能马上得以恢复。俄国被迫依赖其自身的已遭受破坏的资源。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经受住最初狂暴的攻击,但它在世界上是孤立的。苏维埃政权在国际舞台上遭到一些强大敌人的攻击,而且事实上根本没有资源来确保其民众的忠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个政权的社会基础遭到严重的破坏。列宁严肃地认为,虽然帝国主义军队未能成功地颠覆苏维埃政权,但是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牵制和破坏是如此严重,以至于苏维埃政权对于其他民族(以及本国人民)的吸引力被大大削弱了。

在这种危机形势下,列宁和他的同事们被迫从根本上重新估价整个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目标以及为实现革命目标所需要的制度。苏维埃或公社中最初的反国家主义思想是以国际革命的迅速扩展为前提的。的确,苏维埃的目的是要成为当时世界革命鼓舞人心的中心。它向世界人民传达的信息是:要以苏维埃为榜样,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无需国家授权的官僚、法官、部长以及警察;解散帝国主义国家所有寄生的机构;重新掌握自己生活的权力。在满怀革命激情的初期,社会主义被具体化为人民的权力——被统治的终结。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意味着权力关系的激进变革,意味着一切统治和服从关系的激进变革,这种统治和服从的关系迄今为止一直是阶级社会的特征。

现在,列宁不得不面对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即帝国主义国家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瓦解,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也不可能瓦解。与列宁的所有预言相反,帝国主义国家已经设法稳定了货币,保持了战后的稳定,解散了他们的军队,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动荡。

在这种国内和国际都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在国内受到农民的包围,在国外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俄国的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公开的专政才能生存。为了证明这种立场根本转变的合理性,列宁诉诸于苏维埃政权永远不会垮台这种政治相对主义,这与作为耻辱标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当一致。他提出了一系列论点来证明共产主义单一政权的合法性,这些论点是粗糙的、愤世嫉俗的并且没有丝毫政治意义。列宁在特殊的情况下创立的现在被宣传为苏维埃国家基础的神话,连同那些辩护的论点都将是彻头彻尾的犯罪经历。

我们能够心安地承认,为了实现政府最基本的职能(保卫领土和保障民众生活),1920年俄国的任何政治体制都将不得不诉诸专制的措施。危机的积累和痛苦的规模(毫无疑问,共产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应对此负责)使得采取果断的行动甚至无情的行动成为必要。危机本身就已经为政府采取严厉行动来消除危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列宁也在这个关键时刻指出:我们做不了别的什么,这些事情是令人遗憾的,我们的行动和政策是严厉的,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很难证明其正当性,但是非常时期需要非常的拯救措施。这可能是一个传统的、合理的反应,是政治家们日常所做的那种反应。

列宁从来都不满意于一般政客们不假思索反应的惯用伎俩,正是这一点立即使得他的思想变得十分有趣和极其危险。对于列宁来说,总是不得不把当前的困境放到更加普遍和广泛的背景之中,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获得理论上的解决。这真实含义是:这完全是出于无奈(virtue had to be made out of necessity),必须把不可预见的和灾难性的东西当作一个可以理解的过程的组成部分,必须把政策的失误和突然的变化都与新时代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目标结合在一起。

此时,列宁公开承认共产主义者只不过是人民群众的沧海一粟,而管理整个行政机构的全部重担都难以置信地落在了少数积极分子的肩

上：“整个俄国只有几千人。”^①共产主义者不可能也不会放弃政权，然而，他们既不能通过诉诸通过自由选举实现的人民主权论证明其权力的合法性，也不能够通过苏维埃的复兴来使公共机构的实际事务民主化来证明其权力的合法性。列宁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种选择都将会使他们迅速失去政权。这是革命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决定性地重新评估社会主义的内容及其实现方法的时候到了。理论从一种思想观念的解释系统变成了一种有害的辩护书，正是这一时刻的理论对此后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观念的形象起着腐蚀和损害作用。从此以后，理论只不过是一群自封精英的权力辩护而已。

让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起点。当今时代是挣扎着要诞生的社会主义与对濒临死亡激烈反应的资本主义之间进行无休止斗争的一个时期。为了避免他们日益上升的国内危机、他们殖民地令人不安的自信和他们竞争对手的侵略意图，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变得日益独裁和专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点就已经被清楚地揭示出来，但在虚假的和平时期这些特征并没有消失。不管它们如何包装自己，不论它们接受何种宪政目标，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变成专政国家：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力、特权、财富以及利润，他们别无选择。现在列宁过于简单化的相对主义以及政治权力得以运作的形式开始惹人注意。他认为，无论资产阶级国家自己决定选择议会民主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还是军事专制，这都是完全不重要的事情。资产阶级国家借以装扮自己的外在形式毫无意义。重要的是他们政策的客观内容。资产阶级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简言之，就像它可以通过军事独裁来实现一样，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正好也可以通过民主共和的议会来稳妥地实现。列宁认为，民主制作为资产阶级专政最完美的形式确实有意义：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民主愈发达、愈“纯粹”，阶级斗

^① CW, 32, 61.

争就愈公开,愈尖锐,愈残酷,资本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专政就表现得愈“纯粹”。^①

对列宁来说,这只是表达了马克思本人的基本观点,即资产阶级国家的不同形式绝不应该掩盖这个事实,即它们都是资本主义阶级权力的现实本质纯粹外在的种种变化。然而,列宁把这个观点向前推进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如果“向前”是个恰当的词)。从1920年起,列宁认为,适用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的东西同样适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它也能够被多数派或少数派加以运用。必要时它也可以通过诉诸民众授权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或者更加简单地通过诉诸维持一种生产方式所必需的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具有各种不同的外观。只要社会主义政策的阶级本质内容保持完整,社会主义的统治形式和辩护方式并不重要,列宁决定性地得出结论说:“这里同管理形式毫无关系。”^②

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当时在自己的著作中随声附和列宁这种似是而非的相对主义立场和赤裸裸的政治冷淡主义。他们也赞成不再把群众广泛地参与一切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管理这个早期目标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内涵。从今以后,无产阶级政权不再是通过工厂、团委会、苏维埃、地方性的公社组织、民兵、工会以及合作组织来加以表达和实施。他们三人都认为,曾经作为革命早期阶段特征的群众自主自发形成的革命高潮充其量不过是革命初级的破坏阶段。这是一个必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它摧毁了旧的权力结构并使旧的权力结构所赖以存在的价值体系名声扫地——但是它并没有给未来社会的结构和价值创造出任何积极的东西。根据托洛茨基的观点:“革命越是彻底,吸引的群众就越多;革命拖延的时间越长,它对生产体系的破坏就越大,对公共

① CW, 28, 461.

② CW, 28, 238.

资源的侵蚀就更加可怕。”^①布哈林在1920年夏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迄今为止，革命仅仅导致了旧世界的解体，而没有导致新世界的原则和结构的建立。^②列宁含蓄地指出，把社会主义的实质内容与迎合最大多数的公众参与的管理模式等同起来，这是错误的。列宁由此总结道，社会主义不是改变人们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是变革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必然王国将被战胜，随之而来的是真正的社会自由的实现。只有在遥远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对权力关系进行激进的变革，并为公共管理的广泛参与创造条件。正是在1920—1921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才开始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出清楚的和一致的区分。在此之前，这两个术语几乎可以相互替代使用，并没有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独特的历史准备阶段。

政治垄断和滑向恐怖行动

1920年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其他主要理论家们开始自觉地为漫长的“过渡时期”进行理论辩护，这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此之前，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在布尔什维克的国家理论中占据大量篇幅，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列宁在自己的《国家与革命》著作中那样）一直被等同于巴黎公社的管理类型，随后又被等同于苏维埃。在革命的早期，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形式”、“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在1918年夏到1920年夏之间，这一切都突然地发生了变化。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危机。粮食和食品的供应问题由于铁路

^① L. Tro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nn Arbor, Mich., 1961) p. 7.

^② N. Bukharin, *Econom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New York, 1971) pp. 5-9; 以下简称 Bukharin, *Economics*.

系统的瘫痪而加重。燃料和原材料的供应也受到同样的影响,而这些问题都加重了因工人咄咄逼人地争夺控制权所引起的生产上的严重低迷。此后,内战开始爆发,政府失去了从南方获得石油的通道,并且失去了对俄国的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当白军在南部和西部进行骚扰的同时,德国人占领了乌克兰,军事干涉在北部和东部造成了严重破坏。这充分说明,苏维埃政权生存需要对贫乏的现存资源最大程度地加以集中和有效利用。应该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来保卫苏维埃政权。这意味着整个国家都要按照战时要求加以改造,为几条内战前线展开人力和物力的动员。“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在敌人包围之中。它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所有机关的全部工作都要适应于战争,都要按战时要求加以改造!”^①因此,这里可以得出结论,通过工厂、团委会和苏维埃,进行争论、讨论和集体决定的革命实践已经非常不合适了:

实行集体管理,无论在委员会人数方面或处理的工作范围方面,都不应超过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禁止“长篇大论”,要最迅速地交换意见,通过交换意见互通情况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只要有一点可能,集体管理就应限于在最小范围的委员会内仅就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最简短的讨论,至于对机关、企业、工作和任务的**实际安排**,则应委托一位……同志负责。^②

新的口号是铁的纪律;是毫不留情的、坚定的指挥;一人管理和负责制;广泛的劳动动员。列宁建议,“最好是不允许广泛使用‘公社’字样”^③,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假定,一个权威的指挥中心按照轻重缓急对人力和物力进行分配。只有国家可以担当这个角色,只有共产党能够

① CW, 29, 437.

② CW, 29, loc. cit.

③ CW, 29, 431.

符合这个要求,并努力使之成为拯救革命的有效工具。

此时,无产阶级专政被描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正如党在其中的角色一样。面对如此众多的醉心于对社会主义进行军事破坏的国内外敌人,列宁这时认为,只有和敌人一样军事化、集权化和独裁的政权才能生存下来。“在军事上,在一切事情上,都要有军事纪律!”^①列宁认为,同样清楚的是专政不可能由整个阶级来行使。广泛民主参与的公社梦想将不再适用。只有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拥有知识、责任和经验的那些人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管理国家事务。无产阶级的最优秀代表、富有纪律性和经受考验的干部都是党的成员。因此,党注定要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要管理,就需要有一支经过锻炼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大军。这样的大军是有的,这就是党。”^②

161

正是在内战期间,党开始认同了在俄国出现的高度集中和军事化的国家形态。这个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代表委员会——迅速地篡夺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只是名义上对它负责。整个苏维埃体系(除了一两个地方例外)的活力开始迅速下降。苏维埃不是由共产党的政客来统治,就是自动地向人民代表委员会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在随后苏联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政府都没有重新获得旧有的权力、信心或者活力。荒谬的是,正是1989年3月当选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提出的复兴苏联的计划,直接导致将强大的民族主义选民的增长,这些民族主义选民迅速地把自身从苏联中分离出来。

到1921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党或国家的作用的基本轮廓已经得到很好的阐明。坦率地承认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需要很漫长一段时间。在战争和内战结束之后,国家陷入困境。工业生产已经完全崩溃,城市无产阶级已经消失,饥荒的威胁,特别是通过国际革命来拯救俄国

① CW, 29, 447.

② CW, 32, 62.

落后状态的希望渺茫。在这种凄凉的情况下，党或国家的作用和责任变得巨大无比。

非常清楚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不存在的）无产阶级来实施。只有党可以担当起这个历史角色，代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无产阶级都还那样分散，那样被人鄙弃，在某些地方还受人收买……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①

162 到了1920年晚期，历史的车轮又回到了原位。社会主义的内涵被加以重新定义，连同国家的本质和作用也完全地被改变。只要社会主义被定义为变革社会内部的统治关系以及鼓励全体人民重新掌握其失去的权力，那么，无论是党还是国家都不可能要求占有优势的权力。在这里，社会主义是自我行动；正如列宁所隐讳地指出的那样，“消除肿块”才是可能的。到了1920年晚期，列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都赞成社会主义与程序规范毫无关联的观点，这些程序规范的目的在于保证人民的权力——选举任命以及撤销所有的公职人员，领取与工人相同的工资。在这种新的定义中，社会主义也与政治协会的自由和出版自由无关。列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城市无产阶级的基础已经瓦解，残存的工人阶级日益不满，在1920—1921年这种危急的形势下，实行政治竞争将意味着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终结。列宁在给米雅斯尼科夫(Myasnikov)的信中坦白地说道，主张出版自由“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②1920年底列宁解释说：

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专政’这个概念无

① CW, 32, 21.

② CW, 32, 505.

非就是这个意思。^①

然而,所有国家都是阶级国家。正如我们所见,在列宁的分析中,当代社会中的一切国家都成为阶级专政的国家。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运用暴力反对资产阶级而获得胜利和加以维持的”。列宁继续说道,这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力”^②。根据这些论述,党或国家所采取的任何独断行为显然都是合理的,因为政权本身是唯一的法官,它能断定谁属于含义模糊的“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很容易被当作政权所有敌人的代名词。重要的是,按照列宁主义的辩证逻辑,那些不赞成我们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他们客观上形成了敌对的阵营。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按照这种强制性逻辑,特别是温和主义者、调和主义者以及随大流的那些人,事实上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是改良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贵族,打着社会主义者的旗号,但是客观上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③，“小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④以及所有支持者都属于这个阵营。按照反证法,“资产阶级”和“对手”这两个词已交替使用的,它们都应该受到无产阶级国家的任意镇压。

163

正是列宁不仅毫不含糊地宽恕而且大力鼓励增加政治警察(契卡〔the Cheka〕),当政权遭到攻击时,支持它采用恐怖主义的方式对付苏维埃政权的各种反对者——自由社会民主党、拒绝上交粮食的农民、投机分子、流氓组织、游手好闲的人和酗酒的工人。列宁采取惩罚的严厉程度时常变化,并依照涉及的团体而不同,从取消定量供应卡到强迫性劳动,从监禁到当场惩戒性地处死。“无产阶级丧失阶级特性”的论点,正如它所表明的那样,与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1920年所取得的理论共识即无产阶级国家为了对工人阶级(堕落的)的残余分子进行再

① CW, 31, 353.

② CW, 31, 238.

③ CW, 22, 194.

④ CW, 28, 301.

教育不得不诉诸高压政治的方式相一致，它预示着由国家指导的大规模恐怖运动的可怕未来即将来临。喀琅施塔得就是分界线（the Rubicon）。1921年3月，列宁这种非此即彼的可怕的逻辑（要么是由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是由白卫军〔the White Guardists〕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降临到这座革命的英雄城市。

在内战结束之际，喀琅施塔得的工人们和波罗的海舰队（the Baltic fleet）的水兵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归还他们为之做出巨大牺牲的革命权力和革命机构。毕竟，他们一直是享有盛名的爱国者和具有震撼性的革命力量。在1917年7月，他们已经集中全体力量（*en masse*），他们领导了十月份对冬宫的进攻，他们响应号召到至关重要的内战前线中去以坚定红军的决心，保卫苏维埃政权。既然一切都已经结束，革命者已经击败了所有的敌人，他们需要得到曾经为之奋斗的东西——自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确保所有社会主义政党自由竞争。著名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主力舰（the Battleship *Petropavlovsk*）决议后来成了喀琅施塔得宣言，这份著名决议总结了他们的天真的计划：

164 由于今天的苏维埃不再表达工人和农民的意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由鼓动之后，应该立即进行新的选举……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左翼社会党人的言论自由；工会和农民协会的集会自由；释放所有社会主义政治犯和一切因其政治活动而被逮捕的工人、农民、士兵和水兵。废除军队中的一切政治组织，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单独具有宣传的特权。实现所有的工人分配的平等。只要农民没有成为雇佣并付给工资，他们就有支配土地和饲养牲畜的自由权利。^①

毫无疑问，这是对“委员官僚制（*commissarocracy*）”的一种反抗、是对官僚的霸道和政治不宽容发展的一种反抗。然而，它开始并不是

^① Anweiler, p. 248.

一种专门反对共产主义者的叛乱，它只是苏维埃理想的一种最后的英勇表达——它不断重复的口号是“自由选举产生苏维埃”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不是归党”，希望这些口号能在整个俄国鼓动起类似的起义，以迫使共产主义者放弃对他们权力的垄断。

在列宁看来，喀琅施塔得的叛乱给政权带来的危险，比前两年来军事威胁的总和还要大^①。列宁承认，这次反对官僚主义、要求真正民主的运动“对无产阶级也有大影响”，也承认政府的政策使农民产生敌对情绪，致使他们公开地反对苏维埃政权。虽说如此，客观上，“归根到底这个运动是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造成的”。他指出，“这里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国外白卫分子在活动。”^②它利用了广泛的疲惫情绪，利用了极度剥夺所造成的普遍饥饿的形势，利用了由于军队的复员、工业实际上陷于瘫痪和随之而来的城乡之间有组织交换的瘫痪所进一步恶化的形势。列宁承认，工人“正在挨饿”，他们为了生存被迫成为小商业者：“这一切都从经济上使无产阶级丧失阶级特性，同时也必然会诱发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倾向。”^③在这种普遍剥夺、孤立以及政治上迷失方向的情况下：

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期间），那他事实上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④

在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的过程中，在将起义者“像山鹑”一样击毙的过程中（如托洛茨基教导其军队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可以把自已的镇压行为合理化——它不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水兵和革命的英雄城市，而是用来反对白卫军和破坏者到处宣传的小资产阶级不良思想。

165

① CW, 32, 184, cf. 179.

② CW, 32, 184.

③ CW, 32, 199.

④ CW, 31, 45.

为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掌握权力，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们被迫欺骗他们自己以及日益萎缩的追随者。不管是在公众场合还是私底下，他们的语言都变得更加极端和更加具有报复性。托洛茨基就是如此，档案的公开提供了新的证据，显示列宁也不断迫切要求更多地使用恐怖手段来对抗所有已察觉到的反对者^①。

列宁再一次拒绝了共产主义者应放弃对权力进行垄断的反革命建议。在缺乏公众支持的情况下，坚持对权力的垄断势必会导致国家的高压政治和恐怖。正如列宁和布哈林所承认的那样，苏维埃国家正在模仿最初打算要摧毁的帝国主义的国家的结构的形式。

列宁和政治的终结

很显然，国家政权能够不再以人民赞成为基础，也不再将广泛而深入的人民民主参与作为其目标。必须要建立起一套新的基础原则 (grounding principles) 和一种新的合法性根据。毫不意外，正是这些任务在 1920—1921 年深深地吸引列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他们一致赞成社会主义与行政分权和大众参与无关——这不是在程序上而是在实质上定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被定义为最有效地分配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以确保生产效率的最大化。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对管理方式不发表意见——实际上，它在国家和工业的每一层次上对个人独裁制都有着强烈的偏好。非但不无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是专政国家加以掩饰和道歉，而且认为舍此别无他法。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式能将俄国从国内经济危机中挽救出来。对于意志消沉和丧失阶级特性的工人阶级的残余分子(更别提难以控制的农民阶级)来说，没有其他方式可以代替最严厉的惩罚性纪律。更重要的是，在一个长期充满敌意和侵略性的

^① 尤其是参见瑟维斯第 3 卷所作的严谨论述。

资本主义包围的国际环境下，苏维埃国家能够做的只是长期抓住由资本主义对手所建立的专政权力。

列宁立场的相对主义此时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就国家没有自治权——它只不过是实施阶级统治的代理人这点来说，列宁已经彻底地回复到还原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根据列宁的观点，正如国家采取的形式与无产阶级毫不相关一样，它与资产阶级也是毫不相关的。因为资产阶级会根据时间、地点和国际环境迅速调整其实践、协定和宪法形式，因此，无产阶级国家也必须这样做，“民主形式是一回事，这个机构的阶级内容却是另一回事。”^①总之，民主并不是神圣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利益对于民主的依赖并不比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对它的依赖多。列宁对那些迷信民主程序的人报以嘲讽的口吻，“我们不信奉‘绝对的东西’，我们嘲笑‘纯粹的民主’。”^②在当前的形势下，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如果有必要，其他的一切包括民主必须为此做出牺牲，列宁提醒他的追随者说：“工业是永远需要的，而民主不是永远都需要的。”^③无产阶级专政（毫不含糊地由党来实施）强调，民主原则既不适用于车间，也不适用于国家。列宁非常清楚地指出，“形式上的民主应当服从于对革命的利益。”^④只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突依然存在，那么“我们决不许诺任何自由和民主。”^⑤“任何民主，和其他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⑥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列宁根本没有任何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① CW, 28, 268-9.

② CW, 32, 504.

③ CW, 32, 27.

④ CW, 32, 86, cf. 55.

⑤ CW, 32, 495.

⑥ CW, 32, 81.

马克思对民主和多元主义政治也持着一种十分暧昧的态度^①。正是与马克思分析的基本含义完全相一致,使列宁(以及随后的列宁主义者)把纯粹是工具性的国家看作是有利于阶级统治维护和再生的压迫机器和权力机关。

167 列宁忠于他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他对政治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相对主义立场。列宁经常宣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② 政治的作用是在公共场合把社会内部基本的经济对抗加以提炼并清晰地加以表达。政治是人类活动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对抗性的阶级利益公开地表现在公共政策规划上的对立和无从比较。在现代社会,政治把自己降低为这些人的利益表达:一部分人试图维持和加强现存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另外一部分人则试图毁灭这种关系。正如在当代社会阶级被简单化为两大基本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样,政治斗争本质上表现为它们各自政党之间的斗争。社会内部经济团体间的合并和分化过程自然会在两个敌对政党的出现中得到反映。正如我们将在第七章中看到的那样,对马克思来说,单一政党的政治合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形态的必要组成部分,对列宁来说也是如此。正是党为工人提供了正确的社会主义意识以及全国性组织——如果缺少这些,工人就不能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党将会清除工人的幻想,并且通过其宣传和实际行动,引导他们树立真正革命性的意识,认识到他们的利益和有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能调和的。到此为止,列宁如此忠实地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说明,政治实际上走向了终结。它只是能够澄清和阐明但从来不能终结当代社会根本的经济对立的口水战(the war of words)。为了使经济和社会的权利分配发生根本变化,争论、宣传以及政治斗争都将必须让位于武装斗争:“当无产阶级专政被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根本不

① 在‘The Marxist-Leninist Detour’ in J. Dunn (ed.), *Democracy: The Unfinished Journey* (Oxford, 1992)中,我已经提出了这些论点。

② CW, 32, 83.

是用投票而是用内战来解决的。”^①既然政治只不过是经济利益(也就是阶级的本质差别)有意识的清晰表达,由此可以得出,在革命结束之后,随着私有财产的消灭,政治的基础将不复存在。哪里没有劳动力的雇主集团和那些被迫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的分离,哪里就没有阶级的存在,哪里没有阶级的存在,哪里也就没有政治。

然而,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形而上学把政治置于人类史前被遗忘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形而上学也同样是如此。尤其是在其活跃的政治生活的最后几年(1920—1922年),列宁不断地对党内外日益陷入到无止境的辩论和理论论战的倾向表示不满,“现在我们的决议已经多得不仅没法看完,而且也没法整理了。我们应当做实际的工作,而不是去写决议。”^②列宁认为,这种令人分心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并不是仅仅因为国家的紧急事务需要全身心地给予关注,而是因为作为所有这些争论之基础的推理方式和思想方法已经过时了。在后革命时代,这些“政治上的激烈争论(political fireworks)”只不过是个人偏见和设计的陈述,肤浅地掩饰个人升迁或自我标榜的动机。在列宁的眼里,这种政治纯粹是毫无价值的、极度虚荣的胡扯。列宁对政治的不满逐年增长。对列宁来说,政治所表达的是革命过程中一切情绪化的、华而不实的和过时的东西。简言之,政治是那些还没有上升到科学的精确性和确定性状态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通过介绍俄国国家电气化委员会(the State Commission for the Electrification)的工作成果,该成果被列宁称赞为“我们党的第二个纲领”^③,列宁提请第八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the 8th All-Russia Congress of Soviets)考虑并接受公共事务管理方式的变化,这意味着:

168

今后出现在全俄代表大会讲台上的,将不仅有政治家和

① CW, 29, 510.

② CW, 32, 430.

③ CW, 31, 514.

行政管理人员,而且有工程师和农艺师。这是最幸福的时代的开始,到那个时代政治将愈来愈少,谈论政治会比较少,而且不会那样长篇大论,讲话更多的将是工程师和农艺师。为了真正转向经济建设事业,必须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首先树立这种风气,并且自上而下地在所有的苏维埃团体中,在一切报纸上,在一切宣传鼓动机关内,在一切机构内部都来树立这种风气……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①

169 科学作为国家政权的一种替代性合法性根据显现出来了。随着列宁对群众(甚至是工人阶级)创造能力的信心下降,随着他对阻碍俄国发展的那令人震惊的文化缺失的日益重视,列宁开始不断地夸耀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比起党的理论家们的争论和群众的空虚散漫,科学作为一种推理方式强烈地受到推崇。科学的工具,如辩证法思想(在列宁看来,这是科学的实质)的工具并不能通过得到群众的赞成而得到改进。这样,把专家的权威与党的权威结合起来。党作为辩证法的捍卫者,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保卫科学的声誉和权威,同样,持有权威的那些人可以从中得到科学的保护与祝福。

在其活跃的政治生活的最后几年,列宁对于描述几十年来苏维埃政治特征的那些趋势具有重要的影响。列宁在哲学上和在本性上都无法容忍多元主义和折衷主义。列宁像其导师普列汉诺夫一样,在历史观上是一个坚决的一元论者。他坚信(不顾一切相反的证据)工人阶级在历史上只有实现其目的的意愿,而党则有实现其目的的远见和途径,唯有党才能够对它清楚地加以阐明。在列宁的世界观中,没有给不同观点之间进行真正原则性的、持续性的争论留下任何空间,而这些不同观点同样是无产阶级使命有根据的构想。在这方面,他紧紧追随着马克思,马克思对于有分歧的、脱离正轨的工人阶级的设想和理论同样不能容忍。在这两个案例中,对竞争对手构想可靠性的这种否定,根源于

^① CW, 31, 524 - 5.

教条主义者根深蒂固的傲慢立场。正是因为列宁及其追随者对他们理论上的正确性如此坚信,才使他们有能力抵制和谴责离经叛道之人和反对派。如果工人阶级只有一个意愿,而科学拥有出路,并且如果党是二者思维过程和思想发展监护人的话,那么,必然由此得出结论,党的反对派不仅反阶级,而且也反科学。这种极其强制性的逻辑成为苏维埃国家及共产党随后发展的特征。到列宁去世时,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党在其所有的意图和目的上都丧失了正确的政治内涵。

第七章 政党,阶级和意识

170

在列宁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党的组织的理论和实践原来是其最大的财富,同时也是其最大的负担。是其财富这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建立了(有时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一个受过训练的、结构严密的组织,它能够利用前沿组织和现代通讯媒介来发动群众、具有献身精神的积极分子所组成。列宁主义者会满意地发现,正由于这些因素,他们自身的政治力量大大超过他们的实际人数。是其负担这点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随着列宁主义政党变得更加成熟,尤其是在他们不受挑战地占有国家权力的地方后,这点也日益强劲地表现出来,因为它注定会导致内在的衰退。

在很多不同层面上,列宁主义对民主的态度不是含糊不清,就是在实际上加以敌视。列宁早期政党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是革命前的俄国,那时,政治活动被禁止,民主被沙皇当作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想而拒绝。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开展民主的群众性政党活动的实际经验(至少在1917年2月推翻沙皇统治以前)。还有这时列宁感到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由于投票支持战争而最终使自己名声扫地。列宁主义的历史方法论断然拒绝了民主的基本设想,即社会内部政治异见能够并且应当和平地加以协商。

正如我们所见,列宁主义形而上学的科学自始至终与民主的理论

171

或实践在根本上不相一致。它坚持认为,客观真理绝不是通过征询大众意见而得出来的,既然真理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就不得不采取能够确保达到结果的全体一致的程序性方法。工人阶级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只有一种真实的意愿,而科学则对一切现象提出了不容置疑的观点,这样,庞大而僵化的党的组织结构就被这两个相关原理(the twin axioms)合法化了。因此,离经叛道者不是愚昧无知之人、恶棍,就是工人阶级精神的异己分子。他们需要的不是再教育就是接受训练。只有当列宁主义政党成为单一政党国家的执政党时,这种循环论证才表现出来。不仅党员而且整个社会都要受到党对现实的看法和惩罚性纪律的支配,这也是一切持不同政见者们的命运。这里不仅确立了思想的领地,而且确立了社会和政治权力的领地。党的最高领导者不仅是真理的解释者,而且是党内国内所有这些负责人的任命者,他们负责管辖和惩罚异端分子。在这种狭隘排外的集团里,党只对自身负责,权力的专断同权力的腐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本人在其最后著作中接近于承认这种困境,但那时他实际上已经处于无权状态^①。在列宁之后,只有戈尔巴乔夫试图将党从垄断真理的傲慢自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选举竞争和自由媒体的拒绝中解放出来。可以预想戈尔巴乔夫的努力是一个悖论:与他的成功相对应的是党的权力和苏联统一的土崩瓦解。由于其历史、精神实质及组织结构的原因,结果是列宁主义政党不能够实现这样一种转变,即从作为科学和客观真理的工具而使自己合法转变为通过人民同意来证明和维护他们的权力。

^① 尤其参见列宁最后富有意义的著作《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文章都收录在《列宁全集》第33卷。有关列宁对党和国家机构的最后反思的意义的分析,参见 M. 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 (London, 1969), and 1981, chs. 14 and 15.

政党和无产阶级意识

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党的基本功能是清楚地阐明工人阶级的历史目标并激励和动员工人去实现这些目标。工人阶级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革命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从而最终在社会范围内消灭剥削和阶级分化。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列宁看来,工人阶级不是一个统一的、无差别的群体。它本身是由不同社会阶层所组成,这些阶层的组织水平不同,理论程度也不同。因此,在工人阶级的内部,清楚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竞争性的项目。问题就立即出现了:如何从这些多种多样的项目中提炼出一个有凝聚力的、统一的目标?为回答这个问题,列宁紧跟马克思,去借助于模糊的历史固有(historical immanence)观念。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固有观念认为,对社会发展的精心研究将揭示某种一般趋势,一旦这些一般趋势被确立并居于统治地位,就会驱使人们按照既定的方式行动。当然,绝大部分群众是不能正确地掌握这些发展趋势或规律的,因此对于应该如何改变自己的处境所知甚少。对大部分工人来说,他们考虑最多的可能是适当地改善他们作为雇佣工人的现状——也许是劳动时间的减少,或报酬的增加。他们很少想到他们应当致力于改变他们的地位,成为他们自己工厂的主人或共同所有者。然而,用马克思主义的表达方式来说,历史规律表明:当资本主义成熟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对抗与对立将会随之不断加剧。历史证明,工人条件的暂时改善从来不过如此——它们会被下一次经济萧条所侵蚀。历史经验使人深刻地意识到,正是这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部分地和有限地改善他们条件的要求才是乌托邦,他们会逐渐地明白,只有革命性地推翻资本的权力并代之以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工人过上体面而文明的生活的愿望。

172

工人们自己通常不能预见到这些未来发展,在明显混乱的日常事

件中，他们不可能独立地洞察出这些趋势和倾向，这些趋势和倾向正推动着他们走向与其雇主和国家进行革命性的对抗。数代的经验积累、不断受挫的希望和日益恶化的条件，最终使他们确信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权力和财产关系。但是同时他们会长期遭受失败，因为他们缺乏主要是来自有效组织的那种目标意识和决心。

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将党引入历史的进程，列宁则更加明确地将党引入历史的进程之中。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共产党人“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¹⁷³马克思继续说道，他们最近的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①在列宁对党的论述中，几乎没有对马克思的原文做丝毫改动。首先，列宁接受了一个重要假设，这个假设也是马克思提出的但很少加以阐释——共产党人（或党员）远比无产阶级本身更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共产党人由于懂得历史规律而能够预测未来。正因为他们具有先见之明，所以他们能够领导无产阶级，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影响并保护他们免遭失败。

在列宁主义关于党的理论和实践的核心中，有许多最基本的原理，在进一步探讨之前我们必须对这些原理进行说明。此时此刻，我们必须不加考察地接受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将在第九章中更充分地加以展开。作为一个哲学体系，列宁主义断言世界是可知的和有规律的。他还坚称有两种认识方法，系统化、普遍化的（或“客观的”）科学知识高于由直接经验所表达的“主观的”知识。正是党来解决科学的或客观的知识。因此，党对于无产阶级奋斗目标的分析要高于无产阶级自身对其目标的意识。只有一套统一的阶级目标，只有一种可以识别的阶级意愿，这些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来说同样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坚称，正是共产主义者独自清楚地表达了这些目标和意愿——这就是党的首要历史作用。

^①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1, p. 46.

在这点上,列宁主义(再一次忠实于马克思的原著)在定义上采取了一个不起眼的变戏法伎俩——原来这对于意识形态的不可抗拒的影响(mesmeric effect)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伎俩是惊人地简单和大胆——仅仅在阶级遵照党对其目标的论述并鼓动自身去实现这些目标这个意义上,阶级才被定义为阶级。据称,无产阶级只有当它至少在国家的层面上组织起来并且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目标时,它才能上升为阶级的存在。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它急需一个政治组织——共产党。现在,党不仅进入到了阶级存在的定义中,并且成为阶级的基本表达。无产阶级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如果缺乏有效的理论表达和政治性组织,那么它就不可能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当马克思界定共产党的任务时,用这样的方式隐晦地表述为:“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①这是一个定义性的观点(definitional proposition),它来自于马克思更加概括性的论断“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②(普列汉诺夫及后来的列宁多次加以引用)。

174

当然,列宁主义的文献充满着党对阶级的责任和义务。很少被提及但却更为根本的是阶级对政党的责任。现在要对任何向党外学说及领袖们的动摇、妥协以及任何辜负党的期望的行为承担责任。脏乱的、真实存在的无产阶级——具有各种不同目的和愿望的雇佣工人的集合体——在他们走向一个真正阶级存在的过程中,是由为其阶级存在制定标准的党来做出判断。更加自相矛盾的情况是,党的领导人的阶级背景和那些给无产阶级存在的本质下定义的理论家们的阶级背景并不重要。的确,他们很可能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一部分”^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而不是工人,毕竟,工人既没有接受培训也没有闲暇来科学地

① Ibid., p. 43.

② 这是普列汉诺夫 1883 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参见 G. V. Plekhanov,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vol. 1, London, 1961, p. 59)一书中的引言,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把马克思介绍给俄国读者。

③ MESW, 1, 43.

思考这些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考茨基甚至更加坚定地认为，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阶级充当了科学的工具^①，它也是社会主义目标内容以及在实现这些目标过程中工人阶级作用的定义者。

就党的基本的理论基础来说，列宁主义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列宁主义同样要求建立在一种专门知识的基础上，同样建立在这种傲慢的论点的基础上即仅仅通过工人中的投票表决不能够揭示无产阶级事业。正如托洛茨基评论的那样，“甚至无产阶级自身的心理中也包含着一种可怕的保守主义惰性。”^②多数人的见解与社会主义事业毫无关系。多数人缺乏组织并受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所支配。他们思想的最小公分母所代表的只是一种愚昧无知的集合体而不是智慧的一种展现。列宁经常断言说，仅仅依靠“斤斤计较的头脑”不能把无产阶级的目标推向前进。

党和议会

明确宣称将要复苏和纯粹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形而上学有效地加强了这种精英主义的和反民主的列宁主义。历史，列宁主义忠实地吟
175 诵道，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上相继出现的阶级为了确保他们对社会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垄断，都必须去掌握国家权力。他们运用法律、监狱、警察和军队为自己的特权进行辩护并加以保护。然而，在每个历史时期，新兴的阶级必须面对现有政权占有者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本教导就是，统治阶级决不会自动放弃他们对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的控制权。他们必须被暴力地加以推翻。马克思坚

① 参见第一章注释 26。

② L. Tro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nn Arbor, Mich., 1961), p. 10.

决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①，只有通过革命行动才能实现历史的根本变革。这种根本性的变革——其中一个集团取代另一个集团成为财富、地位和权力的拥有者——不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一切其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党派的错误在于他们的理论设想和政治实践都假定社会内部敌对的主张能够且应该和平地加以解决。他们设想当选代表按照绅士般议会辩论的方式进行理性讨论并达成妥协，这能够而且应该解决社会争论并关注选民的痛苦。在列宁看来，民主以及一切民主政党（包括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设想都和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相脱节。毫无疑问，他们在表面上具有吸引力，但他们是软弱而平庸的。他们都陷入到国家统一、阶级融合和政治妥协的甜蜜幻想之中。然而，历史终将证明只有暴力和有组织的革命行动才能够实现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变，这就是列宁主义政党在革命前的一段时期内必须让群众牢记的基本信息，“大家知道，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最激烈最尖锐的形式即内战的形式解决的。”^②

因此，党的目标与任何其他政党的目标不同，它并不追求在现存体制内掌握权力，而是要推翻它。它不承认现存国家是权威的合法源泉，也不把他们的法律看作是其他东西，他们的法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益的法规汇编。这是一个好战的抵制主义（rejectionism）或分离主义（separatism）意识形态的政党，它的目标是要削弱权力和财富现存分配方式以及所有支持现存分配方式的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它的斗争领域基本是在议会之外，是在现存宪法之外，因而也是在法律之外。

列宁主义的这种抵制主义立场，并不意味着党应该完全地放弃传统政治——那是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列宁强调，这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当然存在着这样的时刻，革命的潮流势不可挡，此时，从无能的资产阶级议会的“清谈馆”中完全撤退出来并揭露他们的

176

①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1, p. 217.

② CW, 25, 203 - 04.

伪装,对党来说是完全恰当的。在这种历史时期,党的场所是在街道、工业工厂和卫戍部队里。这些是权力的真正焦点之所在,成为决定性的领域是这些场所而不是议会。党在议会中的活动以及日常的政治斗争在阶级教育和为革命性进攻做好阶级准备方面依然是重要的。党在这里的作用就是要消除继续为群众所珍视的广泛传播的幻想——相互对立的利益有可能和平地加以调和的幻想。

无论资产阶级议会是如何地受到束缚和限制,资产阶级议会都应当被用来向人民大众证明,在它们的条件下想要从这种机构中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完全是一种幻想。列宁提醒其追随者说:“资产阶级民主在教育和训练无产阶级去作斗争方面,具有无可争议的意义,但它始终是狭隘的、虚伪的、骗人的、冒牌的,始终是对富人的民主、对穷人的欺骗。”^①政治,甚至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有限政治(the restricted politics),依然要为许多教育和组织的目标服务,列宁主义正常不应该忽视这些教育和组织的目标。首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将会清除群众中的虚幻希望,即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现存结构之中可以实现实质性的改变。他们甚至还会说明当今社会真正的阶级格局。它将使得哪个党代表哪个集团和哪个阶级,赞成或反对进步性的改革立法完全变得一清二楚。党在这里的责任是清楚的。正是准确地促进了这些问题,才揭露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典型化。它的目标从来不是讨论那些能在政治派别中达成最大限度的一致赞同的问题,而是抓住能够迫使工人解放的支持者们和反对者们采取针锋相对并高度清晰而公开的立场的那些问题。

177 有必要不断地强调和梳理对抗性利益,要取得成功,党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对抗政策并削弱那些支持政治和解的“左派”或“右派”的努力。对列宁主义政党来说,最不义和危险的力量总是那些中间分子,倡导阶级和谐与社会和平的迷人号召,改良主义者与和解主义者的诱人言

^① CW, 28, 108.

词——这些始终是最阴险的声音，因为他们使人们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东西——不经过斗争他们就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并且想要的东西：

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非党性就是对各政党的斗争漠不关心。但是，这种漠不关心并不等同于保持中立，也不等于拒绝斗争，因为在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者，……漠不关心就是默默地支持强者，支持统治者。^①

因此，共产党人的目标不是改革一个不可改革的权力体系，而是要证明在这个体系内进行富有意义的、持续的改变的不可能性，要揭露那些持反对立场的人的毫无意义的要求。通过挑选那些要求党派表明自己赞成或反对保护现存的权力结构从而使政治生活两极分化的问题来揭示和强化所有政治团体的阶级方向。

最后，议会政治在其作为媒介使党能够抓住其目标选民(targeted constituency)方面，其作用是有限的。党能够并且应该利用资产阶级选举运动的一切机会和有限自由把自己的信息传达给劳动群众。党能够而且应当充分利用议会代表所享有的豁免权把议会作为阶级战争的传播机。在这方面议会的作用不是提供一个通过对渴望改变的理性辩论来说服反对者的机会，而是在国家的核心机构中，能够找到一块受保护的场所，使得好战的无产阶级的声音能够借以获得全国性回响。因此，共产党人的代表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其建议对立法委员的影响上，他们在那里不是向议会发表讲话，而是(正如倍倍尔[Bebel]早已提出的那样)通过议会这个窗口向外部发表讲话。最重要的是，他们绝不会被代表的独立性概念所引诱，受个人良心的指使进行知情辩论(in-

178

^① CW, 10, 79.

formed debate)。他们毫无疑问是民众领袖，被授权进行辩护，这既不是他们自己的敷衍，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即兴演讲。绝不应该容许他们忘记自己只是党在议会的代言人。

我们发现，对于优秀的列宁主义者来说，党的活动的决定性场所不是在议会内而是在议会外。他们为自己立场辩护而引证的论点有很多的层次。他们认为，从历史上看，涉及权力和财产结构的根本性改变这类重大问题，事实上不是通过辩论而是武力来解决的：反对封建的和君主政权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证明。更为根本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表明正是人们的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决定人们的政治立场，并使之成为毫不动摇的主张。总之，那些相信通过道德上的或思想上的辩论能够说服富人放弃自己的特权的人，充其量不过是毫无希望的乌托邦主义者。资产阶级文明真正的权力场所既不在议会也不在内阁，而是在于资本和武装力量的结合。党在任何时候如果想要成为重要的革命力量，那么就要在这些场所与面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工厂和卫戍部队不得被政治化，它们不得不成为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基本中心，因为一方面（维持整个制度的）剥削是被系统地加以追求，另一方面，剥削受到国家权力许可的支持，“事情完全相反，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得‘瓦解’军队，而且不这样做不行。”^①在列宁主义的分析中，如果资产阶级国家只不过是有意地使用强制的力量来维持剥削经济关系的组织，那么由此可以得出，列宁主义者不应被政治辩论的虚假表演所迷住，而应该寻求揭穿它的现实基础。

党和阶级

维持资本主义的物质价值(material values)是在工厂和车间里被

^① CW, 28, 284.

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工人在这里被雇用,从他们身上榨取获剩余价值并转化为利润——资本主义整个制度的命脉。正是在工厂和车间里,工人们被大量地集中起来,并且随着劳动过程内部的劳动分工的每一次改进而不断增加。在这里他们可以感受到他们联合起来的潜在力量。最为重要的是,在这里只有工人被集中起来——唯有依靠出卖他们自身劳动力的那些男男女女。顾名思义,在工厂、矿山和车间里没有小商人、农民、小型企业主、官员、教师或小职员,只有纯而又纯的工人阶级。因此,党应该集中自己的资源在工业企业中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当然,在整个苏联的历史中,党正是建立在产业和职业的支持者的基础之上。相信本土选民或议会选民重要的人,支持那些仍然抱有议会社会实际力量的真正场所这种错误观念的人。然而,对共产党人来说,产业组织更加重要。他们“天然”的支持者是产业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他们坚决主张,正是这个阶级并且唯有这个阶级,才能引导社会沿着推翻资本主义文明的道路前进。但是在它能够有效行动之前,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并意识到自己伟大的历史作用。赋予无产阶级这些至关重要的组织和意识要素是党的责任——未来革命(实际上,是全人类的)都依赖这些要素。

179

尽管党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且是所有遭受资本剥削的人真正的天然代表,但是,列宁主义的核心原则绝不可能把党与工人阶级等同起来。党有必要保持自己与阶级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不同。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党负有明确表达一切雇佣工人一般的和长远的利益的责任。因此,党不得不代表并清楚表达的不仅是现存的、在工人阶级中已经达到的思想水平和组织水平,而且还要引导并领导它走向下一阶段的发展。在列宁看来,党如果不是这么做,便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这将使党陷入要表达不同群体雇佣工人完全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苦情的不幸境地。工会是这种工作的恰当工具。如果党将自己局限于微小的经济改善的斗争中,它的信息和成员都将被迅速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它会堕落到跟在工人尾巴后面的地步(“尾

180

巴主义〔tailism〕”）。它的政治目标就会因过分关注于面包和黄油这类劳动报酬和条件的问题而变得模糊（“经济主义〔economism〕”）。这就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分子装扮成工人的朋友和他们政治代言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除非有一个坚决的和理论上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来强有力地执行其长期目标，并且毫不留情地揭露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伪善，否则工人阶级注定要受激进的机会主义者所支配，他们会利用自己发现的政治真空，来削弱工人阶级革命团体的作用。

在第一章中，我们相当详尽地考察了流行的解释方法的不足。这种解释方法认为，唯有列宁要对坚持党和阶级的分离所带来的有害后果负责。我指出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而且也是列宁从普列汉诺夫那里继承下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基本准则。可以从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和纯洁的考茨基那里找到证据，大意是说，如果没有以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为首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和组织上的首创精神，那么工人阶级注定在历史上无所作为。那些声称代表马克思主义正统的人没有一个坚持认为，充分的革命意识是工人运动本身的自然或自发的产物。在这点上，我们无须再次重现 1902 年列宁在《怎么办》中所描绘的“新型政党”的概念背景。

我们早已经发现，根据列宁主义者的说法，合格的党员远不只是坚持党纲和交纳党费，它还包括要以适当的角色持久不断进行活动来为党服务。从一开始，党就被设想为最忠诚的活动精英，来自那些被认为有特殊才能的人。同样，我们发现党的目标选民不可能是不加区分的作为整体的雇佣工人。党更倾向于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先锋队。在列宁看来，将共产党融入到作为整体的阶级之中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做，只会使自己由于分布面过于广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绝大多数一般的和落后的工人对运动的任务产生决定性影响，从而削弱了党作为历史性力量的影响力。它会在地方性的、短暂的和琐碎的需要面前陷入泥沼不能前进，并且丧失其概括性的和预见性的作用。

正是因为党的职责是领导无产阶级,所以党和阶级决不能成为一个混合体,它们决不能被结合在一起。理论上说,党、先进的工人和作为整体的阶级都处于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中。这里,列宁的确在当代政治学中加入了一个真正创造性的注解,它对于列宁主义的自我形象和信念来说是基础性的。这就是党是作为力量的加速器或倍增器的观念。其基本含义非常简单:有效的组织可以使人数相对较少的积极分子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迅速扩散。一个规模小却富有纪律的团体,按照共同计划行动,拥有清晰的权力结构和精心组织的劳动分工,因此就能够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产生超出其规模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判断任何团体或政党所具有的可能影响,并不能简单地通过计算它的拥护者和投票者的数目而得到正确的评估。相反,任何组织的政治影响力主要是该有效组织的功能。列宁经常援引实行具有权威的管理职能分配和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大规模企业的模式,来说明这种体系的生产率如何地远远大于大量工人在分散的手工工厂中工作的生产率。他总结道:党必须仿照工厂的模式。在其他时候,他又对小规模的职业军队的力量与大规模的缺乏组织的叛乱分子的力量进行比较。从这两个的比较中,列宁主义政党吸收了一个词汇和一种形象化的描述。这个词汇和形象化的描述对其后来的发展来说远非无关紧要的东西。战争、战斗、先进战士和总参谋部这些军事化的比喻与劳动分工、原动力、传输带、嵌齿轮如此等等的生产性的比喻相辅相成。

不管采纳哪种比喻,中心论点是不变的:

结论是:在一切国家里,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除了“党”以外,还有**靠近党的“广大阶层”**和组成党、为党提供成员和养料的这一**阶级的广大群众**……

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这是有可能呢?100人的力量是否能够超过1000人的力量呢?**有组织的100个人**,不但可以超过而且一定会超过。组织能使力

量增强 10 倍。^①

因此,党应该关注其成员忠诚的强烈程度和他们不同职能的有效连接,就像关注其更广泛支持的宽泛性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说,那种更广泛支持本身正是来自于群众在一个高效的纪律严明的组织中的将会具有的信念,实际上,这个组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宁肯少些,但要好些。”^②这并不意味着相对来说较小的政党自然而然就能够改变社会或进行革命:那纯粹是冒险主义。党宁愿通过一系列中间组织,通过其严格控制的报刊和宣传单位的媒介,对其支持者和选举人的“广大阶层”产生影响。接下来,这个“广大阶层”应使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加入进来,随后是社会中的犹豫不决之人和边缘阶层。正如我们后来会看到的那样,这就是像无党派工会这样的团体所具有的重要性——它们成为党对广大的工人阶级产生影响的“传输带”。

在列宁主义关于党和阶级之间关系的论述中,关键的问题不是把二者混合在一起,而是抓住二者之间重要的基本联结。在所有的列宁主义政党中,这些动员联结都是相同的:党中央当局指导党的专职干部,接下来,党的专职干部又到地方的、职能的或工会的党组织进行动员,激励先进的工人,然后通过他们对工会、文化组织和其他前沿组织或传输带的影响,这些先进工人的自信又使工人阶级中中间和落后的阶层加入进来。

列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群众的参与,党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如果党的口号和实际政策远远超前于先进工人,那么它将毫无影响力。这种冒险主义或雅各宾主义的危险在于,它站在与处于另一端的经济主义、自发性崇拜(spontaneism)、尾巴主义或改良主义的错误相反的极点上。这两种极端都具有灾难性威胁,只有把精明的政治领袖与精

^① *CW*, 19, 406.

^②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 1923 年 3 月列宁最后一篇文章的标题。*CW*, 33, 487 - 502.

密而详尽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加以避免。在任何情况下,在几乎可想象到的任何环境里,如果莫斯科有意的话,就能发现国际共运的列宁主义政党陷入这种或者那种“偏离”的错误之中,因此需要被清洗或“更新”。

民主集中制和布尔什维克策略的普遍化

在列宁主义者看来,地下党的秘密组织对于防御战略和对于进攻战略来说同样都是至关重要的。列宁主义者不相信资产阶级民主或资产阶级公民权利的永久性。只要他们为掩盖并保护资本主义剥削服务,他们就依然存在。因此,这意味着,党越是成功地揭露它们的伪装和假象,社会范围内的社会紧张就越会加剧,资产阶级就会不得不更依赖军队和警察的赤裸镇压来维持他们的权力。在这种情景下,革命政党完全依赖开放的、公开的组织结构就是一种不可能的乌托邦,毕竟,他们很可能被挑选出来专门加以镇压,就像对待所有工人运动中的军事领导人那样。因此,党自身就有必要为这种不测事件做好准备。党不得不对其公开的方式加以复制,建立起一个平行权力结构和秘密的联系渠道和宣传方式。因此,其地下组织必须具有使用编码和密码的“专业性”技能,小心地保护他们的联系人,相互信赖,无可指责。秘密性和专业性在党的关键活动领域诸如潜入武装部队这样的活动领域中尤其重要。

对于建立秘密的、等级制的、由“专业人员”组成(或至少指挥)的政党,列宁最初的正当理由是俄国沙皇专制统治的背景,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所有政治活动都被禁止。没有任何其他现实的公开的选项。他当时(1902年)并没有设想要向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推荐采纳俄国模式,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的任何时候也他都没有想过。相反,他向往着美好的时光的到来,那时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法律规范能允许

党将自身改造成为一个更像整个欧洲政党典范——德国社会民主党（SPD）那样的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为什么如此多的欧洲社会民主政党的领袖们屈从于民族主义或改良主义的观点？好战的社会主义是如何免遭这种传染？列宁开始犹豫不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组织控制一直过于松散。回顾过去，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一直过于宽容和自由化（broad-church）。对于明显是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寻求与激进的或自由的资产阶级政党们结盟的折衷主义者、和平的渐进的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声名狼藉的支持者，譬如爱德华·伯恩斯坦这些人，他们容忍其在党内存在的时间太长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对选票的贪婪和无端地以获得的议会席位来衡量社会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结果就是通过在其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寻求选举支持从而淡化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信息，议会喧宾夺主最终取代了党。所有勉强赞同社会主义的野心家和冒险者，甚至经常坦诚不承认革命政纲的人都加入了社会主义政党并腐蚀了他们的革命思想：

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几十年（1871—1914年）已使迁就机会主义的各国社会党像奥吉亚斯的牛圈那样堆满了庸俗，近视和叛变的秽物^①。

寓意是明确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清除其机会主义的追随者，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公开确立一个更加清晰、更加坚定的目标，并通过建立程序规则和严格纪律来保证这些目标得以被坚持。它只有对其成员定期进行驱逐或清洗才能保持其纯洁性，定期重新登记将成为列宁主义正常的典型特征，在重新登记中，每位党员被迫证明他或她的忠诚和承诺以获得新的党员证。

直到1920年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才能够相当详细地制定出适合共产党组织的组织结构。此时，列宁对于俄国相关经验早

^① CW, 28, 254.

前的那种谦虚,以及对俄国经验进行概括的那种勉强已经完全消失了。俄国共产主义者(前布尔什维克)是欧洲唯一要推翻自己政府的社会主义者;唯有他们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权,而现在他们要独自面对帝国主义世界协调一致的武力攻击和宣传攻势。

列宁现在完全清楚为什么俄国取得了成功而其他国家则遭到了失败:俄国人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保持了统一,而其他国家的人则没有;他们已经清除了同路的修正主义者,“经济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social pacifists),而其他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党则坚持放任意识形态上的自由化;他们制定了党的真正积极分子应当遵守的组织纪律,其他政党淡化党员资格,任何仅仅交纳党费的人都可以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现在是共产党)坚持铁的纪律以及党的各分部对权威中心要严格负责,而其他政党满足于一个松散、几乎是联盟式的结构。列宁很清楚,除非并只有坦率地创立革命的先锋队政党(vanguard party),革命才有可能广泛传播,俄国共产主义政党是唯一成功的模式,“布尔什维克主义为第三国际建立了思想基础和策略基础,……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典范。”^①

185

1920年7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第二十一条。这些条件仍然被幸存下来的列宁主义政党视为正统经典。其中很多条都在重复这个基本信息,即和改良主义者与社会主义政党旧有的核心领导层进行决裂是绝对有必要的。共产国际及其成员的整个基本逻辑是,渐进主义的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叛徒,他们已成为好战的共产主义的首要敌人,他们是阶级敌人。因此,每个共产主义政党都必须“一贯地和系统地解除他们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任何职务’并揭露他们的背叛”^②。然而,这将不是一次性手术,削弱和渗透的危险是长期的;因此,共产党各分部不得不“定期

① CW, 28, 292-3.

② CW, 31, 207-8.

清洗(重新登记)党组织的成员,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各成员必须在军队和农村中“持坚持不懈地有步骤地进行宣传和煽动”,他们“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不合法机构”^①。最重要的是,共产国际的各政党必须“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②。而这只有在他们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时才能实现。^③

自从1920年起,共产主义政党或列宁主义政党就以自身是战斗的先锋队政党而自豪。他们坚称,一个战斗的政党必须至少具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它必须是由这样一些人所组成,他们不仅具有相同的思想,而且准备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这个事业。第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党员个人和专业部门的作用,党必须拥有一个真正的权威性的中心来对他们进行协调和指导。一个正在准备战争的政党必须为战争而组织起来,它必须有明确的指挥结构以及决定和实施其战略和策略的明确程序。简言之,党必须用同一声音说话,以同一个意志行动。民主集中制是用来描述一整套组织规定(和禁令)的速记语,通过这一整套组织规定,才能巩固和保持党的团结统一。

根据官方的论述,民主集中制不同于官僚集中制。后者意味着一般地采用高压的方式,不讨论也不考虑特殊环境。前者则把最广泛最充分的讨论和咨询、一套广泛的选举系统作为理想起点,在这个选举体系中,广大党员选出他们的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选举出地区委员会,地区委员会进而选举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最终选举出党的常务委员会(后来变为政治局)。然而,当定期的咨询和争论过程在政策问题上形成了清晰的一般立场时,就由党的权威性机构或最高机构清楚地加以阐明,这时,争论和讨论就必须停止。没有任何个人或较低层

① CW, 31, 208.

② CW, 31, 210.

③ CW, 31, loc. cit.

的党组织能够反对或撤销最高权威层的指示，离经叛道就会遭到开除，在1921年俄共第十次会议上说得很清楚。诸如民主集中派(the democratic centralists)和工人反对派(the workers' opposition)这类团体持续有组织地反对列宁的政策，列宁被这种反对行为所激怒，他声称：“反对派应当结束了，应当收场了，我们已经受够了！”^①他声称：“我们这里不是辩论的俱乐部。”^②据列宁看来，党及其政权正面临着不断聚积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这场危机因其内部脆弱和外部孤立而恶化。它遭到其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的困扰，这些敌人试图从经济危机所产生的贫困中获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利用党内的每一次争吵或分裂的迹象来煽动分离以削弱党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决不允许存在派系之争——他们对于党的统一产生潜在的致命影响，因而也对党掌握政权产生潜在的致命影响。列宁在其“关于党的统一决议案初稿”中坚持说：“因此，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③这就是第一次把所谓的“派别禁令”引入到俄国党内，后来被扩展到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

187

俄国共产党接受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被扩展到共产主义国际(人们通常知道它的简称——共产国际)的所有政党。出于民主的宣传目的，尽管他们能够使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等等国家的共产党具有自己的风格，但是一开始就很清楚，他们仅仅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统一的整体——第三(或共产主义)国际的一部分。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都不是独立自主的机构，相反，他们都是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的下属机构，而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反过来选举其全权执行委员会。就像在俄国党内一样，共产国际内也是如此，所有政策的实际决策权力和控制，主要人员的分配和财政的分配都被赋予了中

① CW, 32, 200.

② CW, 32, 252.

③ CW, 32, 244.

央执行机构。为保证这种控制不会被地方或国家的因素所削弱,或不会被强大“国家的”人物的偏好所削弱,共产主义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把自己任命的代表派往所有那些有着重要影响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国家。共产国际的代表负责确保共产国际的政策指导得到坚定不移地坚持。他们直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其负责的各方面的工作,个人的活动和党的各项活动。他们是“总方针”的守卫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他们的直接影响(不仅仅是他们的金钱控制),世界新兴的共产主义政党(尤其是在欧洲)在20世纪20年代初都被成功地“布尔什维克化”了。

无产阶级阶级特性的丧失与党的专政

1921年,对内部和外部的批判与争论采取一种研究和严厉的态度开始成为列宁主义的典型特征。作为一种思潮,它最终与欧洲左翼的民主传统相决裂,列宁主义与欧洲左翼一直处于不协调状态。它极其蔑视所有那些仍然幻想工人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现存民主、议会和法律机构而获得解放的领导人。它轻蔑地驳斥那些人,他们认为新闻自由和其他政治派别的自由可以为重建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服务——列宁对此回应说:这无异于要求党自杀^①。非常清楚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漫长时期内,党不能允许进行政治竞争。国家应当是一党制国家。列宁过去曾觉得有必要求助于政权所面临的极端危机来证明“暂时”限制民主的合法性。到了1921年,他已经放弃了这种辩解和防御的姿态:他对共产主义者的真诚和坚定不移感到自豪。他们正在进行阶级的专政:只有党能够担当此任,因为只有它拥有必要的决心、统一意志和久经考验的领导者。相比而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

^① CW, 32, 505.

整体,结果在自己革命中所遭受的痛苦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的都要多,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上的利益,他们遭受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贫困和匮乏”^①。他们在内战的战场上牺牲自己,他们被饥饿、寒冷和传染病从城市据点中驱赶了出来,他们死于伤寒和霍乱。结果,他们变得士气低落,成为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各种口号的牺牲品。列宁不断地坚称,无产阶级还是分散,被人鄙弃和被人收买的:

无产阶级还都是那样分散,那样被人鄙弃,在某些地方还受人收买……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不以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②

无产阶级已经丧失了阶级特性^③。它倒在血泊之中并且一蹶不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吸引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意识的党才能够掌握权力:

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能够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④

列宁此时坚持,一切社会主义革命都必须经过一个残酷的专政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党必须要利用国家的全部压迫力量来镇压其内部的敌人——甚至是在工人阶级内部的敌人。它决不能容忍任何政治反对派,并且应该坦率地宣布,在极其危险的斗争中不得不牺牲民主,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消极的压迫性的一面——利用国家力量镇压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无产阶级专政也展示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建经济的任务。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必须要动员一

① CW, 32, 488-9.

② CW, 32, 21.

③ CW, 32, 199.

④ CW, 32, 246.

切力量。那是个长期目标,党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并改革自身。它决定着政权的未来以及社会主义本身的未来。

有很多相互联结的方面来说明经济的调整势在必行。历史地看,它起因于共产主义者的这种认识,即革命的经济成本直接与革命的激进程度成正比。革命越深入越激烈,它给社会经济结构带来的成本就越巨大越严重,正如布哈林巧妙地指出,“共产主义革命代价大小的程度是由共产主义革命的深度所决定的……革命所有的实际成本都基于再生产过程的缩减即生产力下降的基础上。”^①列宁现在认识到1917年的口号实际上导致了混乱和崩溃,尽管原先设想它可以调动群众的力量去修复经济上的缺陷。工人控制工厂的运动破坏了工作场所的权威模式,并让工人对“资本主义”技术专家或管理者产生强烈的怀疑。190 旧的生产关系被破坏了,却没有新的责任和纪律体系来取而代之。结果是生产力的灾难性下降,消费品匮乏,随之农民不愿出卖其产品。到1921年,形势变得极为严重,工业生产全面停顿,饥荒、挨饿在全国蔓延。经济是人民和城镇生存的条件,它不得不再次运转起来。只有党才能领导经济的这种恢复,但是它也缺乏经验和专门知识。从这时起直到1923年的最后著作中,列宁反复地严厉批评了共产主义者在管理经济上的无能。党内充满了无用的理论家、论文和决议的编撰者(spinner)、一些无畏的、自我牺牲的和大胆之人,但这些无畏的、自我牺牲的和大胆之人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继续保持耐心的、不辞辛苦的秉性来从事管理、检查、节约资源,成为鼓励人心的生产示范单位。在革命猛烈进攻时期,这些人是模范,而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多余之人。更糟糕的是,他们由于不能学会新方法而开始变得有害无益。当恢复城镇和乡村之间的生产和交换成了当前的任务时,他们仍继续进行争吵和理论上的辩论。他们甚至拒绝承认自己的愚昧无能,且轻蔑地对待唯一可以指导他们的人——资产阶级专家、管理人和商人,“应该承

^① N. Bukharin, *Economics*, pp. 106-7.

认,也不怕承认,百分之九十九的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派去干的并不是他们现在就胜任的工作,他们不会干自己那一行,现在应当学习。”^①

1921年,列宁已经发出了标志着党随后历史特征的转折信号——未来党的作用在本质上是经济的、管理的而不是政治性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党的当务之急是经济。党的所有其他目标都要服从于这个目标。只有通过大规模重建工业这个“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②,党才能重新创造出城市产业工人阶级——党自身的社会基础。到那时之前,党只能是飘浮于空中而得不到社会的支持。这就是布哈林何以提出“原始积累时期的‘本质’是生产无产阶级”^③。现在有人向我们提出了有点奇怪的观点,认为党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运用国家权力根据地域、比例和确保党自身生存的必要意向来再造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力量,党的首要任务是重新产生已消失了的无产阶级。国家要重构经济基础以达到保障其自身权力得以持续和再生的目标,这正是帝国主义国家曾经做过的。由于缺乏广泛的可依赖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正如布哈林在1916年所指出的那样^④)突然发现这个主意,利用国家经济的、财政的和强制的力量来保证他们自身的经济生存和镇压所有的政治对手。

191

1920,正是布哈林又一次援引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模式作为唯一有效的组织结构既用来保证共产主义者(在俄国是极小一部分人)的政权,也用来确保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对生产关系积极的有意识的干预,拯救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方法将是这种积极组织过程的继续。”^⑤

① CW, 32, 309.

② CW, 32, 492.

③ N. Bukharin, *Economics*, pp. 110 - 11.

④ N. Bukharin, 'K teorii ...'. 列宁最拒绝布哈林关于有必要摧毁无所不包的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但是到1916年底,他已经把它作为其战略的基石而明确地加以接受。

⑤ N. Bukharin, *Economics*, p. 69.

布哈林在其《过渡时期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 (该书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党在其中作用的整个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继续阐述他的含义:

现在我们必须提出无产阶级机构组织体系的一般原则的问题……清楚的是,工人阶级在形式上所需要的那个方法,与国家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方法是相同的。这种组织方法存在于无产阶级的一切组织与一个包罗万象的组织,即与工人阶级的国家组织,与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的协调。工会“国家化”以及无产阶级的一切群众组织实际上的国家化,都根源于转型过程本身的内在逻辑。劳动机构的最小单位必须转变为一般组织过程的工具,这个一般组织过程受工人阶级集体智慧的系统指导和领导,工人阶级国家机构这个最高的和最包罗万象的组织是工人阶级集体智慧的物质体现。这样,国家资本主义体系辩证地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为工人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形式。^①

192 在1921年的危机中,列宁已经开始接受了一种完全类似的想法,把党国的作用作为一种纯粹的工具力量,少数掌握政权的人可以借此确保其政权的延续性。其他一切重要的机构、团体和制度都要明确服从于这个目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自主地存在。

1920—1921年,列宁提出要全面地重新审视俄国的社会主义方案,这不仅是对俄国的,也是针对欧洲所有新兴的共产党。由党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了公社或苏维埃式的民主这种最初说法。在整个社会内部,政治和民主被有效地禁止了。甚至在党内,最能激怒列宁的也是那些不合时宜地持续辩论和理论争论。正如一些人所暗示的那样,列宁不但不鼓励,反而不断地要求这种辩论和争论必须停止,“今后

^① Ibid., p. 79.

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①当列宁对施略普尼柯夫说,对他的批评最恰当的回答是枪时^②,他甚至对党内的反对派都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此时,党已经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列宁认为工会只不过充当着“传输带”和“嵌齿轮”的作用。借此把党和国家的政策传给群众。党不受束缚的权力的最后一个潜在障碍被清除了。工会(与其他一切社会组织一样)不得不接受党有权把自己的候选人安排到关键岗位,并不得不使工业管理只对国家负责,而不是向全体工人负责,“既然我们,党中央和全党,还要进行行政管理,就是说,还要管理国家,我们就决不会放弃而且也不能放弃‘整刷’,即放弃撤职、调职、委派、开除等等办法。”^③更重要的是,列宁一直坚持党有必要进行自我改革和再教育以适应领导国家和管理经济的全新挑战。

列宁现在赞扬党员所具有的那些优点和价值几乎与革命早期所称赞的共产主义者的那些优点和价值完全相反。现在党不再需要领袖气质,冲动的演说家。它需要的是勤奋的、周到的和果断的管理者,能够坚持做枯燥乏味的产品零售宣传工作并遵守详尽的工作计划安排,就像斯大林这样的人。这不只是斯大林被加速提升为党的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重要负责人的一年,而且更为重要的,这是精英统治的新风气得以确立,其才能和目标得到明确规定的一年。所有这些都直接进入到斯大林主义的创建中。进一步说,这是列宁主义计划的完成,即利用国家来重新恢复工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这也是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如此无情加以追求的东西。

193

① CW, 31, 514. 列宁希望的是“最幸福的时代,到那个时代政治将愈来愈少,谈论政治会比较少,而且不会那样长篇大论,讲话更多的将是工程师和农艺师”(pp. 513-14)。

② CW, 32, 206.

③ CW, 32, 99.

神话,党和权力

在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一周之内,斯大林就妄称自己有定义“列宁主义”这个新术语的责任,要对“列宁主义”这个生造词负主要责任的正是斯大林。在他新撰写的悼文的前两条中,斯大林呼吁把党及其统一作为列宁主义遗产最神圣的要素,这一点也不意外:

列宁同志与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①

列宁主义政党的神话特质毫无疑问是皈依者的一种准宗教安慰的源泉,也是党外人士产生敬畏的源泉。它在诗歌散文中得到赞美,它出现在典礼和戏院之中,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营造出某种至高无上的组织氛围,这种组织要比仅仅是其各部分之和大得多。对其伟大事业的忠诚和顺从会使卑贱的个人有机会在崇高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作用。党,唯有党能权威地解释辩证法、阶级意志及历史规律。它定义总路线,并且任何反对集体智慧的个人都是不正确的。它不仅要求其成员在政治上忠诚,而且要求他们行为规范,随时召唤,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牺牲个人的抱负、友谊,甚至是他们的荣誉和生命。这就是对党愚忠(*partiinost*)或党性观念(*party-mindedness*)的含义——把党放在第一位,放在一切人或个人意向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党愚忠,在实践

^① J. V. Stalin, *Works* 13 vols (Moscow, 1953) vol. 6, pp. 47-8.

中即在日常生活中就表现为拒绝资产阶级哲学和文化中追求自我的个人主义。党是全体价值、合作价值的表达,其中的个人正如他或她所承诺的那样充当着服从的角色,努力维护集体意志。代代相传,党的神圣性和坚定接受党的政策命令成了真正的列宁主义者的独特标志。很多人自愿接受党的纪律和限制,把它作为人类自私自利犯罪本性的必要消毒剂。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审判活动最生动地揭示了这种情形的可怕悖论,在这个大审判活动中,斯大林轻而易举地就能从毕生是共产主义军事家和杰出领导人那里获得有关他们在党内进行破坏和犯罪活动的可怕供述,他们非常清楚,这些供述会使他们被处于死刑。

越是把党美化为全知、全能、全善,个人就越是会觉得他或她自身的有限和渺小。党所履行的职能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上帝和教会早期活动所履行的职能是一样的。党和党的总书记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品质,而一般的普通党员则相应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他们摆脱脆弱的唯一出路是认识到任何一个完善自我的细小措施完全与历史和整个人类的目标密切联系着的,这个目标通过党来加以表达和实现。

对党崇拜和神圣化作为列宁主义的核心要素是由斯大林提出的,他在十年中通过大规模清洗几乎清除和杀害了所有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党的领导人斯大林用反复无常和粗野的方式对待所有或真实或是想象的反对者。这个问题极其鲜明地提了出来,虽然列宁在其晚年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但却无力解决。在共产主义政权的整个历史中,这却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法解决的问题。隐晦地说,它就是古老的**监护人又由谁来监护**(*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的问题——谁来防范守卫?我们应更清晰地重新表述为:谁或用什么来限制共产党?其领袖应对谁或对什么负责?如果党不会被定期通过民主程序来追究责任,也不要面对政党竞争的挑战或大众媒介的批判性监督,它如何能防止自身堕落,谁或用什么来防止腐败、裙带关系或冗余。

在列宁的最后岁月,他一直被这些问题所困扰。在他周围他看到

并且严厉斥责的是大量党员和国家官员的不称职、霸道和官僚习气。列宁所开出的解药是无效的，后代人在用这副解药来处理相同的制度问题时，同样也没有取得成功。首先，列宁建议彻底清洗野心家、谋位者和投机者。党应该清洗自身——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人们相信威胁开除出党会很好地把党员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他们履行的职责上来。第二，党要通过建立一个由具有奉献精神和忠诚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组成的审查委员会使党本身及其国家管理纯洁化。^① 这将会建立一种有限的或代理的外部责任制。第三，党应通过建立由党的监督委员会(Par-ty Control Commission)实施的坚定而严厉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来防止权力滥用。这里，党将建立一种严格的自我管理方式。逐渐地，列宁寄希望于这些程序和机构能保证党及其成员的纯洁和正直。然而，他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在他自己掌权时，这些似乎具有自动防故障装置的机制每个都被误用到这样的程度，在其实际运行中，它们都使原打算要治愈的痼疾恶化了，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被斯大林实际控制了。到了1922年和1923年，列宁已经不得不去思考这难以想象的事情：要是肆无忌惮和残暴之人成功地攫取了这些机构并操控它们来掩盖或纵容自己滥用权力又怎样呢？这个问题并不是一种空谈，相反，它威胁到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列宁未能使党警惕这种危险所具有的潜在的灾难性后果，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应对此负责。

列宁给继任者留下的党已经是一个庞大而僵化的组织并且逐渐地官僚化了。它已经禁止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一切反对派，它渗入国家的每个部门，控制了所有它准备允许其继续存在的那些社会组织。它不对任何人负责，国家和其他机构的竞选已经中止了很长时间。所有重要的职位都采用任命的方式而不是选举的方式。党正是在自己的成功统治中为自己变质创造了基础。他们通过党的核心组织(书记处和

^① CW, 33, 496.

组织局)所掌控和执行的权力把他们的候选人安置到其党、国家和社团所有下属机构中去,从而确保他们自己权力的永久性。

民主集中制——当代共产主义自吹能够使其摆脱西方社会主义的那种腐化和优柔寡断的组织形式,在实践中原来是共产主义政党及其领导的政体堕落的首要因素。较低一级的党组织选举产生上级党组织,接着上级党组织再选举出更高级别的党组织,如此这般直到选举出党的最高机构政治局和总书记,这个过程显然一种垂直结构的间接选举。它是以一种观点为前提,即党内成员的水平层次明显不同,这意味着党的成员间在责任、经验、可靠性和理论认识上的层次变化。这里暗含的理由是:只有同等级的团体才适合对其对应领导人品质做出判断。因此,只有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才有资格投票选举政治局成员,再由政治局成员选出总书记。普通党员在这些重要的审议中都不起任何作用——他们选举其地方党的机构成员与国家所有层面的领导人选举过程相隔了四五个层级。对间接选举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先决条件是如此根深蒂固地情有独钟,直到最后戈尔巴乔夫彻底地拒绝遵从其先贤,转而寻求其作为苏联总统的民众直接授权,民众直接授权的观念对于党的合法标准来说,自始至终都是异质的和危险的,甚至最具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对这种对民意仅仅进行“数学的”计算也都抱有一些反感。它冒犯了党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结果党被民意以惊人的速度遗忘在一边。

第八章 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阐述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讲述的是一种共同人性的人类意识不断地增长。宗教和帝国人为地使人与人处于敌对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乐观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最后时刻才最终使人们摆脱了宗教和帝国的束缚,然后,他们会意识到他们自己面临着共同的事业即提高一切人的道德和物质生活。自从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以来,这种团结一致就一直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它表现为极度向往一个没有陌生人的世界,在那里“人人皆兄弟”。这也是乌托邦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传统来说,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新文明对于打破地方的、区域的、民族的和宗教分化的障碍的这种趋势都起了促进作用。每一个时代都对普遍的类意识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时是无意识地起了促进作用,经常是事与愿违地起了促进作用,而这种类意识是共产主义最终实现的目标。

197

在1844年巴黎手稿(Paris Manuscripts of 1844)中,马克思阐释了这个具有普遍性和直接性的主题,虽然该手稿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不为其追随者所知,但这个主题仍然是他的整体思想体系的核心。马克思坚持认为,只有当人突破自身、家庭和地域的狭隘界限,并开始意识到他与人类的统一时——当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把类当作自己的对象”

并且“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看待”^①时,人才是自由的。根据这种解释,整个历史只不过是为一个时代的到来做准备,在这个时代里,把人分隔开来的一切疏远,把人与人对立起来的一切身份标志都将消失。共产主义被设想为是人的史前时期的终结,正是到了共产主义,使人类分裂的最后一个伟大的对抗——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抗——也最终被消灭。那时人类才能进入一种真正的人的存在。人们都将意识到,其他人潜能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是自己发展的条件。人类将会摆脱作为古代社会的特征的那种分裂和对抗,最终过着一种类的生活: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②

列宁主义继承了马克思的基本问题是,只有经历了社会的分裂达到真正内战的程度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才能可能实现完整的人或人的类存在的目标。这只有在经历了现代社会两大阶级最严重的对抗之后才会到来。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消灭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才有可能作为一个为体现人类普遍斗争的阶级而出现。在这期间,分裂和对抗仍然是无产阶级的策略。

列宁关于区分剥削民族和被剥削民族的全球分析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阶级和民族的界限现在变得模糊起来,全人类普适性事业(universalist project)的成功开始被等于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失败。在把全民的事业与逐渐成为反帝国主义战争(与全人类战争同义)最重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民族集团(national group)联系起来方

^① K. Marx, *Economics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Moscow, 1961), p. 74.

^② *Ibid.*, p. 102.

面,这仅仅是迈出了一小步。通过这种省略的过程,开始把全人类的普遍斗争与普遍的阶级联系起来——无产阶级的在与帝国主义的作战中,最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当然是在俄国共产党指导下俄国工人阶级。

作为世界历史性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

新兴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很大部分在于,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驱使它去打破贵族、地方自治以及行业公会特权的复杂网络;英国王室的直辖领地、公爵领地以及小公国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的关税壁垒和法律,从而为思想的交流、商品的交换以及人民的交往设置许多障碍。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迫切要求至少要是国内范围的市场,但是在贸易和生产的庸俗口号下,它当然无法获得必要的群众支持以取得胜利。在同封建主义和狭隘的地方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为其事业披上富丽堂皇的色彩。资产阶级宣称在法律条件下所有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平等的,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它为结社自由和旅行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而战。它打破了商业和思想蒙昧的障碍,并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创造了更广泛的基础。总之,市场要求把人们吸引到更加广泛的交换模式,因此也被吸引到较大的共同体之中。

199

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相矛盾之处部分地在于,资本主义发展得越是成熟,就越会发现自己既受到了起初的空间维度的束缚和限制,又受到自主选择的公民和政治观念的限制和束缚。资本主义产出的规模和数量迅速地超过了民族国家所能容纳的有限容量。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体太小,已经被证明不能承受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它日益需要一个国际性的、全球性的市场。为了生存,资本主义不得不变成扩张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和侵略主义者。在资本主义成熟的晚期,它不得不扩张自己的经济领土,并且只有通过征服其他国家才能扩张自己的经济领

土。很明显,资本主义在其金融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早就冲破了它的国家外壳。民族国家与生产产出的总量已经不相适应了。

200 对外征服与对内镇压和迅速调整自由、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理念相辅相成,这些理念是资本主义初期和成熟的资本主义早期的特征。“白种人的义务”和“天定命运”型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是颓废的、寄生的和压迫性的民族主义,它只有通过否决其附庸的和依赖性的国家组织的所有民族自治权才能够生存下来。在列宁看来,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主义对国内和国外的自由、民主和平等都加以否定,“帝国主义无论在对外或对内政策中,都同样力求破坏民主,实行反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帝国主义无疑地就是对一般民主即一切民主的‘否定’,而绝不是对种种民主要求中的一个要求即民族自决的‘否定’。”^①

正是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期间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和性质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才导致了资本主义发生这种变质。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导致大量剩余商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猛增长。资本主义商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都是其他生产制度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马克思认为,这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重炮,资本主义它用摧毁了一切万里长城^②,并且在数十年间使一千年来一直保持不变的文明处于从属地位: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必须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③

根据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惊人地加速了人类的聚集过程。东方复杂的和迄今为止永恒的古代帝国,非洲和澳大利亚的猎人和采集部

① CW, 23, 43.

② MESW, 1, 38.

③ MESW, 1, 37.

落,德国漂亮的领地,甚至俄国蒙昧主义专制统治都处于它的影响之下。资本主义开通了铁路、开凿了运河、建造了大量轮船,并且通过电报建立了一个快速的通讯网络,从而大大地缩小了世界的物理空间。整个世界突然地进入全球性的交换和通讯模式,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全球性的交换和交流模式。整个世界中所有重要的地方都受到了国际贸易(和与之相伴的文化)的渗透。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世界历史性的生产方式,不仅第一次使自身普遍化,而且第一次毫无例外地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纳入到共同的交往模式之中。在列宁看来,全球资本主义是全球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条件:

还有消除民族隔阂、消灭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等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趋势,这种趋势每过10年就显得更加强大,并且是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①

201

在马克思看来,由民族主义向世界主义的转变正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逐渐完成的。资本主义不仅创立了普遍的商品交换,而且也创立了普遍的思想交流,“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广大民众——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在所有国家实际上都被排除在他们民族文化的领域之外。他们既没有充分地接受教育来领会其文化的特殊意义,而且他们也没有闲暇和金钱去享受文化成果。马克思似乎认为,他们的文化是劳动的文化,是那种越过民族的界限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③

然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全体体系,它的普遍潜能必定会被其内在动力及其财富和权力分配所牵制。资本主义并没有结束人与人之间的

^① CW, 20, 28.

^② MESW, 1, 38.

^③ MESW, 1, 51.

分裂和对抗的状态,它只是使自己的统治和依附关系普遍化。现代世界见证的并不是前资本主义世界的那种无数地域的和具体的划分,而是人类历史中最后一次伟大划分的出现和加剧的对抗——这些受资本剥削的人与那些占有和利用资本的人的对立。取代了那些古代复杂的身份象征——工艺、等级、部落、地区、国家、帝国、宗教和性别,整个社会已经处于一种根本冲突之中——那些被迫出卖他们劳动力的人与那些雇佣他们的人之间的利益对抗。在马克思看来,在人类走向真正的人的复苏的道路上,这是最后一个巨大障碍。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划分已经普遍化,它极大地简化和明晰了历史从各种各样的特殊形式上升到全球性的普遍形式的过程。历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与过去一切时代相比是以惊人的速度)将会迅速地揭露这最后一次伟大对抗的实质。世界上的被剥削者将会很快结成共同的组织机构,提出一种共同的信念,即只有终结生产方式上私人所有制的影响,才能最终消灭剥削和进入到一个真正人的、普遍存在的最后阶段。

民族自决潜在的进步性

列宁关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与他提出金融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理论是一致的。到那时为止,列宁同欧洲很多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一样,都坚定地遵守社会主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主张每个民族都有神圣的自决权。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完全消除诸如奥匈帝国这种大国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束缚是一种倒退。他们认为,重要的是在保存庞大经济体优越性的同时,允许成员国有一定重要程度的文化自治。其他一些人,尤其是欧洲东部边缘地区的一些人都强烈地认为,考虑到正在加速走向贸易国际化以及作为金融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特征的资本的大规模输出,回到民族主义政治学不仅是过时的,而且是反动的。像罗莎·卢森堡这

样的思想家满怀热情地认为,民族主义在双重意义上都是反动的。第一,民族主义迎合和助长了分裂情绪以及政治和经济实体的小型化,而现代生产力则需要一个国际市场和全球市场。因此,从经济上来说,民族主义的诱惑是一种倒退。第二,那些最适合推动民族分裂主义的人是资产阶级,甚至是与“民族”的教会结盟的反动贵族。她总结道,民族的牌玩起来非常危险。民族主义破坏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军事团结,并且会把国家归属而不是阶级归属作为最主要的身份象征。

布哈林提出了同样有力的论据,在1914—1917年期间,他在很多方面都要领先于列宁本人的思想发展。布哈林是第一个完整提出金融资本理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他在金融资本理论中得出结论说,作为自给自足经济体的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永远地结束了。因此,民族主义已成为过去——从根本上来说,它与生产、贸易和信贷不可避免的国际化的国际相脱节,生产、贸易和信贷的国际化是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历史只给了腐朽的国际金融资本主义指明了一条道路即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不是立即将世界分解为许多特殊的民族国家——这是反动的,而非进步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之前、革命之中以及革命之后都应该尽全力为一个欧洲合众国的愿望游说拉票,这个欧洲合众国将会为一个世界合众国。

203

这些都是强有力的论据。这些论据似乎不仅符合现代世界的趋势,而且也明显与马克思的普遍主义形而上学相一致。在列宁看来,这些论据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它们将一种趋势说成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事实。列宁毫不怀疑现代世界中存在着重要的甚至是占支配性的力量,这些力量日益使民族主义成为多余。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民族自决已经过时了。那就会犯了把可能当作现实的错误。虽然布哈林和卢森堡所看到的那种趋势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具体的现实方面,它的影响则差强人意。它对于特定国家不同产业的影响不同,并且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则更加多样化。有些工业已经被置于银行和金融资本的垄断控制之下,而其他的则没有。有些国家实际上已经被资本输出的帝

国主义国家所并吞或者直接控制,而其他国家则是刚刚开始遭到金融资本的渗透。在有些国家,由垄断所导致的竞争消亡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身的生命已经超过了它的进步潜能,而其他国家则刚刚开始进入资本积累的早期阶段。

因此,具体地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极其多样化的画面。这就是列宁所谓的重要概念“资本主义发展有不平衡性”。根据列宁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世界上的确有些地方的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衰退,因此,那里的民族主义也已经过时。同样,世界上也有一些地方的资本主义相对于更古老的生产和分配方式而言才刚刚开始获得优势地位。在这里,民族主义是眼前的事件。最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才刚刚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关系远没有处于主导地位。在这里,民族主义是将来的事情。

根据列宁主义的分析,存在着三类不同的国家,在这些不同的国家中民族问题(或民族自决权)的进步意义也显著不同。由于列宁的分析对于现代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因此在这里有必要详尽地加以引用。列宁认为,应当把国家分为三大类:

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运动在这里早已结束。这些“大”民族每一个都在压迫殖民地的和本国的其他民族……

第二,欧洲东部:奥地利、巴尔干,特别是俄国。在这里,20世纪使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特别发展起来,使民族战争特别尖锐起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民族自决权,它无论在完成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方面或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

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以及所有殖民地,这些地方的人口共达10亿。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的刚刚开始,有的远未完成。社会党人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

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分子。^①

因此,民族自决是进步的或是退步的,取决于必须加以考虑的特定事例的具体情形。有一件事情列宁很清楚:不能先验地或一成不变地认为在当代世界民族自决客观上已成为反动的了。

列宁也清楚,决不能得出促进民族解放在战略上和策略上都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相反,扼杀那些从来没有享有自主权的国家的热情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任何好处。从战略上讲,迄今为止最好是允许他们亲身体验政治上的独立所带来的虚幻利益,并且让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自愿重新加入一个更广泛的经济体将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在列宁看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潜力不仅是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崩溃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也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获得全球性胜利的关键因素。列宁认为,迄今为止单纯依据领导集团的阶级属性来划分和评价这些运动的做法过分简单化了。他们必然要追求的政策类型更具有根本意义。

205

食利国、超额利润和工人贵族

在列宁看来,必须把民族问题放在一个世界背景之中加以研究,这个世界背景自马克思时代以来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剥削民族和被剥削民族的区分在世界政治中是新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仅仅提到剥削阶级。他不曾预想到自1900年以来就日益普遍的情形:即整个民族集团都参与对其他民族集团的剥削。尤其是英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食利国”。至少在世纪之交起,英国的主要输出品就不是制成品而是资本资源。英国资本主义的生存和繁荣并不是依赖于有用商品的生产 and 出口,而是靠过剩资本的输出,这些资本在国内市场上已经找不到有利可

^① CW, 22, 150-1.

图的场所。英国通过殖民政策,已经为资本的输出生创造了一些受保护市场,英国可以确保它们获得最佳回报。一大批富裕的食利者阶层出现了,他们以对外投资中所获得的贡金生活。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以“剪息票(clipping coupons)”^①为生。然而,并不仅仅是食利者资本家和金融资本贵族从殖民剥削中获利。列宁的这个论点具有创新性:即所有的阶级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到这项活动之中。超级富豪的身边有一群家用奴隶——男管家、男仆、司机、园丁、主妇、女仆——依次一味恭顺地排列着。腐朽的程度依然在不断加深。这并不是有一部分拥有债券的工人的收入成指数增长,他们几乎封建式地依附于他们的主子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工业无产阶级(或者至少是他们中的一些重要阶层)也被卷入到殖民剥削的复杂网络之中这样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殖民剥削为帝国主义权力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它为商品和资本的输出生创造了封闭的和受保护的市场,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它们的收益率——必要时行使国家的强制力量。对原材料和当地的劳动力的独家占有同样得到了加强。由于殖民地当地的劳动力期望值比较低,而且由于还没有实行在“自己的”国家中盛行的那种对于过分剥削的文化制约,因此当地的劳动力受到了更加残忍的剥削。由于这些原因,投资殖民地获得的回报率要高于宗主国市场的回报率。这就是列宁所谓的“超额利润”的来源,超额利润在保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能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超额利润,大城市的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马克思曾经预言的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当利润率下降时,资本家将又一次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会加大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他们将会延长工作时间,加快和加大工作过程的强度,或者将工资降低到最低工资之下。利润率不断下降是马克思阐述资本主义危机的核心。它最终将会导致“投资——生产——销售——利润——投资”的再生产循环无法维持下去。它进一步引起贫困、不满以及产业

① CW, 23, 106.

工人有组织的反抗,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制度将会被革命冲垮。因此,杜绝金融资本通过殖民剥削以获得超额利润是世界革命进程关键的战略目标。它将会从根本上破坏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并且恢复宗主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

在国际金融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为自身的系统问题找到了短期的解决方法。通过从殖民剥削中获取的超额利润,资本主义可以暂时确保国内经济内部的利润率不下降。而且,资本主义可以用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残羹冷炙来改善某些选定的工人集团的安全状况和生活标准。这些技术工人,即那些早已经受到工会强力保护的人,都可能被富人的残羹冷炙所收买。现在开始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现象:工人贵族的生活标准、安全、期望值和社会道德观念变得与中产阶级下层更加难以区分。他们从殖民剥削中获得的利益也许相对适中,但是他们客观上已经参与到一个民族国家对其他民族国家的系统剥削之中。

207

工人贵族的观念是列宁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其经济根源在于帝国主义政策。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与马克思的预言相反,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级变得更加资产阶级化而不是革命化;对于列宁1914年之后阐述社会民主党的渐进和改良主义的发展来说,它也处于核心地位。在列宁看来,工人贵族中的技术工人对于作为整体的阶级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他们被更好地组织起来、更加善于表达、更加自信和受过更好的教育,改良的“社会主义者”领导者们所说的话正是针对这种支持者的。这是他们天然的支持者,资产阶级思想通过他们渗透到无产阶级身上,侵蚀无产阶级的意识并使他们丧失意志:

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道,正是朝着靠剥削亚非两洲以建立帝国主义欧洲的方向而共同努力的;**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一部分,他们被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所收买,已变成

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①

因此,发达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不能够恢复他们的活力和革命任务,直到他们成功地使他们的国家不再参与殖民剥削。没有爱尔兰的自由,英国工人就不可能获得自由,马克思的这个结论预感到英国更加复杂和扩展的殖民剥削网络。列宁的结论更加清楚和直接,“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②宗主国工人阶级的败坏行为只有通过结束殖民主义才能得到纠正。

208

在列宁看来,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争夺经济势力范围的必然结果)最终教训了宗主国的工人:他们通过参与殖民剥削所得到的微薄回报需要他们付出自己鲜血的巨大代价来获得。他们是帝国主义的炮灰,在巨大的范围内遭受死亡和残废的危险。他们将会最终认识到他们所获得的救济金只不过是可怜的一点钱(widows' mites)。根据列宁主义的论述,在宗主国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那时是重拾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条件。把击败自己的国家作为小恶已经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的标志,使自己国家的殖民附庸国获得解放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的标志。殖民地的民族自决事业并不是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标志,而是革命过程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因此,金融资本主义的阿基里斯之踵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对帝国主义经济势力范围的一种否定。它拒绝接受他们的商品和资本,它拒绝他们独自无偿占有原材料以及容易利用的劳动力。要求经济和政治独立的每一次成功从而都会减少帝国主义可获得的超额利润量并加速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即使民族独立的要求没有获得成功,它对于全球斗争也具有重要贡献,因为它迫使帝国主义者派遣更多的武装力量,更多的海军支持力量,更多的警察、法官、狱卒以及公务人员,从而增加了管理的成本。管理的成本越大,它所获得的净

① CW, 23, 110.

② CW, 22, 149.

回报也就越低。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民族自决运动都削弱了帝国主义维持和再生产自身的能力。因此,殖民地的民族运动与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在与同一个敌人作战。反对帝国主义的事业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并且在列宁看来,这是世界革命前景的绝对核心,应该把二者紧密联系起来。

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来说(它们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愿望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必然对恢复控制本国资源和终结帝国主义的经济依附关系感兴趣。他们的原材料被大规模地攫取但从来不对原产地加以改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他们日益被迫专门种植的许多商品作物身上:棉布、烟草、茶叶和橡胶,这些商品作物的种植不是为了满足本地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本国的需求。他们自己的传统产业由于价格低廉的外国工业品的侵入而遭到摧毁,而且他们的劳动力在外国管理者的控制下沦落到奴隶的地位。无论是工人还是刚刚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对民族自决感兴趣。列宁直率地承认,这很可能是个例证,即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要力量的正是民族资产阶级。他同样相信,如果成功的话,民族资产阶级出于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必将操纵新的民族国家。这是可以预料的。然而,这与把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重要战略并不矛盾。

209

作为 20 世纪的一种意识形态,列宁主义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合为一体。它们是推翻国际金融资本主义同一个战争的两个方面。列宁鼓起勇气说,从长远的观点看,胜利终将属于世界上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被剥削者。列宁主义是第一个将不属于欧洲世界的民族国家看作是同一事业的共同参加者的意识形态。他们并不是那种被迫耐心地学习和适应西方比较“先进”和成熟的议会制度和自由主义模式的追随者或年轻的会员。他们并不总是只会响应他人的倡议和计划并且永远为他们自身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落后感到歉意。相反,列宁主义的世界革

命的纲领则认为：西方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已经变得衰败、寄生以及腐化。其价值观念和制度都变得堕落不堪，整个社会阶层都堕落为奴性和寄生性的状态。西方国家再生的动力很可能不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来自东方或来自殖民地。列宁主义给殖民地和经济上被统治的人民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保证。他们最终将会摆脱从属地位。他们不再用外国语言编写的剧本中的一个小配角，他们现在成为他们自己创作出来的“进步性”剧本中的主角。

210 社会主义者的全球革命战略是清楚的——通过(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运动,尤其是那些被自己国家统治的国家中的运动,揭露迎合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并揭示帝国主义战争殖民掠夺的真实本质,从而为最终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和国家的工人革命做好准备。

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

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最具独创性和最具有影响力的要素大概是对它的全球视角。由于资本主义已经扩展至国际范围,因此对革命前景的评估必须建立在全球力量对比的基础上而不能以具体国家为依据。在这种总体评估中,列宁主义关键点在于,它并没有在时间上和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看作是相互区别、相互分离的,相反,而是将它们看作是相互密切联系、相互支持的。社会主义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都是革命的动力。因此,这意味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必要等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力已经耗尽才开始努力追求独立。他们并不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注脚,相反地,他们很可能是清除帝国主义的全球性大爆发的发起人和催化剂。反帝国主义革命可能开始于殖民地,尽管未必会完成于殖民地。就其成功的方面来说,殖民地的斗争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中引起了经济和社会的危机,然后他们将会采取适当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这反过来又使前殖民政权的工人群众变

得更加激进。它们不仅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政权对于保持剥削和民族征服并不感兴趣,相反,它是为所有人的幸福而奋斗,前殖民地很快就会认识到人们自由和平等地结成更大的普遍联合体具有更大的优势。列宁清楚地指出,这就是现代世界的革命进程,它将实现马克思的真正人的普遍性的目标,这种真正人的普遍性目标将会永远结束阶级和国家的分裂。但最终的目标并不是大量民族国家的永恒存在,相反,它是要建立一个全体人民的广泛联盟。

在十月革命期间以及随后不久,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中心纲领是要确保所有受沙皇政权压迫的民族都获得独立。决不容忍民族问题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傲慢态度。东部的民族、南方外高加索人民以及更加发达的俄国西部边境的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必须公开地加以保证,这种民族自决权包括更有意义的分离权——建立他们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力。在1913年的《民族问题提纲》中,列宁是这样说的,“我们纲领,除了从政治自决,即从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力这个意义上来解释以外,我们决不能作别的解释。”^①

211

列宁毫不含糊地认为(大约可以从他反复强调的宣言中看出这一点),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集团都拥有绝对的民族自决权。他坚称,社会主义政权运用国家暴力镇压民族权力是没有问题的。他注意到,用棍棒无法把人们赶进天堂。^②然而那也就是说,要对民族自决权设定一些非常重要的条件。第一是宣传一种权利并不意味着支持这种权利的行使。列宁拿离婚权作比较。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任何文明婚姻中,使这种婚姻关系保持文明的条件是双方中的任意一方可以在适当的声明之后有权终止这种关系。然而,决不能由这种权利的存在推论出,离婚是双方“标准的”或典型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二种保留意见则带有更严重的影响。自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

① CW, 19, 243.

② CW, 20, 72.

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列宁一直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民族区分问题上必须是彻底的不可知论者。无产阶级政党承认其成员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和战斗者的地位,而不是把他们看作是特定种族或民族集团的成员。因此,列宁(与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一道)坚决抵制崩得派(the Bund)要求在一个联盟党内专门代表犹太工人的利益。党内并不存在联邦制的问题或“民族阶层”的问题。党的职责是要代表和清楚地表达所有雇佣工人的利益和共同奋斗目标。因此,当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要求不可避免地被表达出来时,党对他们自然表示同情,但党绝不可能在组织上分裂为单独的民族集团。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党的国际组织上的完整性。无论如何,党的责任是要时常强调狭隘民族主义的缺陷、始终指明使工人反对工人的危险以及总是强调在更大、更能容纳经济和政治单位的联合体的好处。党绝不应该忘记,它最终代表所有人类的共同事业:“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就是各民族通过高度统一而达到融合……”^①

列宁天真地相信,只有对被压迫少数民族的敏感问题采取一种宽容和同情的态度才可能实现更高的联合。当他们第一次体验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独立之后,正是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将使他们意识到加入更大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优越性。列宁坚持认为,那些关系必须是出于自愿的并且是自由地加入。任何强迫接受一种强制的语言或用暴力来阻止分离的企图都必须绝对地加以排除。列宁声称,这种行为直接有利于资产阶级分离主义者——排外的民族主义的支持者。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者是工人阶级综合民族情感的支持者,这种民族情感不仅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相矛盾,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它的一种表现。一个真正民主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承认各地区的自治权,特别是居民的民族成分复杂的地区和专区的自治权。这种自治同民主集中制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地,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地区的

^① CW, 20, 34.

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民主的集中制。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用母语的充分自由,摒弃任何一种语言的任何特权。一个民主国家不容许在公共事务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部门中,有任何一个民族压迫其他民族,即以多压少的现象。”^①

十月革命后,列宁很少有时间来详尽阐述民族问题。他论述这个主题的著作也是零零散散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不管怎样,它们都是在重复列宁1913—1914年间所提出的一般主题。当然,他坚持认为,应该直截了当地对沙皇帝国即“人间地狱”极大的不公平加以谴责和纠正。一切臣服的民族都有分离的权力。只要俄国共产党人继续镇压其臣服的民族,他们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拥护者。必须要消灭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取消强制的官方语言,必须改变俄国一直以来对旧帝国的“弱小”民族所采取的傲慢的或以强凌弱的态度。只有赋予他们以最大限度的自由,直至有分离的自由,只有对他们过去的暴行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做到感同身受;只有这样,这些弱小的民族集团才会逐步相信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会平等对待他们的善意。崭新的苏维埃国家不应该惧怕分离主义运动,因为它们只是对以往压迫的一种完全自然的反应。列宁乐观地认为,民族情感的这种自然之花会导致一些独立国家的生产,但是它持续的时间终将是短暂的。当旧沙皇帝国中迄今被压迫的民族开始认识到并且高度评价社会主义俄国兄弟般的宽容精神时,并且当现实的经济状况使他们认识到一个更大的联合体的益处时,那时他们将会满腔热情地参与到一个更大的联合体。

213

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复杂歧义与他在决定大多数其他问题的政策上的直率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毫无疑问赞同民族自决权,这种民族自决权实际上包括分离权;然而,他也完全反对那些落后的小国家不断增加。他认为规模庞大的不断增长的政治和经济体有益处,似乎又认为通过容忍和鼓励最广泛的民族自决可以促进这一进程。他坚决主张,

^① CW, 20, 224.

无产阶级从来不参与对其他国家劳动者的镇压，无产阶级的职责是支持人民的解放和独立。然而，与此同时，压迫国家和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必须坚决保持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高度统一。

按照列宁的思维方式，每一个现代民族^①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文化：

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且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笼统说的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

他继续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是“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抽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绝对是为了对抗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排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权主义。因此，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要求都对其他所有国家构成一种持久威胁。通过承认所有民族集团的地方自治、承认他们的语言与其他语言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承认他们可以自主管理“人民群众的一切文化和教育的需求”，当然也承认他们的分离权，这些反而确保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有了这种铁的保证（后来由于列宁接受把联邦制原则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组织基础而受到鼓舞），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和平地实现“所有民族和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更紧密结合”^③。但是联邦制本身只不过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④。

然而，在整个分析中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和无法解决的含糊不清之

① CW, 20, 32. 参见列宁写于1920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篇文章实际上重申了这个构想。CW, 31, 145.

② CW, 20, 25.

③ CW, 20, 282.

④ CW, 31, 146.

处。不言自明,无产阶级是代表全体人类的普遍利益和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唯一阶级。但是,共产党人必须“支持”所有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解放运动”^①,即使这些运动明显是由资产阶级(因而是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发挥领导作用。正如上面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在其他时候列宁坚持认为,任何民族文化中只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成分值得支持。不管怎样,致力于民族独立的事业只是一种暂时的策略,它不可能得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明确支持,这一点始终是明确的。民族独立一旦得以实现,就应该努力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势必把一切“民族的”运动都融入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更大的潮流之中。因此,民族独立只是走向国际联合的前奏,不可能把民族独立本身当作最终目标。出于这种原因,列宁主义强调共产党人在一般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要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

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该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②

在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争取解放的事业中,共产党人要同时削弱支持他们的社会基础,并把民族解放斗争转化为反对地主阶级和神父的社会斗争,并且有可能的话,要直接领导解放斗争。这种情形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有可能实现,正如列宁所承认的那样,“在这些国家里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③至少可以说,他们的任务是复杂的并且有可能充满矛盾。

215

① CW, 31, 149.

② CW, 31, 242.

③ CW, 31, 243.

一国范围内的国际主义

评论家们一致认为，列宁真正坚持这个观点并把它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即任何傲慢自大和沙文主义地对待以前在俄罗斯帝国统治下人民对于新生的苏维埃联盟都是一场灾难。然而，列宁身边的同志，尤其是作为民族委员会委员的约瑟夫·斯大林所持的远不是这种容忍和宽容的观点。

显然，无论是在理论倾向上还是在智力上，斯大林都无法领会列宁论述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关系的深刻性。也正因为如此，列宁本人在1913年曾经详细地指导斯大林写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①然而，十月革命后，作为民族委员会委员的斯大林又不断地变得简单化，他至少可以为自己在列宁的思想中找到一些论据。对他来说，清楚明白的是，正是俄国无产阶级成功地完成了革命并且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推动力。所有其他阶级和不发达民族集团一直犹豫不决、推诿搪塞或者实际上是反对无产阶级的倡议——因此他们是反革命的潜在源泉。当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经济的优点还不能使他们认识到接受无产阶级(俄国)的领导能够最好地保护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就需要对他们加以强力约束。在斯大林所理解的列宁主义看来，只有无产阶级表达了全人类普遍的奋斗目标，因此无产阶级在任何社会团体的奋斗目标表达上都拥有特权。在评估民族独立的要求时，必须把本地工人阶级愿望的表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从这里开始到宣称无产阶级意图的唯一表达者是共产党只有短短的一步(这与列宁主义的精神完全一致)。总之，民族独立运动是否具有进步性的最终裁决者是共产党。

216

^① J. V. Stalin, *Works*, vol. 2, pp. 300-81.

正是这种普遍的观点支配着随后苏联的民族政策,尽管列宁在其生命的最后政治斗争中坚决反对这个观点,但收效甚微。共产党著名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在臭名昭著的格鲁吉亚问题上与他保持一致,列宁遭到了孤立。斯大林野蛮地粉碎了格鲁吉亚人建立自己国家的企图,而列宁曾经发誓支持他们。由于体弱多病,列宁让托洛茨基作为自己的代表来揭露斯大林在这件事上的沙文主义和野蛮行为,并且解除斯大林的权力。但是,托洛茨基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他因自己的不作为而保护了斯大林并且也最终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与几乎所有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样,托洛茨基在对待旧帝国少数民族的民族愿望时也不赞同列宁较为温和的路线。在列宁的坚持下,苏维埃联盟的第一部宪法(与随后所有版本一样)含有一个明确赋予所有联邦共和国都有分离权的条款,但一开始就很清楚的是,与很多宪法权利一样,这种分离权的行使实际上受到了否定分离权条款的限制。

列宁去世后,他的追随者同时实行双重战略,结果是这种双重战略日益难以调和。苏联一贯的目标是使不同的民族和种族集团团结起来(*sblizheniye*),为了最终实现他们相互间(*sliyaniye*)的融合。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人认为分离主义者以及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是过时的,从根本上说是反动的。文化和语言的自治程度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有很大的变化,并且这种文化和语言的自治程度无论如何通常都要服从于苏联人民创造一个历史上崭新的共同体这个更大的目标。然而,在世界更大的范围内,它保留了苏联政策的基本要点,鼓励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所有民族解放运动,并明确地规定这些都是“进步的”运动。正是通过这些民族解放运动,列宁主义政党才在中国、南斯拉夫、越南以及古巴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然而,为这种运动提供经费和武装并对取得成功的共产党政权提供支持已成为苏联一笔巨大的经费开支,它最终促使苏联的解体。

成功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在被内战所摧毁、很大程度上是贫穷的国

家里,共产主义越是广泛传播,对苏联核心区域的经济要求也就越高,所面临的西方的威胁也就越大。撤回支持将是与列宁主义信仰的一种决裂并且被视为向帝国主义的投降,然而继续支持并保卫成果所付出的代价又将是昂贵的、毁灭性的。苏联力图向世界证明他们的计划经济比其他竞争性制度能带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这被证明是妨碍其努力的因素之一。在列宁主义正统和热衷于团结世界上被压迫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名义下,苏联人实际上被要求放弃了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标准的提高。社会主义的果实似乎在其他地方被抵押,对成果地分享却不断被推延。

与列宁主义的其他重要内容一样,民族问题解决前提也是革命至少要迅速地扩展到经济上先进和文化上发达的欧洲国家。列宁乐观地预言,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人参加无产阶级事业将会抵消俄国和东欧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地位。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终将会诞生,它不仅技术上先进、文化上宽容,并且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的广泛需求。加入这种规模巨大、宽容而繁荣的国际联盟所具有的益处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以至于较小的和欠发达的民族很快认识到加入其中的巨大优越性。他们尽情享受民族独立和分离好处的正常愿望很快被参加更大的国际联盟的热情所取代。毫无疑问,民族生活具体的文化形式将会持续发展一段时间,但是它们将不再与民族国家的那种充满危险并制造分裂的政治形式相一致。

218 结果很清楚,即使在列宁在世期间,苏联也有可能长时期被文化和科技都发达西方所孤立。在联盟自身(与理想化设计的联盟明显不同)的范围内,俄国人不仅是占有绝对优势的民族集团——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从事生产的、技术熟练的、整个无产阶级人数的绝大多数都是俄国人。俄国工人在文化和科技上的落后远没有通过西方工人参与国际事业得以弥补,被认为具有革命美德的人只能是俄国工人。按照列宁主义的逻辑,既然正是工人阶级并且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清楚地表达真正的国际主义,那么,在苏联规定崭新跨国联盟性质和目标的任

到俄国工人头上。对于所有其他民族集团来说,把社会主义国际视为俄国统治的一个微弱借口,视为是维持俄罗斯帝国永恒的计谋,这就是不足为奇的。

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每年相同的“发育不良”和孤立的革命使这种趋势不断增长,即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等同起来。如我们所见,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列宁本人将俄国革命的经验普遍化。在他去世之前,随着此后力量的不断增长,国际主义者被定义为那些毫无保留地并且无条件支持苏联政权政策的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逐步演变为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称之为的“苏维埃国家神圣的利己主义”。至此,起初作为一种普遍性变革使命是要为一种真正的人类存在创造全球条件,后来逐步陷入为孤立和落后国家的狭隘性作辩护的地步。

第九章 确定性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列宁在 1905 年革命失败之后才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俄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批判性反省过程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点，这部分是由当代欧洲思想的发展所推动，部分地是由诸如别尔嘉耶夫(Berdyayev)、布尔加科夫(Bulgakov)、弗兰克(Frank)、司徒卢威(Struve)和格尔申宗(Gershenzon)等这样一些著名思想家所领导的本土宗教哲学的复兴所推动。这个阶段是以 1903 年题为《唯心主义的问题》(*Problems of Idealism*)这部富有影响力的文集的出版为开端，随着著名文集《路标》(*Vekhi or 'Landmarks'*)的出版而在 1909 年达到高潮。后一本文集自始至终都在指责说俄国知识分子的整个社会主义传统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毫无用处的。撰稿人宣称，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和普列汉诺夫的战斗唯物主义迫使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赞同科学是人类的解放者和真理的客观标准。任何科学和任何有价值的实证经验都不能产生最微不足道的道德规范——他们认为，这种“科学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伦理上破产了。俄国知识分子另外一个伟大的战斗口号——为人民群众(或者是工人阶级)服务——同样是否定了知识分子在教育人民和提升素质中的作用。

219

《路标》认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一心关注的只是人民的物质需求而忽略了他们的文化和精神需要。弗兰克总结道：“总之，我们可以把

俄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定义为一群追求世俗上心满意足的没有信仰的好战僧侣。”^①他们对普通群众的神秘感毫不在意颂扬了平庸之辈，并把价值和目标降低到群氓的水平上。它也导致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地方自治主义，它“拒绝接受个人责任的这种观念”^②，即个人责任对于一种有意义的道德存在来说是极其必要的。在司徒卢威看来，现在到了该要放弃“不敬的、反政府的分裂活动”并恢复其应有的精神和教育作用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记得，正是这个人刚好在十一年前起草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起初，列宁很少关注 20 世纪早期席卷知识分子的思想大骚动。毕竟在列宁看来，对于经济上不稳定和社会见解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来说，暂时对外来或本土最新的思潮的热情是完全自然的。柏格森 (Bergson)、尼采 (Nietzsche)、弗洛伊德 (Freud)、詹姆士 (James)、阿芬那留斯 (Avenarius) 和马赫 (Mach) 都有着他们自己的思想家小圈子，当然，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 (Vladimir Solovyov) 及其追随者的作品中正统的灵修复兴最有影响。列宁起初对实证知识的思潮和对一切正统思想的挑战几乎——无动于衷。他认为没有必要偏离马克思主义笔直而精确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蔑视学究式地玩弄新奇的名词、古怪的术语、狡猾的‘主义’”^③，列宁自豪地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一致——并没有任何取悦当代哲学家的言辞。

1908 年——重新阐述正统观念，意识和物质

正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门徒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在哲学上的任性促使列宁拿起正统唯物主义的棍棒（在列宁手中它们就是棍棒）

① B. Shragin and A. Todd (eds), *Landmarks* (New York, 1972) p. 179.

② *Ibid.*, p. 143.

③ *CW*, 14, 147.

来击溃他们。甚至那时,正如列宁在1908年2月给高尔基(Maxim Gorky)的一封信中坦白承认的那样:

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修养不够,这使我不能公开发表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在认真阅读我们党的哲学家的著作……而**他们**迫使我完全倾向于**普列汉诺夫**……他的策略是极其庸俗劣的。但在哲学方面他捍卫的是正确的东西。我赞成唯物主义,反对“经验……”之类的东西。^①

列宁对波格丹诺夫在1904年和1906年间出版的三卷本《经验一元论》(*Empiriomonism*)的反应有点姗姗来迟。波格丹诺夫意图用恩斯特·马赫科学上与哲学上的研究成果来修正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波格丹诺夫看来,经验批判主义通过把人类假定为世界的创立者和组织者而最终解决了思维过程和自然客体的二元论。在这种观点看来,一切现实都与人类共同努力以确保人类物质存在的具体经验密切联系在一起。凡是有助于人类摆脱变幻莫测和不安全感的自然的东西,也有利于解放的事业,因而符合人类联合的目标。这在许多方面来使人联想起马克思早期的立场,在那里社会主义是等同于人道主义的。人们在加工自然界所提供的原材料的活动中,逐步了解人类自身以及物质本身的局限性。这是一种激进主义的和目标导向的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中,联合劳动的认知过程是极其重要的。在劳动中,人们将逐渐认识到他们自身,即在协作的生产劳动中他们技能的广泛性和限制,以及与他们劳动活动相结合的劳动对象的属性。^②

列宁尤其感到忧虑的正是波格丹诺夫关于物质和意识关系的解答。在他看来,波格丹诺夫太接近于唯心主义者“没有主体就不可能有客体”的主张。在波格丹诺夫的论述中,物质只不过是“由实际目的所

221

① CW, 34, 361.

② K.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Moscow, 1961)

支配的人类投射的结晶……它们是集体经验的组成部分”^①。列宁认为，波格丹诺夫已经作了太多的让步，他已经模糊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事物显然是先于并且独立于有意识的观察者而存在。在这一时期，精神和物质的区别以及它们不同派别的划分是列宁这一时期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波格丹诺夫的错误在于他兜售其老师马赫的混乱观点，即“物或物体是感觉的复合”。^② 列宁把这种错误观点总结如下：

1. 把一切存在的东西都说成是感觉。
2. 把感觉叫作要素。
3. 把要素分为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后者依赖于人的神经，一般说依赖于人的机体，而前者不依赖于它们。
4. 把物理要素的联系和心理要素的联系说成不是彼此单独地存在着的；它们是一起存在的。^③

222 列宁认为，波格丹诺夫所听信的正是这种含混不清（它起因于把精神和物质归结为“要素”从而来削弱二者区别的这种语义上的简单把戏）^④。波格丹诺夫在他的书中承认，他的确采纳了马赫“关于经验要素对‘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中立性的观念、关于这两种特性仅仅依赖于经验的联系”的观念”。因此，波格丹诺夫已经“抛弃唯物主义的观点，因而使自己不可避免地陷于混乱，走上唯心主义的歧途”^⑤。最糟糕的是，波格丹诺夫开始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客观真理的标准是没有的；真理是思想形式——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⑥

当然，列宁并不希望争论经验或实践是检验、纠正我们观念的唯一可靠方法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恩格斯一样，他也赞同在有论证之

① Kolakowski, vol. 2, p. 440.

② CW, 14, 41.

③ CW, 14, 54.

④ CW, 14, 145.

⑤ CW, 14, 58.

⑥ CW, 14, 123.

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对在布丁的检验在于吃。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或错误受到确实可靠的检验。”^①因此,经验揭示真理的作用不容置疑。存在争议的是列宁坚持认为(列宁接受的是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遗留下来的正统观点)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上存在着一种无法逾越的二元论,以及坚持认为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中,物质具有逻辑和历史的先在性。列宁不得不进一步为唯物主义的观点做辩护,即客观真理可以认识的——它的确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基本条件。

列宁感到确立这些显而易见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不困难。地质学和生物学的科学充分证明了这个事实,即世界先于现代人的发展而存在。“自然科学关于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前的论断是真理,对于这一点,自然科学不容许有丝毫的怀疑。”^②列宁认为,这既不是一个主观的命题,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命题,相反,它是客观地证明了的。几乎每天都有揭示自然界迄今尚未被认识的特性的最新科学“发现”,例如最近在煤焦油中发现了茜素。^③列宁认为,那种认为在这个发现之前煤焦油中不含茜素则是荒谬的。根据列宁和整个列宁主义的传统,只有假定物质第一性的基本观点才与实际的科学实践相一致。

223

科学家首先观察和研究他所关注的对象,通过他的感觉来反映它并且考察它的结构,他提出关于这个结构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本身作为一种精神的建构几乎是毫无价值的,除非他能够通过令人信服的实验来充分证明这个假设,即研究的对象的确与假设的真理相符合。如果假设被证明,这个假设就不再是科学家通过他的客体的观念来建构的,反而是他正确地理解了客体自身的内部结构。其他人可以重复这种证明实验并取得相同的结果。这里的指称对象始终是研究的物质客体而不是其他人所设想的观念。在列宁看来,唯物主义通过这种方式

① CW, 14, 109.

② CW, 14, 123.

③ CW, 14, 102.

“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①列宁断言,除了通过大脑对受到的视觉、触觉、听觉和味觉活动作出的反映过程,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认识世界。但是,正如列宁所注意到的那样,“感觉依赖于大脑、神经、视网膜等等,也就是说,依赖于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②在这种论述中,认识的过程是经得起唯物主义分析的检验。科学将会最终阐明复杂的化学、电子和物理的相互作用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大脑产生了感觉并随后对感觉进行加工。

在列宁看来,“唯物主义承认‘自在客体’或心外客体,认为观念和感觉是这些客体的复写或反映”^③;“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性的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④大脑为“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⑤的客体创造出一种“影像”、画面或者反映。总之,唯物主义理论是“思维反映对象的理论”^⑥。“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性的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⑦

224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列宁来说,唯物主义具体说明了外部客观世界的原貌。我们的观念差不多能够“反映”这个客观世界,并通过实践即通过对自然环境的客体进行人类占有或实验得到提高。在这一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人类将逐渐认识到“自然界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因果性和必然性”。^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自然规律“不依赖于

① CW, 14, 46.

② CW, 14, 55.

③ CW, 14, 27.

④ CW, 14, 130.

⑤ CW, 14, 84.

⑥ CW, 14, 100.

⑦ CW, 14, 130.

⑧ CW, 14, 155.

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作用”，一经我们认识了，我们就会成为“自然界的主人”。^①

列宁反对波格丹诺夫及其圈子中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坚持认为，客观真理甚至绝对真理是能够认识的。坦白地说，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添加了一些令人费解的条件。例如，我们知道，绝对真理是（按照恩格斯对物质的“辩证”分析）“由相对真理构成的”。^②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辩证法的视野的确是非常狭窄的，并且在认识发展（或建构）的过程中的作用不是太大——这一点很少提到，也没有展开。其主要作用是提醒我们认识总是不完整的并且可以说是相对的：

在认识论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③

总之，正如列宁准备承认的那样，就他们承认一切客观真理都具有历史条件性而“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④来说，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中也含有相对主义的成分。

进一步追随列宁涉猎认识论的内容或许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把列宁的研究视为一种试图客观地对当时兜售的各种各样认识论的优点和缺点加以提炼的话，那我们就忽略了核心问题。事情绝非如此。列宁的目的是要揭示所有哲学都具有片面性和党性。它要么是反动的（否认客观世界、客观真理、因果性和自然规律的可能性），要么是进步的并且承认它们的现实性。它要么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要么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它要么对不平等、不公正的现状表示赞同，要么设想一种未

① CW, 14, 190.

② CW, 14, 134.

③ CW, 14, 103.

④ CW, 14, 307.

来,在那里社会和自然都被重新组织起来以满足人类的需要。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列宁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在于证明“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没有中间道路”以及“哲学理论在阶级斗争中并不是中立的而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每一种哲学都服务于一定的阶级利益”^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看来,列宁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把哲学史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并且哲学没有独立性,哲学仅仅是“政治的继续,是对特定政治的一种沉思”^②。在这种论述中,哲学是用来划分路线和派别的。^③

列宁认为,对于严密的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偏离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④

列宁指出,这就注定了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的命运:他们一开始是怀疑客观外部现实的存在,并且最终欣然接受了一种人类的宗教^⑤;同样地,“波格丹诺夫对客观真理的否定是和信仰主义完全‘协调’的。”^⑥

如同在政治上一样,在哲学上最阴险最危险的敌人并不是公开的对手,而是中间道路派、调和主义者以及中立者。列宁最痛恨的正是经验批判主义支持者的这种“妄图主张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无党性”^⑦,我们的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公正地说道:“在一切党派之

① Kolakowski, vol. 2, p. 451.

② L.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London, 1971) p. 56.

③ Ibid., p. 56.

④ *CW*, 14, 326.

⑤ *CW*, 14, 344.

⑥ *CW*, 14, 125, cf. 341.

⑦ *CW*, 14, 318.

中,最可鄙的就是中间派别。”^①在列宁看来,马赫主义者就是“哲学上的可鄙的中间党派,它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把唯物主义派别和唯心主义派别混淆起来”^②。他们“就是给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路”^③,而他们的支持者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④。“经验批判主义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就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效劳,帮助他们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⑤。

1914——黑格尔、辩证法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列宁1908年对哲学的反思几乎完全是在重申经历了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传播过程的这种极其简明的唯物主义,尤其是恩格斯阐释的唯物主义。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多次重申所追求的唯物主义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实证的,而是辩证的。^⑥狄慈根,尤其是恩格斯^⑦被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人们认为“恩格斯能够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且了解黑格尔辩证法天才的真理内核。恩格斯是为了辩证唯物主义而摒弃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⑧。当时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加以探讨。列宁所有职业活动中的方法都是辩证的,而他那时的唯物主义绝对是死板的。毫不关心诸如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事物的内在联系这类复杂的问题。《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明显缺乏作为研究这些联系以及质变

226

① CW, 14, 339 - 40.

② CW, 14, 340.

③ CW, 14, 341.

④ CW, 14, 343.

⑤ CW, 14, 358.

⑥ 例如可参见 CW, 14, 261.

⑦ CW, 14, 120.

⑧ CW, 14, 310.

和量变的辩证法。直到1914年当战斗的完整的唯物主义面临着新的威胁时，列宁才认真地转向对黑格尔，以寻求真正辩证方法的指导。

列宁认为，黑格尔的伟大天才之处在于他揭示了观念的辩证法运动（列宁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都更深入地研究了黑格尔）。早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列宁就被黑格尔所吸引，此后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会随身携带黑格尔著作。^①引以为豪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自始至终都在使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激进化，而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第一次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个术语并且系统地加以阐释。^②列宁在使国际共产主义哲学真正扎根于俄国方面的确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③。这是因为辩证法对他们有关人身、自然、社会领域的自满的和预定的观念发起激烈挑战。总之，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哲学：

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④

227 无疑，正是辩证法思想的这种革命性如此强烈地吸引着列宁以及这种强制性的哲学立场的追随者。在本章的结尾我们将探讨辩证唯物主义在列宁整个思想结构中的作用，但是现在还是让我们来揭示引自马克思的上述引文的含义。

我们也许应该注意到，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研究的客体是一种“历

① N. K. Krupskaya, *O Lenine* (Moscow, 1971) p. 75.

② 参见第2章注释9。

③ K.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1938), p. xxx.

④ *Ibid.*, pp. xxx-xxxi.

史上发达的社会形式”。人类的经济、社会、政治和观念的生活都是辩证法起作用的领域。从研究希腊哲学发展的博士论文开始^①，马克思就明显认识到，作为一种论辩方式的辩证法的作用、尤其辩证法在考察不断变化的现象中的作用。进一步说，马克思要感谢黑格尔（马克思在准备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重读了黑格尔），因为黑格尔把各种敌对思想冲突的辩证过程阐述为历史哲学的中心主题。根据这种论述，每一个重要思想（正题）都有一个对立的（反题），它们之间的争论最终在一个新的合题的表述中得到解决，这个合题在更高层面上既保留正题的肯定或进步的因素，也保留了反题的肯定或者进步的因素。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这个新的合题起着旧正题的作用，它迟早将与一个新的反题相对立，最终将会从中产生一个更高层次的合题。在这里辩证法内在地表现为“思想的自我发展”^②。

马克思自我评价说，他对辩证法的独创性运用在于从各种对立思想得以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根源中找到了各种对立思想冲突的深层根源。在其研究成果中，马克思声称人们不同思想观念通常都是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物质产品的分配关系的一种反映。总之，不是观念决定物质现实，而是物质现实决定观念。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人是否对他人进行剥削或者被他人剥削，对于决定人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上的思想色彩具有首要的意义。这并不是说（正如马克思有时所要断言的那样）观念不具有任何独立性，而是意味着，只有清楚地表达了经济上划分的阶级利益，关于社会的组织或重组的重要观念才能对历史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这些观念反映客观实际的程度决定了它们影响历史的范围和能力。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主张观念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

①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1, pp. 25—105.

②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p. 495.

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就是要将辩证法“重新颠倒过来”^①。但是,就观念本身来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②它们仅仅能够清楚地表达历史上真正对立的阶级的物质利益。因此,阶级利益的冲突才真正是辩证法之所在。一部人类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且在现代社会它可以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早年(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表示赞同的那样)将阶级(而不是观念)作为辩证法斗争的真正主导力量:

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③

马克思后来的历史著作即《法兰西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相当详细地并且也相当策略地阐述了对各阶级力量的冲突和不断变化的形式所作的这种辩证分析(尽管我们很可能认为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阶级仅仅是观念的化身)。然而,马克思本人几乎没有在自然界或物质世界中寻找辩证法运动的证据。^④

① K. Marx, *Capital*, vol. 1, p. xxx.

② K. Marx, 'The holy Family', *Collected Works*, vol. 4, p. 119.

③ Ibid., pp. 35-6, 《列宁全集》38卷第26-27页引用过这段话。

④ 我想起一个简短的引证,在1867年6月22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似乎承认在现实的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的作用,“我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做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同样有效的规律。”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p. 223.

恩格斯：作为自然科学的辩证法

正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使辩证法的范围和要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正如我们所见，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仍然是关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本质的一种解释性假说，“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他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①在这里，辩证法仍然只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思而不是历史的组成部分（首先，这一直都是黑格尔的错误）。相反，对于恩格斯来说，物质本身、一切物质都是辩证地生成的。对于马克思而言是假设的东西，对于恩格斯来说则是绝对的：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②

在恩格斯看来，正是辩证法表明社会主义由仅仅是道德的灵感上升为一门科学：“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③在恩格斯看来，一切现象都遵循诸如否定之否定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等这种普遍规律。^④恩格斯吹嘘道：“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

① K. Marx and F.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1965) p. 38.

② F. Engels, *Anti-Duhring* (London, 1948) p. 29.

③ Ibid., p. 158.

④ 在恩格斯看来，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动物界和植物界，在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起着作用(*Anti-Duhring*, p. 157)。恩格斯列举的水的量变转化蒸汽的著名例子是在第 141 - 142 页。这个例子明显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123 - 124 页也赞同性地加以引用。

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①确实如此，恩格斯的确发表了重要的免责声明并把精密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并把二者与像历史和政治学这样的“人类”科学区别开来。^②只有在第一类科学中才有可能获得“永恒的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③，但是他依然把这个信念传递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即辩证法是一种独特的科学之科学。根据这种描绘，辩证法的适用范围很广并且对整个自然界的结构作了说明。

在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就已经过于称赞恩格斯处于唯物主义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最前沿^④，当他在1914年转向研究辩证法时，列宁同恩格斯一样，也是要表明所有现象都是辩证地组织起来，因此都遵循着辩证法的规律。列宁整理的关于辩证法思想的十六点要素似乎受到其导师的影响：

(1) 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2) 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

230

(3) 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

(4) 这个事物中的内在矛盾的**倾向**(和方面)。

(5) 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

(6) 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斗争**或展开。

(7) 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

(8) 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

① Engels, *Anti-Duhring*, p. 17

② Engels, *Anti-Duhring*, pp. 100—3.

③ Ibid., p. 101.

④ CW, 14, 309 and 310.

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都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

(9) 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过渡。

(10) 揭露**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

(11) 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深化的无限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

(12) 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

(13) 在高级阶段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

(14) 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的否定)。

(15) 内容对形式以及形式对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16) 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过渡。(15和16是9的**实例**)^①

列宁屡次回到一个主题是理论(或抽象)理性优先于实践(或具体)理性,他发现黑格尔出色地证明了这个主题。列宁在论述中提到两种不同层次的经验——直接生活的经验和理论反思的经验,并且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些与他先前区分的自发性和自觉性高度一致。在这两个例子中区分的是两种认识,即来自未经深思熟虑或者有目的实验的日常生活经验的认识和与抽象理论化的、可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的认识。第一种认识几乎没有事物和观念的相互联系观念,而第二种认识则在个别中看到普遍,在普遍中发现个别,“任何个别(无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列宁更加简洁

^① CW, 38, 221-2.

有力地把这句话表述为“个别就是一般”。^① 第一种认识的领域是舆论和市场,而第二种认识的领域是科学和实验。列宁及其随后的列宁主义者使这些不同的认识模式具有主观的或客观的特征。^② 需要指出的是,前者未必一定是错误的,只是说前者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它抓住了脱节的、不连贯的、不能推广的各种现象。

与此相反,辩证法的道路始终是从特殊到一般或普遍。正如列宁在笔记中赞同黑格尔,辩证法的运动“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本质到二级的本质,不断深化,以至无穷。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③。研究一切现象的内在矛盾以及一切现象与其他现象的关系是从主观认识到客观认识的辩证途径,并且这只有以抽象概念为中介才能实现:

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④

这个过程,即列宁称之为真理的过程,使我们从特殊和主观“经过‘实践’走向客观真理”。^⑤

辩证推理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分析一切现象所固有的相互矛盾的因素,“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⑥因此,一切事物都可以理解为矛盾或对立面的统一体;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一切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一切表面上稳定和统一的事物的背

① CW, 38, 361.

② 有关这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例如可参见 CW, 38, 201.

③ CW, 38, 253-4, cf. pp. 296 and 361.

④ CW, 38, 171.

⑤ CW, 38, 201.

⑥ CW, 38, 359.

后,都存在着永恒的张力和对立,弄清和揭示这种张力和对立是辩证法家的任务。这是辩证法进步的革命作用的重要方面,因为辩证法不同于资产阶级科学,它所关注的不是稳定和永恒,而是内部的斗争和不断的运动。在黑格尔看来,“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某物只因为在本身中包含着矛盾才运动,才有冲动和活动。”^①列宁用三条粗竖线强调对这段话表示赞同,他对黑格尔进一步的反思也用粗线表示赞同:否定的东西是“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②

唯有列宁是不断强调社会内部各敌对阶级力量之间根本冲突的辩证论者(和革命家)——这是他研究和论述辩证法的主要政治意义。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时刻强调社会和平、神圣联合(union sacrée)或国内和平(burgfrieden)的这些人,与第二共产国际的这些变节的领导人一样,都背叛了辩证法,因而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这些人试图消除社会的客观结构,只是因为这不符合他们主观的政治意图:因为这将会引起当局的愤怒或使他们不受欢迎。因此,在一份一意孤行的最高法令中,他们“裁定”暂时中止这个进程,这个进程正是他们迄今为止一直声称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最终,列宁不得不相信,在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中,客观现实将会重申自己的主张,并且批判所有那些已经忘记了辩证法的实质是“对立面的统一”^③以及“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④的人。而且,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⑤。

列宁对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所作的另外一个重要补充同样也被第二国际的前社会主义者们刻意忽视。这就是恩格斯所谓的从量到质的转

① CW, 38, 139.

② CW, 38, 140.

③ CW, 38, 283.

④ CW, 38, 360.

⑤ CW, 38, 362.

化规律,在上面引述的辩证法十六要素最后一条中提到了这个规律。恩格斯关于这个规律的著名例子就是水转化为蒸汽。水作为一种液体,遵循水力学的规律(例如,水不能被压缩),在不改变液体水的属性的情况下,不断给水加温。然而,总会有这一点(恩格斯称之为“临界点”),在这点上,进一步加热会使液态水突然转化为水蒸气,水蒸气不再遵循适用于液体的规律,而是遵循适用于气体的规律。此时,在 100 °C 时,通过一个微小增量的变化,也就是说,增加小量的热量,被实验物体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降低水温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同样液态水在临界点(0 °C)上会变成成了固态即冰。

很明显,“在量变的一定点上骤然发生质变”。^① 因此,辩证论者必须确定这些关键的临界点(或者“交错线”、“自然界中的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②,在这些临界点上,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突然的质变(或革命)。相应地,这势必需要明确现存的结构或制度所能容纳的外在界限以及预测它们解体的时间表。当然,在这种分析中,加以研究的组织结构内在矛盾的相对优势将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从量到质的转化规律的政治意义在于拒绝所有渐进的或纯粹进化论变化观点的支持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所有流派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突然的或革命的变化既不合理也不可取。而且它也违背了在科学上已定论的进化论发展原则。为了反对这种庸俗的、胆怯的科学,列宁指出只有辩证法“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③。列宁坚持认为,辩证法思想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在于承认这个事实,即一切过程、自然和社会中都会存在着渐进性突然中断的时刻。他赞同地引述黑格尔的话,“辩证的过渡和非辩证的过渡的区别何

① Engels, *Anti-Duhring*, p. 141.

② CW, 38, 123.

③ CW, 38, 360.

在？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①因此，辩证法思想并不是否定进化或量变；而是坚决主张这些变化最终将会面对一切事物、一切结构的有限弹性。它能识别这条界限，超越了这条界线，没有事物的性质的根本性转化，事物就不能发展。

列宁 1914 年深入研究黑格尔的著作明显是一个自我澄清的过程。与当代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列宁更能感受到 1914 年 8 月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尤其是他从前在哲学上的老师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已大规模地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和革命精神。他们能够并且的确利用了马克思本人关于“正义战争”在某些条件下具有正当性的论述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那么，他们错误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哪里？列宁本能地感觉到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或故意弃之不用。他们有选择性地盗用马克思的那些符合他们眼前目的的结论，同时拒绝接受马克思思想的逻辑及其在当代世界的运用。这也正是诸如伯恩斯坦这样的公开而坚定的修正主义者如此轻视辩证法的原因之所在——因为马克思的方法、逻辑和辩证法将会从根本上推翻伯恩斯坦的整个战略及其赖以存在的假设。

234

在辩证法担当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根本认识论这一重任与它公开向列宁的支持者提供的内容贫乏的概要之间差别悬殊。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列宁 1908 年关于唯物主义的著作几乎没有谈到辩证法，而他 1914 年对黑格尔的反思也只是一种个人的研究，并没有打算出版发行，直到 1928—1929 年才公开问世。在那之前，它们还没有在公开领域亮相，因而它不可能成为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要素。正如在上面几页所说的那样，即使当我们试图概括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总的立场时，也难以理解这些文本本身。常常很难分辨哪些是黑格尔的观点、哪些是列宁的观点。列宁插入的语词是分散的、不连续的，并且要么更加抽象地采取摘要的形式，要么更加抽象地采取隐晦评论的形式。在整个《哲

^① CW, 38, 284.

学笔记》中,连续的叙述的只有五页——列宁的简短论文“谈谈辩证法问题”^①,这就是他计划写作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一书的全部内容。

反映现实还是改造现实?

235 很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哲学能力缺乏自信,所以列宁再次忍住没有冒险出版这些材料。然而这并没有使列宁停留在1908年,那时他认为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统一性必须反对任何对其唯物主义基础的削弱。在1914年,他确实触及了一些甚至更加至关重要的主题——他现在似乎认为正是马克思主义者迄今为止用来分析物质的方法本身是不完全的、错误的。意识只是“反映”或“摄影”物质的观念现在看来过于简单化和死板,它似乎没有赋予作为一种积极的和变革的主体即意识本身以自主性。相比之下,辩证法则更加富有活力、至少在名义上不是教条的。辩证法之所以必须很少断言现实的性质,正是因为它现在把一切现象都看成(a)处于内在分解和重组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之中;并且(b)是相互联系着的,以至于任何一个现象的内在变化都会对相邻的现象产生因果性影响,接着这些现象的变化又反作用于起初研究的事物。原因转变为结果,结果转变为原因。面对着事物的这种内在的流变性和复杂性,对于感觉和认识活动的要求以及一些可能性假设都大大地提高了:

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无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②

① CW, 38, 359-63.

② CW, 38, 195.

辩证论者被迫认识到存在着“空间和时间的非间断性”^①，即物既在一个地方又不在一个地方、它们绝不仅仅是是什么，而是不断地转变为不同的东西。不应该把它们“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②。完全清楚的是，在这个更加流逝的和复杂的世界中，这个世界与列宁 1908 年所勾勒的世界相比似乎远不是规定的，人的概念同样也必须是流逝的，复杂的并且不是规定的。人的概念为了“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必须符合其易变性；它们“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过渡的，往返流动的”^③。在这里列宁并不稳定地接近于提出这个论点，即概念在现实的建构中的确起着积极作用（即使这种建构的准确性和精确性仍然需要实践加以检验）。最终，他恰好得出这种观点：

认识论中的实践

换句话说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
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④

列宁必定早已意识到这种说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似乎是辩证思维的一个自然结果）与他早前对经验批判主义者的猛烈攻击有着根本的不同。根据他修改后的评价，如果不再有精神和物质的严格区分，如果认为精神有能力创造或建构客观世界，那么列宁仍然希望坚持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明确界线现在又在哪里？旧唯物主义对精神和物质的划分变成了辩证的共生关系，在这种辩证的共生关系中“世界是观念的异在”^⑤。

236

列宁似乎是打破了恩格斯更具决定论的唯物主义的符咒，更加接

① CW, 38, 259.

② CW, 38, 109.

③ CW, 38, 253, cf. p. 177.

④ CW, 38, 212.

⑤ CW, 38, 184.

近于马克思早期的辩证的普罗米修斯主义(Prometheanism),就像列宁当前的工作那样,马克思也是从借鉴与批判黑格尔开始的。他现在似乎接受这个观点,即观念本身在现实的建构(并由此导致现实的变化)中发挥着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正在回到早年的灵感之源(并且是列宁多次引用的来源):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列宁援引马克思 1844 至 1847 年的艰难探索历程,在这个探索过程中马克思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之后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①。这种转变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正是马克思的“导言”。在导言中他强调说:“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②并且马克思在此宣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③列宁的一生毕竟都献身于这些真理性的论断,并且他在 1914 年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些论断的慰藉。列宁几乎难以承认(更不用说其他人)的是得出这些结论的方法与他早期继承恩格斯的方法之间的分裂。

1904 年,列宁无论在理智上还是直觉上,都不得不相信观念具有改造现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力量。“人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外观、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④当然,这种“人的活动”必须承认马克思相当明确的告诫,即从本质上说,观念“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观念的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⑤。相应地,这只不过是重申了这个观点,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列宁不得不相信,激进理论如果不起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它也可以并且将在改变现实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理智上、政治上和心理上,列宁都倾向于承认(至少在他私人笔记中秘密地承认),“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

① CW, 38, 342.

②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p. 183

③ Ibid., p. 182.

④ CW, 38, 218.

⑤ CW, 38, 39.

物主义。”^①他继续阐明他的观点：黑格尔要胜过“庸俗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一千页关于哲学的东西中，普列汉诺夫对“辩证法本身”却一字不提。^②因此，列宁总结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③

很清楚，这些结论太具有爆炸性而没有公开发表。正如列宁必须承认的那样，它们也是对他五年前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的一种批判。很显然，新的知识论（或认识论）与旧的物质世界的客观性的观念之间存在着矛盾，列宁并没有公开说明这种矛盾，但是分别在不同著作中含蓄地加以承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几乎没有涉及辩证法思想的结构和目的，而《哲学笔记》对物质世界的优先性明显持谨慎态度。最为重要的是，列宁再也没有回到这些主题，并且他的《哲学笔记》也是在他去世五年之后才得以公开出版。那时人们的思想不如列宁那么挑剔、不易被黑格尔思想的奇妙之处所吸引，已经形成一个新的普遍的解释体系，从而使唯物主义成为一种形而上学，使辩证法成为一套永恒不变的“科学”规律。在辩证法这种武器的武装下，共产主义者就能够攻下任何堡垒，克服每一个障碍。没过多久，辩证法就成为斯大林无情的唯意志论的一种辩解，它强行按照观念的要求来裁剪桀骜不驯的现实。辩证法成了“科学之科学”，注定要与作为计划经济和计划社会的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携手同行，并且党的领导无疑是其神谕。

哲学——政治的功能和蕴涵

尽管列宁的反思是零碎的，但是毫无疑问辩证法对于 1914—1917

① CW, 38, 276.

② CW, 38, 277.

③ CW, 38, 180.

年期间列宁的思维模式和自信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首先给列宁几乎所有主要政治战略提供了哲学上的支撑点。在最广泛的层面上,列宁认为作为马克思历史观重要组成部分的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不过是对立面同一性和统一性的表现。来自于进化发展已经达到界限的垂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在现代世界中,也明显表现出由量向质的转变。资本主义以旧有的方式无法统治下去,而社会主义革命信心十足地创造出取代它的价值和制度,这就发出了一个解体而另一个出现的临界点的信号。辩证法最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以背叛的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和社会和平的鼓吹者为一方和以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另外一方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区分线。最重要的是,列宁对辩证法的研究对他本人的自信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首先列宁完完全全地被孤立起来了——被其俄国的环境、他的流亡同事所孤立,当然也被迄今为止他一直尊重的所有欧洲马克思主义领导人所孤立。从心理上和理智上来说,列宁对自己的立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确信,这不仅是为了把第二国际的昔日领导人谴责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而且也是为了阐明一个新的、纯洁的革命性国际得以建立的方法论基础。正是这种问题促使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来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为他头脑中的政治战略提供某种哲学支撑也完全不是偶然的。从历史上来说,这就是列宁主义的产生。

列宁竭力让辩证法为无产阶级的(即革命的)政治服务,这绝不会令我们感到惊讶,因为他直言不讳地表达所有哲学的党派性。正如马克思所敏锐发现的那样,一切政治意识形态都表现为是自然的、基本的和永恒的,正是人类、社会和国家的那些性质符合他们的政治目的,并且为那些被这些意识形态赋予特权的阶级的经济利益辩护。正如马克思主义学者反复强调的那样,哲学没有独立性,它只是为阶级的目的服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阿尔都塞(Althusser)看来,哲学就是划分路线和界限——这是意识形态的典型功能。

人们很容易从中得出结论说列宁主义赋予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话语

以特权。这里的问题在于,无论在政治著作中还是在哲学著作中,列宁都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不可能是科学的媒介。只有在“哲学实践”^①中经历了艰苦锻炼的知识分子才能获得和扩展客观的或科学的知识。唯有知识分子能够在一个必要的高度抽象的层面上把握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一般和个别的同一性、对立面的统一等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民群众被限制在未经思考和难以证明的主观认识的狭窄范围内。然而,只有客观知识可以作为革命政治的指导,因为唯有客观知识能够牢牢掌握未来。知识分子之所以(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创造性地概述他们的作用时所说的那样)能够处于领导地位,正是因为他们“比无产阶级大众能更加清楚地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前进纲领、条件以及最终的普遍目标。”^②他们之所以能够处于领导地位是因为科学地理解社会就是对具有预测力的发展规律的表达。因此,了解科学也就是了解未来,或者至少可以预知什么东西正在形成。

239

这种立场的实际结果是相当明确的。在所有现代意识形态中,列宁主义比其他任何意识形态赋予知识分子角色的信任和权威都要多得多。没有其他的意识形态思潮把其成员资格与某种特定的哲学立场联系在一起,并且在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把某种特定的哲学作为必修的课程。的确,几乎所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在认识论问题上都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很少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像列宁主义那样,出于知识分子比一般群众更加清楚地表达了真理的环节就如此明确而公开地相信知识分子的著述,并且在这样做时还赋予其理论上的领导者以至关重要和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任何人在追求确定性时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应付的代价。同样可以得出,政治领导者的著述必须被他们的追随者相信具有一种特殊的权威性,即使难以了解这种权威性(并且特别是这种情况的话),这种权威性也明确了他们真实的或根本的利益。列宁主义者

① “哲学实践”这个术语是路易斯·阿尔都塞的。

② MESW, 1, 46.

的领导者必须始终不变地作为著名理论家和哲学家的面目出现在他们的追随者面前。因为别无其他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权力就是他们的话语。如果不是他的选集或全集被大力宣扬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没有一个列宁主义的领导人能够执政如此之长的时间。这完全是由知识分子创造的一种意识形态,并且有些人会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是由他们创造的,而且是为了他们并且根据他们的利益而创造的。

240 辩证法在共产党及其领导集团的合法性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相信在所有共产党领导人中,只有他自己懂得辩证法的复杂性。布哈林作为运动中的一位的主要理论家才华卓越,但是根据列宁的“遗嘱”,他从来没有掌握辩证法。^①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初看起来有点奇怪),斯大林作为党的领导人,还坚持要求在权威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②中担当辩证法章节的作者的特权,《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整整一代共产党人的指南。如此有价值和重要的版权决不允许处于党及其高层领导的控制之外。

然而,我们不应该留有这样的印象,即列宁主义的哲学成见完全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因此列宁主义政党普通的追随者从他们的所见中,从外部,即作为其领导人的理论指导中得不到任何安慰或满足。相反,在好战的列宁主义者的传记中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们对于掌握辩证法是非常欣喜的并且相信自己将会成为唯物辩证法的代表。他们或许不愿意承认,解释和论证世界的物质性及其辩证发展的观点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但是,他们过分地相信他们党内的人有能力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并挫败所有的对手,这是他们巨大自豪感和蛊惑人心的自信

^① CW, 36, 595.

^②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History of the CPSU (Bolsheviks) Short Course* (Moscow, 1938) pp. 105—1031. 斯大林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章也发表在他的著作《关于列宁主义的问题》(*Problems of Leninism*) (Moscow, 1953)第713—715页上。

的持久源泉。

辩证唯物主义对于列宁主义现实政治的重要性通常都被人们轻描淡写甚至被忽略。一个阐明其实际意义的方法之一就是追问它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含义——假定普遍不接受存在着像客观真理这类东西的可能性。假定我们能够期待的一切东西都会阻碍我们得出关于自然、社会和社会政策的或多或少适当的和可接受的论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原则上不能反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广泛争论,并且事实上我们可能真的认为应该鼓励(或者,至少不是禁止)表达不同的、甚至古怪的观点。坚持这样一种怀疑论或相对主义的立场,我们或许想走得更远,并且想坚持规则和惯例,这些规则和惯例确保这种多样性观点——在政党内部和政党之间,在选举程序、议会、新闻界、学术生活、电台和电视上,哲学、科学、历史如此等等中——得到尊重和坚持。

241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等同这对命题,即(a)在自然、社会、历史和经济问题上存在着诸如客观真理或科学真理的东西,以及(b)有幸拥有这些现象的发展规律的全面知识将享有认识真理的特权——那么实际的结果将会极不相同。那些否认实证科学论断的人,要么被认为是无知之人,要么被认为是恶毒之人,根本不值得去保护。不管怎样,都应该把他们看作是敌对阶级观点的代言人,因为只存在着无产阶级哲学和资产阶级哲学:“那些不赞同我们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很显然,广泛的公众争论将发表错误的观点,并且对他们过于信任,因而削弱了科学的威信并破坏无产阶级思想的统一性。这种真理的观念和实现真理的途径不仅不需要由规则、惯例和容忍与保护不同观点的克制所组成的密集网络,而且必须把它们看作是一种误导,即使没有产生实际的危害。列宁主义得出结论说,科学的发展并不是通过无意义的投票、计算人数或进行选举获得的。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后来坚持认为,所有问题都是对科学解答的修正。根据这种看法,这就意味着一切掌握辩证法必需技巧、占有充分的数据及对现象进行详细探讨和分析的人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在革命之后,这逐渐成为列宁的立场,这是列

宁放纵党内持续的争论和蔑视“政治”的根源。对列宁主义者来说,真正的科学始终如一,争论反而会削弱科学的地位和声誉。科学是论证真理的一个机构。

由此可见,这些机构必须建立起来,旨在对所有问题提供权威的“科学”观点。在学术层面上,承担这种职责的是涵盖一切认识领域的科学院(Academies of Sciences);在实际和政策领域,党行使这种职责。为了确保所有这些机构在各方面都只发出一种权威的声音,很显然就必须要建立组织和管理的程序、规则和标准,以保证结果的全体一致。

242 不允许存在派系之争、不容忍竞争性的政纲,竞选也被认为是事与愿违的。权威人士的决定应被视为要全体一致地加以接受,并且由受其影响最大的人们全体一致地加以背书。因此,党、国家、工会、学院或其他类似的最为权威的机构的任何决议必须被全体一致地接受,并且对所有较低级别的权威机构产生约束作用。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方式和普遍的列宁主义全体一致的风格的整个理由都来自于它的哲学出发点。我们还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提出这一点。当共产主义政权开始允许甚至鼓励党内党外的广泛争论时,当他们开始容忍甚至保护持不同政见者发声的权利时,他们由此也开始反对把党作为科学和真理的拥有者这个列宁主义的概念。他们仅仅借助于相对主义的真理概念就能够证明这种行为的正当性,这种相对主义的真理概念一定会威胁到他们自己的权力主张的哲学基础。总之,他们那时就不再是列宁主义者了,并且作为现代共产主义基础的那种统一的权力结构解体了。这正是在苏联所发生的事情。哲学原则与实际权力的联系如此紧密,在现代意识形态中是绝无仅有的。

第十章 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243

如果说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那么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极权主义的理论家们声称,全面控制社会和个人的这种斯大林主义野心的理论基础、心理基础和制度基础都是由列宁牢固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托派分子和相当广泛的左派分子也持续不断地提出了一种解释路线,即斯大林主义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是对列宁主义的歪曲(illegitimate offspring)。在这种解释中,这两种现象的目的、方式和方法都明显不同,并且它还坚称,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列宁本人不但意识到了斯大林主义“变质”的危险,而且还尽力提醒党要把这种危险从自身中清除出去。

首先,让我们讨论一些争议不大的因素。首先存在着的诸多共识是,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出身背景和个人特点极不相同,因此他们总的政治风格也极为不同。列宁生长在一个富裕的、有文化的大家庭中,这种家庭尤其能够提供支持并具有稳定性。斯大林则生长在一个贫困家庭,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他的父亲粗野并且酗酒,整天不回家。^① 列

^① 更有用的论述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著作有:R. V. Daniels, *The Stalin Revolution: Foundations of Soviet Totalitarianism* (Lexington, Mass., 1972); I. Deutscher,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Harmondsworth, 1966); G. Gill, *Stalinism* (London, 1990); R. Medvedev, *On Stalin and Stalinism* (Oxford, 1979); L. Trotsky, *Stalin* (London, 1947); R. C. Tucker, *Stalin as a Revolutionary, 1879—1929* (London, 1974) and A. B. Ulam, *Stalin: The Man and His Era* (London, 1974)

宁在其一生中保持着学者的自制和严谨；斯大林实际上在 14 岁就没有认真地学习了。列宁是位很棒的语言学家，他早期作为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一名学者表现优秀，他后来通晓法语、德语和英语，表现同样优秀。他是一位在大多数欧洲主要城市生活过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斯大林事实上并没有在其出生地格鲁吉亚和移居俄国以外的生活经历，他对所有外国的东西都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

244 甚至列宁最严厉的批评者们也承认，就个人而言，列宁极其谦逊有礼。他在革命后所作的艰苦努力让人们崇拜他，纪念他的伟大，或是借助于宗教的意象把他想象为上帝式的存在。当 1918 年列宁遭到刺杀处于死亡边缘之时，他抱怨说，报纸上充满了这种粗野无礼的废话。列宁的身体一恢复就立刻派他的高级助手前去苏维埃报纸的办公室直接指示，要求立刻停止这种庸俗的对个人的歌功颂德。相反，斯大林短暂的谦虚表演就显得虚伪和做作。在他得势掌权的过程中，他发现扮演列宁的忠实代理人 and 谦逊追随者的角色有很多便利之处。他在这个阶段得益正是因为他的低调，而且他的竞争者轻视单调乏味的党的幕后管理事务，斯大林因此把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然而，当斯大林驱逐了所有的对手，自己取得对党的完全统治时，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赞美是过度的，也没有什么颂扬是奉承的。成为苏维埃精英的资格条件现在变为是对斯大林的顺从和奴性态度，并且随时准备赞美他的天才。

人们相当广泛地赞同，出身背景和性格的差异使得他们两个人的政治风格——即两个人如何向同事和外界表现自己的风格迥然不同。列宁的权威体现在他是一位严格的领导者，以其具有的广博而清晰的学识受到景仰和尊敬。他给人印象深刻并令人信服，靠的是以理服人，靠的是对自己所提出观点的直率坦白和执著精神。斯大林则不同，他并不那么光明正大并且善于伪装。在他那里，政治原则的争论很快演变成了人身的攻击、政治的狡计，并最终演变为对真正的和想象的手进行肉体消灭。在列宁看来，党具有团结的意义，它超越了包括个体在内的个体的总和。在关键的时刻，列宁会坚持自己有权从根本上重新

调整政治战略。但是同样地，他也总是寻求和赢得中央委员会以及党的代表大会对于这些调整的批准。他很重视程序上的手续，至少是重视与党相关的程序上的手续。列宁在世的时候，每年都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他高度重视党代会。在1927年召开的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有效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在这之后一直到他1952年去世，斯大林仅仅允许召开了三次党的代表大会。诸如农业集体化、国家快速工业化这种对社会主义（以及党的）战略目标的根本调整，甚至都没有提交到党的代表大会。在他执政期间，斯大林娴熟地利用他掌控的地方性、地区性和全国性党组织的任命权来排斥异己，确保自己的权威。当那个目标实现以后，他将党的老战士、布尔什维克的“保守派（Old Guard）”统统视为是与他不共戴天的敌人，并在20世纪30年代把他们全部清除干净。相应地，党所遭受到的死刑和牢狱之灾比苏维埃社会其他部门都要多得多。斯大林大批屠戮苏共领导阶层，无情践踏党的规则和惯例，并且熄灭了党内最后一点自由的火花。

245

列宁的最后斗争——对斯大林的攻击

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内容和风格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可能在列宁最后的著作中找到其最令人信服的证据。《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的“遗嘱”）清楚地指出：“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①列宁遗嘱的附件指出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太粗暴（*gruby*），并且要求代表大会“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一职务”——列宁继续说道，这个人要不同于斯大林，要“较为耐心、较

^① CW, 36, 594-5.

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① 这并非是一位垂死之人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很显然，这是列宁在其生命最后十八个月中事实上所关心并且写到的事情。列宁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事务的调查，并且极力反对斯大林的高压和沙文主义态度以及他的委任（比如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所有这些都使他确信，无论是从个性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斯大林不仅不可靠而且粗鲁，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真正威胁。毫不夸张地说，在 1923 年 12 月遭受两次中风以后，列宁仍竭尽全力与斯大林作斗争。

246 最后的两篇文章是列宁在很短的时间内向其秘书口述的，当时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达到了极限（并且中央委员会已禁止他从事任何政治工作），这两篇文章很明显都是直接针对斯大林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②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③严厉批评了整个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不称职，尤其是批评了斯大林的统治。工农检察院（WPI）于 1919 年在斯大林的主持下建立起来的，自检察院成立以来斯大林就一直是其委员。它本应该是作为这样一个机构，一方面用来培训工人和农民以便在管理工作中担当领导角色，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政权中最重要的公共问责机构，它确保政府其他部门的全部工作都处于严格的监督之下。列宁的结论说，很遗憾，工农检察院在这两方面都没有起到作用。

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④

① CW, 36, 596.

② CW, 33, 481-6.

③ CW, 33, 487-502.

④ CW, 33, 490.

列宁的文章一语双关,因为它不仅指责了斯大林对于工农检查院的严重忽视,还主张恢复将这个工农检查院的活力,把它同党自身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授予其问责权,甚至向党的政治局问责的权力。这样,重组的工农检查院将成为一个督查机构,不仅监督国家机关的不称职和傲慢行径,而且列宁尖锐地补充说,它还将根除“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的官僚主义者”^①。根据推理,它将作为最有权的机关向权力日益增长的党的总书记——斯大林本人问责。因此,这也难怪斯大林及其随从(受到在《真理报》的布哈林的支持)反对经由托洛茨基召集的政治局会议来决定列宁最后文章的出版事宜^②。列宁的文章最终按时刊登在了1923年3月4号的《真理报》上,但是很清楚列宁并未打算让事情到此为止。他告诉其秘书,“他要把工农检查院的问题提交党代会”^③(1923年4月即将召开的第12届党的代表大会)。《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5日)出版的第二天,列宁给斯大林写了一个特别强硬的便条,正式要求斯大林为他与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通话时的粗鲁无礼道歉,“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否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④斯大林似乎粗鲁地指责克鲁普斯卡娅违反了政治局做出的规定(并且由斯大林监督执行),即禁止列宁“看报纸、会见来访者和了解政治资讯”^⑤,只允许列宁和他的秘书每天接触五分钟以口授他的个人日记。列宁派秘书把便条交给斯大林,并第一次采取预防措施把便条复写给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这本身就表明列宁此时已不再信任斯大林。斯大林陷入了困境,他作出了让步并进行必要的道歉,然而,这种道歉从未公之于众。

247

① CW, 36, 494.

② L. Trotsky, *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 (New York, 1962) p. 72.

③ CW, 42, 491.

④ CW, 45, 608.

⑤ 主任医生费尔斯特(Foester)曾经如此告知列宁的秘书。就列宁来说,他的“印象不是医生指导中央委员会,而是中央委员会指导医生”,CW, 42, 492-3.

很明显列宁正准备对斯大林发起重大的理论攻击、组织攻击和人身攻击。他确信斯大林已对党的团结构成重大威胁,并且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①事情。斯大林的粗鲁使他不适合做总书记,他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使得他不适合担当民族事务人民委员(the commissariat of the nationalities)。在这种“列宁最后的斗争”^②中有着一种豪迈的英雄主义。他的职权被剥夺就像他已经离职了一样——一个虚弱的、病危的人,像一个犯人一样被困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地,被禁止同外界联系,被一个医疗团队所监视,这个医疗团队只对一心想破坏的那个人负责。(的确,有个完整的研究提出了这个观点,在列宁的医生的帮助下,斯大林最终成功地毒死了列宁。)^③甚至列宁的老战友也没有准备帮助他,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担心列宁最终会提名托洛茨基为他的继承人,并且托洛茨基也被列宁委托处理格鲁吉亚问题,^④他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份谴责斯大林的简短声明,甚至托洛茨基也没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每到重要关头他总是搪塞、称病,或者不真实,或假谦虚,拒绝像列宁的传人那样行事。列宁的支持者只剩下了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以及私人办公室的值得信赖的、不屈不挠的女秘书(令人奇怪的是,这里面竟然包括斯大林的妻子娜佳·阿利卢耶娃[Nadya Alliluyeva])。

248

如果我们不认可这位患病老人最后的英雄事迹,那么我们未免太冷酷了。但是同样地,在列宁和斯大林不平等的对抗中,如果我们不承认这是一种自我诱导的悲剧性的痛苦,我们就是失察了。列宁一时疏忽,用人不当,以至于养虎为患,他自己培养的人现在要对付他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故事的另一方,即看看作为列宁自然的、并且可能

① CW, 36, 596.

② 对列宁与斯大林最后斗争表示某种同情的论述,参见 M. 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 (London, 1975)。

③ R. Payne, *The Life and Death of Lenin* (London, 1964)。

④ 参见 1923 年 3 月 5 日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 CW, 45, 607.

也是必然的继承者斯大林。

作为列宁工具的斯大林

党内任何有声望的人都不会怀疑，斯大林是列宁的人。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的传记^①清楚地表明，在斯大林革命生涯的早期，他就英雄般地迷恋列宁——迫切地向列宁证明自己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忠实的支持者。列宁则欣然接受这位显然谙熟马克思主义的“了不起的格鲁吉亚人”，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和外高加索地区的革命运动有着重要的组织上的联系。斯大林似乎像列宁一样具有一个革命活动家所有重要的品质。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而且在密谋技术上训练有素。1905年起义失败以后的那段艰难的反动时期，斯大林帮了列宁大忙，他为党筹措资金，是负责为布尔什维克大规模征集钱粮的武装战斗队的主要联系人。正是斯大林及其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在1907—1908年的大罢工和工人代表大会中赢得了荣耀，唯独他所负责的巴库在这一时期表现活跃。他们不屈不挠、意志坚定，毫不妥协地清算孟什维克，这些都给列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列宁赞扬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是“政治大罢工中最后的莫西干人(Mohicans)”^②。到了1912年，列宁实际上与党内知识分子决裂，这些人陷入到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哲学的迷思。此时，列宁重组其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所依靠的人正是处于地下的高加索实干家。斯大林和他的助手奥尔忠尼启则都被选进了五人指挥中心，而且两人还被任命为负责指挥党在俄罗斯活动的四人俄国局成员。^③我们应该注意到，斯大林迅速跃升至党的领导层完全出于列宁个人的坚持。

① 参见本章首页注释1。

② I. Deutscher,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Harmondsworth, 1966) p. 100.

③ Ibid., p. 109.

正是在列宁的鼓励下，斯大林着手写作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或小册子。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写于1913年1月并且在数月后出版。^①这本书从列宁主义的立场对社会民主党的大量素材作了很好的调查与批判。该书公开反对联邦制以及民族文化自治而坚持民族自决的原则，同时还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更大目标。据说列宁本人和善地对斯大林进行了指导，告诉他小册子应该包括哪些主题以及如何谋篇布局(十月革命前斯大林唯一可称为“理论”的贡献)，并且在出版前列宁还认真地改正了斯大林文章中的不当言词。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知识界趋炎附势的环境下，列宁很希望看到他所极力培养的副手至少能被视为是有一定理论功底的人。然而，这一切都不应导致我们认为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完全一无所知或无能，也不认为他写的那本小册子实际上不是他本人的成果。也许就理论来说，他可能是可靠能干但不出色之人，而且也可以理解他慑服于列宁本人在民族问题上的大量声明，但是，那种认为斯大林在理论上一无所成的传统观点还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1913年年初，列宁的“了不起的高加索人”^②刚回到俄国就被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和秘密警察)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sky)出卖了，他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直到1917年2月沙皇政府被推翻。1917年3月斯大林作为俄国最资深的布尔什维克回到彼得格勒，很快控制了党的委员会和《真理报》的主编职位。这实际上又是列宁的意思，尽管在1917年四月列宁回来之前的数月中，斯大林反复无常，但是他还是被聘为《真理报》即党最重要的报纸的主编。“七月事变”的革命流产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被迫逃离彼得格勒，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被捕入狱，在他

^① Stalin, *Works*, vol. 2, pp. 300—81.

^② 在1913年2月，列宁给高尔基写信说：“关于民族主义。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应当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埋头……写一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CW, 35, 84)

们都不在的情况下斯大林重新取得了党的领导权。

革命以后，斯大林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9年又被任命为工农检查院的人民委员。他同时又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他是唯一是中央委员、制定政策的政治局，享有组织或执行权力的组织机构或组织局的成员^①。通过工农检查院他可以在国家的每一个部门安插代理人或对它们进行监视，通过党的组织局（1919年3月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共同筹划下建立起来）他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直接任命和调动党的干部。党的组织生活原本掌握在才能突出的、精力充沛的青年人雅各布·斯维尔德洛夫（Jacob Sverdlov）手中，此人受到全党的喜爱。但是命运弄人，1918年年末他因斑疹伤寒突然离世，之后不久斯大林便逐步进入了党的组织机构的中心。1922年3月，斯大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而正式确认了他作为党的组织者的卓越才干。此后，他不仅负责党的所有领导干部的安置和升迁，还负责确定政治局会议的议事流程和相关文件。斯大林现在实际上在为苏维埃政权中的统治精英设定议题，并且渐渐控制了其招聘和安置。最终，通过成立于1920年9月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他成了党纪和清除野心家的负责人。

250

我们应该清楚，在这样一个权力的持续不断集中的过程中，列宁不仅支持或提议对于斯大林的任命，还大力为斯大林辩护，反对那些对斯大林身兼数职不满的人。列宁对他的同志们反问道：“我们谁没有这种罪过呢？”^②只是到了1922年底，就是在12月中旬列宁第二次中风之前，各种因素促使列宁第一次认真考虑斯大林是否适合掌握大权。此时，正如所有真正发生的悲剧一样，一切都已太晚了，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和用人不当，原来的英雄注定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

^① Abramovitch, pp. 276—77.

^② CW, 33, 315.

列宁——建造庞大而僵化的组织

列宁本人一直是要最坚决地摧毁党内外的所有政治对手。十月革命之后的数月间，他不接受要建立基础广泛的社会主义联合政府的呼吁，这甚至在列宁自己的党内也有广泛支持。他沉着地授权关闭反对党的活动场所，骚扰并逮捕他们的活动分子。^① 对于俄国的未来来说最为不祥是，列宁赞同立即解散于1917年11月经由广泛选举产生并且在1918年1月已经短暂召开的立宪会议。

251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他们断言，唯有他们能确保人们珍视的、等待已久的立宪会议的召开。托洛茨基声称说，十月是“立宪会议的救星”^②。直到这时，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所有的政党都坚称，只有立宪会议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力和合法性来重建后帝国时代俄国的宪法、司法、政权以及财产关系。然而，随着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重点就迅速地发生了变化。列宁尖锐地指出，苏维埃的民主远远优越于“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列宁争辩说，苏维埃的民主是积极的和共享的。它拥有数百万受过教育的自我管理的人才，因此，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③。列宁提醒说，我们绝不可能倒退到过时的、名声扫地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毫无疑问，列宁主要寄希望于工人和士兵强烈的“苏维埃爱国主义”。

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大概算起来，农民党（社会革命党人——SRs）获得40%的选票，布尔什维克党获得25%的选票——1 580万张

① L. S. Schapiro, *The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and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he Soviet State: First Phase, 1917—1922* (New York, 1955)对列宁镇压政治反对派作了最充分的论述。也可参见 R. R. Abramovitch, Ascher, and Broido.

② 转引自罗莎·卢森堡1861年的著作第57页。

③ CW, 28, 248

选票和立宪会议中拥有 410 个席位对 980 万张选票和 175 个席位。然而，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主要的城市地区和最重要的军队。^① 列宁认为这次选举存在着偶然因素，并没有代表性——它不能反映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亲布尔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因十月革命而产生的分裂。这样讲的意图就很明显了，正如罗莎·卢森堡直截了当地指出的那样，如果立宪代表的构成的确不能反映公众意见，那么就“应当安排新一轮立宪会议的选举”^②。布尔什维克消灭民主、维持专权以及恣意妄为打压反对派的战略，卢森堡总结说：

简直是无药可救。因为它阻塞了唯一能够用来修正社会制度一切先天缺陷的活生生的源泉。那种源泉就是最广大人民大众充满活力的、自由自在的、生机勃勃的政治生活。^③

她同样也很清楚，“没有一种出版的自由，没有不受限制的集会和组织的自由”，^④群众的统治完全是无法想象的。她预言说，缺乏这些条件，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将会堕落为一种“派系活动——少数政客的专制独裁”，公共生活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野蛮对待。^⑤

252

少数几个外国的社会主义者仍然认为列宁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这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所作的预判。孟什维克随声附和这个观点，并且在列宁自己的党内也更加文明地表达了这种观点。缺乏出版自由，没有自由选举出来并且至高无上代表大会，公民用什么纠正方法来清除行政机构的不作为和专横？

列宁对立宪会议的反对逐渐表现为是理论上的而不是临时说法。

① 最充分的分析是在 O. Radkey, *Russia Goes to the Polls. The Election to the All-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1917* (Ithaca, NY, 1989)。在 1919 年 12 月，列宁写了一篇长文“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CW, 30, 253-75)，这是对其革命战略的一次重要的编纂整理。

② Luxemburg, 1961, p. 59.

③ Ibid., p. 62.

④ Ibid., p. 67.

⑤ Ibid., p. 72.

(如果这种临时说法是列宁反对选举结果的主要理由,那么列宁就还没有真正回答卢莎·卢森堡的挑战。)列宁声称,传统的议会制度的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了:

劳动阶级根据经验确信:旧的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已经过时,它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完全不相容。只有阶级的机关(如苏维埃)才能战胜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全民的机关是办不到的。^①

他强调说,苏维埃作为革命的民主机制在每一方面都是优越的。它不仅是特定阶级的机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比审议机构更具有活力。民主成功的衡量标准不在于有多少选民参与投票,而在于有多少人真正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苏维埃政权集立法、司法、行政以及政策制定这些功能于一身,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公共管理事务真正变为群众的事务。因此,不应该回到原始的宪法形式,这种形式早已被广泛证明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把全部政权交给立宪会议就等于和凶恶的资产阶级妥协。”^②反正这些就是布尔什维克立即解除期待已久的立宪会议的主要辩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尽管列宁刚好在十月革命之前在其宣传口号中还不断宣称,只有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才能把立宪会议从右派背信弃义的企图中解救出来,“唯有我们的党掌握了政权才能够保证立宪会议的召开。”^③)

然而,实际上,在9月底布尔什维克更加严格地遵守列宁的指示,“只有这场战争的发展能帮助我们取得政权,但是,在起义过程中我们必须尽可能少谈论这一点(要牢记甚至明天我们就能夺取政权并且我们不会让它白白溜走)。”^④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成立的人民委

① CW, 26, 435.

② CW, 26, 440.

③ CW, 26, 20.

④ RSDLP, *Minute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pp. 48—9.

员会(the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或 Sovnarkom)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而且党完全控制了中央执行委员会(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10月3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颁布一个法令意思是要单方面妄称立法权归属自身。这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场政变,表明工农政府(和党)取得了对苏维埃及其执行组织的控制权。渐渐地,布尔什维克拥有了对于有着全权代表大权的人民委员的任命权,并且他们还分化和重组难以对付的苏维埃和具有威胁性的政治对手。在十月革命的六个星期中,高尔基的报纸《新生活报》(*Novaya Zhizn*)悲叹于苏维埃运动如此迅速地走向尽头:最终“‘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个口号实际上已经变成‘一切权力归少数布尔什维克人’……苏维埃堕落了,它变得软弱无力,并且一天天地失去自己在民主方面的威望。”^①最初英雄般的演出——有人民的参与和纯洁梦想的演出已经结束了。

很明显,反对联合,反对分权,反对民主道路的正是列宁(托洛茨基现在是他最大的支持者)。他对政治对手的冷酷无情,他拒绝承认公共政策替代性方案的合法性,以及他对公众用来表达意愿的公共论坛的破坏,这些无疑都为内战埋下了祸根。解散立宪会议被很多人视为这场内战的导火索——布尔什维克开始公开宣布与俄国人民为敌。当然,正是由于内战,使得公共生活的残暴行为扩散开来,感染了党和国家机关,并且创造了斯大林主义从中得以孕育和蔓延的一种社会背景、一种工作方式和一种思想态度。

反对派的终结

曾自豪地成为党内一切“离经叛道之人”和“反对派”的终结者的正是列宁。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要求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自治,要

^① 引自 Anweiler, pp. 206—7.

求有一定空间来提出他们的替代性公共政策方案,在这些方面他们遭到了与工会和合作社运动同样的命运。列宁反过来告诉他们每一个人,在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垂死的(因此也是衰落的)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时代,只能在一种专政和另一种专政之间进行选择。^①

在这种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在“这个被包围的要塞里”^②,都没有自由和民主可言。一丝一毫的偏差,对纪律最轻微的违反都只能对敌人有利。不管作恶者的意图和公开声称的动机是什么,这些行为都是反革命的。人们所宣称的动机和他们言论或活动的“客观”意义之间的区别,经常被列宁引用来证明任何反对者,或者甚至任何要求一种受保护的空間都是不可信的。当然,并没人起来反对这些言词或行动所带有的隐蔽而危险含义的诬陷。只有党的领导能够判断什么对无产阶级和/或革命的事业是利或不利,以及它们随着国内外形势而发生的变化。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对“间谍、破坏者和奸细”的大规模清洗中所运用的正是这种逻辑。列宁既预感到斯大林会随意判定有罪群体,也预感到斯大林会残忍地对待他们。1918年3月,列宁已经要求建立“真正革命的、能迅速而无情地严惩反革命分子、流氓、懒汉和捣乱者的法院”^③。

在列宁通过党来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情况下,不再有个人或是团体的可以运用他们独立性的隐蔽地方或没有被侵犯的空间。例如,如果工会想要宣布自治并且在党和国家之间保持中立,列宁就会谴责他们“都是为反革命打掩护,或者是毫无觉悟的表现”。^④合作社派也同样被告知:“你们决不要心存侥幸,以为可以多少保存一点独立。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想也没有用。”^⑤“各个团体不能够有也不应该有什么独

① CW, 28, 417, cf. p. 431.

② CW, 28, 394.

③ CW, 27, 219.

④ CW, 28, 383.

⑤ CW, 28, 335.

立”；列宁强调说：“必须使一切服从苏维埃政权。”^①

到了1921年3月，当国家正针对农民采取放宽经济措施之时，当最后一批武装抵抗分子已经被镇压之时，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下决心建立一个纪律严明且全党高度团结的新政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列宁对内部的争执和辩论越来越感到愤怒，他认为这种争执和辩论都是病态的因素。他抱怨说，党生病了，它在发烧。^②党竟干出了“搞党内辩论和争论这种奢侈行为。党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联合起来的十分强大的敌人的包围之中，又肩负着空前的重担，对于这样的党来说，这种奢侈行为实在令人吃惊”^③，这些外部敌对的威胁与内部孤立的危险情形的结合，足以使列宁坚持要党的第十次大会“采取严厉措施防止所有的派系活动”。他是这么强调的：

因此，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④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派别禁令”，其目的是要对列宁的个人结论给予正式的支持，“反对派应当结束了，应当收场了，我们已经受够了。”^⑤

作为一个被敌人、贫穷、匮乏和随之而来政治上的摇摆所包围的执政党，党不可能被“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的争论”所阻拦。这些都不是绝对重要的；事实远非如此，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能否实行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行，完全取决于由党的领导层所评估的政治环境。列宁

① CW, 28, 333.

② 列宁本人谈到“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讨论具有不健康的性质”，它已经变质为派别斗争(CW, 32, 54)。在“党内危机”中，他号召党“要治好”无休止争论的病：“必须有勇气正视痛苦的现实。党生病了。党在发烧”(CW, 32 43)。

③ CW, 32, 168.

④ CW, 32, 244.

⑤ CW, 32, 200.

为团结一致而战的意义是任何反对党的个人和集团都不可能是正确的。那就是愚忠的含义。这种教条后来被用来平息诸如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人对斯大林的批评。党被提升为忠诚的最高聚焦点。党表达了工人阶级、革命者以及一切进步人士的使命，并且反对党就是自毁前程。

256 到最后，列宁本人成为他自己的学说的牺牲品。正是他坚持说党自己的领导核心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当他不再掌权的时候他又怎么能抱怨呢？因为他自己曾经一直蔑视要求言论自由权、宣传自由权的人们，他现在又用什么言词、用什么语言来抱怨呢？当他赞赏不受规则和法律约束而完全和唯独基于权力的裁决时，他还能抱怨独断专行吗？他曾因下属过于谨慎地使用惩戒性的处罚以及不愿意诉诸恐怖手段而频繁地训斥他们。重要的是，他应该向谁呼吁？还能相信谁呢？所有潜在支持反对霸道的官僚主义和党的独裁主义的人都在他明确地暗示下被消灭。他潜在的支持者以及他借以向支持者呼吁的这种交流方式和媒体，都因为他自己的偏狭而选择中立。回顾起来，他最后的斗争、他挑衅的和英雄的话语就是空洞的手势和假慈悲(crocodile tears)。就托洛茨基后来流露出来的反对斯大林的越权行为以及公共生活的官僚化和残酷化来说^①，列宁从未承认过他的广泛责任，即他创建了这种制度，思想态度、政治不宽容和这种习以为常的和精神上的相对主义，它们的恶果就是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成为列宁主义理论的背叛者，这最后一套辩解是布尔什维克的高级领导者们，除斯大林以外，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都具有书生气地蔑视组织事务的典型特征。我们要相信，这些值得信赖的、品德高尚的(但在组织上是幼稚的)外行人被斯大林这个官僚给欺骗了。因此，可以原谅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隐藏在组织背后的个人权力的可怕。但

^① 例如参见 L.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New York, 1970)。非常值得一读的托洛茨基的自传《我的生活》(*My Life*) (Harmondsworth, 1975)对其在镇压俄国社会党人反对派和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中极端作用含糊其辞。

对于布哈林来说,可能只有一半是对的。他思想上焦躁不安,对于行政事务漠不关心——也正是因为此,列宁不让他承担政府部门的职责。除布哈林之外,很少有人能天真地提出这种貌似合理的要求。托洛茨基当然也不能。在大革命前的漫长生涯中,他就是党的谋划老手。先是在革命中,然后在红军和内战中,他都是最重要的协调人和组织者。在每个时期他都意识到党的人员安置的重要性,他还率先坚持认为非党的组织,比如说工会和苏维埃,它们的领导成员应该全部由党来任命。他做事太过冷酷无情,在使每个人和每件事都要服从于党/国家的最高权力上,他太过分和太无情,以至于列宁不得不在他的“遗嘱”中对他严加管束,并在告诫党要反对托洛茨基在处理问题时过火的“管理”方式。^①

257

并不能说是列宁本人削弱了组织的重要性——尤其是党组织的重要性。长期作为列宁经营党务的助手,斯大林从其主人本人那里学会了这行的诀窍。正是列宁在他不知疲倦的论战中教会了斯大林如何使用普列汉诺夫的要义,即对待对手的方法就是给他贴上叛国者的标签。策略就是夸大一切偏差,以便把通常具有极不相同观点的异议者聚集在一起,贴上一个贬损的标签。他们变成了“经济主义者”、“尾巴主义者(tailists)”、“取消派(liquidators)”、“造神者(god builders)”或者“白卫军”。革命前,列宁对于自己利用党的机构去孤立和排斥对手一直都没有感到内疚。革命后,诸如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这种反对者被党的机器有系统地加以解散——他们被重新分配到偏远地区的工作岗位上或者是被送到国外。就喀琅施塔得叛乱来说,就有数百人,可能有数千人被机枪射杀。

党的所有著名干部都同样具有负罪感。他们都积极参与或者是消极容忍对一系列组织和团体的镇压。他们都一样强烈鄙视反对派的抗议活动,反对现政权的人都被草率地和粗暴地加以对待。在列宁看来,

^① CW, 36, 595.

诉诸正当的法律程序,要求建立制衡机制和限制行政特权,都是没有阶级原则的表现——是诉诸资产阶级的合法性。没有比对党的忠诚更重要的忠诚了,因此也没有比革命的利益更重要的律法。当然,这些都起源于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那种制度相对主义(the institutional relativism)。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制度(和规范和约束的模式,构成它们的制衡机制)并没有真正的独立性。它们全都是某一阶级或其他阶级的工具。他们是阶级权力借以行使的专门机构。正是列宁不断强调无产阶级控制的国家政权的最重要特征是,它是完全地并唯一基于力量之上的一种专政。这远不是一个抽象问题,因为从一开始,政权只能通过强制力的组织来维持自身。对于革命和革命者来说,内战经历本身就是持久地、残忍地失去清白。随心所欲地使用暴力,报复性和惩戒性地处死导致了一种通过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倾向。它使(并且部分地创造了)一种飞扬跋扈的管理方式、一种僵化的中央集权、绝对地服从权威变得严重。内战也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组织生活。苏维埃放弃了它们的权力或者说是被党剥夺了权力。大部分地方的国家专门机构根本上就是军队和契卡,持不同政见者都已经被送进了集中营。在列宁时代,恐怖已经毫不含糊地被当作是国家政策的一种工具。即便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这个政权就开始吞噬其子民。很明显,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起义是一个转折点:这个政权不仅向其从前的支持者宣战,还正式向试图把苏维埃政权变为现实的异端宣战。

制度相对主义和重新定义社会主义

这就让我们直接触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关系的核心——重新阐述由列宁提出并最终由斯大林贯彻实施的社会主义特征。在革命最初的那段激情岁月,受列宁《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的鼓舞,一切都是透明的。政府要方便群众并由群众来行使职责。这里的程序规则已经被

确定为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的本质。决定性的问题一直是政府以及行政机关如何运行——所有选定的官员都可以被罢免吗？并且他们拿工人的工资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社会主义此时被解释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所有人都是（或可能是）他们自身的自我管理的参与者。在这里，社会主义被理解为一切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彻底重组——发号施令者的终结。

这些正是 1921 年被喀琅施塔得人作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力而要求归还的东西。然而，此时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又重新系统阐述了这个政权的神化基础，并且在此过程中，引人注目地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列宁精心策划了对苏维埃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种决定性的重新阐述，并且这一切在 1918 年春末和夏天就已经开始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布哈林）越来越相信，人民缺乏文化，由于国内工业崩溃和外部孤立而造成的贫困，以及内战期间他们的残暴行为，使得自我管理的梦想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被重新定义为效率和生产率的最大化。重建工业、城乡之间的交通和交换这些基本目标成为党和国家最优先议程。所有促进这些目标的东西现在都被赞扬为是进步的 and 革命的，即使它意味着联盟和苏维埃要让位于共产主义的人民委员发号施令，即使它意味着要对工人阶级本身实行高压政治。一长制、纪律以及分层式的控制和权力，这些现在都被公认是必需的，符合重新定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最重要的是，这就是斯大林主义发展的切入点。未来已经被出卖了。社会主义作为对国有经济进行控制，国家作为所有企业和个人资源的分配者，这些观念都不是斯大林的创造。相反，这是被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广泛接受的计划方案。托洛茨基在 1920 年宣称：

259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是对作为工人集体意志的苏维埃机构的统治，而不是对个体企业进行管理的那种形式。^①

^① L. Tro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nn, Arbor, Mich., 1961).

列宁本人也回应了卡尔·考茨基的批评,他甚至更为彻底,他声称,“统治的形式与这个问题完全无关。”^①到了1919年中期,他认为“‘公社’这个词在我们这里用得随便了”,^②这时他完全坚持从生产主义者的角度对社会主义进行定义: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共产主义就是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③

斯大林没有必要提出一种唯我独尊的苏维埃国家的权力理论,也没有必要从生产主义的角度来虚构一种社会主义概念。他继承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列宁的观点。他所要做的仅仅是1929年之后在对农民的残酷攻击中来实施那些理论。

260 一直存在着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即“斯大林真的必要吗?”^④这种争论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1929年突然中止的新经济政策和随后开始了整个农业的快速集体化。同时,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也开始了,整个苏维埃联盟抛入到国家精心策划的混乱状态,可以说这种混乱状态比迄今为止任何社会所经历的范围都要更大,影响更深远,并且也更加残酷。当然,我们能够思考一下,从中长期的观点看来,这种对不变的、古老的生活模式的正面攻击在社会或经济的层面上是否合理。我们也可以追问其他战略是否就不能带来更好的回报(而不是量化的)。历史学家们将永远不会赞同,无论列宁是否在世,列宁都会支持斯大林的休克策略或者布哈林的在一切生产和交换领域更加平衡、更加稳健的发展计划。毫无疑问,对于新经济政策状况的评价就是并仍然是并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问题。但是这并没有详尽地讨论列宁主义

① CW, 28, 238.

② CW, 29, 431.

③ CW, 29, 427.

④ A. Nove, *Was Stalin Really Necessary?* (London, 1964).

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关系的性质。甚至可以说,过分关注本质上无法解决的政策偏好问题会使我们偏离更加本质的源流关系。

在这本书中,我认为列宁主义充满了历史和科学的双重形而上学,它赋予列宁主义以确定性。它也使列宁主义在处理群众广泛参与、裁决以及竞争性的公共项目这些问题时在方法上敌视民主。人民大众从来就不是科学的工具,因此,它也不能准确地理解它自己的过去或未来。斯大林从列宁那里忠实地继承下来的这种哲学上的自大在他自己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①一书中明确地体现了出来。就列宁来说,辩证法的规律能够并且已经被用来解释(或判定)所有极端的实际政策,“如果发展是以揭露内在矛盾、以对立面之间的碰撞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很明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一个十分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现象。”斯大林继续说道,这种斗争“我们不必去审查……而要接受它的结论”^②。斯大林正确地指出,这只不过是重申了列宁重要的名言:“发展就是对立面的‘斗争’。”^③因此,通过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加剧和决战貌似可以通往发展的道路即列宁主义的道路。斯大林残酷、严厉的阶级对抗方案就有了合理的辩证法依据。而且,这个

261

过程只能由党来指导,因为只有党才能正确地理解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与列宁主义的原则与实践是完全一致的。

鉴于共同的出发点,在每个重要关头,斯大林总能在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找到自己政策的依据,这就不足为奇了。他坚持说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列宁主义者,这完全合理。和列宁一样,他把对党的路线批评或对抗说成在客观上是反革命;和列宁一样,他给真实的或想象的反对派贴上侮辱性标签,并且指控他们有组织地犯罪;和列宁一样,他不给他们提供正当的法律程序来保护自己。我们必须记得,正是列宁一再坚持认为阶级的权力(或者国家的权力)得以运用的特定形式无关紧

^① J. V. Stalin, *Problems of Leninism* (Moscow, 1953), pp. 713—45.

^② *Ibid.*, p. 720

^③ *Ibid.*, p. 718.

要。列宁强调,既可以通过一个独裁者也可以通过民主的管理委员会来实现。它可能会有“独立的”司法部门的那种欺诈性的缺点,或者它可能会通过戒严令和草率的裁决来操控。在列宁看来,国家和阶级的权力表现自身的特定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实行的政策的阶级内容。斯大林并没有发明一种制度相对主义,这种制度相对主义在苏维埃对法定诉讼程序以及宪和法律尊严的蔑视中处于核心地位——相反,它完全是作为列宁主义的重要特征被提出来的。

俄国社会主义计划的实际内容也是如此。在新经济政策被迫取消之前,正是列宁把社会主义重新定义为产出和生产率的最大化。他明确地解释说,为了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结束学院式的管理方式,代之以一个人不可挑战的权威。列宁坚持认为,这种管理方式也与工作流程完全无关。由此可见,如果广泛的政治高压和/或劳动力的再教育对于实现增加生产的目标来说是必要的话,那么它就不仅是和社会主义相容的,而且还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按照列宁扭曲的逻辑:

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同个人管理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①

262 在孤立以及工业崩溃和无产阶级人数减少并失去其阶级特性的情况下,“必须加强纪律,加强个人管理和加强独裁。”^②列宁很久以前就曾坚决地主张,社会主义不仅对社会中统治与支配的模式毫无认识,而且也不关心权力是如何运行的。因此列宁主义在限制掌权者们的特权或者是为那些受到其行为伤害的受害者们提供补偿这方面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整个欧洲政治思想的包袱都以这种随便的和灾难性的方式被扔进大海里——它所关注的东西早在斯大林登上舞台很久之前就宣布为是无关紧要的,在社会主义的话语中并没有它的一席之地。毫

^① CW, 30, 476.

^② CW, 30, 516.

无疑正是列宁决定性地、彻底地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对话。

总之,在促使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成为可能的一切方面,列宁都是同谋。在每个阶段(直到最后一个阶段,那时已经太晚了),列宁都亲自推动了斯大林在党内和国内权力的上升,并且平息了对他的急切批评。更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早就宽恕作为苏维埃政权早期主要争论的政治性清洗,并且支持消除党内外所有反对派的中心。他的哲学立场和政治倾向的整个逻辑都倾向于得出一致的结论。他不仅宽恕自己明确鼓励对那些反对党的路线的人进行恐怖镇压,还大力坚持党有权控制一切政治力量和社会代表的得到官方授权的机构。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如果列宁活得更久的话,俄国革命就能少一些血腥,变得更加文明和人性化。毫无疑问列宁显然比斯大林更平衡,更有自信,也更有教养。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列宁不可能像被卷入斯大林所追求的那种放肆的、个人的报复行为和与农民的灾难性斗争之中。然而很可惜,所有这一切都有点离题。问题在于,数百年来,西方的政治传统已经认真地研究的正是如何限制和控制个人影响政治进程的问题。从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以来,政治理论家们(包括个人和社会集团)一直指望诸如民授权力、法定权以及独立的司法救济等这些措施来限制恣意行使权力的倾向。正是列宁毫不含糊地把整个传统思想仅仅作为资产阶级的辩护而弃之不理。正是他赞美无产阶级专政不受限制的、无尽的权力,他注定会认为,这种权力既可以由一个独裁者来行使,也可以由一个民主的管理委员会来行使。他并未给他的同志们以及苏维埃人民留下任何只言片语,甚至也没有留下任何借以向反对个人专断权力的人发起挑战的官方论坛。

第十一章 结 论

264

在本书中,我认为,列宁主义作为现代世界的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它来自于列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反映。正是这一事件促使列宁重新对当代资本主义性质及其历史演变做出评价;正是这一事件促使列宁重新对社会主义的性质及其实现道路做出激进的定义;最后,也正是这一事件促使列宁重新对谁是朋友敌人和谁是敌人做出激进的定义。

列宁确信这次战争表明资本主义已经最终失去了它的进步潜能,毫无疑问很多社会主义者都持同样的看法。他现在所要做的事件就是要使他们相信,希望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既是不可能的、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划时代转变的基本方法。在列宁看来,如果资本主义的确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点,那么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社会体制再也容纳不下其内部矛盾。当然,每个时代都有它自身的矛盾。在每个时代,这些矛盾都会愈演愈烈直至无法解决。它们最终表现为直接对抗的、无法调和的主张。在列宁看来,这就明确了革命转变的时刻,这种革命转变的时刻不仅不能避免或延迟,而且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去促成这种革命转变。列宁认为,在这一时刻,继续迫切要求体系内部逐步的、激进式变革就是不必要的、多余的。在一定的突破点上,社会(和一切自然现象)迅速发生质变,在这个过程中它的特征也发生根本

的改变,这种突破点的想法很清楚对于列宁的观点来说是根本的和必要的。因此,这连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列宁投身于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理由。列宁自己必须确信他的结论在方法论上是正确的,而他的对手反而忽略了或者是背叛了马克思的方法。渐进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都已经陷入了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他的研究中认为,中断、飞跃——临界点——是马克思学说的实质,这就不足为奇了。

认为列宁只是采用了一种适合他争论立场的哲学立场,即适合革命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的立场,这也太过于容易了。这些并不纯粹是一种实用立场的问题。第一,它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有着无可挑剔的依据。第二,它深刻地独创性地阐明了一直被第二国际所忽略的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思想根源。最后,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列宁独特的意象图,它一旦被采纳,将会具有强大生命力。列宁开始清晰表达的这种意识形态充满了辩证法的范畴。作为一种全面替代所有现存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它既是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也是列宁主义的历史起点。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其新意识形态的所有方面一样表达了自己明确的理论结论和理论界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现在只限于接受辩证法的规律。任何不同意从量到质的转化规律及其相关的连续性的中断(革命的飞跃)的主张的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列宁主义和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不言而喻的界限。这条界限是划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那些渐进主义者、改良主义者、费边主义者以及陷入那种列宁轻蔑地称之为的“沼泽”中的可能主义者(Possibilistes)之间。

哲学也许是(虽然并不必然总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起点,但由于它过于抽象的性质,哲学从来都不是意识形态普遍吸引力的基础。这里抽象的东西必须转化为其目标选民所认识和信服的对当代现实的经济、社会 and 历史的更加具体的说明。西方的文明为大量的卡珊德拉(Cassandra)所补充,他们既猛烈攻击左派的也猛烈攻击右派的利己主

义狭隘性和道德的颓废与滑坡。为了建立它所声称的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列宁主义必须要超越厄运即将来临的抽象(但是老生常谈的)预言。它必须证明在资产阶级秩序腐朽结构的范围内已经创造了建立一个更高级的文明的手段。在这里辩证法再次发挥作用,把当代作为对立面的统一加以揭露:它是垂死的和退化的,然而同时也孕育着转变的进步性潜能。

辩证法既是列宁主义的理论起点,也是列宁主义的历史起点,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这并不是构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动员力量之基础的正确方法。这些特点是由实用的当代世界图谱——它似乎是多么精确地描绘了巨大分歧的轮廓和标志,似乎合理地阐明其选民如何逐步发展到目前这种危险的状况,以及他们如何通过一些努力就能最终迈向尊严和幸福的国度——所赋予的。哲学必须被转化为历史学、地理学和经济学。这些也正是帝国主义理论的作用。

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包括大量补充叙述,所有这些叙述对于提供给其追随者的当代世界的意象图来说是都是重要的。首先,它强调的是历史。它不仅把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描绘为一种文明和一种生产方式,而且还补充说明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及其在资本主义最后的衰落阶段是如何遭到削弱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主义首次为其目标的实现设定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现在就是向社会主义的革命性转变的时间。所有那些对这些结论吹毛求疵的人、所有那些许诺未来成为革命者的人,都被列宁归入反革命阵营。在每一点上都存在着分界线的划分,而这正好也是一种独特意识形态的论述所必需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帝国主义也包含着对政治空间和政治时间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叙述。这就是地缘政治学,同样也是日程表和年鉴。它界定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和外围,这对后来的“依附理论”有着极大的影响。它认为发达的北方和西方直接剥削贫穷的南方和东方,通过设置贸易条款和使用资本的条件,使他们在全球经济的范围内继续处于从属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它把殖民地和半殖民的民族民主

267

革命和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结起来,作为对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可缺少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第一次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它给予了非欧洲人在那种被描述为人类进步运动的发展中以至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与列宁主义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地理叙事也包含着它自身的分界线。现在只有宣布放弃自己国家吞并的一切土地和殖民附属国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列宁甚至进一步说:只有积极支持和鼓励本国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的人,并且在战争的过程中,只有宣称本国失败才是罪恶较轻的人,才是一名社会主义者。

帝国主义经济或许更加平淡无奇、更好加以把握,但对于列宁主义的结构来说依然至关重要。在列宁看来,作为信用和资本来源的唯一控制者的银行的作用,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的衰落,又表明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紧迫性。进一步说,这也是轻松实现社会化并由人民来治理的象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作为金融资本主义统治人类史上最强大、最独裁、最富有侵略性的国家结构的最后阶段,同时也预示着民族国家的超越。只有承认作为一种文明和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最后衰落和寄生状态的人,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既承认它立即被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超越的必要性,又为革命性推翻作为资本主义最后防守阵地的国家结构而工作的人,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粉碎资本主义包含着粉碎帝国主义国家,并且苏维埃是**唯一**可以取代它的一种管理方式——它们具有普遍的意义。当然。在后来,苏维埃被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这种过时的观念也起着区分朋友和敌人、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作用。

列宁主义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始终都是一系列改良过的结论和描述,因为它不仅宁愿在与所有现存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温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中来定义自己,而且还特别喜欢在与所有其他种类的革命社会主义和所有马克思主义其他变种的激烈对抗中来定义自己。然而,为了能够抓住其目标选民,他有点抽象的理论不得

不转化为纲领性声明,然后转化为能够唤起大众行动的具体的政治口号。意识形态(至少,成功的意识形态)要确定能把握这些不同层次的表达的重要性——从方法论和哲学到一般理论,从纲领性声明到日常鼓动。就列宁主义来说,这种进展(或者,可能是回归)表现为从《哲学笔记》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国家和革命》、《四月提纲》和《布尔什维克能够维持政权吗?》这条线索。无疑在“终止战争”、“土地归农民所有”、“民族自由”以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列宁独特的激进政治口号中表达了最后煽动性的内容。

所有这些不仅对列宁来说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全新的东西,十分明显地是来自列宁的理论性和煽动性命题所受到的一种审查待遇。这些反应——甚至来自于他最忠实的似有者的反应——就是丑闻、愤怒、不理解。宣称列宁主义作为当代世界的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和意象图,其标定的特征在1917年4月之前就已经清楚地阐明并广为人知,就是违反所有事实。

只是在那时(1917年4月,译者注)列宁主义才成为现代世界的一种全面的、几乎是前后一贯的、综合性的意识形态。列宁主义第一次满足了一种独特意识形态论述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它现在具有:

(i) **为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提出一种全新的方法论。**虽然不是意识形态本身基本的组成部分,但是列宁主义仍然把坚持正确的方法作为追随者的一个条件。据称,辩证唯物主义能够理解过去和现在一切事物的内部结构和未来演变。科学就这样与预言配成对了。

(ii) **为人类定义了一个新时代。**它断言,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一种文明,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战争显示了它的最终矛盾,但同时它又为全球社会主义的繁荣、和平与和谐创造了条件。现在就是从阶级束缚向真正人类社会的转变时刻。

(iii) **确定自己的选民。**这就是受到世界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的贫苦农民和民族民主运动支持的发达国家的城

市产业工人。它毫不隐讳是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把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斗争整合成一种对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共同攻击。

269

(iv) 要向自己的目标选民历史地说明他们的现状是如何获得的以及他们如何会在推翻政权的革命中享有共同的利益。它也要指出资本主义怎样并且何时进入到一个最终的、退化的和压迫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通过用殖民剥削中的一部分超额利润来进行贿赂,阶级敌人已经渗入工人阶级中来并且削弱了他们的阶级意志。

(v) 为所渴望的未来提供一种鼓舞人心的愿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民族压迫、没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或者没有强制性的国家形态的世界。这是一个天真的但却永远富有魅力的社会解放和个人解放的理想:列宁称谓的“发号施令者的终结”。

(vi) 对如何从一个受鄙视的现状到达一个所渴望的未来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作为阶级的动员者和发言人的政党的作用,显然是革命转变的一个必要特征,但是它不是充分条件。金融资本主义本身创造了取代它自身的各种管理制度(银行、托拉斯、联合企业等等),而人民自己则通过建立苏维埃自发地收回他们失去的权力。

(vii) 把复杂的理论化的东西转化为易于理解的实际纲领和独特口语,从而能激励群众行动起来。这里的意识形态模式差不多是对一个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的反应。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它通过许诺获得支持并因此对所有竞争者的主张进行攻击。因此,对于列宁主义来说,恰当的口号就是分裂和对抗。

(viii) 把自己与其他一切竞争者的意识形态明确地区分开来。在每一个层面的论述中,从基本的方法论到日常的口

号,从民族问题到对战争的分析,列宁主义都确立了自身的分界线和描述。通过范围广泛的重大历史、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分辨出一个人是朋友还是敌人。如同一切意识形态那样,它最终把自己与所有竞争者划分开来。

显然,上述每一个要素对这种观念的综合体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观念的综合体就是闻名于世的列宁主义。因此,似乎同样清楚的是,这种综合体、在概括性和易于理解方面的这种不同层面表达的广泛性和共存性,不仅在1914年之前是不存在的,甚至都没有去思考。列宁主义还没有出现的必要。在这一点上,列宁觉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虽然遭到挑战,但是并没有被背叛。

270

列宁主义的部分力量(甚至更多的缺点)正是在于它觉得有必要对当下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理论解释。根据其说明,令人满意的理论从不满足于个别和偶然的情况。资本主义没有了它那时所展现的特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再能够确保其稳定性,或者就不能再生其权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它的战时的国家形式就表现为是不可避免的。在列宁看来,它们象征着一种延长的发展过程的终结,这种延长的发展过程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必然的。列宁决定论的方法论本身使他倾向于断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都了无新意。它们的战时形式是它们最终完成的形式,这种最终完成的形式只是显露了那种迄今为止它所固有的但却是隐藏着的东西。尤其是资产阶级国家只能作为残酷的独裁国家才能在未来继续存在。在列宁主义的分析中,无论它们采取何种宪政形式,现时代资产阶级国家从结构上都被迫追求与自由主义最初的进步性目标相反的目标。自由贸易和市场主权让位于垄断和国家指导,个人和团体的自主权被政府部门不断膨胀的权力所消灭。金融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只有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能在再生产自身并确保自身持续不断的权力。为了确保一小部分垄断者的持续的权力,必须要消灭民主和民权。帝国主义国家对内压迫、对外侵略,在不断扩大剥削范围的无止境的斗争

中,给世界带来了灾难和毁灭。它们都是与民主、和平或自由无关的纯粹独裁国家。

毫无疑问,辩证的方法在列宁主义的摩尼教(Manichaeism)结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比的恶与清白的善是相平衡;剥削和暴政与劳动和活动的自由相平衡;军国主义和战争与和平和国际合作相平衡;全能的国家与社会的授权相平衡;混乱和浪费与自觉地计划相平衡;殖民征服与民族自决相平衡。一个阵营飘扬着黑暗和压迫的旗帜、而另一个阵营则飘扬着光明和自由的旗帜。列宁主义历史的、辩证的和反诘的结构试图消除细微差别或限制条件。正如列宁不断吹嘘的那样,其政治学的全部实质在于消灭中间立场;消灭危险的空想家们,他们设想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价值和制度之间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妥协。正是因为它挑战列宁主义的绝对性及由此得出的对抗政治,所以它是所有团体中最危险的团体。因此,用政治术语来说,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渐进主义者、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事实上是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最恶毒的敌人。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他们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走狗和代言人,因此他们始终是共产党的主要目标。对社会民主党背信弃义的本质及其同情敌对阵营的这种教条主义的坚持,给20世纪的政治留下可怕的伤痛。在决定命运的两次大战期间,欧洲法西斯主义开始抬头,来自左派的抵抗潜能由于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分裂而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这种分裂带来的痛苦和紧张接近于希特勒上台。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争斗,对于列宁主义来说极其根本的,这种争斗也提出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当然,有很多评论家低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列宁主义理解的重要性。本书认为列宁主义自我定义的实质,就是重新恢复有关阶级斗争、迫切需要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尤其在与社会民主党争斗的过程中,这也是本书的部分研究内容。毕竟,正是温和主义者、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公开断言马克思必须要

加以“修正”。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历史预言并没有实现而且越来越不可能实现。工人并没有变得越来越贫困、中产阶级并没有消失、从而阶级“矛盾”正在缓和而不是正在激化。他们认为,无论如何,是时候丢掉谈论表达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的“矛盾”的习性了,这种思维方式是武断和过时的,并且最重要的是,它不再与当代现实相符合。由于马克思的结论被认为是错误的,那么他的方法也被认为是有欠缺的。因此,马克思学说中的伪“科学的”决定论的、必然主义的因素应该被一种更加公正和更加理想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的道德优越性的信念所取代。总之,正是因为它们扭曲现实,阻碍社会主义政治去适应一个变化的现实,应该放弃历史和科学互补的形而上学。

272

相比之下,列宁主义的激情和承诺来自于它坚持认为马克思在本质上是正确的。马克思对社会和经济的预测也许会暂时被不曾预料的对抗因素所掩盖,但是它们将会再现新的活力。从经济、民主或政治上要求改造资本主义和确保每个工人享有最起码的尊严的压力明显地变得越来越脆弱。尽管所谓的工人“领袖”全都背叛和“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客的奉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必然性仍然会表现出来。当然,这需要强有力地重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目标,这需要撕下所有反对这些目标的人的假面具。这需要建立一个组织,完全认真地对待革命的动员和准备工作。它将把非信仰者从自身和工人运动中清除出去。它最终会提出一种令人满意的经济和社会分析,不仅对马克思预言的明显失败(和所谓工人阶级“领袖”的背叛)进行解释,而且也说明资本主义实际上正在走向其最终的全球崩溃。列宁主义政党和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都明确打算恢复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直接性和现实性本质。正是列宁对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的全盘接受使他系统阐述了其关于虚假意识的独特发现以及党在纠正虚假意识中的作用。

如果是欧洲工人阶级都倾向于追求一种温和的、融合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纲领这种情况的话(并且它的证据是压倒性的),那么可以极其粗略地得出以下两种可能的结论:

要么(a)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和社会分析已经是错误的,因此,必须对他的革命性转变的纲领进行修正;

要么(b)工人阶级理论资源的不足使他们对自已的曾被他们背叛的领袖所操纵的现状和未来产生了错误评价。

273 为了揭穿第一种(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的)结论的虚伪性,重新回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列宁不得不强调危险的虚假意识概念。这个概念远没有违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世界中,虚假意识的概念对于保卫正统马克思主义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们必须说明,工人阶级怎样和为何要偏离其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任务,他们怎样和为何成为资产阶级价值和资产阶级政治的牺牲品。一句话,必须对英国的经验进行说明。但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如列宁(包括考茨基在这一问题上)不得不宣称,革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集体经验的一种自然的、必然的或自发的产物。因此,列宁不得不诉诸于作为工人阶级认识方式自然结果的虚假意识的概念。因而断定,真实的意识或正确的意识既不能纯粹从工人阶级经验的范围内产生出来,也不能从其共同的思想过程中提炼出来。相反,它产生于一种单独的和独特的经验与认识方式。列宁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最初**确切**阐明了社会主义的观念,只有他们能够把它从当代的曲解中拯救出来。唯有他们坚定的行动能够为马克思转变计划的实施提供必要的历史条件。

然而,在列宁主义的论述中,政党的重要性并不是来自其原始行动和动员的效果。相反,只有在它对于揭露党有特权掌握的现实的真正本质有用的范围内,其行动才有重要意义。没有党的专业知识指导的行动与悄无声息地辞职一样都是徒劳无益的。党所声称的科学当然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我们早就明白唯物辩证法是如何影响列宁主义的结论和主张的,我们只能描述一些党的优良认识方式的结论和后果。唯物辩证法声称,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物质的东西而不是别的東西所构成。因此,它们都经得起科学研究的检验,这种科学研究既

揭示它们进化的内在动力,也揭示它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科学的目的是从这些研究中得出有关事物变化的一般规律。因此,事物的变化是可认识的并且受规律的制约;也就是说,可以对事物的变化进行预测。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从量到质的转化——无疑可以运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正如它被运用于物质的东西一样。在这些领域内,发展也意味着相互对立的力量的不可调和以及一种现象最终被另一种现象所超越。“科学”的发现以这种方式愉快地与革命进程的需要相一致,为革命的进程提供神秘的科学必然性。工人阶级由于其自身的天命所不能理解的东西,经过用唯物辩证法科学武装起来的党的介入而被揭示出来。

当然,普通的积极分子很难掌握辩证的(或“科学的”)论证方式,但是,低估其在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则是相当错误的。对于信仰者来说,它所表达的正是作为系统解释一切现象的列宁主义的普遍的、包罗万象的性质。更为关键的是,它的解释方式被认为根本区别于、优越于一切“资产阶级”的认识方式或思维方式。人们不断声称,辩证唯物主义是工人阶级特有的思考方法。它不仅是一种确定性哲学,它也是激进分子的一种分离哲学。辩证的形而上学的运用也产生了其他一些后果。首先,它赋予了凭借在运动中所处于理论上的权威地位,能够成功地用自己观点来解释复杂事物的那些人以特别突出的作用。他们的观点一旦确立,形而上学本身就为他们的言论进行辩解。然而,更为不祥的是,自然和社会领域中的一切现象都经得起能够得出关于自然的客观的、能证实的命题的研究的检验,这种主张很容易得出这种结论,即任何特定的问题都只有一种解答可能是科学的。这反过来要求对决策程序做出安排以确保结果的全体一致。在这种构想中,科学因争论不休和意见不一而失去价值并且名誉扫地。因此,党铁板一块的特性部分来自于辩证法科学的虚假的确定性,并且的确也被辩证法科学虚假的确定性所维护。

科学的形而上学贯穿于列宁主义的全部著作。这构成党声称领导

工人阶级的基础,因为党掌握着一种阶级本身难以获得的专门知识。列宁一贯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把党与阶级混为一谈是徒劳无益的——这将放弃党的专门责任并且将会削弱而不是增强阶级的活力。275 同样清楚的是,考虑到党具有特别的话语权,并且阶级没有能力确切地论述独立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党决不会受制于工人阶级占支配地位的、多数人的观点。对于列宁主义来说,无论是运动的目标还是实现目标的恰当方式,都不能通过民意测验或者选举投票的结果而得出。如同所有把群众动摇的、不实的意见与受过训练的新会员的确定的、可以论证的知识区别开来的思考方案一样,它不仅仅是不可知论者,而且实际上是敌视民主的程序。

的确,列宁主义不仅敌视民主,而且也敌视政治;科学是二者的解毒剂。一旦当确保最佳回报的最有效的资源优化配置已经实现,并且当科技创新已经摆脱垄断资本主义的束缚而尽情发挥,那时,纷争的政治和嫉妒稀缺资源分配的政治将会消亡。正如列宁所说,少谈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在执政时,列宁不断地为最新技术创新所倾倒。他多方面赞美泰勒制(Taylorism)、电气化以及不经过挖掘从煤中提取天然气的革命性技术。当然,这种科技乌托邦主义最典型的事例还是列宁对整个国家电气化转型的潜力的过高评价。他把这种宏大的计划当作为克服城乡生活差别,把妇女从家务劳动的卑贱奴隶中的解放出来的“党的第三个纲领”。列宁坚持认为,每一个发电站不仅仅是发电的场所,而且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新技术的大众化的大学,是整个地区启蒙的中心。这是最新的最现代化的生产力,它不仅使俄国直接跨越到20世纪,而且同时也导致俄国人民的一种文化转型。总之,“共产主义”被表述为这种乌托邦公式即“苏维埃政权+俄国的电气化”。在这种论述中,列宁主义中政治的被取代和失势以及整个列宁主义的传统都可直接归因于它对一种过时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固守。

科学的形而上学为一种历史的形而上学所补充,历史的形而上学自称不仅知道人类努力的所有最终目标,而且还知道其推动力量以及

其最后的结局。列宁主义宣称,历史仅仅看到阶级的角色,并且在现代世界中只有两大基本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历史同样证明,阶级利益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只有通过革命性的对抗才能最终解决。帝国主义理论把现代社会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最终战争与同时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列宁主义从时间上精确地明确提出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端——全球的社会主义改造新时代的开端。这种全球社会主义改造新时代是突然发生的,并且以持续不断的进步活力来消灭资产阶级的一切文明。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以这种高度理论化的分析为前提的。把它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是有道理的,社会主义是在世界大战的最终危机之后不可能重建自身的这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唯一替代品。

资本主义政权已能够稳定自己、遣散部队、通过谈判达成战后和解,并且能够影响到向平时时期经济的过渡,当这一切变得明显时,列宁主义就面临一个根本的问题。正如马克思革命预言的失败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列宁和他的追随者要么坦率地承认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预测和世界革命的预测存在着分析上的缺陷,要么试图把责任归咎于第三方来解释这种明显的失败。承认前者实际上就是放弃他们自己主张的权力和否认十月革命正当性的全部理由。因此,他们诉诸这种观点,即其余的欧洲工人阶级,尤其是他们的领导人放弃了社会主义者的责任。他们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个有目的、有系统和有纪律的组织来领导。列宁远没有承认自己方面的错误,而是决定使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所有政党效仿的模式。只是在这一点上,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结构才在列宁主义的历史上能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苏维埃共和国在世界上仍然处于被孤立状态,因此,要使国外领导人为他们俄国同志的“失败”而有一种日益加深的负罪感。随着西方的每一次“失败”,随着每一年的过去,这种教训在国内得到越来越多的灌输——世界革命的失败并不能归因于列宁

277 主义的分析错误,而在于西方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人政治上的缺点。无论是列宁历史的形而上学,还是其重大论述都被再次证明没有任何缺陷,有缺陷的是群众的虚假意识和他们的领导的背叛或无能。

作为一种解释性的意识形态,列宁主义的范畴随着 20 世纪的发展而越来越不安全。它既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世界革命(至少在西方主要的高度发达国家)明显没能成熟的原因,也没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些不断增长的科学的国家计划并没有表现出比资本主义竞争者更加有效率和公平的证据。正如在起初的论述中,列宁主义含蓄地把自由主义的价值和承诺作为对战时帝国主义国家事实上已经创造的东西的一种内在批判,因此,执政的列宁主义诺言和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事实证明现在也是极其有害的。在工厂内实行真正民主和人民选举苏维埃的承诺是共产主义政权第一个牺牲品,它被列宁根据内战紧急来证明是不合理的。此后列宁主义远没有重建它们,反而得意于对一切制度安排持一种实际的相对主义。它现在宣称一个阶级借以行使权力的制度形式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关,就像它与资本主义毫不相关一样。资产阶级专政在只有由其先锋队——共产党来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中找到它自然的衬托物。原来被证明是一个残酷的幻想的自由王国,被喋喋不休地重复“苏维埃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民主无数倍而变得更加残忍。与之类似,坚决保证有意识和有计划地分配资源的优越性将会使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受到严重束缚的科技的巨大潜能得到释放,这种承诺同样没有变为现实。相反,“计划”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科技差距变得更大,事实上,所承诺的富裕的王国只不过是一个连最基本的日用品都匮乏的政权。

列宁主义的逻辑并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适应性和持续的生命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使一切都变得明白易懂的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特征是这种观点即到了 1914 年资本主义就是垂死的了:它不再能够再生产自身,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完全显而易见的是,资本主义比这种预测生存的时间越长,削弱列宁主义历史的形而上

278

学的经验证据就越多。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斯大林工业化早期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制定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计划越是暴露自身的缺点,作为党的统治权之基础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就是越不可信。

历史没有证明列宁主义的预言,科学也不是列宁主义的伟大救世主。相反,这两种傲慢的形而上学所造成的对民主和正当程序的不屑一顾最终得到了报应。在俄国中心地带和东欧外围地区,列宁主义被大众运动抛置一边,不予理会,这种大众运动早就不再对他们永远服从的建立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目标抱有幻想,早就不再对他们屈从于其摆布的科学和党的发言人抱有幻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列宁主义基本上不能适应民主的原则和实践。根据其喜好以陈旧方式试图控制势不可挡的运动最终被认识到它们都是——自己的基本原则和专横习惯与人民主权并不相容的这些人孤注一掷的企图。

与其他所有的意识形态一样,列宁主义创造出自己的世界:创造这个世界,建构这个世界并加以简化,以使它能被自己和追随者所理解。然而,与当代世界其他主要意识形态不同,列宁主义是一个人在极短一段时间内的思想产物。因此,列宁主义并没有诸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臭名昭著的社会主义等“广教会派式(broad-church)”的意识形态所有具有的明显缺点。这些主要思想在列宁主义产生之前大约一个世纪已经发展起来。因此,它们是高度综合的、复杂的和矛盾着的思想体,这种思想体在内部会对目标和策略进行持久的争论。从哲学上说,它们是折衷的和杂乱的,同一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信奉着极不相同的基本原理。毫无疑问,这些意识形态的内在复杂性经常使它们变得模棱两可甚至晦涩难懂,这对于未来选民来说是如此,对于学术评论者来说也是如此。它们的信息必然是含糊不清的,这是因为每一个都必须设法公平对待那些对其形成做出贡献的各种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因为民主政体的目标必须要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不断地陷入这种根据保护政权“包罗万象”的当务之急来权衡确定性和特殊性的信息的困难任务之中。基础过于广泛的要求也许会使其激

279 进分子感到苦恼并使选民迷惑不解,但是一个过于狭隘的政纲又容易使它被谴责为宗派主义。毫无疑问,主流意识形态内在的折衷主义和多样性特征是引起大众思想混乱和知识分子轻蔑批判的不竭源泉。另一方面,它也是所有广泛意识形态流派的持续适应性和敏感性的重要来源。在它们知识承传的宽广范围内,它们能够发现一系列新目标和支持性论点,这一系列的新目标和支持性论点在没有对一致性造成过多伤害的情况下,就成为对已改变的形势做出的一种一致的反应。

列宁主义并没有被想象为是一种广教会派式的意识形态。列宁主义的产生并不受民主话语的约束,它也不赞同民主话语的前提。列宁主义作为一个人的思想产物,无疑具有一种严密的内在一致性。它在哲学上、方法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一个整体,或者正如列宁经常说的“是一整块钢铁制成的”,并且毫无疑问这也是吸引知识分子的部分因素。列宁主义不仅只是一个人思想的产物,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是在极短的时间范围内构思出来的。从1914年到1917年是列宁主义形成的关键之年;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在1923年3月写下最后一个字,做了最后一次演讲,列宁于1924年1月底去世。以任何标准来衡量,列宁所反映和理论化的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段非常时期——国际战争、毁灭和破坏、帝国的崩溃、内战和重建的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列宁来说,理论化的过程就是把不一般的东西变成一般的东西和必要的东西的过程。正如列宁主义的哲学在研究客观知识的确定性一样,列宁主义的政治学也在探究有关阶级、经济结构、国家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明确主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正是列宁绝对确定的信念给他的同时代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或感到苦恼),并且引起了其追随者近似于崇拜的尊重。当他去世时,他成了不朽的圣人,并被无耻地誉为“永垂不朽的人”。他的著作被当作是经典的文本,并且成为衡量共产党人忠诚于列宁遗志的标准。斯大林转而用极其庸俗的问答方式将列宁的思想作为告诫其信徒的戒律。更加悲惨的是,即使是与格奥尔格·卢卡奇一样的富有经验和敏感的追随者也能够反思

说：在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已经停滞不前了。

正是因为这种不可挑战的基本原理是如此的广泛，所以这种忧郁的和谴责性的见解也就意味着是理论创新空间的极其狭小。列宁主义陷入了它的创造者“永远正确”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并且它也是被锚定在一个它无法逃避的时间框架内。最终，列宁主义傲慢地和独断地否定一切折衷主义和离心倾向。因此，列宁主义既不能更新和复兴自身，也不能面对真正民主政治的挑战，它的所有主张最终都被真正的民主政治一扫而空。

附录 1 1870—1924 年的重大事件和 列宁主要著作年表

281

1918 年 1 月 30 日之前的日期是俄国旧历的日期,它比 19 世纪西欧日历要晚 12 天,比 20 世纪的西欧日历要晚 13 天。1918 年 2 月 1 日起,俄国的日历与西方的日历就一致了。

参考文献是引自《列宁全集》,即 1960—1970 年莫斯科俄文第四版 45 卷的英译本。随后标出的黑体数字是卷册号的速记符号,紧接着速记符号之后则是页码。引自 1983 年哈丁(Harding, 1983)的参考文献是引自本人的著作《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文本》(*Marxism in Russian: Key Documents*, Cambridge, 1983)。

- 1870 年** 4 月 10 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诞生于辛比尔斯克。
- 1879 年** 列宁开始在辛比尔斯克古典学校学习。他的校长即费奥多·克伦斯基是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父亲,列宁在 1917 年 10 月推翻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政府。
- 1881 年** 3 月 1 日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恐怖组织民意党暗杀。
- 1883 年**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在日

- 内瓦成立及其领导人乔治·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一书出版。(Extracts in Harding, 1983, pp. 44—54)。
- 1886年 1月 列宁的父亲去世。
- 1887年 3月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因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被捕。
- 5月8日 列宁的哥哥以及其同伙被处决。
- 282 8月 列宁进入喀山大学学习。
- 12月 参加少数学生的抗议活动被逮捕并被驱逐出学校。
- 1888—1893年 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萨马拉的革命讨论小组;以校外生资格攻读圣彼得堡大学的法律学位;加入到与著名的民粹主义者的论战;开始收集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数据。
- 1893年 秋—冬 到达圣彼得堡,加入工艺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给涅夫斯基门地区的工人讨论小组讲课。
- 1894年 3月—6月 撰写他的第一本重要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¹, 133—332;这本长篇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反驳了俄国民粹派的经济、社会的观点,它是社会民主党在俄国国内的第一本出版物。
- 1895年 春 小册子《论鼓动》出现在圣彼得堡(in Harding, 1983, pp. 192—205)。
- 4月—5月 去国外与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流亡者取得联系;给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留下了深刻印象。
- 5月—9月 在法国、瑞士和德国结识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回到俄国,访问工人阶级中心,安排规划杂

- 志《工作者》(Rabotnik)的出版和发行。
- 11月—12月 圣彼得堡及其他地区发生罢工潮；列宁写了大量鼓动性传单并且准备出版地下报纸。写作《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2, 95—121。
- 12月8日 列宁和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其他领导人被逮捕。
- 1896年** 春 开始准备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综合研究。
- 6月 圣彼得堡纺织业爆发最广泛的罢工。
- 1897年** 1月 纺织业再罢工；列宁被流放到舒申斯克村三年 283
时间。
- 5月 到达流放地；继续写鼓动性的小册子和经济理论方面的文章。
- 冬 写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2, 327—51；继续从事俄国资本主义的重要研究。
- 1898年** 3月1日 在明斯克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代表大会，其宣言由彼得·司徒卢威起草(in Harding, 1983, pp. 223—6)。
- 7月 列宁和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结婚；他们共同翻译悉尼(Sidney)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所写的《工联主义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一书。
- 8月 列宁完成了其重要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草稿, 3, 25—632。这本著作于1899年3月出版,这可以说是他单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独创性贡献。它详细说明了脱胎于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过高利贷、商业、制造业以及工业资本主义等不同的阶段发展过程,并试图依据这种发展进程对国

- 家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进行定位。
- 8月 阿克雪里罗得有影响的纲领性的声明《目前的任务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日内瓦出版 (in Harding, 1983, pp. 227—41)。
- 11月 在国外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一次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资深成员被“年轻的”对手打败。
- 1899年 3月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出版。爱德华·伯恩斯坦出版了基影响深远的修正主义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英译本的书名是《进化的社会主义》〔*Evolutionary Socialism*])。
- 春 叶·德·库斯柯娃的《信条》出版,这是俄国修正主义的第一个宣言 (in Harding, 1983, pp. 250—3)。这激起了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愤怒地加以还击,4,171—82。
- 9月 《工人思想报》(*Rabochaya Mysl*)第7号的“单独增刊”出版——俄国修正主义最充分的论述(摘自哈丁的重要文章, in Harding, 1983, pp. 242—50)。
- 1900年 1月 列宁的流放期满。
- 2月—7月 为创办一份“正统的”报刊去对抗诸如《工人思想报》这样的修正主义报刊杂志的影响而穿梭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以建立联系,并且开始准备第二次党代会。
- 劳动节 哈尔科夫(Kharkhov)爆发大规模的游行。
- 8月 列宁在苏黎世与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讨论一份新杂志《火星报》的出版。
- 12月11日 列宁编辑的《火星报》问世,并且刊登了他社论

-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4, 366 - 71, 这篇文章提出的很多观点后来在《怎么办?》中得到详尽阐述。
- 1901年** 1月—3月 为《火星报》和《曙光》(*Zarya*)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是要求广泛地改组党,以便党能担当民主革命领导者的角色。
- 劳动节 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示威,在圣彼得堡的奥布霍夫国防机构(the Obukhov Defence)发生的激战中达到顶点。
- 1902年** 列宁一整年都在为《火星报》做编辑工作;组织《火星报》的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二次党代会。
- 2月—3月 列宁写作《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6, 109 - 150。
- 3月 《怎么办?》在斯图加特出版,5, 349 - 520。《怎么办?》意欲充当(或用作)《火星报》资深领导人为争夺第二次党代会主导权的公共平台。它强调了反对沙皇制在俄国全部斗争中的中心地位,因而有必要建立一个集中的、训练有素的和职业化组织起来的党,这个党的领导核心是党报的编辑委员会。
- 1903年** 继续为《火星报》做编辑和报道工作;在负责召集党的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
- 3月—6月 规模空前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在大多数主要城市爆发,尤其是在南部燃烧。
- 6月—7月 起草议事程序和议程,为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起草规则和决议。
- 7月17日 在布鲁塞尔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

- 表大会；列宁被选为副主席。
- 7月24日 代表大会移至伦敦。
- 8月2日 就其党规第一条的表述发言（规定了成为党员的条件）；马尔托夫与之竞争性的表述被采纳（摘自哈丁著作对这场争论的描述，in Harding, 1983, pp. 279—87）。
- 8月2日或3日 《火星报》核心小组在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上发生了分裂。
- 8月7日 在党报编辑委员会的组成上发生激烈的争论。列宁得到了普列汉诺夫的支持；他们的支持者现在叫作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以马尔托夫为其主要代言人的少数派则被称为孟什维克。
- 10月19日 列宁辞去《火星报》编辑委员会的职务。因为普列汉诺夫决定扩大编辑部，把被第二届党代会驱逐的三名编辑也吸收进来。
- 1904年** 2月 日俄战争爆发；全年党内都争论不休；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回顾了第二次党代会的危机及其后果，7, 205—425。
- 7月 由孟什维克控制的“新”《火星报》出版了罗莎·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在本书中她得出结论说，列宁的“组织概念是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大威胁”（in Harding, 1983, pp. 295—309）。
- 11月 各地激进分子召开地方自治组织会议；俄国自由主义者开始活动。
- 12月 旅顺港（Port Arthur）沦陷给日本；巴库大罢工。
- 1905年** 1月9日 流血星期日；加蓬神父在圣彼得堡沙皇冬宫领

- 导了大规模的、和平的游行示威，数百人被沙皇卫队屠杀；大罢工运动开始；列宁号召采取决定性的革命行动推翻沙皇。
- 4月12—1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谈到了武装起义的必要性，与农民的联系和未来革命政府的性质。
- 6月—7月 列宁撰写《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9，17—140。
- 8月 沙皇最终同意召开国家杜马或代表大会，但其有限的范围几乎遭到了社会所有阶层的拒绝。
- 10月 逮捕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几乎导致了全国大罢工和工人苏维埃或委员会的成立；沙皇被迫答应公民与政治权力以及实行民主宪法。
- 11月7日或8日 列宁抵达圣彼得堡并号召党发动武装起义。
- 12月 莫斯科发生大罢工和暴乱。
- 1906年** 1月 强烈要求联合抵制杜马；列宁积极准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
- 4月10—25日 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联合）代表大会。列宁就土地问题、国家杜马和武装起义问题发表讲话和作报告；列宁的党规第一条的表述被采纳。
- 7月8日 沙皇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斯托雷平牢牢控制独裁政府。
- 12月 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列宁的激进观点。
- 1907年** 1月 列宁和孟什维克之间就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的策略问题发生争执；孟什维克打算把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政党。

- 4月—5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 6月3日 沙皇蛮横地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
- 8月 第二国际(或社会主义者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和马尔托夫与会并强烈反对“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
- 12月 列宁再次遭到流放。
- 287 **1908年** 主要关注于反对一些著名的追随者(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并且关注于建立布尔什维克的新杂志。撰写他重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4, 19-361。
- 1909年** 继续与“造神者”争论,反对要求从国家杜马中召回布尔什维克代表的派别(所谓的召回派)。
- 1910年** 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就哲学和政治策略问题发生更多争论。
- 9月—11月 写作《论俄国罢工统计》,并且写下一篇重要的文章,分两部分分别于1910年12月和1911年1月出版,利用大量的数据来论证他在1905—1907年的政策,并且用来支持他的论点即先进工人(特别是矿工)和发达地区带领落后阶层或地区进行经济斗争,然后进行政治斗争。这可以看作是自1905年以来列宁关于政治策略的最重要的文章,它为工业无产阶级在同独裁统治进行政治斗争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提供经验上的论证,16, 395-421。
- 1911年** 列宁重新与普列汉诺夫联合起来,在报刊上打击所有企图贬低地下党的重要性的人(所谓的

- “取消派”)。
- 12月 主持外国的布尔什维克派会议,为最终与孟什维克决裂做准备。
- 1912年** 1月 在布拉格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会议完全由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这次会议上宣布将取消派(即孟什维克领导层)清除出党。
- 4月 沙皇政府在勒拿金矿区屠杀数百名罢工的工人引发全国性大规模的同情性大罢工;布尔什维克的日报《真理报》发行。
- 1913年** 1月—4月 罢工和游行规模继续扩大。 288
- 6月—12月 主要就国家问题作演讲和写文章:《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20,19—51。
- 1914年** 1月 在巴黎、布鲁塞尔、列日和莱比锡就民族问题作演讲。
- 2月—5月 写下《论民族自决权》,20,395—454,批判那些否定民族问题在当代世界中的重要性的人(尤其是罗莎·卢森堡)。
- 5月—7月 社会主义国际局——第二国际的执行机构——布鲁塞尔会议,召集制定共同纲领以避免迫在眉睫的战争。
- 7月23日
(西历8月4日) 法国和德国社会主义政党投票支持本国政府参战,第二国际在实际上破产。
- 7月26日 列宁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被捕。
- 8月23日 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斡旋下,列宁被释放,安全到达瑞士的伯尔尼;一到伯尔尼列宁就立即发表声明指责所有支持国家战争的社会主义者,并极力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争取社会

- 主义的国内战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21, 15 - 19。
- 9 月至 1915 年 5 月 详细研究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相关资料后来以作为《哲学笔记》出版，38。
- 10 月 在列宁的领导下《社会民主党人报》重新发行；这成为他接下来三年表达思想观点的主要媒介。
- 1915 年 2 月—7 月 列宁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了一系列反战文章，并增强布尔什维克流亡集团的凝聚力。
- 6 月—7 月 列宁开始研究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献，具体表现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的笔记后来作为《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39 出版。
- 289 7 月—8 月 开始热心于同反战团体建立国际联系，为即将在齐美尔瓦尔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反战国际会议做准备。
- 8 月 20—26 日 左派在齐美尔瓦尔德集会，列宁写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提出的决议草案》，21, 345 - 8，但没有人支持他的诉求。
- 8 月—12 月 继续为报刊撰稿；大力传播布尔什维克关于国际战争的观点。
- 12 月 为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作序，22, 103 - 8；他自己开始写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
- 1916 年 1 月—2 月 积极组织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并创办左派杂志《先驱》(Vorbote)，并为该杂志写了《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22, 108 - 21，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22, 143 - 57)。
- 4 月 11—17 日 反战社会主义者在昆塔尔召开第二次国际会

- 议,列宁在此次会议中以左派组织者的身份出现,并在齐美尔瓦尔德时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 6月19日 完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草稿,**22**, 185 - 305;本书堪称是列宁主义最重要的文献,它断言全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寄生的、军国主义的,并且其存在已丧失了历史合理性;它为全球范围内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
- 10月 写作《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简明扼要地阐述自己的重要观点,**22**, 105 - 20。
- 12月 在苏黎世图书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国家问题,直到十月革命爆发。
- 1917年** 1月9日 列宁在“流血星期日”周年纪念日发表《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23**, 236 - 53)。
- 1月24日至2月8日 俄国二月革命;士兵加入到全国性的大罢工和游行;强有力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突然出现,其他主要城市纷纷效仿;沙皇的大臣们被逮捕;临时政府成立(国家杜马的临时委员会)。
- 3月2日 沙皇放弃支持大公爵米哈伊尔;列宁得知二月革命的消息,准备回国。
- 3月4—26日 列宁在3月4日的《提纲草稿》中表明了他对二月革命的态度,**23**, 287 - 91,其主题在他的五封《远方来信》中得到了详述。
- 3月12日 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自西伯利亚流放地回来控制了《真理报》,并操纵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和临时政府采取更加和解的态度。
- 3月27—4月3日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离开伯尔尼去苏黎世,已

完成“闷罐火车”之旅的早期安排，在这期间列宁拟定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四月提纲》，24，21-6）；在彼得格勒芬兰火车站受到了热烈欢迎；晚间，他向彼得格勒充满怀疑并且冷漠无情党员工人工党提出了自己的提纲。

- 4月—5月 全力做好组织工作并为报刊撰稿使布尔什维克党相信他的新战略；破坏临时政府，削弱孟什维克的影响，反对战争的继续；在这两个月列宁写了90多篇文章。
- 5月4日 托洛茨基自美国回来会师列宁。
- 5月5日 有社会主义者和苏维埃领导人参与的新的联合政府成立；克伦斯基成为战争部长。
- 6月3—24日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 6月9日 布尔什维克号召举行被苏维埃代表大会撤销的游行示威。
- 6月10日 普通的布尔什维克成员加入到彼得格勒的大规模游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犹豫不决。
- 291 6月18日 反政府示威再起，抗议俄国在加利西亚的攻势。
- 6月20日 列宁被选进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 7月3—5日 彼得格勒发生的反对前线动员单位的骚乱和游行，这次骚乱和游行受到了普通的布尔什维克成员支持，并且在一开始也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中央委员会曾鼓动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但未能给予强有力的领导；临时政变；告败；列宁被迫转入地下工作。

- 7月7日 临时政府通缉列宁。
- 7月8日 克伦斯基成为政府总理。
- 7月10日至8月8日 藏身于拉兹利夫的列宁继续为报刊大量撰稿，继续写作《国家与革命》，**25**，387 - 496。列宁这本最“无政府主义”的著作详细阐发了他先前的结论，即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作为联合政府的民族国家和作为其典型统治模式的代表制政府都变成多余的了。在社会主义的结构中取而代之的是公社，公社的当代形式就是苏维埃。
- 7月16日 科尔尼洛夫将军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
- 7月23日 托洛茨基被捕。
- 7月26日至8月3日 俄共(布)第六次代表大会。
- 8月底 军队总司令拉甫尔·科尔尼洛夫试图暴动；布尔什维克的命运发生转变，红军势力增长。
- 8月10—9月17日 列宁在芬兰。
- 9月4日 托洛茨基被保释。
- 9月15日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列宁的来信《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26**，19 - 21，以及《马克思主义和起义》，**26**，22 - 7；至此，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中成为多数派。
- 9月17日 列宁自芬兰的赫尔辛基到维堡以便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施加更直接影响，但此时中央委员会拒绝列宁回到彼得格勒。
- 9月22—24日 列宁撰写文章《政论家札记：我们党的错误》，**26**，52 - 8。
- 9月26日 列宁就革命的军事方面的问题给伊·捷·斯

- 米尔加写信 **26**, 69 - 73。
- 9 月 29 日 列宁写下《危机成熟了》, **26**, 74 - 85。
- 9 月底至 10 月 1 日 写作《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26**, 89 - 136; 这是列宁关于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广泛的纲领性声明; 列宁关于金融资产阶级本身创造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机制的分析理论化, 并且极其激进地提议用人民政权取代国家政权。
- 10 月 6 - 8 日 列宁写下文章《论修改党纲》, **26**, 151 - 78。
- 10 月 7 日 列宁从维堡回到彼得格勒。
- 10 月 9 日 在托洛茨基的积极领导下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
- 10 月 10 日 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 列宁要求进行武装起义; 大多数人正式致力于这项行动; 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弃权。
- 10 月 14 日 列宁会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讨论起义的准备问题。
- 10 月 15 日 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对起义的前景并不看好。
- 10 月 17 日 列宁写下《给同志们的信》, 批驳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反对起义, **26**, 195 - 215。
- 10 月 20 日 军事革命委员会开始集结军队。
- 10 月 23 日 临时政府下令关闭布尔什维克的出版机构。
- 10 月 24 日 列宁在《给中央委员的信》中要求立即发动武装起义; 晚间, 列宁抵达斯莫尔尼宫, 帮助协调革命军队, 并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做准备。
- 10 月 25 日 上午 10 点, 列宁发表公告《告俄国公民书》, **26**, 236, 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 政权转到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加入彼

- 得格勒苏维埃,起草关于和平、土地以及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法令,**26**, 249 - 63;召集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布尔什维克人支持列宁的措施并且决定建立一个新政府。
- 10月26日 人民委员会的新政府成立;列宁起草《工人监督条例草案》,**26**, 264 - 5。
- 10月27—11月1日 克伦斯基召集克拉斯诺夫将军领导的军队;向彼得格勒进军;被打败并逃散。
- 10月29日 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就组成社会党人联合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 11月2日 经历激烈战斗之后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夺取政权。
- 11月4日 人民委员会的人民委员递交辞呈,抗议列宁拒绝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加入政府。
- 11月13日 颁布工人对所有工业企业进行监督的法令。
- 11月29日 中央委员会中建立政治局以负责处理紧急事务。
- 12月7日 建立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契卡)。
- 12月9日 开始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
- 12月14日 列宁写下《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26**, 391 - 4。
- 12月24—27日 列宁在芬兰短暂休假期间写下《怎样组织竞赛?》,**26**, 404 - 15。
- 1918年** 1月5日 在布尔什维克退出和立宪会议解散之前,列宁参与召集立宪会议。
- 1月6日 列宁起草《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26**,

- 434 - 6。
- 294 1月7日 列宁拟写《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26**，442 - 50。
- 1月8 - 9日 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列宁关于缔结单独的和约的提议，批准了布哈林同德国进行革命战争的计划。
- 1月10—18日 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
- 1月30日 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拒绝签署和平协议但宣布战争结束。
- 从1918年2月开始，俄国采用了新式历法，在这以后的日期与西方普遍使用的日期相同了。
- 2月18日 德国再次发动攻势，列宁坚持签订和约。
- 2月20日 建立临时执行委员会来处理政府会议之间的紧急事务；苏维埃政府颁布建立红军的法令。
- 2月23日 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同意签署和平条约。
- 3月3日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条约签署。
- 3月10—11日 列宁和其他政府官员从彼得格勒来到莫斯科。
- 3月8日 布尔什维克采用“共产主义者”名称。
- 3月14—16日 苏维埃第四次大会。
- 3月15日 同德国的和平条约正式通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从政府中辞职。
- 3月23—28日 列宁口述《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27**，203 - 18。
- 4月1日 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指导防卫和组织军事力量。
- 5月5日 写文章《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27**，325 - 54。

- 5月26日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 5月—6月 列宁关注严峻的食物供给和燃料情况；捷克斯洛伐克团暴乱；坦波夫的反苏维埃叛乱；交通系统的崩溃。
- 7月4—10日 列宁在全俄工农兵和红军代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295
- 7月6日 德国大使米尔巴赫被暗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
- 7月16日 沙皇及其家族成员在叶卡特琳堡被枪杀。
- 8月30日 列宁遭到范·卡普兰的枪击并受伤；重病两周；乌里茨基被暗杀。
- 9月10日 红军攻占喀山。
- 9月24至10月中旬 列宁在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休养。
- 10月8日 红军攻占萨马拉。
- 11月3日 匈牙利苏维埃革命爆发。
- 11月6—9日 全俄苏维埃代表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召开。
- 11月10日 列宁完成其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28**，229—325。
- 12月至1919年1月 列宁为党中央委员会撰写论文《论工会的任务》，**28**，382—5。
- 1919年** 1月 德国斯巴达克派政变失败，随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遭到杀害。
- 1月16—25日 工会第二次大会。
- 2月6日 红军攻占基辅。
- 2月22日 剩余的孟什维克报纸被关闭(**28**，447—8)。
- 3月2—6日 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28**，457—74。

- 3月18—23日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邓尼金军队在南方取得胜利;尤登尼奇的军队推进到彼得格勒;列宁全神贯注于军事问题并增强党的力量以应对这种威胁。
- 3月21日 库恩·贝拉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在匈牙利建立。
- 9月—10月 列宁忙于写作《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30, 107-17。
- 11月—12月 红军重新部署并成功地对尤登尼奇、高尔察克以及邓尼金发动攻势。
- 296 12月2—4日 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上做政治报告(30, 170-88)。
- 12月5—9日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
- 12月12日 红军攻占哈尔科夫。
- 12月16日 列宁写下《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30, 253-75。
- 12月30日 红军攻占叶加特林诺斯拉夫。
- 1920年** 1月初 红军攻占察里津和罗斯托夫。
- 1月25日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列宁为一长制和建立劳动军辩护(30, 309-13)。
- 2月 红军更名为“劳动军”。
- 3月29至4月5日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30, 443-62;大会决定出版《列宁全集》。
- 4月3-7日 列宁在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 30, 502-15。
- 4月-5月 写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31, 21-117。

- 5月1日 列宁参与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
- 6月初 写作《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土地问题提纲初稿》，**31**，144—64；与波兰开战。
- 7月4日 写作《关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提纲》，**31**，184—201。
- 7月11日 红军在对波兰的攻势中夺取了明斯克。
- 7月19—8月4日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31**，215—34；大会赞成列宁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31**，206—12。
- 8月15日 波兰开始反攻——红军迅速撤退。
- 9月22—25日 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 10月12日 列宁参加他的好友伊奈沙·阿尔曼德的葬礼。 297
- 10月20日 写作文章《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31**，340—61。
- 11月21日 在俄共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作了《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的讲话，**31**，408—26。
- 12月22—29日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作了人民委员会关于租让制和电气化工作的报告(**31**，461—518，532—3)。
- 12月30日 发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的演讲，**32**，19—42。
- 1921年** 1月25日 完成了他的小册子《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32**，70—107，承认了工会有必要保护其会员免遭苏维埃“官僚主义者损害”。
- 2月底 彼得格勒发生大规模罢工；季诺维耶夫领导下的市党部严厉反制；宣布发动反攻。

- 3月8-16日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作《中央政治工作报告》以及《中央政治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32, 170-209);《关于工会问题的讲话》(32, 210-13);列宁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新经济政策的开始(32, 214-18);列宁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禁止党派主义和自由化(32, 241-4)。
- 3月8日 爆发喀琅施塔得叛乱;波罗的海舰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被推翻。
- 3月20日 根据列宁的指示彼得格勒实行军事管制。
- 4月21日 完成小册子《论粮食税(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32, 329-65。
- 5月26-28日 主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
- 6月22至7月12日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为共产国际的策略辩护并作了《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32, 468-96。
- 298 8月20日 写文章《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文中列宁哀叹了无产阶级丧失了阶级特性,33, 21-9。
- 9月20日 写文章《关于清党》,33, 39-41。
- 9月27日 写信《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33, 42-8。
- 10月17日 发布一项重要政策声明,《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33, 60-78。
- 12月23-28日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作《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报告,33, 143-77。

- 12月31日 党的政治局批判列宁六周假期,1922年2月又延期到3月底。
- 1922年** 1月12日 中央委员会通过列宁的《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33, 184-96。
- 3月12日 写作文章《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33, 227-36。
- 3月24日 列宁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他关于提高入党条件的建议(33, 254-5)。
- 3月27日至4月2日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在会上作《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33, 263-310。
- 5月23日至10月1日 居住在哥尔克。
- 5月26日 列宁首次中风。
- 7月13日 告知他的秘书他可以阅读了。
- 10月2日 回到莫斯科,重新工作。
- 11月5日至12月5日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作报告《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33, 418-32。
- 12月23日 列宁第二次中风。
- 12月23-26日 列宁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他所谓的“遗嘱”,他要求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进行评价并且要求将斯大林免职(36, 593-7);有关列宁口授这些信件背景,参见他秘书的日记(42, 481-2)。
- 12月30日 口授日记《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36, 605-11)。 299
- 1923年** 1月4-6日 口授文章《论合作社》,号召重组国家机器并强调了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性(33, 467-75)。
- 1月9-13日 口授文章《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42,

433 - 40。

- 1月19 - 23日 口授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33**，481 - 6；列宁写于1923年的文章很直白并且对当局的缺点直言不讳；列宁质疑党能否执政，反思国家和官僚主义的无节制滋长，指出在文化滞后和国内外孤立的环境下领导人的缺点具有的危害。
- 3月2 - 9日 口授他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33**，487 - 502。
- 3月9日 第三次中风。
- 5月15日 移居哥尔克。
- 7月下半月 身体有所好转。
- 10月19日 最后一次短暂拜访莫斯科。
- 1924年** 1月21日 列宁逝世。
- 1月23日 列宁的遗体被运往莫斯科；放在工会大厦。
- 1月27日 列宁的遗体被安放在红场的临时陵墓。

附录 2 《列宁全集》导读

300

全书引用的是可用的完整英文版,即莫斯科 1960—1970 年出版的 45 卷俄文第 4 版《列宁全集》和外加两卷索引的英译本。该版本的第 41—45 卷含有摘自俄文第 5 版《列宁全集》增补的材料。

第 1 卷,1893—1894 年

主要文本有:《论所谓市场问题》;《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在这些文本中,列宁主要是想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分析优越于俄国社会主义者和民粹派的分析。商品生产和随之产生的社会分化的发展都有历史记载,政治战略上的最重要发现(不同于民粹主义迷恋农民)也被清楚地表达出来:“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p. 299)。”

第 2 卷,1895—1897 年

1895 年的著作反映的是向“经济鼓动”的转向以及期待从对经济斗争的控诉和拓展中产生政治意识(和组织)。《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清楚地论述了这种意识和组织的阶段性发展。列宁在其 1897 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中回到了政治实践的问题,他

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反对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p. 335),其政治组织必须是有纪律的、秘密的,并且是建立在专门分工的基础之上(p. 349)。长文《评经济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阐释了他早期反对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市场扩展的方式问题,并且他开始精确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第3卷阐释得更好(见下文)。

第3卷,1899年

这厚厚的一卷(多达658页)只有一篇文章《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篇文章是六年搜集数据,改进方法,追溯俄国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高利贷、商业、制造业以及工业资本主义等连续(和同时)阶段的演进的劳动成果。它仍然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彻底的和最具有独创性的贡献,它也规定了列宁所倡议的社会民主政治实践的界限,直到他在1914-1916年对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作了全新的清晰的分析。列宁主题的一些有用摘要可以在pp. 192-3, 310-18, 380-3, 541-51, 581-6, 596-9中找到。

第4卷,1898—1901年

本卷第一部分是对于社会主义者经济学论著的大量评论——并没有超出列宁早期的分析。其余的部分是列宁的一些重要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列宁尖锐地批判了俄国首次出现的“修正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他为《工人报》写的文章(特别是《我们的当前任务》和《迫切的问题》)早就预见到了他的纲领性声明《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火星报》创刊号社论),提出了夺取政治斗争领导权的紧迫性,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纪律严明、分工明确、拥有一份权威的中央报刊的政党。列宁得出结论说:“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p. 368)。”

第5卷,1901—1902年

本卷开篇就说：“‘怎么办?’这个问题，近几年来特别突出地提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面前。”列宁的《从何着手?》重申了资深的领导人要求重新控制支离破碎的运动并且把他们创办的杂志《火星报》作为党的权威声音——它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者和组织者(p. 22)。《怎么办?》的中心论点是提出了党在赋予工人运动以自觉性和组织方面的作用问题，提出了通过群众运动来促进这个进程的党在全国性政治斗争中的作用问题(尤其参见 pp. 368 - 441)。列宁反复指出，领导权已经落后于自发的运动(尾巴主义)，并且得出结论说，必须结束这种“混乱、瓦解和动摇”(p. 518)的时期。这就极其笼统地提出了党担任这种角色和领导跨阶级民主斗争在组织上的必要性(pp. 451—92)，在这里强调了集中、专业化、分工以及训练有素的职业革命家在强加工人附属的或“一般的”组织中的重要性。该文本是作为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火星报》派的明确纲领而写作的。

302

第6卷,1902—1903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社会主义者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目标；第29 - 33页是对“最低纲领”的经典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贯彻了这些意图，得出结论说土地国有化(p. 141)是最能加速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以及随之发生的农民阶级分化的措施。《告贫苦农民》试图论证农民经济上受压迫和政治上无权只有通过加强“农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同“城市无产阶级”(p. 423)之间的联盟才能得到改善。《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波兰社会党的争论，它支持无产阶级的“自决的自由”而不支持人民或民族的自决自由，并且强调有必要在俄国建立起单一的、非联邦制的政党。《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最完整地阐述了列宁提出的全国和地方党工作的责任模式和组织结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

草案》有列宁对党员的定义(第1条, p. 476), 这个问题在第二次党代会中引起了激烈争论, 也使《火星报》核心小组产生分裂。

第7卷, 1903—1904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回顾了第二次党代会就党章问题产生的分裂, 《火星报》编委会的组成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倾向的出现。《进一步, 退两步》极为详细地(并且相当索然无味地)说明了这些争论(也为列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辩护); 在回应罗莎·卢森堡对于这本著作的批评中, 列宁更加干脆地提出了这些事件的实质问题(pp. 474—85)。

第8卷, 1905年1—7月

本卷有大量论述反对沙皇制“革命”的开始与发展的短文, 在这些短文中, 列宁认为党必须掌握武装起义的领导权, 认为政治鼓动已经让位于内战(p. 211), 因此, 党必须掌握军事斗争的领导权同时向政治上不成熟的人敞开大门, 因为革命斗争会迅速地教育他们(《革命的日子》, 《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 《给波格丹诺夫和古谢夫的信》)。列宁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中的建议放在第293—303页, 并且
303 详尽地阐明了“部分军队”对于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性(pp. 560—8)。《关于公社的演讲提纲》早早预见到了《国家与革命》(第25卷)中的主题和他在1917年对国家所持的激进立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是一份有用的、简略的审视。

第9卷, 1905年6—11月

主要的文本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党要么积极领导受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影响的反对地主所有制和独裁的革命, 要么试图安抚可能背叛革命同沙皇制进行立宪妥协的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这个小册子还坚决反对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pp. 28—

9),并且声称“革命会把社会民主主义教给俄国的工人群众”(p. 17)。关于如何组织战斗队和武装小分队的介绍凸显了列宁关注,即武装革命必须恰当地加以准备(pp. 344—6,420—4)。

第10卷,1905年11月—1906年6月

《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列宁第一次把苏维埃评价为“临时革命政府的萌芽”(p. 21),它应当组织人民的武装,把土地分给农民,给各民族以自由(p. 25)。《论党的改组》重申了之前的要求,即在革命的环境中,党应该立即向群众敞开大门以克服地下工作的停滞。《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这篇有用的总结性摘要是在第91—92页,《土地纲领草案》这篇令人耳目一新的简要大纲是在第194—195页。

第11卷,1906年6月—1907年1月

《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为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参见第9卷)中的这种预言辩护,即宪法上的修修补补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并且强化这种见解即只有协调一致的武装起义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在《论抵制》中列宁号召他的追随者们利用第二届杜马作为鼓动的平台(p. 145)。《莫斯科起义的教训》和《游击战争》(pp. 171—8和213—23)中列宁提出,“在国内战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战斗的党”(p. 220),列宁还哀叹于这种情形,即在12月莫斯科起义的失败中,党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它的最终失败是因为缺乏人手和军事能力,不肯使用恐怖手段,也无法组织小的、灵活的游击队伍。《俄国政党分类尝试》标题很长,简要论述了在混乱的革命过程中,政党是如何逐渐成为经济阶级的或多或少的合格代表。

第12卷,1907年

本卷含有大量的短文、决议和讲话。有些是敦促积极参加国家杜

马的选举并分析选举结果的意义(例如, pp. 15—131);其他的则是直接针对孟什维克为争取自由派立宪民主党的支持并放弃军事斗争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机会主义”,例如参见《孟什维克的策略纲领》。列宁关于民主革命两种可能的结果的预言现在变成了在“美国”道路或“普鲁士”道路——完全民主和自由的资本主义,或用议会形式以及保留封建所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粉饰门面的专制主义中进行选择(pp. 355—6)。

第 13 卷, 1907—1908 年

本卷中的文章堪称是全集中最好的。也许《〈十二年来〉文集序言》这篇重要文章——列宁对于直到那时他自己所写文章的一个自觉的自我批评——是个例外。尤其是列宁奉劝不要将《怎么办?》的主题与其背景相脱离;《怎么办?》正好是对《火星报》立场的一个总结(p. 102);它有时是“狂暴而残酷的”(p. 104);也是“用论战方式来纠正经济主义”(p. 108)。《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pp. 219—429)对于东拉西扯地使早期的分析复杂化;第 295—300 页和第 313—322 页关于土地的国有化问题,第 421—429 的结论极为典型。《公社的教训》(pp. 475—8)再一次提醒革命者要防止半途而废和对敌人仁慈的危险,但没有说明内战在清除爱国主义幻想方面的功效。

第 14 卷, 1908 年

实际上,本卷主要是列宁的一篇重要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pp. 19—361)。它重申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真理,反对一切驳斥或者“修正”它的人。后者是列宁以前的追随者(特别是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他们受到了恩斯特·马赫的影响并提出了所谓的“经验一元论”。列宁认为这种离经叛道将导致“造神学”,忽视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最终放弃革命的意识形态。第 6 章(pp. 314—58)很可能是这本书最容易理解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重申了列宁的信仰,即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整块钢铸成的”，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于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p. 326）。

第15章,1908—1909年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pp. 31—9）是列宁为数不多的直接面对伯恩施坦反对“崩溃论”的一般观点。在关于社会主义论述的另一端，列宁反对诸如古斯塔夫·爱尔威的激烈的反军国主义立场。《对目前时局的估计》对革命尚未完成的任务进行了冷静地分析，并鼓起勇气澄清了经济和政治的分歧。《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是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政治战略和阶级分析问题上的分歧的发展和现状的一种综述。《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重复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即资本主义带来了无产阶级的地位丧失和贫穷，为宗教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本文也指出了俄国特殊的情况，因为它没有经过直接的反宗教的资本主义阶段，因而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留下了反宗教的任务。

305

第16章,1909—1910年

继续激烈、无聊的论战，反对布尔什维克派中的召回主义者，并且也反对孟什维克，孟什维克现在被称为“取消主义者”，他们低估了秘密的党的地下组织的重要性。本卷唯一真正重要的一篇文章是标题平淡无奇的《论俄国罢工统计》（pp. 395—421）。这篇文章利用了大量统计学数据来论证1905—1907年间布尔什维克理论和实践的“客观的”正确性，来为《怎么办？》中的一些论点——先锋工人（特别是矿工）在开展经济和政治斗争、促进比较落后的地区中的作用；党有责任要响应并领导这部分阶级——辩护。在《论〈路标〉》一文中，列宁批评了自由派/立宪民主党的知识分子，而在《两个世界》一文中，他则从党坚定地反对一切种类的修正主义中感到了一点慰藉。

第 17 卷,1910—1912 年

本卷中没有什么重要的或是有趣的(除了热心的历史学家)文章。列宁不断地哀叹党的糟糕状况及其组织的毁灭(例如参见第 188、453 页),但这并没有阻止 1912 年的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宣称对党的名称具有专有权(p. 454)。《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pp. 39—44)简单地描述了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以及面临的困难。

第 18 卷,1912—1913 年

306 列宁的文章反映了因屠杀勒拿矿场工人引发的罢工潮以及第四届杜马选举的政治动员而出现的新的乐观状态。列宁重新恢复了他在 1905 年提出的激进纲领,并要求重新组织政党,例如可参见《革命的高潮》(pp. 102—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当前任务》(pp. 150—7)。继续同“取消派”论战,强调秘密的地下党的中心地位:《秘密的党和合法的工作》(pp. 387—96)。《革命罢工和街头游行示威的发展》(pp. 471—77,参看第 541—542 页)这篇文章强调了群众性政治罢工对于激发农民和士兵的重要性。《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简要地总结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pp. 485—6)。《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pp. 582—5)简要地预见到了随后几年将要阐释的主题——世界历史的分期,亚洲革命,自由主义的破产以及帝国主义的危险。

第 19 卷,1913 年

这个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pp. 23—28)简洁地阐述了这样一种流行见解:“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p. 23)。《资产阶级与和平》说的是权力掌握在银行家和大资本家手中,资产阶级正变得反动、军国主义化(pp. 83—4,参见第 106—107 页)。《几个争论的问题》(pp. 149—69)是列宁对与取消派(孟什维克)争论所作的最好总结,使他论战的思路变得完整一致。《革

命无产阶级的五一游行示威》重申了列宁认为大罢工是革命动员的工具的观点。《民族问题提纲》和《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承认民族自决权(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并反对文化自治(pp. 243—51, 539—45)。

第20卷,1913年12月—1914年8月

含有几篇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的文章,这些文章对后来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制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pp. 19—51)根据变得更具有国际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变化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来确定民族主义的相对进步性。《论民族自决权》(pp. 395—455)回顾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争论,结束语(pp. 451—4)中阐述了困难的准则,即党支持分离权,同时也坚持“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列宁反对强迫使用官方语言,也反对在民族问题上使用强制力(pp. 71—3)。本卷还有大量与民粹派、立宪民主党人、取消派等日常批判对象的争论;《泰罗制就是用机器奴役人》(pp. 152—4)察觉到了一个新的批判对象。

第21卷,1914年8月—1915年12月

本卷中占优势的主题是对战争性质的分析和在已改变了的形势下制定社会民主党的革命任务。列宁的直接反应在《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pp. 27—34)、《社会主义与战争》(pp. 297—338)和《在错误的旗帜下》(pp. 137—57)得到阐释,最后一篇文章特别重要,因为它描述了资本主义三个划时代的发展阶段,最终到达反动的和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利用超额利润来维持自身,这种超额利润过去是用来获得工人贵族的支持——列宁对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所作的条理最清楚描述。《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pp. 35—41)再次分析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及其领导人的背叛;《第二国际的破产》(pp. 207—59)又把机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以及缺乏正确的历史和理论方法联系起来。《齐

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决议草案》(pp. 345—8)宣告了帝国主义在战争中破产,和社会革命时代的到来。列宁在《卡尔·马克思》(pp. 46—79)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各自作了最充分的阐述。

第 22 卷,1915—1916 年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pp. 187—304)无可比拟的是列宁主义作为国际意识形态最重要单一著作。它对战争和工人运动处于支配地位的机会主义提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它为列宁的这个结论辩护,即资本主义已变成垂死的并且必然是军国主义的,然而同时它通过将它的矛盾全球化而创造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虽然是以不平衡的方式)。因此它边缘地带国家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相一致提供了一种理论辩护。《为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的序言》对列宁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观点的主要来源缺乏敬意,而更多的是批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pp. 103—7)。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pp. 143—56)和《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pp. 320—60)这两本小册子中列宁继续关注民族问题。后一篇文章了无新意,但前一篇文章很重要,因为它按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了三类国家,揭示了民族主义在它们中间的截然不同的内涵。《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完善了列宁早期的分析,即“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党领导人的背叛有其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根源,现在是时候清除它们了(pp. 108—20)。

第 23 卷,1916 年 8 月—1917 年 3 月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pp. 105—20)对列宁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分析同对机会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破产的政治分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立场作了一种精彩的、简明的阐述。《青年国际》批判性评论了布哈林关于国家观点,认为他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关于 1905 年革命的报告》(pp. 236—53)强调了革命斗争

作为阶级发展的催化剂的重要性,并且声称俄国革命是“未来欧洲革命的序幕”(p. 252)。在《提纲草案》(pp. 287—91)中,列宁对于沙皇政府被推翻的消息十分兴奋,他呼吁苏维埃组织起来,人民武装起来,不要相信政府或是任何护国主义者政府;这些主题在他《远方来信》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远方来信》实际上制定了他在十月革命前的理论和策略立场(pp. 297—342)。在第三封和第五封信中他开始阐明他的建立无产阶级民兵基础上的“公社国家”观点,这也是他首次提出这个观点。《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把激进的俄国革命视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第24卷,1917年4—6月

列宁的《四月提纲: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pp. 21—6)将《远方来信》(见上文)的观点概括成十条尖锐的使他的布尔什维克追随者震惊的命题。列宁坚持认为苏维埃可能是唯一与“公社国家”相容的革命政权形式,他还要求“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僚机构”(p. 23),这些主题在《论两个政权》(pp. 38—41)、尤其是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pp. 57—88)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颂扬了建设一个公社国家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可行性。这些目标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列宁坚持把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论无产阶级民兵》(pp. 179—82)继续谈论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压迫机构的话题,正如他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pp. 228—43)所做的那样。后者更加强调说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一条,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化的时代,唯有国际行动才有效。《必将到来的灾难和不讲分寸的诺言》(pp. 424—30)提出了单一国有银行、工人对生产的监督、普遍劳动义务制作为摆脱经济灾难威胁的方法(参见第513—515页)。列宁在《党纲的修改》中提出的建议是用隐秘的形式概述了他对帝国主义的理论论述,对战争的分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将要实行的经济、政治和行政措施。它是十月革命的总纲(尤其参见第469—79页)。

第 25 章,1917 年 6—9 月

《国家与革命》(pp. 397—496)贴切地解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国家的著作以及其追随者所作的扭曲。军事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使得重新采用激进措施来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没有常备军、警察和官僚机构的公社式的国家形式变得更加必要。管理、生产和分配将变得十分简单以至于一切人都可以“参与国家管理”(p. 477)。这不再是遥远的纯粹理论性方案,这一点在列宁同时期的理论陈述、流行的小册子和演讲中也清晰可见,例如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pp. 327—69)中,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所写的篇幅最长并且最详尽的纲领。

第 26 卷,1917 年 9 月—1918 年 2 月

309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pp. 90—6)再一次强调了第 25 卷中提到的一些主题——苏维埃是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机器”,它废除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人民的武装;通过垄断资本主义创造的机构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p. 108),尤其是指导生产、分配和消费并且已经是“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机构……社会主义社会的骨骼”(p. 106)的大银行。列宁声称“我们可以立刻吸引 1 000 万人,甚至 2 000 万人组成的国家机构从事国家管理”(p. 114)。这篇文章比任何其他文章都更好地把列宁对金融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群众参与的变革潜力的信念短暂地综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列宁所有的著作中最复杂和最连贯的文本。《局外人的意见》关注更为平淡却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把起义作为一种艺术来对待并且整理出五条原则(p. 180),参见《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第 22—27 页。从九月中旬开始,列宁就呼吁布尔什维克去夺取政权。他的信件变得更加坚决,在写于十月革命前夕写的《给中央委员的信》(pp. 234—5)达到顶点。新政府的《和平法令》(pp. 249—53)、《土地法令》(pp. 258—

60)和《工人监督条例》(pp. 264—5)都是由列宁起草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提出了解散立宪会议的种种借口,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是少数派(pp. 379—83)。《怎样组织竞赛?》重申了相信只要反对“一切死套公式”和“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p. 413),人民就能够对生产和分配进行有效计算和监督。

第27卷,1918年

列宁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pp. 87—109)带有一种全新的、冷静的、几乎是忧伤的语调——俄国正在倒退,国家机器的改造和生产力的恢复几乎没有进展,没什么军事力量可言,世界革命是“童话”(p. 102),然而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p. 98);一个有组织的撤退期。《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pp. 237—77)反映了新的矛盾心态。他一方面坚持《国家与革命》中的主题,与此同时他又坚持雇佣资产阶级的专家,实行一长制,扩大收入差距,引进泰罗制,终止新闻控制,“实行个人独裁权力”(p. 268),重新坚持“劳动时的铁的纪律”,并且无条件地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即苏维埃领导人的意志(p. 271)。《论饥荒》(pp. 391—8)清楚地传递这种信息,即非常时期需要由无产阶级所组成的钢铁般的队伍来领导,用独裁的办法来对抗农民和一切反对派。《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pp. 406—7)概述了列宁的严厉措施。

第28卷,1918—1919年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pp. 229—323)是对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批判,列宁极其相对主义地宣称,管理形式相对于它的阶级目标来说是第二位的;他为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基本组成部分的“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p. 236)的专政辩护,认为它优于“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p. 246)。就像孟什维克一样,考茨基不懂公社的重要性,不会分析苏维埃的阶级基础,不理解农民的革命潜

力。列宁的《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pp. 412—28)重点重申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或资产阶级专政间做出一个选择。也仍然(1919年1月)坚持认为,广大人民将通过工会参与到国家管理的实际工作中来,但这需要时间,因为工人还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p. 424)。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提纲和报告》(pp. 457—74)回顾了苏维埃政权的理论背景,并把它与资产阶级的民主作了对比。

第 29 卷,1919 年 3—8 月

《成就和困难》(pp. 57—88)是一种不寻常的坦白分析,主要是国家政权在国内外事务中遇到的困难和失败。他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关于党纲》承认社会主义的建设成绩并未达到预期的要求,承认之前的工人监督的法令是“无力、盲目和偶然”(p. 154),管理事务做得也不好以至于工人群众只是在理论上而不是实际上能够参加苏维埃机构(p. 179)。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下”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pp. 182—3)。《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pp. 305—13)介绍了共产国际的简史,总结了俄国能够开创社会主义革命并获得第三国际领导权的六点原因。《伟大的创举》(pp. 411—34)颂扬了第一个星期六义务劳动(义务的无偿的假期劳动),肯定了城市工人的领导作用,把共产主义定义为“更高的劳动生产力”,需要来自工人阶级的纪律和模范生产以及清除党内的投机分子。他提出“不允许广泛使用‘公社’字样”(p. 431)。到了7月份,列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党的专政(p. 535)。

第 30 卷,1919—1920 年

《苏维埃政权和妇女的地位》(pp. 120—3,参见第 371—372 页)是一个罕见的、不成熟尝试。首次提到了工人阶级的疲惫不堪(p. 186)。《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pp. 253—75)是一篇以一般的方式

为布尔什维克战略进行辩护的重要文章——乡村不能和城镇等同，农民不能和工人一样；布尔什维克在决定性地点（特别是在军队中）和决定性时机拥有压倒性优势。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通过运用国家权力来满足人民的经济需要，使社会主义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给国家的管理者提出了一些较适当的目标——只是向英国看齐；苏维埃政权本身受到了效率低下的威胁，“我们得坦率地承认，我们还非常不善于……当组织者和管理者”。《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pp. 502—15)对无产阶级的软弱以及总体上缺乏组织能力和纪律感到异常沮丧，尤其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侈谈平等、自由和民主就是胡说八道”(p. 506)；“必须加强纪律，加强个人管理和加强独裁”(p. 514)。

311

第31卷,1920年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pp. 21—118)。列宁第一次试图在世界的范围内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和苏维埃的经验当作是有效的、可复制的。和混淆了阶级和党的专政的那些左派人士进行争论，强调了作为决策机构的俄国共产党的作用。革命需要的具体条件(pp. 84—5, 94—5)。《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pp. 206—11)暗含了布尔什维克模式的普遍化。《青年团的任务》(pp. 283—99)有趣地断言，目前一代只能毁坏这个世界，下一代将建设一个新的世界，并“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p. 299)。无产阶级的文化并不是拒绝接受过去的文化，它是过去文化发展的顶峰；然而，道德“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p. 291)。《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pp. 340—61)坚持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证明了专政是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道路。专政被赤裸裸地定义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p. 353)。《关于生产宣传的提纲》(pp. 404—6)重新要求媒体减少政治的篇幅，集中关心生产，多引导而不仅仅是报导。《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pp. 408—26)强调了经济重建的新

任务和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的重要性,在这个经济计划中,电气化是关键(“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第419页),把这个计划当成是“我们党的第二个纲领”(p. 514)。指出了无产阶级精疲力竭的困难,大多数人低下的文化水平,官僚主义方法的盛行和不负责任的批评。

第32卷,1920—1921年

在《论工会》(pp. 19—42)和《再论工会》(pp. 70—107)中,列宁反对将工会纳入国家机构——有必要保留工会来防止工人遭受国家的官僚主义弊病。然而,他们不配领导国家管理,因为“无产阶级都还那样分散,那样被人鄙视,在某些地方还受人收买”(p. 21)。因此,工会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共产主义学校的“传动带”(p. 98)。工业民主被视为危险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任何民主……都是为生产服务的”(p. 81)。列宁的《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严厉谴责了党内的工人反对派团体,认为他们的流行观点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p. 199),在危机的形势下,统一是必要的并且所有反对派都必须闭嘴。列宁后来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pp. 241—4)禁止“产生具有不同纲领的集团”(p. 241),要求解散已有的类似集团。他的《关于粮食税的报告》(pp. 214—38)标志着粮食贸易的国家垄断的一个突然逆转并且预示着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经济系统的危机需要对农民做出让步。《粮食税》(pp. 329—65)是一个更广泛的理论大纲,试图在列宁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体系中用国家指导来调节市场,国家资本主义本身被认为与战时共产主义和原始的、小规模生产和交换相比是一种巨大进步。

第33卷,1921—1923年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pp. 60—79)评述了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错误,因为无产阶级丧失了阶级特性并

且工业发展停滞不前(p. 65);在退却期专有权秩序和纪律;野蛮行为、官僚主义、贪污受贿和文盲是需要应对的敌人。《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重申了32卷中的很多主题;工会在企业的管理中没有任何作用(p. 189),必须训练大众“管理社会主义工业”(p. 190);调动大众支持国家计划;并且充当共产党领导的传送带的作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pp. 263—309),对当前的形势和未来任务作了一种暗淡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共产主义者缺乏管理经济和贸易的能力;他们甚至没有认识到“他们必须从头学起”(p. 275);99%的共产党员“不会干自己那一行”(p. 309)。《论合作社》(pp. 467—75)又认为合作社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是连接农民和无产阶级国家的纽带,但是政策的成功依赖于改革“完全无用”的国家机器并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p. 474)。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pp. 481—6)中,列宁方案的核心是通过使全部机构都处于权重位高的惩戒性的工农检查院的监督之下来革新“革命前的糟糕透顶的”国家机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pp. 487—502)是列宁最后的文章,继续批评了“可悲的”、“令人厌恶的”国家机构,在瞎忙的五年中所创造的东西“被证明是无用的,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p. 489)。(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工农检查院是最糟糕的组织,必须强令加以重建和重组。国家机关必须“厉行节约”(p. 501)。列宁最后反思了陷入僵局的国际形势——资本主义没能推翻社会主义革命但严重地妨碍社会主义的发展;然而,从长远来看,“俄国、印度和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p. 500),但要获得胜利它们必须变得文明。

第34卷,信件,1895—1911年

列宁与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波特列索夫的200封信——《火星报》的创办、党纲的起草、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集以及列宁从《火星报》编辑部的辞职(p. 89)。与波格丹诺夫、勒柏辛斯基

(Lepeshinsky)、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以及其他人的通信则谈到了组织和策略问题。

第 35 卷,信件,1912—1922 年

收录了 321 封信件,很多是写给高尔基以寻求支持,还有很多是写给伊涅萨·阿尔曼德(Inessa Armand)(在列宁的所有信件中语气是最为温和、恳切的)。从 1914 年到 1917 年,列宁与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Kollontai)的信件来往最为密切。在致尼·伊·布哈林的一封信(pp. 230—1)中反对在国家问题上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但是六个月后在致柯伦泰的信中(1917 年 2 月)又承认,比起考茨基,他更认可布哈林的观点(pp. 286—7)。本卷还收录了很多秘密电报和有关具体政策方面的指示。

第 36 卷,信件和文件,1900—1923 年

有 1900—1903 年期间列宁就创办《火星报》致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重要信件。《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pp. 297—301)的新闻报道很好地表明了列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应,并且列宁的《四月提纲初稿》(pp. 431—2)也很重要。他的《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下的任务》(pp. 560—5)揭示了党对法律系统的操纵,列宁坚持说,应当进行带有惩戒性措施(包括枪决)的“示范性的审判”。本卷中尤其重要的文件就是列宁的“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这是他在 1922 年 12 月至 1923 年 1 月期间口授给党的最后一封信。列宁反思了党的领导层分裂的危险,他还对主要领导人的优点和缺点作了比较模糊的审视;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必须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他得出结论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问题不是小事,或者说,它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小事(p. 596)。”《关于民族或自治化的问题》(pp. 605—11)在格鲁吉亚分离问题上再一次谴责斯大林的恶毒和俄罗斯沙文主义。

第37卷,给亲人的信,1893—1922年

列宁坚持定期,差不多是每周都给他的母亲和家庭其他成员写信。这些书信显示列宁很关心家人的健康以及与业务相联系的额外福利——资金、获得书籍以及和出版商的联络等等。这些信中还有涉及列宁家庭的日常生活、旅游和罕见的娱乐的大量细节。

第38卷,哲学笔记

包括列宁在1895年到1916年间对于具体哲学著作的批注和思考。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08—1909年,这时他主要参考普列汉诺夫和德波林的著作——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第14卷)一书的写作做准备;二是1914—1916年,这时他主要的参考书是黑格尔的著作。在《谈谈辩证法问题》(pp. 359—63)中,列宁重新发现,被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辩证法是“问题的实质”(p. 362)。

314

第39卷,关于帝国主义笔记

主要由列宁的笔记构成,来源多种多样,有德语的(占绝大部分)、法语的、英语的以及俄语的笔记,编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参见第22卷)一书。这些笔记包括了对大量文献的摘录、数据表和章节的写作计划。最有趣的材料中之一是本卷最后部分尤其是第734—742页和第754—761页的文章和演讲的计划。

第40卷,土地问题的笔记,1900—1916年

列宁比其他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更加一贯地致力于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进行研究。第186—235页和第295—405页充分体现了他对于数据的精通和兴趣,但更有趣的材料是本卷的第一部分(pp. 29—70),其中包括列宁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关于土地问题的重要著作的写作计划和提纲。

第 41 卷, 1896—1917 年

本卷中有很多文本性的材料(常常是简要的笔记,篇幅基本不超过一页纸),这些材料对专家来说很有价值。《答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一文意见》(pp. 53—9)证明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火星报》阵营内部的紧张关系。《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三个提纲》(pp. 113—22)证明列宁早在 1904 年就对巴黎公社有不寻常的兴趣。1905 年关于传单的草案和计划(pp. 171—6)、《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和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体》(pp. 204—7)、《第三届杜马和社会民主党》(pp. 209—16)以及《关于俄国组织问题的发言》(pp. 250—1)都是更为重要的“新”材料。写于 1912 年的《告俄国全体公民书》(pp. 262—6)是对国际政治、战争和沙皇的对外政策的一次不同寻常的广泛审视。重要的文献有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争论(pp. 247—7, 308—10),关于民族问题的大量笔记(pp. 313—23),社会主义和战争(pp. 337—55),关于昆塔尔会议的材料(pp. 360—79),1917 年对于党纲的修改(pp. 418—24),以及仅有的一次提到他被处死的哥哥亚历山大(p. 430)。

第 42 卷, 1917—1923 年

315 收录的重要材料有列宁 1918 年《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pp. 68—84),就周到准备共产国际的问题给契切林(Chicherin)的信(pp. 119—21),有关把电影作为宣传工具的介绍(pp. 161—2 和 388—9),尤其重要的是列宁对革命中暴力的必要性和契卡宣传的、经济的以及暴力的作用所作的冗长反思(pp. 166—74)。列宁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和外国资本进行经济合作的乐观计划(pp. 175—80, 232—7, 239—48, 285—96),但是他后来被迫承认这个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政策并没有什么效果(p. 426)。本卷的结尾是《我们应该如何重组工农检察院》一文的重要草稿。在一个附录中,《关于莫斯科

组织成员的再登记表》是列宁近乎喜剧地轻描淡写特性的典型材料，在回答“你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哪些作品”这个问题时，列宁回答说：“（下划线作家的）几乎全部作品”。

第 43 卷，信件、笔记、电报等等，1893—1917 年

大量有关《火星报》和随后布尔什维克期刊的制作、分发和资金的日常通信。给第二国际的人物写信告知他们有关俄国党内的分裂状况，尤其是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米耶·胡斯曼(Camille Huysmans)写信。极力奉承奥古斯特·倍倍尔，饱含热情地赞美他正直的革命行为和德国模式理论上的成熟(pp. 232—3)。然而，不久之后(pp. 253—4)，他又转而正式写信抱怨社会民主党行政机构出版了匿名的、诋毁性文章来攻击俄国党内的所有倾向。他要是知道托洛茨基就是那位做坏事的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早先对托洛茨基的批判(p. 222)就会进一步增强。列宁还就组织和编辑事务给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卡尔宾斯基(Karpinsky)和伊涅萨·阿尔曼德(Inessa Armand)写了很多信件。他给哥尔特(Gorter)写信建议国际期刊谴责社会主义的背叛者(p. 453)。给加涅茨基(Hanecki)写信要求帮助实施计划使英国当局保证安全运送俄国的革命流亡者回国(pp. 622—3)。就建立第三国际写给拉狄克(Radek)的信(p. 632, 参见第 634—635 页)。

第 44 卷，信件、笔记、电报等等，1917—1920 年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对于协调苏维埃活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感兴趣，他对于军事、经济计划、电气化和科学创新和食物供给问题的细节尤其一丝不苟。他甚至亲自忙于处理要求保留他们住房的个人请愿。这些记录很少有超过半页纸的，它们几乎都具有极其具体的背景，对此更感兴趣的可能是专门的历史学家而不是普通的读者。有一些情况可能例外，即他要求从乌克兰农民征集粮食的严厉建议——对不履行责任的那些定义不清的“富家”判处死刑——斯大林应对此承担责任

(pp. 406—8);还有一封信介绍了列宁关于水力开采泥炭的技术“捷径”并以行政指令加以推广(pp. 456—8)。

第 45 卷,信件、笔记、电报等等,1920—1923 年

800 多个条目,绝大多数都非常简短且无关紧要。他写给梁赞诺夫的信件预示着要成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pp. 80—1),1921 年 2 月的信是关于有必要对农民让步和严重的粮食危机(p. 89),强调与农民的贸易对于避免崩溃至关重要(pp. 94—5)。下令季诺维耶夫照料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的墓(p. 138)。关于食品和燃油危机的信件,明确指示打击不服从行为,给高尔基的信恳求他去国外治病(p. 249)。在写给罗特斯坦(Rothstein)的信中解释说他疲劳过度,正在治疗(p. 255)。不断抱怨效率低下和繁文缛节;详细指导和敦促建设电站。在给温什利赫特(Unschlicht)的信中指示不公开革命特别法庭:立即枪杀以儆效尤(p. 454)。列宁向斯大林抱怨人事部门和精力都转移到了共产国际(pp. 598—9)。最后一卷的结尾是三封短信,要求托洛茨基在格鲁吉亚事件上攻击斯大林(p. 607);再次向格鲁吉亚的同志保证他正在关注这件事情(p. 608);还有一封是写给斯大林的,列宁要求他就冒犯自己妻子的事情道歉,否则就与他断绝关系(pp. 607—8)。

第 46 卷,索引,第一部分

本卷第一部分包含一份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列宁全集》收录的全部著作的清单,包括信件和笔记。第二部分是著作中提到的具体人物的姓名索引。

第 47 卷,索引,第二部分

本卷全部是主题索引,在苏维埃编辑者们认为是合适的主题思想的范围内,这个主题索引有用的。

附录3 按主题排列的列宁主要著作

综合性的著作		卷号	317
1899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3	
1916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22	
哲学著作			
1908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14	
1914	《卡尔·马克思》	21	
1915	《谈谈辩证法问题》	38	
政治战略			
1905	《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	10	
1910	《论俄国罢工统计》	16	
1916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23	
1917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	24	
1920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31	
党的组织			
1902	《怎么办?》	5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	6	
1905	《党的重组》	10	
1907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13	

1920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31
1922—23	《“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	36
土地纲领		
1902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	6
1906	《土地纲领草案》(工党土地纲领的第五次修改)	10
1917	《土地法令》	26
318	民族问题	
1913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20
1916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22
苏维埃国家的形成		
1917	《国家与革命》	25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26
1922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33
1923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33

索 引

(索引中的页码为原著页码,检索时请参见本书边码)

- agrarian question: 土地问题 85 - 6,
283, 284, 314; 也可参见 peasants
- Akselrod, P. B.: 阿克雪里罗得 36,
46, 282, 283, 284, 313, 314
- Althusser, L.: 阿尔都塞 225, 238
- anti-socialist laws: 反社会党人法 54 -
5
-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288
- Armand, I.: 阿尔曼德 297, 313, 316
- Babushkin, I. V.: 巴布什金 23
- Bakunin, M. A.: 巴枯宁 17
- Bebel, A.: 倍倍尔 53, 54, 60, 73,
315
- Berdyayev, N.: 别尔嘉耶夫 219
- Bernstein, E.: 伯恩斯坦 58 - 66, 67,
283, 304 - 5
- Bloody Sunday: 流血星期日 38
- Bogdanov, A. A.: 波格丹诺夫 49,
86, 220 - 2, 248, 287, 304
- Bolsheviks: 布尔什维克 emergence
of 的出现 36 - 7, 285; in 1917 在
1917 83, 99 - 106; an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和共产国际 183 - 8;
chronology of 的年表 290 - 94
- bourgeois politics: 资产阶级政治 9 -
12, 33, 44, 45, 65, 151 - 2, 167,
175 - 8, 262 - 3
- Bukharin, N. I.: 布哈林
on imperialist state 论帝国主义国家
46 - 7, 189; and proletarian state 和
无产阶级国家 190 - 2; anticipate
Lenin 先于列宁提出 202 - 3; and
dialectic 和辩证法 240; and redefi-
nition of socialist project 和重新思
考社会主义方案 123, 129, 246, 255,
256, 257, 258 - 9, 260, 289, 294,
307, 313

- capitalism in Russia: 俄国的资本主义
 Populists and 民粹主义者和 19 - 20, Lenin's analysis of 列宁的分析 18, 22 - 3
- Cheka: 契卡 258, 293, 315 也可参见 terror
- Chernov, V.: 切尔诺夫 80
- Chernyshevsky, N. G.: 车尔尼雪夫斯基 219, 226
- Chkeidze, N. S.: 齐赫泽 80, 81 - 2, 101
- commune: 公社 参见 Paris Commune
- commune state: 公社国家 85, 92, 291, 307 - 9, 310
- Communist (or Third) International: 共产(第三)国际 295, 296, 297, 298, 310, 311 consciousness: 意识 Marx, Kautsky and Lenin on 马克思, 考茨基, 列宁论意识 32 - 6; Lenin on 列宁论意识 171 - 4, 181 - 2, 273
- Constituent Assembly: 立宪会议 38, 80 - 1 102, 250 - 3, 281 - 2, 293, 310
- Constitutional Democrats: 立宪民主党人
 参见 Kadets
- Dan, F. I.: 丹 47, 100, 109
- Danton: 丹东 102
- Deich, L.: 波特列索夫 36
- democracy: 民主
 Engels and 恩格斯和 58 - 9; Bernstein on 伯恩斯坦论 9 - 10, 150 - 1, 166 - 9, 170 - 1, 175 - 8, 188, 196, 250 - 6, 274 - 5, 277, 311
- Democratic Centralists: 民主集中派 254, 255
- Deutscher, I.: 多伊彻 218
- dialectics: 辩证法
 Bernstein and 伯恩斯坦和 60 - 1; Engels and 恩格斯和 228 - 9, 236; Marx and 马克思和 227 - 8, 232; Lenin and 列宁和 229 - 42, 314; Stalin and 斯大林和 240
- dictatorship: 专政 154 - 9, 161 - 3, 261 - 3, 277, 309 - 11
- Dietzgen, J.: 狄慈根 225, 226
- Dreyfus, A.: 德雷富斯 72
- Duma: 杜马 39 - 41, 72, 80, 286, 303, 304
- Emancipation of Labour Group: 劳动解放社 282, 283
- Engels, F.: 恩格斯 on democratic road 论民主道路 58 - 9; on methodological flaw in Marxism 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缺陷 111; on philosophy 论哲学 220, 222, 224, 225, 228 - 9
- Erfurt Programme: 爱尔福特纲领 58
- Fabians: 费边主义者 63, 65, 69
- Feuerbach, L.: 费尔巴哈 225, 236, 288

- First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 34
-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 8-9, 52-4, 306-7
- Frank, S. L.: 弗兰克 219
- Freud, S.: 弗洛伊德 220
- Gapon, G.: 加蓬 38, 285
- general strike (mass strike): 大罢工 67-71
- Gershenzon, M. O.: 格尔申宗 O. 219
- Gorky, M.: 高尔基 220, 225, 248, 253, 316
- Guchkov, A. I.: 古契柯夫 80
- Guesde, J.: 盖德 63, 65, 75
- Hegel, G.: 黑格尔 Lenin and 列宁和 13, 77, 113-14, 230, 232-4, 236, 288, 314; Marx and 马克思和 227-8; Engels and 恩格斯和 229
- Hervé, G.: 阿尔威, G. 70-1, 72, 75, 305
- Hilferding, R.: 希法亭 127, 129
- Hobbes, T.: 霍布斯 123, 152
- Hobson, J.: 霍布森 120
- ideology: 意识形态 2-4, 112-15, 138-40, 239, 268-70, 277-80
- intelligentsia: 知识分子 23-4, 30, 33-36, 239
- Iskra (The Spark): 《火星报》31-2, 284-5, 301-2, 304, 313, 314
- Jacobins, Jacobinism: 雅各宾派, 雅各宾主义 16-17, 18-19, 20, 32, 48, 106, 182
- Jaurès J.: 饶勒斯 71, 73, 220
- Kadets (Constitutional Democrats): 立宪民主党 39-41, 47, 48, 80, 91, 96, 97, 99, 108, 304, 305, 306
- Kamenev, L. B.: 加米涅夫 81, 91, 104, 247, 249, 290, 292
- Kautsky, K.: 考茨基 on consciousness 论意识 32-3, 36, 273; on Erfurt Programme 论爱尔福特纲领 38; and revisionism 和修正主义 65, 66-7; and mass strike 和大罢工 69-70, 71, 72; and 'super imperialism' 和超帝国主义 134, on 1905 论 1905 年 286; as critic of dictatorship in Russia 作为俄国独裁的批判家 259, 309-10
- Kerensky, A.: 克伦斯基 80, 97, 100, 102, 103, 106, 281, 291
- Kienthal (Conference): 昆塔尔(会议) 76, 289, 314
- Kolakowski, L.: 科拉科夫斯基 33,

- 224
- Kornilov, L. : 科尔尼洛夫 87, 99 - 100, 291
- Kronstadt: 喀琅施塔得 102, 109, 257, 258, 291, 297
- Krupskaya, N. : 克鲁普斯卡娅 75, 86, 247, 283, 290
- labour theory of value: 劳动价值论 116 - 19
- Lenin, V. I. :** 列宁
- career: 生平 revolutionary apprenticeship 革命的学徒期 18 - 22, analysis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俄国资本主义的分析 22 - 3; propaganda, agitation and workers' circles 宣传, 鼓动和工人圈子 23 - 8, *Iskra* and *What Is to Be Done?* 《火星报》和《怎么办?》28 - 37, and 2nd Party Congress 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 284 - 5, 301 - 2; 1905 Revolution 1905 年革命 42 - 6, 285 - 6, 302 - 3; and peasantry 和农民 19 - 23, 43 - 4, 85 - 6, 98, 154;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 8 - 9, 53, 75 - 8, 288 - 9, 306 - 7; 1917, 81 - 3, 92 - 5, 99 - 100, 289 - 93, 308 - 9; and soviets 和苏维埃 85, 94 - 5, 50 - 2, 163 - 5, 277; and commune 和公社 85, 92, 147 - 52, 155 - 6, 159, 160; civil war 国内战争 294 - 6, 309 - 10; and Communist (Third) International 和共产国际 (第三) 184 - 6, 276 - 7; and trade union debate 和工会争论 297, 311; and declassing of proletariat 和无产阶级丧失阶级特性 154 - 61, 163 - 4, 188 - 9, 310 - 12; and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 和无产阶级专政 154 - 63, 156 - 9, 167, 310 - 11; and Kronstadt rebellion 喀琅施塔得叛乱 297; and ban on factions and opposition 和派别禁令与反对派 186 - 7, 254 - 58; and struggle with Stalin 和斯大林的斗争 195, 245 - 8, 298 - 9, 316; as Stalin's patron 作为斯大林的保护人 192 - 3, 248 - 50, 253, 256, 259 - 63; relativism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相对主义和政治的终结 152 - 4, 157 - 9, 165 - 9, 254 - 63; and redefinition of socialism 和重新定义社会主义 165 - 9, 192 - 3, 258 - 63, 309 - 12
- on democracy: 论民主 9 - 10, 94, 150 - 1, 166 - 9, 170 - 1, 175, 188, 196, 250 - 6, 274 - 5, 277; on dictatorship 论专政 154 - 63, 261 - 3, 277, 310 - 11; on state 论国家 9, 85, 94, 125 - 6, 129, 145 - 54; on

- science 论科学 167 - 9, 170 - 1, 240 - 2, 260, 271, 273 - 5; and Marxism 和马克思主义 4, 6 - 7, 9 - 11, 13 - 14, 20 - 1, 33 - 6, 43 - 4, 45, 48, 49, 57 - 8, 59, 65, 77 - 8, 102, 107 - 8, 110 - 19, 140, 144, 146, 148 - 50, 172 - 4, 197 - 8, 210, 226 - 8, 233 - 4, 306; and Hegel 和黑格尔 13, 113 - 14, 226, 228, 230, 232, 233 - 4, 236, 271 - 3, 237, 264; and intelligentsia 和知识分子 273, 172 - 4, 180, 238 - 40; as doctrinaire 作为教条主义者 48 - 51, 59 - 60, 77 - 8, 107 - 8, 111 - 12, 151 - 2, 156 - 7, 169
-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个人特性 1, 75, 104, 110, 243 - 4; emergence of ideology 意识形态的出现 1 - 4, 7, 11 - 14, 15 - 18, 52, 77 - 8, 82, 238; character of ideology 意识形态的性质 2 - 4, 111 - 12, 138 - 40, 209, 238 - 42, 268 - 70, 277 - 80; interpretations of 的解释 4 - 7, 15 - 18, 35 - 6; and philosophy/dialectic 和哲学/辩证法 12 - 14, 49, 77 - 8, 113 - 14, 136, 143, 168 - 9, 220 - 6, 229 - 42, 264 - 6, 270 - 1, 273 - 4, 287, 304, 314; theory of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理论, 83 - 4, 111 - 16, 119 - 41, 266 - 8, 288, 289, 307; on the role of bank 论银行的作用 85, 123, 126 - 7, 129, 136; on export of capital 论资本的输 出 119 - 21, 130 - 1; on uneven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论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 128 - 31, 138, 203 - 5; on colonialism 论殖民主义 133 - 4, 135, 138 - 40; on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论民族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 132 - 4, 199 - 205, 214 - 15, 306; on super profits and aristocracy of labour 论超额利润和工人贵族 120 - 1, 136, 139, 205 - 8, 209 - 10; on phase of capitalism 论资本主义的阶段 8 - 9, 21 - 3, 93 - 4, 114 - 15, 125 - 6, 145 - 6; on 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 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84, 119 - 24, 126, 129, 143 - 8, 157 - 8; on imperialist state 论帝国主义国家 120 - 4, 126, 129, 131, 134 - 5, 137 - 8, 143, 144 - 60, 152, 156, 157 - 8;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论国际政治 131 - 6; on social democracy betrayal 论社会民主党的背叛 10 - 11, 52, 76, 114, 124, 136, 185, 207, 271 - 2; on Mensheviks/Liquidators 论孟什维克/取消派 37, 41 - 2, 46 - 9, 84, 108 - 9, 287, 305, 306; on-

- bourgeois politics 论资产阶级政治 9 - 12, 33, 44, 45, 65, 135 - 6, 262 - 3
- on Party: 论党 overview of 的概述 26 - 33, 36 - 7; organization of 的组织 28 - 32, 37, 183 - 8, 195 - 6, 244; against federalism in 反对联邦制 211 - 12; and unanimity in 和全体一致 167 - 9, 170 - 1, 185 - 7, 241 - 2, 256 - 6, 274 - 5; Industrial base of 的工业基础 178 - 9; and trade unions 和工会 179 - 80, 192, 254, 295 - 6, 297, 298, 310 - 12; and politics of confrontation 和政治对抗 9 - 10, 12, 176 - 8; and class 和阶级 27 - 30, 172 - 4, 180 - 3; and army 和军队 76, 178; and military model 和军事模式 161 - 1, 181, 185; degeneration of 的变质 194 - 6
- on proletariat: 论无产阶级 23, 144, 178 - 9, 213 - 14;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的发展阶段 25 - 8; and consciousness 和意识 32 - 6, 171 - 4, 181 - 2, 273; on terror 论恐怖 258, 262
- works (selected) of: 的著作(选集) *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 …《什么是人民之友…》17, 21, 282, 300;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21 - 3, 283 - 301; *What Is to Be Done?*《怎么办?》16, 29 - 33, 36 - 7, 180, 284 - 5, 301 - 2, 304, 305; *The Agrarian Programme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284, 302; *One Step Forwards Two Steps Back*《进一步,退两步》285, 302; *Materalism and Empirio - Criticism*《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49, 224 - 6, 229, 237, 287, 304, 314;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13 - 15, 119 - 21, 142, 268, 288, 289, 307; *Philosophical Notebooks*《哲学笔记》228, 234, 237, 268, 288, 314; *April Theses* (‘Tasks of the Proletariat in the Current Revolution’)《四月提纲》(“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82 - 3, 85 - 7, 90, 96, 107, 308;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国家与革命》107, 137, 258, 268, 291, 308, 309; *Can the Bolsheviks Retain State Power?*《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46, 268, 292, 308; *Letter to the Congress* (‘Testament’)《给代表大会的信》(“遗嘱”)240, 257, 298, 318;

- How We Should Reorganise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Inspection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 245 - 6, 299, 312
-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64, 65, 121, 277
- Liquidationists: 取消主义者 48
- Locke, J.: 洛克, J. 116, 152
- Lukács, G.: 卢卡奇 108, 114
- Lunacharsky, A. V.: 卢那察尔斯基 49, 248, 287, 304
- Luxemburg, R.: 卢森堡 54, 64, 65, 66, on national movement 论民族运动 202 - 3, on Lenin as anti-democrat 论作为反民主的列宁 251 - 2, 285, 286, 295
- Mach, E.: 马赫 220, 221, 222, 304
- Martov, J.: 马尔托夫 24, 30, 36 - 7, 54, 100, 285, 286
- Marx, K.: 马克思 on consciousness and intelligentsia 论意识和知识分子 33 - 6, 239; on party 论党 172 - 6; on revolution 论革命 45, 88 - 90, 140; on general strike 论大罢工 68 - 9; on capitalism 论资本主义 116 - 19; on universalism and species identity 论普遍主义和种族认同 197 - 8, 200 - 1, 210, 212, 221, 224; on Paris Commune 论巴黎公社 148 - 52; on labour aristocracy 论工人贵族 207; and dialectic and辩证法 226 - 8, 232, 264 - 5; Bernstein's critique of 伯恩斯坦的批判 60 - 5; 也可参见 Lenin; Engels
- particular works of: 重要的著作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宣言》 4, 35, 57, 239; *Capital* 《资本论》 20, 119, 237; 'Preface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88; The *Paris Manuscripts (or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巴黎手稿》(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97 - 8; *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法兰西阶级斗争》 111, 228;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法兰西内战》 148 - 50;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228,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236 - 7
- mass strike: 大罢工 67 - 72, 306
- maximum programme: 最高纲领 56 - 9
- Mensheviks: 孟什维克 origin of 的起源 37, 41 - 2, 83, 84, 285; critique

- of Bolsheviks in 1917 1917 年布尔什维克的批判 86 - 90, 100, 108 - 9, 114, 286, 287, 290, 295, 304, 305
- Mill, J. S. : 密尔 152
- Millerand, F. : 米勒兰 72
- Milukov, P. N. : 米留可夫 80, 86, 97
- minimum program: 最低纲领 44, 56 - 9, 92, 302
- Narodnaya Volya (The People's Will): 民意党 17, 281
- Narodniks: 《工作者》, 参见 Russian Socialism
- Nechaev, S. V. : 涅恰也夫 6
- Neue Zeit* (New Times): 《新时代》 65
- Nietzsche F. : 尼采 220
- Niewenhuis, D. : 纽文胡斯 70, 72
- Novaya Zhizn* (New Life): 《新生活》 253
- On Agitation*: 《论鼓动》 24 - 8, 282
- Ordjonikidze, G. K. : 奥尔忠尼启则, G. K. 248
- Paris Commune: 巴黎公社 69, 85, 148 - 50, 303, 308 - 9
- Parvus, A. I. : 帕尔乌斯 41 - 2, 65
- peasants: 农民 21 - 2, 39 - 40, 43 - 4, 98, 154
- Petrograd: 彼得格勒 102, 109
- philosophy: 哲学 12 - 14; 也可参见 dialectics; Hegel
- Plekhanov, G. V. : 普列汉诺夫 26, 30, 33; and 2nd Party Congress 和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 36 - 7; and 1905 - 7 和 1905 - 7 46, 47, 49; and philosophy 和哲学 66, 71, 86, 219, 220, 222, 225, 226, 232, 233, 257, 281, 282, 283, 284, 287, 313, 314, 316
- Polan, A. J. : 波朗 151
- Populism: 民粹主义 参见 Russian Socialism
- Pravda* (Truth): 《真理报》 81, 82 - 3, 96, 99, 287
-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资本的原始积累 117, 130, 190
-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ies: 职业革命家 31 - 2
- proletariat position and role of: 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 23, 25 - 8, 287, 300; workers' circles and 劳工界 23 - 6, 144, 171 - 4, 181 - 2; consciousness and organization in 的意识和组织 23 - 8; according to Marx 马克思的观点 33 - 6, in Bernstein's assessment 伯恩斯坦的评价 62 - 3; ripeness for revolution 成熟的革命 89 - 90; declassing of

- according to Lenin 列宁所谓的阶级特性的丧失 154, 161, 163 - 4, 188 - 9, 118 310 - 12
- Proudhon, P. J. : 蒲鲁东 34
- Provisional Government: 临时政府 84, 86, 87, 290, 292
- Putilov plant: 普梯洛夫工厂 79, 144
- Rabochaya Gazeta* (Workers' Gazette):《工人报》87, 301
- Rabochaya Mysl* (Workers' Thought):《工人思想报》29, 66, 283 - 4
- Red Guards: 赤卫队 100, 105, 110, 291
- revisionism: 修正主义 283, 304 - 5; 也可参见 Bernstein
- Rousseau, J. - J. : 卢梭 152
- RSDLP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6, 28; Second Congress of 第二次代表大会 30 - 1, 33, 36, 44, 46, 47, 92, 211, 220, 283, 284 - 5
- Russian Socialism (or Populism): 俄国社会主义(或民粹主义) 19 - 20, 282
- Rykov, A. I. : 李可夫, 91
- Seco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第二(社会主义)国际 10 - 11, 26, 53 - 54, 56 - 8, 66, 67 - 8, 72 - 5, 76, 233, 238, 288, 306 - 7
-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SPD): 德国社会民主党 54 - 9, 288, 315
-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SRs): 社会革命党人 40, 80, 87, 90, 91, 96, 99, 108, 294, 295
- Solovyov, V. : 索洛维约夫 220
- soviets: 苏维埃 in 1905 在 1905 年 38 - 9, 46; in 1917 在 1917 年 79 - 80, 84, 85 - 6, 87, 90, 94 - 5, 97 - 9, 101, 102, 106; in Kronstadt 在喀琅施塔得 163 - 5, 252 - 3, 258, 286, 290, 291, 293, 303
- Stalin, J. V. : 斯大林 81; and national question 和民族问题 215 - 16, 248 - 9; and dialectics 和辩证法 240;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个人特性 243 - 4; and party 和党 193 - 4, 244 - 5; career to 1924 1924 年的事业 192, 248 - 50, 290; split with Lenin 与列宁的分裂 313; and Lenin myth 和列宁神话 193 - 5; and debt to Lenin 感谢列宁 248 - 50, 253, 256, 259 - 63; and ban on factions 和派别禁令 254 - 6; and Georgian affair 和格鲁吉亚事务 216, 316; and re - definition of socialism 和重新定义社会主义 259 - 61; relativism

- of 相对主义 258 - 63
- state: 国家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历史进化 125 - 6; Lenin on imperialist state 列宁论帝国主义国家 120 - 4, 126, 129, 131, 134 - 5, 137 - 8, 143, 146 - 50, 156, 157 - 8; Bukharin on proletarian state 布哈林论无产阶级国家 190 - 2; redundancy of nation state 民族国家的冗余 199 - 202, 267; rentier state 食利国 205 - 8; commune state 公社国家 85, 92, 147 - 52, 155 - 6, 159, 160
- 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84, 121 - 3
- Struve, P. 司徒卢威, P. 219, 220, 283
- Stuttgart resolution 斯图加特决议 53 - 4, 286
- Sukhanov, N. 苏克汉诺夫, N. 81, 107
- Sverdlov J. 斯维尔德洛夫, J. 250
- Syndicalism 工团主义 68
- Trotsky, L. : 托洛茨基 17, 41; and permanent revolution 和不断革命 42, 47, 108; in 1917 在 1917 年 100, 101, 104, 110; and Georgian affair 和格鲁吉亚事务 247, 216, 246, 247, 249, 255, 256, 258, 259, 290, 291, 313, 315
- Trudoviks: 劳动社 40, 43
- Tseretelli, H. : 策列铁里 80
- Tucker, R. : 塔克 248
- Ulyanov, A. : 乌里扬诺夫 15, 18, 281, 314
- Weitling, W. : 魏特林 34
- Workers' Opposition: 工人反对派 254, 255, 257
- Zaichnevsky, P. G. : 扎伊奇涅夫斯基 6, 17
- Zasulich, V. : 查苏利奇 36, 316
- Zetkin, C. : 蔡特金 71
- Zimmerwald (conference of): 齐美尔瓦尔德(会议) 76, 83, 289, 307
- Zinoviev, G. : 季诺维也夫 104, 105, 247, 249, 292, 316
- Zola, E. : 佐拉 69
- terror(ism): 恐怖(主义) 293, 316; 也可参见 Cheka
- Third International: 第三国际 参见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 Tkachev, P. : 特卡乔夫 6, 17
- trade unions: 工会 179 - 80, 192, 254, 295, 296, 297, 298, 310 - 12

延伸阅读

列宁的著作：

335

《列宁选集》有很多版本，读者应当注意这些版本取舍文本的理由，这种编辑通常反映政治倾向和编辑们的学术关切。在较小的程度上，45卷本《列宁全集》(加上两卷索引)存在着类似的苛评，这个版本对非俄语读者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资料来源，它是由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60—1970年间出版。它的绝大部分是对俄文第四版(扩展版)的一种翻译。然而，与此同时，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下令准备出版第五版55卷，(*the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a*, Moscow, 1958—65)并声称是“完整的”。毫无疑问，出版这个版本的部分动机是政治性的。列宁批评斯大林的文章在俄国首次公开，无疑是想使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运动合法化。俄文第五版最重要的新材料是增补的材料和信件，构成了英文版《列宁全集》第41—45卷。学者们一直以来都在质疑俄文第五版的“完整性”，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解禁档案也证实了这种看法，即有很多更为尖锐的、无情的列宁通信并未出版。本书附录2是《列宁全集》的导读，它在第300—316页。

关于列宁的著作：

综合性的著作

最完整的政治传记是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经过缜密研究和平衡的著作《列宁：政治生涯》(3 vols, London, 1985—94)。多年之内都不可能再有这种全面的著作。瑟维斯承认列宁理论关注的重要性,但其著作的主要部分则被用来探讨语境问题、个人和党的事务以及实际的政治问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的《列宁的政治思想》(*Lenin's Political Life*, 2 vols, London, 1977 and 1981)仍然是对列宁思想传记的最完整论述,展现了列宁的思想结构,它是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比以前被承认的马克思主义在结构上更加一致。其目的是为了再现一个人的思想发展,而不是(正如在本书中那样)批判性地关注其意识形态地位。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精湛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流》(3 vols, Oxford, 1981)把列宁的贡献放在欧洲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加以评价,并且在第二卷中对列宁的思想作了一种简要而清晰的分析。A. J. 波朗(A. J. Polan)的《列宁和政治的终结》(*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London, 1984)正如其书名那样所提示的那样,批评了列宁狭隘的乌托邦式的政治概念,作者强调,这对苏维埃式的政权具有持久的、有害的影响。摩西·卢因(Moshe Lewin)的《列宁最后的斗争》(*Lenin's Last Struggle*, New York, 1968)详细叙述了列宁改革党、抑制官僚主义和打破斯大林权力的徒劳努力。

列宁主义

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和《列宁主义的问题》(1926年)(载于约瑟夫·斯大林的《列宁主义》,London, 1940)这些文本定义了共产主义者的列宁主义时代。对作为一种动员性意识形态的列宁主义作了较好评论的著作有A. G. 迈尔(A. G. Meyer)的《列宁主义》(*Leninism*) (New York, 1962)和M. 利布曼(M. Liebman)提出列宁的自由主义和独裁主义不相容的二元论著作《列宁领导下的列宁主义》

(*Leninism under Lenin*, London, 1975)。大卫·莱恩(David Lane)的《列宁主义:一种社会学的阐释》(*Lenin: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1981)的内容比书名所提示的要多得多,也有助于讨论其观点的学术化解释的范围。阿兰·贝桑松(Alain Besancon)的《列宁主义的思想起源》(*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Leninism*, Oxford, 1981)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列宁主义根源于俄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信仰和理性的“矛盾复合体”,而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四卷本的《列宁》(*Leninism*, London, 1975—79)赞同性地论述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但它却避而不谈艰深的环节和文本。多米尼克·科拉(Dominique Colas)的《列宁主义》(*Le Leninisme*, Paris, 1982)是一种极富洞察力的主题研究、强有力的文本注释和心理剖析。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Lenin: A Study of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强调了列宁具有在日常的政治实践中清楚地表达抽象理论的能力,而罗莎·卢森堡的《列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Leninism or Marxism*)和《论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n Arbor, Mich., 1961)对列宁关于党组织及其作为苏维埃国家领导者的理论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安杰伊·瓦利茨基(Andrzej Walicki)的《马克思主义和向自由王国的飞跃》(*Marxism and the Leap to the Kingdom of Freedom*, Cambridge, 1995)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自由思想是如何突变为专制主义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明。

传记

传记材料的范围广泛,价值不一。苏联出版的版本(匿名的但是权威的《列宁传记》[*Lenin: A Biography*,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983]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把列宁描述为是个人品德尽善尽美的典范和成功制定苏维埃国家政策的创始人。果不出所料,来自后苏俄的诸如政论家迪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的《列宁:生活和遗产》(London, 1994)则把列宁形象地描述为是追逐权力和运用权力的堕落与疯狂之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在他的《列

337 宁在苏黎世》(*Lenin in Zurich*, London, 1975)中更早就曾使列宁更加人性化——一位既有琐碎小事又有宏伟大事的人,也经常受困于偏头痛的人。罗尔夫·W. 西恩的《列宁:革命的发生和发展》(London, 1974),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的《列宁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Lenin*, London, 1964)和内森·莱茨的《布尔什维主义研究》(Glencoe, Ill., 1953)都是他们那个的时代有影响力的作品,把列宁描述为受权力欲望驱使并且(或)受到潜意识驱使的人,这些欲望和潜意识才是他思想和活动的真正动机。仍然受到好评的更为平衡的描述并且把注释和评论明智而审慎地结合在一起的著作有亚当·乌拉姆(Adam Ulam)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Lenin and Bolsheviks*, London, 1969),尼娜·古芬凯尔(Nina Gourfinkel)的《列宁的肖像》(*Portrait of Lenin*, New York, 1972),埃德蒙·威尔逊的《走向芬兰站》(London, 1960)和波特莱姆 D. 沃尔夫的《三人中谁制造了一场革命》(Harmondsworth, 1966)。大卫·舒布(David Shub)的《列宁》(*Lenin*, Harmondsworth, 1966)仍然是大体上值得信赖的短篇介绍。

辅助材料

通过阅读更具专业性的背景材料通常可以完全理解对具体事件或文本的解释。这里列出的清单并不完整但都是较有用的:Abe Ascher, *Pavel Axelr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nshevism* (Cambridge, Mass., 1972); Samuel Baron, *Plekhanov, The 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 (London, 1963); Stephen Cohen, *Bukhar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71); Isaac Deutscher *Trotsky*, 3 vols (Oxford, 195, 1959, 1963) (vol. 1, *The Prophet Armed*; vol. 2, *The Prophet Unarmed*; vol. 3, *The Prophet Outcast*)。还可以参看这位作家的著作:*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Oxford, 1950); Israel Getzler, *Martov: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a Russian Social Democrat* (Cambridge, 1967); Leopold Haimson, *The Russian Marxists and 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Cambridge, Mass., 1955); John Keep, *The*

Ris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Russia (London, 1963); Baruch Knei-Paz,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 (Oxford, 1978); Richard Pipes,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St Petersburg Labour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 1963); Alan Wildman, *The Making of a Workers' Revolution* (Chicago, 1967); R. Craig Nation, *War on War: Lenin, the Zimmerwald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m* (London, 1989)。

译后记

《列宁主义》是当代西方“列宁学”的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发表于1996年，其作者是英国的尼尔·哈丁教授。尼尔·哈丁是英国威尔士斯旺西大学政府与政治理论系主任、政治学教授，当代西方著名的“列宁学”专家。他早年撰写的两卷本著作《列宁的政治思想》（1978—1981）于1983年获得了艾萨克·多伊彻纪念奖。尼尔·哈丁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实现了西方“列宁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即从一种几乎完全聚焦于列宁的先锋队政党思想的研究转移到对列宁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著作的研究上来。尼尔·哈丁所关注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这样一些政治和经济著作，而不是列宁的《怎么办？》。在《列宁主义》一书中，尼尔·哈丁一如既往地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基本观点和流行见解加以批判，并试图重新阐释列宁主义。如果说，哈丁在早期还试图把列宁描述成一位充满自由主义冲动的思想家的话，那么作为对苏联垮台和最新公布的苏联档案的一种回应，《列宁主义》则更倾向于用一种否定的方式来看待列宁及其思想。例如尼尔·哈丁不赞成把列宁主义描绘成一种落后的政治学，而是认为列宁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同时又认为列宁主义再现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教条而狭隘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主题，并强调“不应该设想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紧密就会有好的口碑”。但是，透过其意识

形态的理论词句,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得到一些理论启示。哈丁在《列宁主义》中提出,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源自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作的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回应;列宁主义的巨大吸引力在于它不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进行了全面批判,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替代方案。列宁主义具有连贯而清晰的特性,它不仅区别并对立于全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与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意识形态也划清了界限,而列宁主义这一特性的根源在于它是在极其紧凑的一段时间内一个人思想的产物。哈丁还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论述列宁主义的哲学,以弥补其早期论著的显著不足。在本书中哈丁把列宁的哲学理解为一种“确定性的哲学”,并把它与其所理解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本书的翻译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南京大学张一兵老师的关心和指导,张老师在百忙之中阅读了本书的译稿,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并且慷慨地把本书纳入到他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我还要感谢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姚顺良老师、唐正东教授、陈亚军教授、王恒教授、孟振华博士、周嘉昕博士、刘鹏博士,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责任编辑李乾坤先生为本书出版付出了大量努力,在此也向他表达我由衷的感谢。在翻译期间,本书的作者尼尔·哈丁教授曾前来我校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访问,我也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就翻译中所遇到的问题向他请教,尼尔·哈丁教授都耐心细致地加以解答,并向译者赠送了他的这本英文著作。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原书中放在正文后面的注释,现分别放在了各章的后面,本书也根据原书页码加注了边码。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传平

2013年11月